

通向义宁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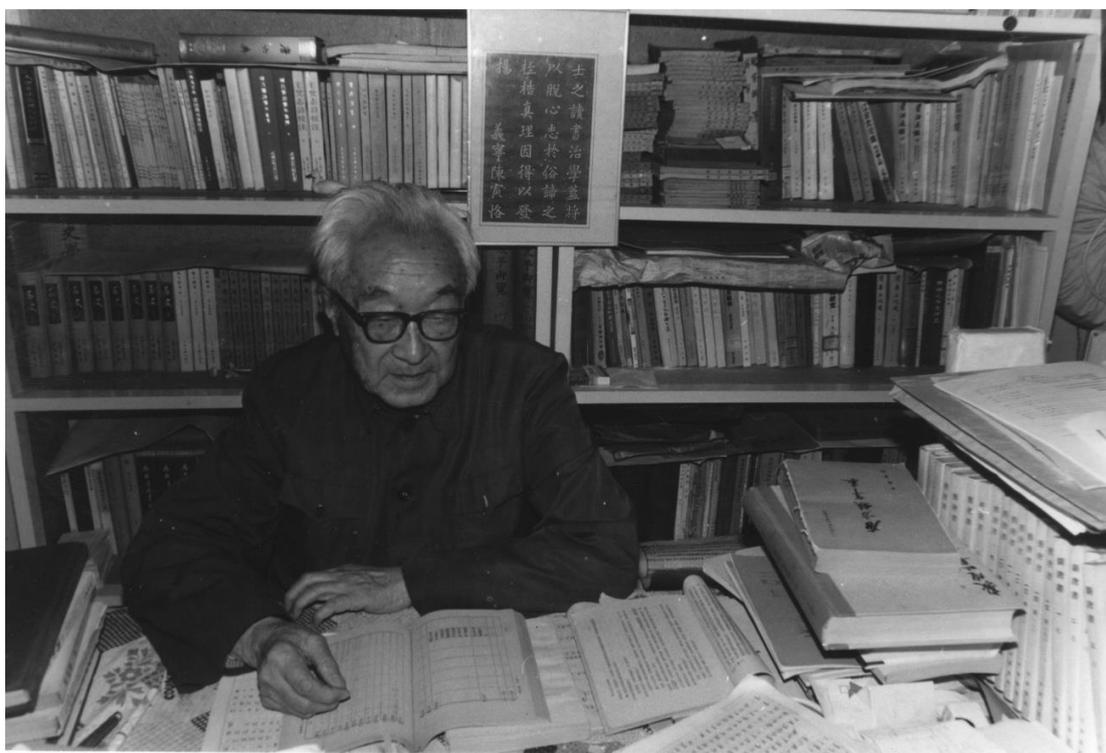
——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

《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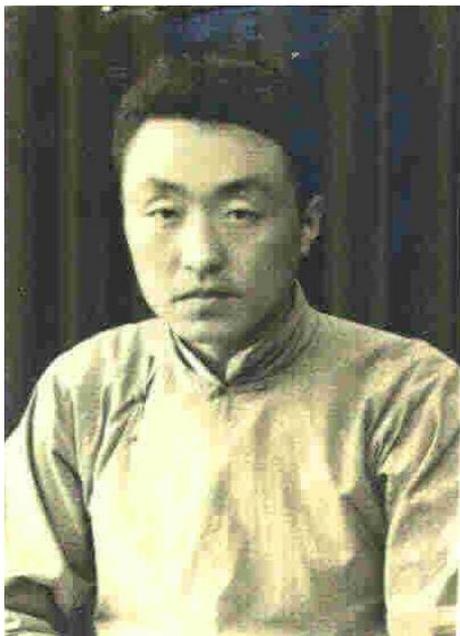
2009年



王永兴先生（1914-2008）



1995年10月在北大蔚秀园书房，侯艺兵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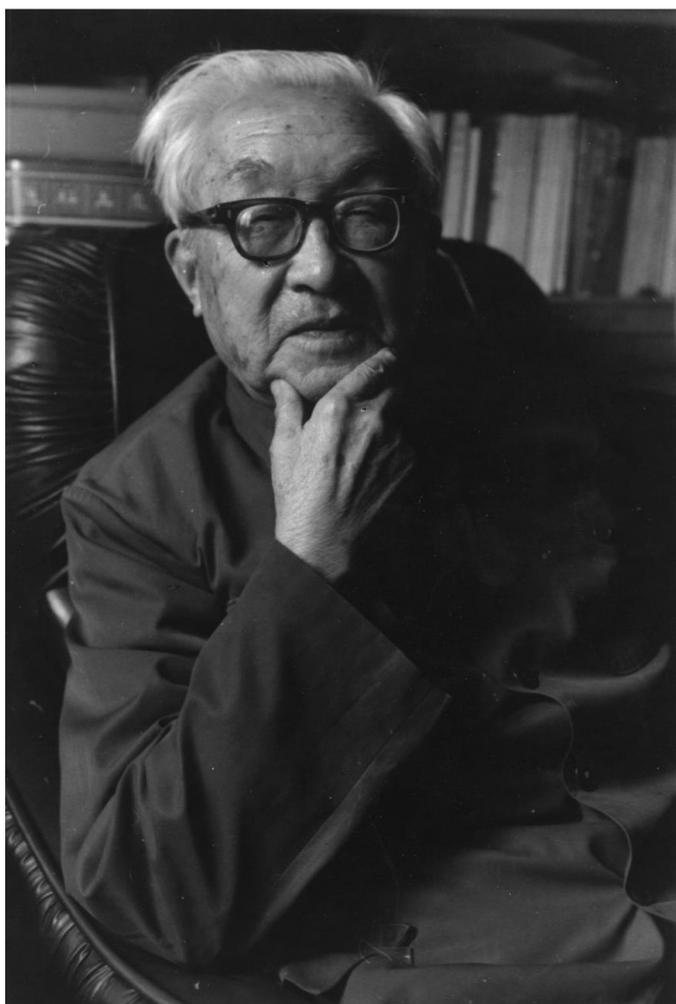
1938 年于长沙临时大学



1940 年 11 月 28 日摄于昆明北郊龙泉镇宝台山北大文科研究所。左起：殷法鲁、周法高、马学良、阎文儒、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董庶、王明、王玉哲、王永兴。



1958年在山西教育学院



1995年10月在北大蔚秀园书房，侯艺兵摄。



2006年在香山植物园。



程应镠与王永兴于上海师大，1985年。



王永兴与王锺翰于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书房，2002年9月25日



王永兴与李埏，1993年于北大蔚秀园



1996年1月12日于北京中关村，左起：徐述华、李锦绣、王永兴、李赋宁。



王永兴与周一良，2000年7月8日于北大燕北园荷斋



与赵守俨在中华书局，1988年



1985年8月7日摄于新疆天池，左起：宿白、周一良、姜伯勤、池田温、王永生。



1988年5月26日广州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王永兴、邓广铭、杨志玖、韩国磐，右三为田余庆。



1994年6月14日摄于北大蔚秀园，左起：李锦绣、金锋、王永兴、吴丽娱、王宏治、卢向前。



1994年6月16日摄于，左起，第一排：宁欣、李锦绣、李志生、李鸿宾；第二排：祝总斌、王永兴、吴宗国、赵和平；第三排：吴丽娱、王宏治、卢向前、牛来颖、金锋。



2007年夏全家聚会，左起，前排：李锦绣、王永兴；后排：王珠文、魏建业、王珠眉、王珠群、钟永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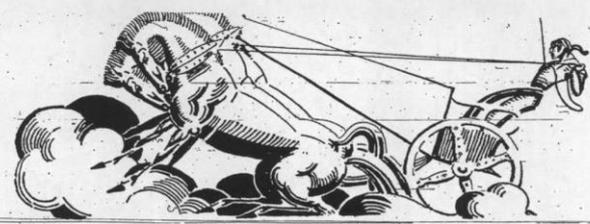
學生與國家

顧哲剛題

1



半年月刊
第六分



學生與國家 第一卷 第三期 目次

青年界紀念孫中山	徐芸書 (一)
外交成功、國策失敗	章毅生 (三)
中日外交中的遮眼法	宋士英 (五)
聯合戰線的管見	千家駒 (八)
青年思想獨立宣言	蔣弗華 (一〇)
法蘭西革命的精神未死 (法國 A. Maurois)	邵森棧譯 (一四)
西北四省的近况與問題	梅貽寶 (一九)
國論介紹	
壯丁訓練與學生	邱梅 (二二)
一段歷史的回憶	大公報 (二三)
關於取締救國團體	益世報 (二四)
學校通信	
十一月七日晨紅山口	魏東明 (二六)
北京大學師生應徵會詳記	魏東明 (二八)
八里莊印像	李敏 (二八)
內地的呼聲 (運城通信)	新報 (三三)
世界青年擁護中國解放運動 (巴黎通信)	新民 (三四)
編輯後記	(三五)

目 录

- 怀念王永兴兄 鯤西
- 悼王永兴教授 吴承明
- 见王永兴讣告随想 黄明信
- 怀念王永兴先生 吴小如
- 深切怀念王永兴先生 王尧
- 王永兴先生与命运 沙知
- 忆王老与郑老的交谊 郑克扬 郑克晟
- 唯一以数十万字专著阐述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优秀受业弟子 丁则勤
- “义宁之学”的弘扬者 蔡鸿生
- 王永兴与清华工农速成中学 郭德魁
- 纪念王永兴先生 武尚清
- 清华园中的永兴师 殷叙彝
- 殚精竭虑 贡献史坛——追忆王永兴先生在清华历史系的一些往事 刘桂生 杨树先
- 夏应元 钱逊
- 纪念王永兴先生 唐耕耦
- 敬悼王永兴先生 董宝光
- 记王永兴先生二、三事 徐自强
- 缅怀著名史学家一代敦煌学宗师王永兴教授 程喜霖
- 提携后进 诲人不倦——永兴先生仙逝周年祭 马世长
- 怀念恩师永兴先生 施建中
- 陳門不了情——追思王永兴先生二三事 林悟殊
- 王永兴先生与上海师大和我 严耀中
- 忆王永兴先生 王守常
- 我印象中的王永兴先生 赵珩
- 憶王永兴先生 王春梅
- 悼念王永兴先生 曹克俭
- 忆念王永兴先生 王邦维
- 回忆王永兴伯伯 程怡
- 中州朔望 雨露河汾——纪念我国著名隋唐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先生 丁克诤
- 回忆王永兴先生 郝春文
-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怀念王永兴先生 张国刚

缅怀王永兴先生 钱文忠
良师·益友·亲人——追忆王永兴先生 李平卫
敬怀王永兴教授 任士英

跟随王先生念书 邓小南
感忆王永兴先生 王小甫
怀念王永兴先生 阎步克
忆王永兴先生 陈苏镇
春天里的思念 马小红
读书须先识字——记王永兴先生的教诲 荣新江
往事杂忆——缅怀王永兴先生 张帆
与天壤同久 共三光永光——追忆王永兴先生 王宏治
王先生教我做学问 吴丽娱
清明祭先生 卢向前
永远的“213”——深切缅怀王永兴先生 宁欣
回忆我的导师王永兴先生 李鸿宾
难忘师恩——怀念王永兴先生 孙顺华
对王永兴先生培养学生的点滴回忆 李志生
健斋前的石阶 牛来颖
谆谆教诲 永世难忘 俞钢
菊花残 人断肠——谨以此文悼念恩师王永兴先生 张剑光

“义宁之学”的传人 胡守为
考释详实 正本清源——读王永兴先生《田制文书考释》 郑学檬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读后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刘进宝

怀念王永兴教授 池田温
追忆恩师王永兴先生——我的北京大学留学回忆 气贺泽保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永兴先生の歴史学 渡辺信一郎
真情悼念王永兴教授 长部悦弘
王永兴先生の想い出 辻正博

漫步在北大蔚蓝的天空下 李锦绣

父親走了 王珠群

王永兴先生年谱 李锦绣编

王永兴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李锦绣编

后记

怀念王永兴兄

鲲西

与永兴兄相识在上世纪三五、三六年之间，在清华园，我是迟来者。回忆那时与永兴兄交往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华园中学生的左派由来已久，有明的有暗的，随便举一例，外文系何凤元就是最出色的一个，今知其人者寥寥无几矣。永兴兄也这样，我认识他时，他正全身投在救亡运动中，而园中左派甚多，我熟悉的则是另一批，所以早时与永兴接触甚少，五十年交谊尽在卢沟桥变起南下之后。

但早先也有一事于我印象极深，即偶过蒋南翔宿舍，瞥见永兴家有人看望他，也是高个子，容貌酷似，我先以为是永兴兄的尊人，后来才晓得是他的大伯父。可以想见永兴兄的家人为他能够考取清华是多么的骄傲！谁知此时的永兴正忙于搞学运，尚无心于攻读。而且最近才得知永兴原报考中文系，后来才转历史系。显示永兴兄坚强的个性与意志力的一面是他在临考试前才对不足的学科突击补习，与他相同的是同级的赵牲君，买二三十本练习，把数学全部复习一过，终于以不低的名次被录取。这一种坚韧性，正是我所缺少的，因而他们二人的进取性成为我自励的好榜样。

一二九运动实际上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而爆发的，那时的背景是日寇步步进迫，整个华北的老百姓无不愤恨填膺，所以当涌上街头的学生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是这次运动最动人的一刻，据当时的报导说，连胡适都深受感动。

一二九运动改变了清华园的学风，其程度超过其他院校。随着卢沟桥变起，三校南迁，历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才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正是在蒙自，我才与永兴接触更密切，同时，永兴和徐高阮才正式听陈寅恪先生讲课。蒙自虽是小城，而风景宜人，陈先生有诗咏蒙自：“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云云。蒙自小聚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时相处的有永兴，丁则良，王逊，许国璋，王佐良，皆校中精英。三八年我毕业后去渝，四〇年再回昆明，与徐高阮、永兴、薛观涛同赁屋文林街光宗巷有一年之久。我记得此时任永兴导师的是向觉明先生。未久永兴携眷移居呈贡，与刘广京君合住。我曾搭火车去看他。

二战结束，清华复校，永兴北上，此时他才正式任陈先生的助教。形势改变后陈先生南下，在北方的永兴，必然从所亲受陈先生教导做着他的学问。世事几度沧桑，在我从田间返回后，永兴应上师大程应镠君之请南下讲学，此际与永兴相见，他依然身体硬朗，健谈一如往昔，所惜者故旧惟永兴、应镠及我三人而已。也正是此时，永兴告诉我，他在文革中受冲击时，曾夜黑上山想让狼吃掉，随后念及儿女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听他说一个伙房平素相处

得很好的师傅以木棍狠狠敲打他的头，令他昏死过去，后来他平反之后，不念旧恶，依然和平相待，这又是他天性善良的一面。对于自然景物，他的感觉极灵敏，我曾在旧文中谈到过他写的一篇极美的散文。在昆明虽然贫困，又不时有敌机空袭，然日报副刊仍不时有佳文，执笔的有应鏐，王逊，徐高阮，丁则良，锺开莱，我曾汇编成集，而终未果。

永兴南来记得有两次，良会难再，而永兴已矣。幸而从他来信中得知暮年有美满的生活，有志趣相投结为伉俪的妻子和论史谈文之乐。由此令我想到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其中说道夫妇相对以强记否决饮茶先后，至茶倾覆怀中，以是为至乐。永兴晚年论史论艺，其乐又何多让！

在《王永兴说隋唐》一书中我仅取附录二“读书不肯为人忙”一节，以为是往昔所昧然不知的真谛。永兴于此条旁征博引极为详尽，换言之惟读书为己，才能由此体现自由精神之所由出。这使我顿悟我昔日所崇拜的英国的爱默生、法国的纪德，其重独立思想之由来即为陈先生所阐释的“读书不肯为人忙”的真理。永兴著述的历史论著非我所及，但附录中的这一段却令我想到了他这个读书人的一生。

耄耋之年，为文往往力不从心，仅以此零散的记忆，表达我对永兴的永远的怀念。

悼王永兴教授

吴承明

少年清华老北大，西南联袂史学初。
寅师门第君入室，考异长编我不如。^①
坎坷边城千里路，重来燕阙五车书。
满园桃李家锦绣，九五飞天寿有馀。

^① 徐高阮、王永兴和我皆在西南联大转入历史系侍陈寅恪先师，故云。

见王永兴讣告随想

黄明信

清华大学 1934 年入学的这一级称为“十级”，十级是人才很多的一级。仅以历史系而言，在革命事业上有突出贡献者有：黄诚、姚克广（姚依林）、杨德基（杨述）、刘汝贤（王荣祥）、郭建恩（郭建）等；在学术上有卓越成就者有：何炳棣、汪篒、王永兴、郭守田、欧阳琛等。汪、王二人都是陈寅恪先生的得意弟子，汪兄可惜中道殒谢、未尽其才，王永兴鲁殿灵光，世所共仰，其学术造诣讣告中已见其大端，毋庸舌费，唯于其在“一二九”运动中之事迹仅“积极参加”四字，于此我可以增加一句：“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清华救国委员会委员，1936 年代表清华参加了北平学联的各校代表大会，被选为北平学联的执行委员”（见清华十级纪念刊）。

1946 年我从藏区回北平省亲，陈师赐饌，师母亲自下厨，其时陈师已失明，得力于永兴兄之助。师嘱我将其二十年代与钢和泰合编的《大宝积经迦叶品六种合刊》与拉萨藏文新版对勘，由永兴兄从尘封的书架中觅得交给我，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年迈鲁钝，不能成文，以志鸿爪而已。

2008 年 12 月 19 日

怀念王永兴先生

吴小如

一

1946年暑假，西南联大复员。当时清华大学在北平招收插班生。我以商科二年级肄业的学历报考清华中文系三年级，幸被录取。当时陈寅恪先生为清华文史两系开课，我因课时冲突都不能选修。但陈寅老为从昆明回清华的几个研究生开了一门“唐诗研究”，一学年只有两学分。我蒙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特批，并征得寅老同意，选了这门课。这门课由学生自选研究课题，题目经导师批准，然后定期去见导师，面对面质疑答疑。记得我当时选的题目是《玉川子〈月蚀诗〉笺证》，寅老认为可以试试。然后约定日期，每周或间周去谒见寅老一次，有问题当面提出。彼时寅老目力已衰，但记忆力惊人。凡我有疑难，寅老随即告知回去检读何书，甚至说明在某书某卷，问题十之七八迎刃而解。到第二学期因着手写论文，见导师的机会少了，但隔一段时间仍须向导师汇报。最后论文写好缴了卷。到暑期大考时，我的论文已被通过，学分到手，原卷发回，上有详细批语。我追随寅老只有这短短一年，到1947年我就转入北大，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寅老。因此我对外从不提及自己是陈寅老的学生。

但就在这短短一年中，我从陈寅老那里知道了王永兴先生。第一次谒见寅老时，老人便告诉我：“有两个时间段你不能来。”原来，一个时间段是由周一良先生来给寅老读英日文资料，另一时间段是由王永兴先生来给寅老读中文资料，这是雷打不动的。而我的那篇作为试卷的论文，是先经永兴先生审阅，然后由寅老决定能否及格，给多少分数，如何加批语，才发回到学生手中的。试卷上的批语，肯定是永兴先生的手迹。我在寅老府上曾有一两次遇到永兴先生，匆匆交臂，并未交谈。在我印象中，虽已认识永兴先生，但先生却未必知道我姓甚名谁，因为我只是一个偶尔谒见导师的青年学生。

从1947到1983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永兴先生在这段漫长岁月里所受的折磨苦难，我事后才逐渐知道。可是就在1983年我刚到历史系，见到永兴先生，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亲切地叫我的名字。我当时很受感动，并立即对先生说：“您是我的老师！”先生说：“咱们是先后同门，你怎么称我老师？”我表示自己在陈寅老门下时间太短，不敢自许为陈先生的学生；而那份作业又经永兴先生亲自评阅，当然自己是晚辈。而永兴先生对我却一见如故，谈起当年在清华的事。先生说：“你怎么不是陈先生的学生，你还记得当年你的论文得了多少分数吗？”还没有等我想清楚，永兴先生便接着说：“听陈先生的课，考试得到八十分的就是好学生，你那篇论文我是看过的，你得了八十七分，你应该算是陈先生的好学生。”我听了不胜愧赧，但从此我却同永兴先生在感情和道义上十分亲近了。

二

有两件事我应当追述一下。为这两件事，永兴先生都亲莅寒斋，使我心里很不安。第一件事是李锦绣同志的大著《唐代财政史稿》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永兴先生希望我写一篇推荐文字。我认真读了部分原稿，写成一篇小文交了卷。永兴先生对我说：“你谈的意见很中肯，应该是推荐书里写得最好的。”而书出版时，拙文并未在书前刊布，看来我的小文也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永兴先生谬赞罢了。不过当时有些闲言碎语，使我很反感。我便另写了一篇短文，把那篇推荐书自行发表，意在澄清一些事实，并隐约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为永兴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第二件事是永兴先生的大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出版，由先生哲嗣陪同，亲自来舍把样书惠赠，并希望我写一篇书评。等我细读全文，发现自己对陈寅老所知太肤浅，永兴先生的大著又旁征博引，要写书评，还须下大功夫读很多书，简直力不胜任。踌躇再三，只好通过李锦绣同志，请她转告永兴先生，不是有意推辞，而是力所不及，请求永兴先生多多谅解。这件事至今引以为憾，实在有负永兴先生对我的厚爱。

三

永兴先生几十年来人生坎坷，一度多病。幸亏先生体质尚好，晚年时病时愈。终因年高体衰，于2008年9月15日不幸辞世，享年九十五岁。虽说已届高龄，但无论从国家社会、学术坛坫、教育领域对青年人的培养种种方面来说，毕竟是无可弥补的一大损失。先生著作等身，学术成果极为丰硕，这有待于身后整理，当以全集形式面世。从我个人肤浅的学识和眼光来看，永兴先生是恪守陈寅老遗诲，最能传承衣钵的最后一位坚定的守望者。不揣谫陋，只从我本身的点滴认识，仰攀寅老一代宗风，斗胆蠡测永兴先生在陈门学术传承中应有的位置。

我初入清华时，并未读过陈寅老的专著，只从刊物上读到他老人家的几篇论文。由于我在中学的国文老师教导有方，我已略窥读书和考证之学的门径，如王静安的“二重证据法”、梁任公对考证中“孤证”不能成立等意见，都曾听说过。对陈寅老，我只知道他做学问是“以诗证史”，又“以史证诗”，所以我在选寅老课时才找了个《玉川子〈月蚀诗〉笺证》的题目。多少年后，除读了寅老几部专著外，还从周一良先生的一篇文章得到印证，“以诗证史”而又“以史证诗”确是寅老的治学方法之一，这才相信当年追随寅老写的那篇不成熟的作业，路子并未走错。不过这只是枝节问题。陈寅老做学问的前提，是建立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基本原则之上的。平心而论，我以为这两句话并无多少微言大义，不仅是学术界人士，凡为有良知的公民，无论做什么事，这两句话都是做人的起码条件。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术界真正奉这两句话为圭臬，并能具体付诸实践的，只有陈寅老一人而

己。即使到了新世纪的今天，能在实践中坚持体现这两句话真精神的人恐怕也不多，我自己也不过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相反，与此背道而驰者还正大有人在。进一步言之，陈寅老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治学的最大愿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弘扬我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和固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遍检《陈寅恪文集》，这种愿望和目的是贯穿于字里行间的。倘具有这样的前提和目的，再来看寅老著书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就比较容易理解和体会了。永兴先生的大部分论著，特别是他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主要就着重阐述寅老的这种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弘扬我国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当然，永兴先生本人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唐史研究和发掘、发现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工作上，而贯穿其中的思想与目的，却完全是与寅老一脉相承的。

至于具体的治学方法，寅老最看重第一手史料。因此他研究隋唐史，除新旧《唐书》之外，更重视《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以及《通典》、《唐会要》与有关的各种野史杂著。而永兴先生更注意到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如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当然，在寅老的治学道路上，史料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不太同意西方汉学家把寅老与傅斯年相提并论的看法，说他们都是史料学家。有人强调，“史科学即史学”，这与陈寅老治学的实际情况不符；更有甚者，有人还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认为“史学即史科学”，这就与寅老做学问的路数更差得十万八千里了。人们读寅老的著作，每认为他是在作翻案文章，其实并非翻案，而是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一点，永兴先生的弟子李锦绣同志对唐睿宗的内禅问题，正是继承了寅老和永兴先生的治学方法，从细微的史料缝隙中找到了突破口，把唐玄宗逼宫的真相揭发出来，理清了历史本来面目。周一良先生在他纪念寅老的大作中曾总结出寅老的治学特点：即“因小见大，见微知著”八个字。也就是说，寅老一生始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仔细爬梳，从有矛盾的史料中找到突破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今天，在我们怀念永兴先生的时候，一方面要把他大量的学术成果加以整理总结，使之成为一笔丰硕而宝贵的财富；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应该从永兴先生手里把陈寅老治学的指导思想和治学方法作为接力棒接过来、传下去，一代代薪火相承，使义宁陈氏之学不至于有断裂之虞，这才是真正有纪念意义的具体行动。既然永兴先生说，我也可以算作陈寅老的一个小学生，那么愿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由衷的期望。

永兴先生，我永远怀念您，愿您宁静地安息！

2009年初开始动笔，同年3月26日脱稿，时在北大中关园。

王永兴先生与命运

沙知

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面世，陈先生在序末郑重说明“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篔、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三君”中我认识汪先生，而王先生直到1980年才有缘面识。在北京大学时我听系里老师说过汪先生是陈先生弟子，系里仅有的两位讲师之一。另一位是接替金静庵（毓黻）先生开中国史学史的杨翼骥先生，1953年院系调整后随老主任也是最后的一位系主任郑毅生（天挺）先生去了南开。长留心中的沙滩时代的北大从此进入历史。

汪先生留在改组后的北大，颇受领导上重视。汪先生对新社会怀有激情，充满期待，对教学、科研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很投入，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和当年不少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想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作出贡献。

建国十周年前后，我和汪先生在一个临时集体里共事一年多，除节假日外，经常见面。不见则已一见往往竟日，七嘴八舌中听到他不少高见。星散后有一天他召我去他承泽园的家便饭。我不能饮，他独酌，抽烟，直至微醺。曾几何时，眼前的他与先前的他有了明显变化。他流露出消极苦闷情绪。我移开他的酒杯，劝他节制，说了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我毕竟对他了解有限，无法深入交流。告辞时他留我又说了几句，记忆犹新。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整理《唐六典》。我缺少思想准备，没有通读过此书，很是迟疑。他鼓励我说，不要紧，边学边做，又说了些他的设想。我表示有兴趣，但学力不逮，请他容我考虑后再定。实际上在风云难测的年代，即便他真想转向做这事也很难。以后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正是年富力强，可有作为的汪先生，竟一念轻生，令人欷歔。

王永兴先生和汪先生同是陈寅恪先生倚重的门生。1954年前后，他二位和邱汉生先生合编过人民出版社的高中中国史。这部被认为是很好的教科书，是曾任该社副总编的巩绍英先生跟我谈及。他说这书内容深入浅出，文字亦佳。王先生大概在院系调整后调入人教社。编书之余，他利用北图交换来的英法藏敦煌写本微缩胶片，阅读研究敦煌文书。1957年在《历史研究》发表《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考出P.3559、P.2657、P.3018、P.2083四号历来被视为“丁籍簿”、“名籍”的文书实为唐天宝十载敦煌县诸乡征发徭役而编制的“差科簿”。这是唐代徭役制施行的一份宝贵遗存。几乎同时，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也取得了相似的研究成果。但彼此是在学术信息阻隔，研究条件迥异的情况下各自独立进行获得相同结论的。这表明王先生在敦煌学领域初试不凡。迨后理应受到国内外学人的称道。若非遽遭一劫，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或许会大大提前，而不致等到八十年代以后。但是与汪先生比较起来，他算是幸运许多。汪先生的学术生涯像夏夜流星倏忽消逝，王先生虽历尽磨难，而没有自弃，终于熬过逆境，步入坦途，令我钦敬。我认识王先生以后，有时将汪先生和

他比较，常不免为汪先生惋惜，而为王先生庆幸。

1978年，王先生年逾花甲，重返京华，回归北大。这实在是他生命历程中一次重大转折。据说邓恭三先生任历史系主任期间，比较强调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没有改变他治史必备四把钥匙的主张。他看重王先生在小学方面的修养。因而在王先生调入北大这件事上颇为积极，出力不少。王先生小学方面的功力，在此后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随处有所体现，学生们应是受益匪浅。他的弟子中，由于基本功扎实而表现优秀者不乏其人。

王先生告别讲坛以前，坚持每年讲授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他认真备课，认真讲课，一丝不苟，十余年如一日。他遵循陈先生的为人治学之道，明辨学者“为己”“为人”之旨，“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从事教学和科研，并以弘扬陈先生学术为己任。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严格要求自己。他这样做人做事，现在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近于迂腐，然而安知他所播下的种子将来不会发芽成长。这只有让历史去检验。

王先生一生的学术业绩主要完成在新时期的前二十年里。在新时期开端，他调入北大，如鱼得水。在日益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他得以专心致志，重理旧业。时值拨乱反正，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前辈硕学鸿儒的价值重新受到应有的尊重。加之对外开放，学术交流“视野融合”等，这些因素无疑对王先生的学术事业转入佳境都至关重要。所以说，王先生命运不错，绝处逢生。

当今之世，研究唐史不能不研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也要求研究者应具备相当的唐史修养。二者兼备，始可言互证互补有所发明。这大概已是学人的共识。但是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我以为王先生的研究工作二者结合方面做得卓有成效，可资借鉴。这有他的专著和论文为证，毋庸在此饶舌。

再有王先生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值得我辈后学吸取。例如他发表在《九州学刊》上的《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的性质和作用》一文，通过巧妙的示范，为解读唐代官府文书、特别是结构繁杂的长卷文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或者说是一把钥匙。由是，本来难以解读的这类文书，参照唐制进行分析，就比较容易读懂，正确掌握内容，了解真相。进一步的研究就有了可靠的基础。王先生撰写此文似乎也在于提醒读书人不要忘记前贤一再叮咛的读书须从识字始的谆谆教诲，可谓寓意良深。难怪有一位眼界高而不轻易许人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后大为赞赏。我说王先生在金针度人，不愧为良师。

记得初见王先生是为请他到人大历史系兼课登门拜访。与先前请裘锡圭先生一样，他爽快地答应。并同意结合文书讲唐史专题，内容主要讲唐赋役研究和唐土贡研究。听课的是人大复校后首届本科生。时在1980年秋冬。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有人还与王先生保持联系，得到王先生热心的指教。我们老系主任尚钺教授在世时对王先生以及其他支持过我们的先生也常怀感激之情。

王先生谢世时，我从医院出来不久，没有能参加北大历史系为他举行的遗体告别会，

深以为憾。王先生纪念集编委会向我征稿，义不容辞。碍于健康，勉力草成短篇，词不达意，言有未尽，又是一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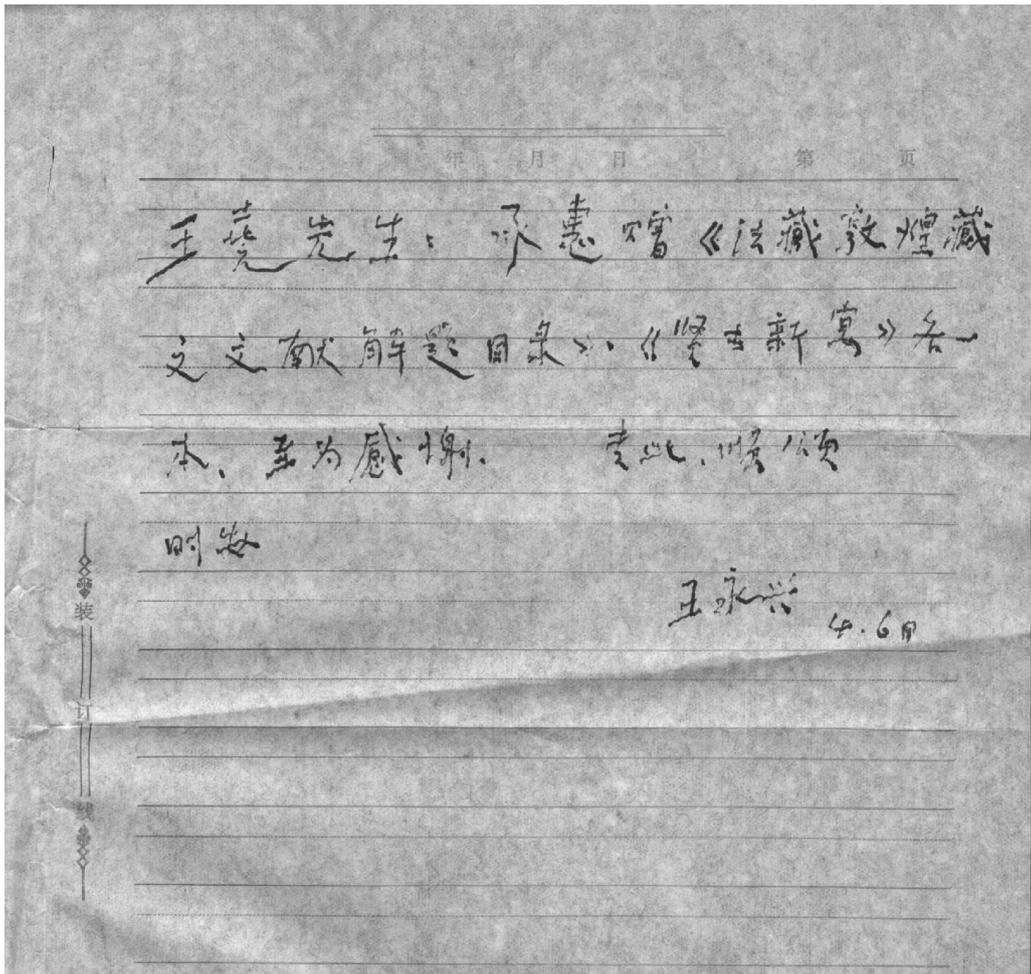
我是凡人，未能脱俗。谨以“王先生千古”一言敬献。

深切怀念王永兴先生

王尧

王永兴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者，大我十多岁。他在史学研究的领域里作出重大贡献。作为陈寅恪先生的亲炙弟子，他继承、贯彻了陈先生的理念和思想。我曾把永兴先生发表在《追忆陈寅恪》一书中的四篇文章一一拜读，深为感动。尤其是《种花留与后来人》一文，更是凄婉动人，反映了永兴先生对师尊的真实情感，娓娓道来，亲切平易，一如往昔。他说：“近年来时常想念先师陈寅恪先生，有时梦中在先生身旁，音容宛如昔日。醒来和锦绣妻述说梦中的情况，感到凄然。”联系到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并题诗，有句：“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确能体验出寅恪先生的心境意想。如今，永兴先生已归道山，草此短文时，不禁回想起与永兴先生相识、交往的几件事：

在季羨林（希逋）先生等诸位老宿的倡议下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而且多次在北大和其他地方开会。我因学习、研读敦煌石室所藏的古藏文写卷，每每厕身与会。后来，经张广达兄介绍，到北大跟永兴先生见面，希望能阅读北大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的胶卷，做一点工作。永兴先生一口答应，并亲自领着我们（我与陈践同志，褚俊杰、熊文彬、王维强三位研究生）一行五人到北大图书馆，介绍情况，馆方顺着永兴先生意见，予以特殊照顾，单拨一间工作室，配有阅读器，让我们仔细地、逐一阅读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的古藏文写卷，核对、校正也在那里进行。后来，我们编成一本《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如果没有永兴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敦煌吐鲁番学会全额出版经费的支持，很难想象这种文字复杂、体例特殊的书能够出版。我们当然在第一时间把书寄奉永兴先生，表示对他老先生的感激。永兴先生收到后还来了一信，从来信的字迹看，永兴先生可能手已颤抖，但仍然认真亲自回书，令人钦敬。他的研究生李鸿宾同志分配到我校历史系任教，多次为永兴先生带来书信及有关信息。鸿宾研究朔方军有年，是永兴先生的高足，后曾担任历史系主任，多有建树。



另一次，1988年，广州中山大学在胡守为等诸位先生倡议下，召开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文革劫难之后的第一次纪念寅恪先生的国际会议，永兴先生与季羨林先生、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到会，我跟王锺翰先生也参加了。在那次带有为陈寅恪先生平反昭雪意味的大会上，永兴先生做了十分动情的发言，后来收入大会文集中。我，作为一个学徒，厕身其间，如在华岳，感念不已。

最近，与胡守为教授在少林寺举行的“中国禅宗·少林问禅会”上相遇，回忆往事，不胜唏嘘，尤增怀念。

永兴先生的亲切关怀，使我永远难忘！

2009年5月1日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寓庐

忆王老与郑老的交谊

郑克扬 郑克晟

王永兴先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北大文科研究所于1939年5月恢复，由傅斯年先生兼所长，家父郑天挺先生（1899-1981，字毅生）为副所长。当时所内聘请许多专家作为导师，有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罗庸、罗常培、杨振声、唐兰、姚从吾、向达及郑天挺诸先生。王先生与汪篔先生是陈寅老的学生，当时郑先生也教隋唐史，也是他们导师之一。

关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况，王先生在回忆郑老的文章中，曾有叙述：

我为研究生之时，学生与导师同住（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小木楼中，粗知先生之生活。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备课研究撰著，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①

又曰：

以陈寅恪先生为首的诸大师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天挺先生乃诸大师之一，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

言语之间充满敬仰之情。

我们认识王先生是在1946年上半年。当时家父已由西南联大转至北平，负责北大接收工作。因当时北平沦陷区北大的学生已经上课，并成立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郑先生任第二分班（文学院）主任。

第二分班由于郑先生德高望重，故请了许多专家来授课，单是历史系就有陈垣、萧一山、孔繁霁、董绍良、齐思和、赵万里等人。王先生恰于此时来到北京，家父也请他在二分班教课。王先生学者风度，一身正气，讲起课来异常认真，考试则特别严格，杜绝作弊事件的发生。郑先生在日记中即曾写道：“（1946年3月25日）第二分班四年级学生补习中国史考试，教员王永兴用隔坐法以防学生有抄袭情事。学生不遵，多数退场，并阻挠（其他）同学考试，有一考试男生并被殴。”对于这种事情，郑先生当然也是支持王先生的。

同时，王先生与郑先生也经常谈论学术问题。据1946年4月14日家父日记载：“王永兴来谈，以西晋何以国祚甚短为疑。余以为或由于开国时无通盘策划，事事苟且，无开国规

^① 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毅生先生》，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通讯》，1999年8月。下同。

模与长治久安之经制也。永兴亦以为然，容详绎之。（王）又言：丁则良谓阀阅开始自东汉。其说亦是。盖门阀之成一在族大；一在通显久；一在婚媾多，东汉窦、马其例也。”

1946年暑假，北大、清华复员后，王先生先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这年十月，陈寅恪先生也已由国外医眼失败回到清华任教。当时陈先生目疾已很严重，而陈之助手徐高阮先生次年春始能来平。于是陈先生乃于十月底致函郑先生，希望能暂借王先生至他处工作。信云：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

于是王先生乃去了清华历史系任教，担当陈寅恪先生助手。

毅先生史席，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
 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君元
 君下学如方能就既自十一月一日起
 暂
 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典君代理
 徐君职务至徐君就既时止如蒙俯允
 即希赐复为荷 弟牛顺颂
 著祺

弟
 陈寅恪敬
 三十五年
 十月廿日

解放后，由于1952年郑先生很快即至南开任教，故与王先生交往少了一些。但五十年代后特别是1963年后，他们同在一起标点廿四史，共同住在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那时，他们除了为标点工作共同磋商外，工作之余，还一起打打太极拳，饭后一起散散步。一次，

王、郑二先生散步至翠微路中华书局入门处，郑先生指着门前数间整齐的平房，笑着对王先生说：1946年曾在此屋中与房屋买卖商会面，为北京大学或买或租房屋，商谈了一下午。后来，王先生在回忆郑老文章中谈到：

我曾拜访过几位北大教授，其家属住房均甚良好（指四十年代城内北大）。此类房屋多至百处，多为先生（当北大复员时）主持或经手获得。……先生主持管理北京大学经费数千万，数十年中无丝毫差异之事。在北京众多高等学校教职员之间，均谓出污泥而不染者，惟天挺先生能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非仁人君子孰能为之。

中华书局每逢春天常组织他们去颐和园等处游览，诸老人均感心情舒畅，工作愉快。而郑、王之间亦建立了更深的友谊。一次，王先生回山西，郑先生恰去城内有事，未及相送，郑先生在日记中都表示“深觉歉意”。从另一方面说，这时王先生由于受到种种压力，变得比较消沉。但工作起来，仍是认真负责，孜孜不倦。不久，“文革”开始了，郑、王二人的处境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各在一方，但师生的情感则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1976年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当时正在外地干校的王先生知道后，十分着急，他忙着分别给郑先生及王玉哲、杨志玖先生写信，表示关怀。信曰：

毅师：人民日报登载，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看报之后想到您和您全家，……致以衷心的慰问。

王先生的信，大家都收到了，但没有留下地址。这是王先生最细心的地方，他不愿这些先生在忙乱中，再多费心写信。又过些天，他又让他的孩子到南开来看望。大家除感谢外，都提及没能回信致谢的原因。其实，王先生心里很明白。

1978年11月初，王先生调回北京大学。他很快告诉郑先生，并告知他在北大的住址。并称：“这次调北大，您从各方面关怀帮助，我十分感谢。近期内拟去津拜谒请安，特先函禀。我的工作，系里正在商量，可能是带研究生。”又说：“近一年来，我从事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汇编校注的编写，第一编即完稿。问题和困难颇多，当向您面陈，请求指导。”不久，王先生果真来天津看望郑先生。

这次会面，他们谈了很多。王先生回忆说：

先生（指郑天挺先生）似有意以其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精神教诲我。先生命我详述四届学生之人数姓名以及目前的工作情况，我一一禀告之。数十人均在高等学校任教和高级学术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的禀述有脱漏或错误，先生补正之。最后，先生笑语曰：“我们（指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没出一个废品。”并语重心长地

教诲我说：“你现在北大任教并主持敦煌文书研究室，也要不出一个废品。”

当时，师生相谈十分愉快。自那以后，王先生多次来过南开，最后一次是参加杨志玖先生的研究生答辩。一如往常，王先生对研究生的要求同样是严格的。

1981年12月20日，郑先生病逝。王先生特致函于克晟，表示哀悼。信曰：

惊悉毅师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从1940年以来，我从毅师受教，他的德行、学识、文章，为举世敬仰，也是我终生的楷模。在我悲痛地哀悼毅师的时刻，我要永远记住他老人家在几十年中对我的教导，像他老人家那样为学做人，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待。特写此信，哀悼我敬爱的老师。

王先生信中对于郑老逝世，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四十余年来，与郑老的交谊，又表示了极大的敬仰与感激之情。

1983年以后，克晟和南开历史系同仁曾约请众多先生撰写对郑先生的回忆及纪念文章，王先生每多“努力撰写”（王先生信中语），并不管多忙，总是按时交稿。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王老对郑老的怀念之情。

近些年来，我们经常去燕北园北大宿舍看望王先生夫妇，王先生经常提到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历史系的往事，特别是提到他和郑老几十年的情谊，我们深受教益。王先生对郑先生的感情是真诚而朴实的，这种师生之间的友谊，最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2009年4月6日于南开大学东村平房。

敬師大人賜鑒

生

前數自得汪述彭同學來信彼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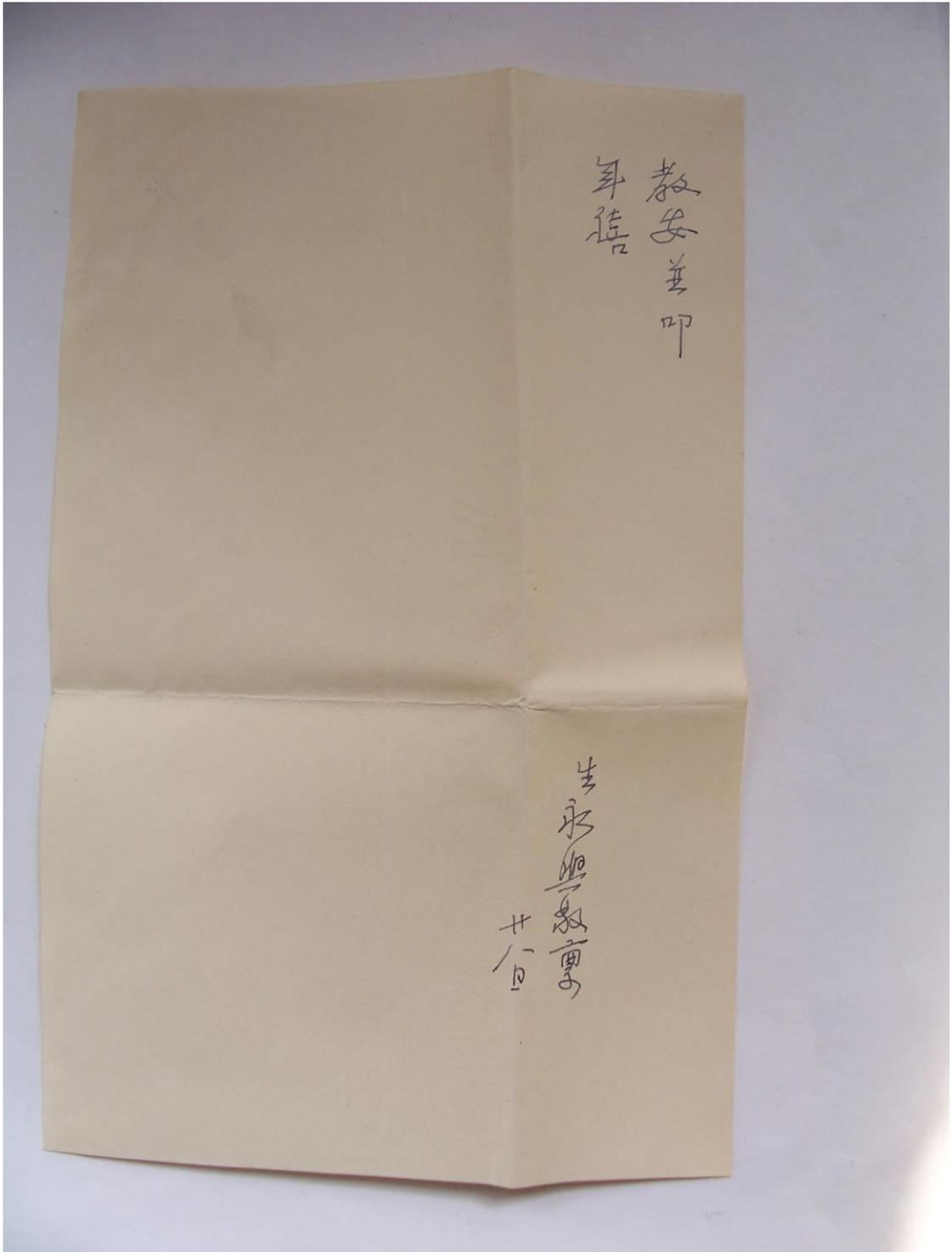
抵永吉惟長白師範學院情形極劣校中無圖書館無
教員宿舍述彭同學至今猶寓旅館中且欠薪數月
不發非惟不能讀書研究且甚艱於維持生活故彼
決於暑假期間學年終了時即辭職返平彼甚願能重返
文科研究所嗎^生 先稟知是

師紋印吉希呈詳陳

又^生

近因軍事需款不知可否

仍向學校暫借支五十美元此事即託任繼愈同學
代辦專此敬請



1946年1月28日王永兴致郑天挺先生信

唯一以数十万字专著阐述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优秀受业弟子

丁则勤

王永兴先生是我国享有盛名的隋唐史、隋唐经济史、敦煌吐鲁番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永兴先生受教于一代宗师史学泰斗义宁陈寅恪先生，并且曾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多年。

王先生是清华大学十级高才生，与我二哥丁则良是同班同学和至交好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清华大学南迁长沙，王先生选修了陈寅恪先生开设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是王先生首次听陈寅恪先生讲课。从此以后，王先生在一生当中，时刻以陈寅恪先生为榜样，从做学问到做人，一丝不苟，始终如一。

王先生于1952年至1955年，曾任清华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1955年至1958年任教育部直属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辑，与陈乐素、邱汉升等位先生共同编写中学中国古代史教材。我在1959年北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曾一度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国现代史教材。那时王先生虽已离开人教社，但却时常听到人教社的先生们提起他和怀念他。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前也有机会结识王先生。那时，教我们班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汪篔先生，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的陈庆华先生都同我谈起过王先生，并对王先生的学问颇为推崇。汪篔教授也是清华十级王先生的同学。陈庆华先生则与王先生共同给陈寅恪先生当过助手。那时，邓广铭教授叫我们隋唐宋辽金史。受以上这些先生的影响，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有很大的兴趣，读过不少专著和原始材料。后来，我虽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动态一直十分关注，并从中获得很多教益。在治学方面，王永兴先生，汪篔先生、邓广铭先生、陈庆华先生对我都有长久、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永兴先生的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坎坷。特别是在王先生44岁到64岁的21年，是一次大坎坷，使王先生几乎完全丧失了读书治学的学术研究条件。但在王先生有生之年，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遵循陈寅恪先生的“长编考异”之法，钩沉索引，焚膏继晷，潜心治学，孜孜不倦，只争朝夕。在晚年书写不便的情况下，仍苦学电脑，奋力著述。王先生一生之中，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每篇文章都是精品，都对相关领域的课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推进。王先生先后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其中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度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略论稿》等。这些著作，都是“发覆”之作，开拓创新，启发后学至巨。

特别应该谈到的是，王永兴先生一生之中均以弘扬恩师陈寅恪先生的义宁之学为己任，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辛勤整理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王先生主编了《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其中载有季羨林教授所写的长篇序言，翁同文先生所写的《追念陈寅恪师》，

张岱年先生《陈寅恪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卓识》，刘桂生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钱文忠先生《略论陈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还有李锦绣先生《唐前期马政初探—学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心得》以及学界多位知名学者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编这本纪念文集，永兴先生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文集卷首刊登的陈寅恪先生照片，是陈庆华先生所赠。王先生在文集后记中深情地记述说：“本论文集刊登的陈寅恪先生照像，系亡友陈庆华教授赠给我的。44年前，庆华和我侍读寅师之侧，同聆教诲。今日念师忆友，至感凄怆。”书写至此，仿佛看见了王先生当时的神情。

陈寅恪先生一生中桃李满天下。其中，优秀的及门受业弟子或比较优秀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不在少数，但是，非常优秀的门人则为数不多。王永兴先生无疑属于非常优秀的门人之列。王永兴先生在80岁的时候，出版了近40万字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这是陈平原先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的一种。在这部书的卷首，王永兴先生以极虔诚的态度申明：“谨以此书，献给恩师陈寅恪先生，纪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下署“受业王永兴拜呈”。

这部专著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陈寅恪先生失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与治学方法。指出寅恪先生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同时又源于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系统深入准确地论述了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这部分是全书的总论。

第二部分为陈寅恪先生三部专著及三篇论文之主旨述要。三部专著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篇论文为：《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这些专著和论文都是寅恪先生的代表作。

第三部分为《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疏证，其中包括：有关蕃将蕃兵以及胡化等，有关黄头军，关于唐代财政，关于唐元和国计簿和开成供军图，关于收复河湟，关于唐代宦官等重要课题的札记疏证。

以上第二、三两部分，是对陈寅恪先生是学渊源与史学思想、治学方法的分论。

全书的第四部分为附录。内容为王永兴先生的五篇旧文，其中第一篇《〈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敕勒等羁縻府州与民族迁徙》为在本书中第一次发表，另外四篇为：《杨隋氏族问题述要》、《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种花留与后来人》、《八十述怀》。这五篇文章都是王永兴先生学习子陈寅恪先生史学有关的著述。

王永兴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在十年浩劫中，因受酷刑，我双手几乎失去写字能力，至今仍书不成字。为此，长女珠眉及婿魏建业在繁忙工作之余，打印书稿的绝大部分，忘年小友李平卫在化学实验之余，亦帮助打印。北京今夏奇热，于电脑前打字之辛苦可想而知，我深感不安又无可奈何。妻李锦绣在撰写期间多次给我启发，完稿后又通阅全稿，调整章节，作多次重大修改补充，使书稿的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并作代序文，我为之欣喜。儿子珠群也帮我做了与出版此书有关的一些琐事，节省了我不少时间。有妻、女、婿、子、友如此，何

幸如之。”从王先生的这段记述中，可见这部书稿的写作与出版是多么的不易。

笔者以粗浅之学，反复阅读王永兴先生的这部专著，获益之多，终生难忘。愚以为，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众多弟子中，唯一以数十万字专著，系统、深入、准确、全面地论述寅恪先生史学渊源与治史思想和方法的第一人。永兴先生这部书，从总体到局部，从总论到分论均至为严谨、周密，堪称对寅恪先生史学的“发覆”之作，有极大的创新和说服力。王先生的一生历尽坎坷，却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这些人才的成长过程不仅与王先生在教学过程中详尽深透、诲人不倦、严格要求有关，还与王先生以毕生的精力深入钻研和总结陈寅恪先生学术渊源与治史思想和方法并形成系统有条理的高水平专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仅如此，寅恪先生的义宁之学因有王永兴先生的系统论述，在王先生身后，亦能不断发扬光大，传之久远，从而使寅恪先生的文史治学得到继承和发展。

近日，王永兴先生的夫人李锦绣教授应邀选编了《王永兴说隋唐史》一书，是为《大家说历史系列丛书》之一部。在这本书中，收录了王永兴先生生前的学术论著 15 片和附录两篇，书中文章篇篇都是精品创新之作，捧读之余，使人眼前一亮。此处只举一例。我在读大学时，接触到论及唐代均田制许多教材、专著和论文，似乎亦能言之成理，但同时也使人产生很多疑问，特别是无力面对反证。在《王永兴说隋唐史》一书中，王永兴先生对唐代均田制的论述，使人顿觉耳目一新。王先生在文章开头，开宗明义地指出“唐代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不是土地分配制度”，文中引用大量学术论据，条分缕析，层层深入，剖析论证了这一创新观念，全文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充足理由证明了所论学术创见，对这一课题作出了定论。

李锦绣先生在《王永兴说隋唐史》一书的后记中说：“将书稿呈给外子，他说又欣喜又惭愧。他从陈寅恪先生受教，治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几十年，百折不回，九死不悔。但遭际坎坷，真正的学术生命，开始于 1978 年，当时他已 64 岁。即使他焚膏继晷，只争朝夕，皓首穷经，老而弥笃，毕竟过了研究著述的最佳年龄。更兼长达二十余年的非人折磨，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肉体病苦，沦肌浹髓；精神伤痛，历久弥新。他奋力挣扎，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长期超负荷工作，甚至艰难地学会使用电脑，笔耕不辍，但无力回天，发展义宁之学之愿只能形诸梦寐，待诸来者了。”锦绣先生这段话写得感人至深，读之使人泣下。

我今年已 76 岁，患糖尿病二十年，近日又患脑血栓、脑腔积液和脑萎缩，肢体共济失调，眼花手颤，思维能力也大不如前，感念永兴先生如师长父兄般的深情厚谊，断断续续勉力为此短文，作为对永兴先生的怀念。

2009 年 4 月 30 日草于海淀区西二旗寓中



丁则勤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1998年

“义宁之学”的弘扬者

蔡鸿生

学缘比俗缘似乎更耐人寻味，后辈有幸与前辈结缘，往往是先闻名后见面的。

1953年冬季，我还是一名刚刚跨入历史学门槛的“一年级大学生”，偶然翻阅铅印线装本《元白诗笺证稿》，在陈寅恪先生所写的“附记”中，第一次见到“王永兴”三个字，从此知道他是协助成书的“三君”之一。经过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又得知正是这个“1953年冬季”，陈先生托专程从北京来访的汪篔同志，带回一个语气严厉的口信：“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往后的事实证明，王永兴先生不愧为陈门“学生”，他满怀虔诚地读陈寅恪的书，听陈寅恪的话，行陈寅恪的道，成了“义宁之学”的弘扬者。

1957年冬季，我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才见到王永兴先生自己的作品，即发表在《历史研究》当年第12期的名文：《唐代差科簿考释》。尽管当时对敦煌学一无所知，但读后仍久久难忘，似乎感受到“霹雳眉边过”的震撼，其细密考证所显示的学术功力，确实令我这名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徒叹为观止。

从闻名到见面，足足隔了三十五个年头。我已经人到中年，王永兴先生则是学界耆宿了。1988年5月，中山大学举办首届“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王先生应邀出席并讲话，我才有机会一睹丰采，略亲警欬，并开启了随后多年的鱼雁之谊。他先后给我写过十余封信，恳切，坦诚，始终离不开“义宁之学”这个主题。1998年12月，拙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由中华书局印行。次年4月2日，王先生自京赐函嘉勉，除夸奖之辞不宜援引外，仅摘录如下两段：

“今日下午，收到中华书局寄来专著一本，我急于拜读。先读后记，次读季序（指季羨林先生为拙著写的序），最后一一检阅目录，其内容多有我不知者。”

“回忆多年前听寅恪先生讲授唐史、唐前期、唐与突厥之关系以及安史之乱与九姓胡之关系，均为讲授重点。今兹拜读您的大著，当更能了解寅师讲授之卓识高论。”

按亲身感受而言，我认为王先生对后辈的关怀是全面的，这就是说，既有鼓励，也有批评。2001年，他已达88岁高龄，但在见到拙文《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引述寅恪先生《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有所误解时，即来信指正，并嘱谨严治学，无负师教。王先生颤抖的笔迹包含着厚爱，无论当时还是当下，我一直是铭感于心的。

依传统“学案”之例，学术被冠以学者籍贯之名，是一代宗师才能享有的荣誉。陈寅恪

先生原籍江西修水，旧名义宁州，学界遂有“义宁之学”的美称。忆自拨乱反正以来，王永兴先生渐脱“一介寒士”的艰难处境，言传身教，著书撰文，为弘扬被边缘化多年的“义宁之学”耗尽心力，其巨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足以为证。他宝刀未老，用潜研抵制炒作，一反把陈寅恪神秘化、遗老化和非学人化的时流，提出研究陈寅恪学术遗产的正确导向，全面评述其在文史领域的“发覆”之功，深入探索其宋学尤其是通鉴之学的渊源，以及“读书不肯为人忙”这条“秘方”的精义，等等。如王先生者，可谓合“生前友好”与“后世相知”于一身，真正无愧于师门了。

王永兴先生虽享高寿，但半世坎坷，抑郁多于展眉，令人同情惋叹。所幸生性坚毅，在逆境中依然叩寂寞以求音。其人其学，犹如久经风霜的老梅树椿，虽朴实无华，却是幽香常驻的。

2009年“清明”后十日



王永兴与蔡鸿生在中山大学黑石屋，1999年

王永兴与清华工农速成中学

原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郭德魁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调我到清华大学工作，协助王永兴同志创建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工农速成中学是建国初党的文教方针的产物，是人民政权建立后为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为工农开门”而建立的新型学校。

工农速成中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中国建立后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是人民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永远值得珍贵的不可忘记的特殊篇章。

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是1951年奉中央教育部令创立的。令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令

（1951年3月26日）

令该校筹设工农速成中学一所，并将计划预算报核由。

清华大学：

兹决定你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一所。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设立四个班，招收学生一六十名。

附发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一份，希即着手筹备，并将筹备情况、具体计划及经费预算一并报核。

附：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一份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部长马叙伦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抄致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

1951年4月12日，清华大学呈教育部函，提请教务长周培源先生兼任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历史系教员王永兴先生兼任副校长。

1951年4月27日教育部批复如下：

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清复（51）发字第七九一九号呈悉。周培源兼任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王永兴兼任副校长，准予备案。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钱俊瑞 代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1951年10月10日举行了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成立典礼，这是清华园里的一件大事。

典礼开始后，工农学员以热烈掌声欢迎马叙伦部长、韦副部长、林司长、师处长等首长。会上马部长作了重要指示。他深情地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指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吸收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给以中等教育，升入大学成为今后建设中的骨干分子。”“工农分子到学校里正规学习，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只有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才有可能这样。在大学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有很多方便的地方，今后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各大学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他勉励工农速成中学的教职员同志们要建立献身工农教育的思想，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做好教育工作，为今后在大学中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创造经验。

最后，马部长亲切地说：“同学们！你们是人民的功臣，是祖国最宝贵的财产，过去在旧社会不能学习，参加革命后，因为任务繁重，也没有机会学习。今天你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现在学校的门向你们打开了！这是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结果。”“进了学校，就应该好好学习，下定决心，以优秀的革命品质来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报答党和毛主席及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完成学习任务，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周培源校长对工农速成中学很重视，很关心，常来视察，听取汇报，他的主要精力在大学工作。

工农中学的日常校务由王永兴副校长全面主持，他是实际的“前线司令”，我（总支书记、教导主任）是王校长的“参谋长”。我们共事两年多的时间，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在共同奋斗中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王永兴同志热爱工农教育事业，他贯彻执行中央教育部关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指示，要求非常认真，表现了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休息，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对工农学员很有感情，热爱学员，为全体教职员树立了良好榜样。他和学员中的老红军甘大金、龚寿山、艾平，老八路刘宝俊、李思问、皇甫秉祥、孙树勋等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1991年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建立四十周年校庆时，他深情地说：“我时时想起在工农中学工作的两年中使我感动使我受到教育的人和事……李思问同志是清华工农速成中学第一届学生，入学时年近四十了。他是全校学生中读书最用功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位，是好学深思的模范。面对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教师，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听从教诲。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考入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78年岁末，在我离开北京二十年后，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我在清华看到了李思问，他在后勤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向我讲了领导后勤工作的经验，使我赞赏钦佩。”

王永兴校长对清华工农速成中学感情很深，他曾经言道：“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是建国初创办的一所为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学校。办学期间仅七八个年头，但她培育了千余名工农干部，其中大部分升入高等学校深造，成了具有专业技术的国家建设骨干，一部分在提高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后重回工作岗位。数十年来，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清华工农速成中学筹建之始，当务之急是建筑校舍。在王永兴校长的筹办下，较快修建了一座教学楼、一座学生宿舍楼（工农学员全部住校，军事化生活），同时修建了一个小礼堂兼饭厅，还修建了一排平房作为教职员办公室和宿舍，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都以校为家。校舍地区原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高低不平。王校长带领师生劳动建校，平整土地，种树栽花，美化校园，特别是平整修建了含有两个篮球场和排球场的运动场。一位年龄比我们长一倍的大知识分子、大学者和工农学员一起挥镐掘土，抬石填坑，除草平地，汗流浹背地干活，真使我感动，使我敬佩。他为年轻的教师们作出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榜样。

王永兴同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谦逊朴实，平易近人，一点大知识分子的架子也没有。他对我很尊重，常使我惴惴不安。他对我在工作上支持帮助，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记得1952年5月我结婚时，一切相关事宜都是王校长亲自操办的，譬如如何举行婚礼，如何招待亲朋，如何用餐，洞房设在何处以及被服用具等，都安排得很周到。我孤身在北京，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的农村，王校长就成了我的“家长”。这份深情厚谊是我终身难忘的。

王校长对教职员工都很关心。当时我们的教师是从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挑选的优秀生，是一群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小青年。大家都未成家，工作、学习、吃住都在学校，学校就是大家的“家”。王校长对待他们如同子弟，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恋爱婚姻和家庭困难等等，和大家感情很融洽。当时我们就像一个和谐欢乐的大家庭，王校长就是我们的“家长”……

岁月如流，弹指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这个当年的“小郭”变成了年近八旬的老头，记忆力减退，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这篇小文对王永兴同志的品德和贡献只能作“挂一漏万”的回忆，但他为人师表的形象和精神是永存的，是永兴的。

纪念王永兴先生

武尚清

惊悉王永兴先生逝世，当时曾写下了悼诗七律二首。诗曰：

(一)

一代名师出辽东，名师姓王讳永兴。
皓首经史宗迂固，潜心理学邃朱程。
折节力学清华馆，培训工农长速中。
编书育才人教社，执教授业惠晋京。

(二)

越土归来重入晋，黄陵教史得识兄。
良师益友垂半纪，知音切磋乐平生。
刚柔宽严君子度，平实醇厚学者风。
留下清名乘鹤去，燕园长闻弦歌声。

举行追悼会前，又写了一副挽联。联如下：

永仁永义仁义有归享遐寿。
兴教兴学教学无处不讴歌。

今当将出版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之际，遵命再写点与永兴先生交往过程中的片段。谨就追忆所及，写出点滴陈上，时地或有未确，聊抒缅怀之忱，庶可反映出先生为人治学的一个侧面。

1959年秋，我在国家派遣援越四年期满回国时，又重返山西，来到山西教育学院工作。永兴先生约在1958年由北京下放到此。我俩同在“历史教研组”任教师。该学院的任务是：培训中学在职教师；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大专班，毕业后当中学老师；也轮训中学行政领导及教务干部。时当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该院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较差。王先生能跟大家一道，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高水平完成各种类型教学任务。王先生有两大优势：一

是他曾在人教社工作多年，所参编中学历史教本为全国法定使用的统编教材；以他自己雄厚的史学根底加上撰写教科书的实践功夫，执教教育学院，可说是适才适用，游刃有余。二是他曾任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副校长之职，也了解工农教育、继续教育之要求与特点，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教中国史，我教世界史。我们都是在阅读、参考大量史书、资料，钻研各地大专院校所用教材之后，亲手编写出本院使用教材；较好做到了科学性、思想性、实用性的统一。

该学院实行“住校制度”，让教师按各教研室居住。一间“教研室”内，书桌、书架与床铺分别依势安放。两三人共住一屋居多。王先生虽分得一间独住平房，也很简陋。该院坐落在省城太原南约二、三十里之黄陵村；教师如要“离校住家”（回城内），须跟领导请假。教师及学员有时也下乡“支农”。特别是在困难时期，院领导组织大家到省内某县与社队相结合“种田”，自给小部分口粮。冬天则用煤粉掺黄土“打煤糕”，升炉火取暖。凡此种种具有革命气氛的老区作风，王先生也都能积极适应，踊跃参加。60年代某年，他曾被选为该院代表，参加全省教育系统“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60年代中期，我赴晋南参加社教运动（“四清”）时，永兴等一批老教师则在省委党校参加学习运动。约自1965年起，该院有一段时期，转为以轮训各地市中学校长、书记、教务主任为主；各学科专业教师，大多已不适应新的任务要求了。王先生在与京津几所大学有所联系之后，约在70年代晚期，调北京大学工作。我则在与蔡佩仪同志共同负责过“晋中支部”学员组约一个学期之后，调到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去教外语了。听说在“文革”期间，永兴先生也曾受到过某些“冲击”，后曾下放到交城或文水的农村去。在那里，因他为人忠厚老实，所以和乡亲们相处很好。在调返省城后，又回到教育学院，曾负责资料室工作，也担负轮训干部的一定的文化课教学。他在图书馆发现一部未开封的《册府元龟》，如获至宝。“文革”已近尾声，正当花甲甫半的学术盛年，先生又孜孜经年于太原的斗室了，为他不久后的北大教研生涯再度积累下财富。

王永兴先生在人教社的工作情况，所知不够直接具体。今愿引述一篇有关论文的一段文字，庶可窥见一斑。该文写道：“自1956年起的中学历史教材，都是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的，称为‘统编教材’。这是一个完整、严密、浩大的权威工程。人教社组织了历史专家、历史教材编写工作者进行编写。分工执笔撰写的，多是精通历史又懂教育的同志。汪篾、邱汉生、劭循正、李绳武、杨生茂、王芝九、王永兴等多位资深学者，多年承担这一工作；形成我国历史教科书编著史上一个人才整备、阵容稳定、章法严谨、成绩巨大的繁荣时期。通过全国广大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及重版修订而日益完善。于是产生出了门类齐全、内容衔接、繁简有度、图文并茂的，科学性思想性都较高的高初中古今中外全套历史课本，形成一个空前完整的历史教材序列，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前。它不但教给了不少于三代的青少年以科学的历史知识，初步培养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且通过钻研课本（连同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备课、讲授，早就了一大批合格的或优秀的历史教师队

伍。这一时期的课本编写，充分体现了党的正确而强有力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教育的光辉成就。”^①可能由于文章作者与永兴先生熟识之故，在列举几位学者时，有意把永兴先生之名写在最后，属于“代谦”之笔，含义是颇可领会的。就这样，王先生后来某个机会看到此文时，还曾谦虚地说：“我没做出什么成绩，可以不写上我的。”其实他是骨干，贡献历有年所。

在山西教育学院时期，除日常教学工作之外，我们曾在山西及北京的档案馆、图书馆查找搜集资料，也做乡土考察走访，编写《山西三百年农民起义史料汇编》（未出版）。王先生无不积极参与，付出心血。在此基础上，曾组织召开过一次关于山西农民起义史的学术讨论会，由山西大学阎宗临、省社科院岳明同志主持，我与师道刚等同志都参加了。我们的现场发言和所带去的王先生等人的论旨摘要，都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另记得在60年代早期，我在北大进修“亚非史”期间，王先生为深入研考河西走廊乃至哈密吐鲁番一带的古代水文水利情况，曾约我在北京图书馆两人整整“坐馆”一天，让我为他译述一些馆藏日文有关资料，以为参证。更可见先生勤苦治学之一斑。那是，也可能恰当他受邀来京参加中华书局廿四史点校工作之时。

承前述，王先生约在70年代晚期，调到北大；我则在1980年调回母校北京师大。我们都已届或将届晚年了，却迎来了更好地从事史学工作的可贵时光。大家都抓紧学习、工作，补回耽误掉了的岁月。王先生在北大主教隋唐五代史，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北师大一位中年教师赴北大听王先生课，不但赞美王先生学识渊博，更敬服他高尚的人格气度。他总是在上课前几分钟步临教室门前，铃响与头几名学生一同入室。他曾不无愤慨地说过：“‘教师，教师’！‘教’然后是‘师’。哪有老师不去上课的道理？！”批评当时个别人当了“教授”就不教本科的歪风。80年代中期，我因参加东南亚史学术讨论会及《世界华侨华人大辞典》编撰工作，在勺园小住几天。某晚造访王先生住所，问候并请他对我刚发表的两篇论文指正，夜十时已过，他仍在聚精会神伏案笔耕。我劝他年事已高，应多珍重颐养。他却说：“正因为‘来日方短’了，才要加倍干活。”先生对我又勤勉有加。先生长我十有五龄，是难得的良师益友。因是悼念文字，情思所至，信笔写来，难循章法。不文不白，或有讹误。博雅正之！

二〇〇九年四月，于北京师大之慕贤书屋。

^① 纪奚：《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清华园中的永兴师

殷叙彝

1949年10月，我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王永兴先生是历史系的教员，不久晋升为讲师。他的专业是隋唐史，解放前曾是陈寅恪先生备课和讲课时的助手。但是解放初期他并没有开隋唐史的课程，却开了一门“联共党史”，并且参加了王亚南先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的辅导工作。这两门课我都没有上，但是历史系委托王先生负责该系一年级新生，后来又正式任命他为一年级导师。而我是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团支部的书记，与老师联系是我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和王先生接触的机会较多，相处也相当融洽。

据我所知，导师并不是清华大学固定设置的一个职务，只是个别系自动委任的。导师的职责并不是“管”学生，而是了解和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必要时提供帮助。在这一方面，王先生是很好地履行了责任的。

王先生对我个人最大的帮助是启发我认识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事业。在到清华以前，我对这位大师一无所知，是王先生主动给我介绍了陈先生的事迹和学术，并且建议我读一点陈先生的著作。他说：“你会发现陈先生的著作是很有辩证观点的。”我于是借了一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来看，感到王先生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我虽然没有继续阅读陈先生的其他著作，但心中对这位大师始终保持着仰慕之情，即使后来听说他因为不愿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拒绝担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时也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直到退休以后我才读了陈先生的另一些著作和一些关于他的著作，开拓了眼界。而这方面的启蒙工作是王先生对我做的。

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筹备之中，办公地点在故宫午门楼上，最早一次的中国革命史展览也是在午门楼上布置的。王先生带我们全班去看了这一展览，要求我们做详细的笔记。半天时间不够，他就带我们去小饭馆吃炒饼，午后继续参观。这次参观使我第一次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敦煌壁画临摹品的展览也是在午门楼上举办的。这次王先生不仅带我们全班（还有一些高班学生）去参观，还请常书鸿先生在展览现场给我们讲莫高窟的历史和外国考古学家是怎样掠夺敦煌壁画的。这次演讲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两点是最深刻的。其一是这些人的掠夺手段是既“高超”，又卑鄙的。例如，美国人华纳能以很高的技术把整片的壁画揭下带走。另一点是：常先生拿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和西洋绘画中的天使（安琪儿）做比较时说：“西方的天使是靠两只翅膀来表现飞的形象的，中国的飞天只有飘带，飞翔的韵味却非常浓。”我曾为《清华周刊》写了一篇短文报道这次参观，并且着重介绍了常先生的这句名言。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情况。王先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曾在北京学生救国会担任过职务，但是在国共合作开始抗日后就退回书斋了。王先生对这一段历史并不隐讳，而是主动和我谈起。他说自己是东北人，强烈要求政府反对日本侵略，这是他参加一二九运

动的主要动力，因为在蒋介石同意抗日后就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就不再想前进了。他还对我讲了蒋南翔、杨述等同志在清华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带有深厚感情谈了杨学诚同志如何从一个天真、朴实的青年，在运动中迅速成长和成熟，后来在湖北参加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且英勇牺牲的历史。当吴晗先生为历史系学生组织革命亲历者的讲座时，王先生也把杨述同志请来给我们讲一二九运动在清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对一二九运动的了解。解放初期和文革以后，王先生和姚依林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文革后他有一次和我谈起丁则良先生的女儿尽管高考成绩很好，却因父亲的问题未能上大学，丁师母生活也挺困难，并说想请姚依林同志关心这个问题。后来北大历史系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也得到姚依林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王先生是有贡献的。

王先生对同学的生活也很关心。当时国立大学不收学杂费，但只有一部分同学享受助学金，其余的同学每个月要自己交饭钱。有一次我们班的潘天恩家里有困难，未寄钱来，别人也帮不上忙，最后我只好去找王先生。他一听我说了情况，就立刻拿钱出来，帮助天恩过了难关。（顺便说一句，当时历史系的老师常常慷慨解囊，帮助同学解困。1951年夏我患胸膜炎，长期发高烧，是老师们捐款买了10支链霉素注射后才退烧的。我同班的周泽燧患了一向被认为是绝症的结核性脑膜炎，也是老师们捐钱买链霉素治疗才好的。）

一年级的其他同学与王先生不象我那样近，但都认为他的导师工作做得很好。我们经过集体讨论，由我执笔写了一张对他表示感谢的大字报，题为“我们的导师王永兴”，张贴在操场旁边的大布告牌上，这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



1950年清华与北大历史系学生联欢，前排左二为殷叙彝，后排左三为王永兴

1951年4月，清华成立工农速成中学，王先生被调任副校长，离开了历史系。我则在

夏天生病住院，后来又休学在校养病，与王先生接触少了。1954年，王先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58年受被划右派的前妻牵累，下放到山西教育学院，文革中备受迫害。1963年，他被借到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回到北大历史系任教，协助邓广铭先生建立了中古史研究中心。在这期间，我常到北大国际政治系讲课和开会，也常常去看王先生。那时周一良先生正因为梁效问题处境尴尬，心情很坏，王先生很关心周先生，常去和他谈心。有一次我和王先生一同吃过晚饭后去看周先生，畅谈了一个晚上。联系到前面所讲王先生对丁则良先生家人的关心，我深深感到老清华历史系的老师们之间存在的深厚友谊。

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留在清华工作的历史系老同学开始酝酿恢复历史系。那时还健在的原历史系老师只有北大的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张寄谦四位和历史所的孙毓棠先生了。万邦儒、刘桂生等曾几次约我和张注洪等系友到家里，聚会谈复系的事，陈庆华和张寄谦二位先生也应邀参加。刘桂生等还访问了几位年长的教授，征求他们的意见。可惜在历史系真正恢复时，孙毓棠和陈庆华两位先生都已去世，因此我们更加珍惜与周一良、王永兴这两位高龄老师的交往。我们曾在清华先后为周、王两位先生祝贺八十大寿，2002年清华校庆日，又在历史系祝贺王先生米寿。我和张柱洪（后来又加上洪肇龙，他是1951年入学的老清华历史系最后一班的学生）好多年来每到春节一定去给周先生拜年，后来也给王先生拜年。在我们心目中，与这两位老先生的联系也是我们和老清华历史系联系的体现。

当时的历史系一年级有十几个同学。后来有的转系，有的调干，有的被调去学政治课，最后从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只有我和周泽燧、王继龙三人（我因病晚了一年，泽燧晚了两年）。虽然我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起初研究五四运动，后来研究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修正主义的历史，都与隋唐史距离太远，所以我尽管与王永兴先生交往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就隋唐史向他请教过，以致在写追忆文章时竟不能对他的学术成就置一词，真正感到遗憾和惭愧。我只好以这篇短文表示对他的歉意和怀念，也表示对老清华历史系的怀念。



殷叙彝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2000年

殚精竭虑 贡献史坛

——追忆王永兴先生在清华历史系的一些往事

刘桂生 杨树先 夏应元 钱逊

我们敬爱的老师王永兴先生，不幸于2008年9月15日在京病逝。噩耗传来，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清华时王先生的学生们，都感到无比沉痛。六十年前的往事，不禁一齐涌上心头。

我们是在1949、50年先后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以后，认识王永兴先生的。但通过与王先生接触以及从其他师长的口中，我们也逐步了解到王先生的一些往事。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并逐步深入华北，激起爱国学生的无比愤怒。王先生作为东北人，亲受亡国丧家之痛。当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清华、燕京、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女一中等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规模浩大的华北抗日爱国运动，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当时在清华中文系就读的王先生参加了清华救国会，积极投身于一二·九抗日爱国民主运动。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45年获得胜利后，王先生也与其他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齐复员到北平。1945—46年，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研究助教。漂泊西南之时，他师从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得到陈先生的亲传，在唐史方面艺业大进，打下后来唐史研究的牢固根基。

1946年，陈先生回到清华，王先生继续担任陈先生的得力助手，就在陈先生家里上班。他对陈先生十分恭谨，虚心求教，认真工作，在生活上也对陈先生非常照顾和关心。陈先生的女儿在语文上感到吃力，王先生就帮助她补习。陈先生对王先生的生活也十分关怀。当时王先生住在城里，每天往返清华，交通不便，陈先生立即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梅贻琦校长，很快使王先生的住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48年底，陈先生转到岭南大学。当1950年刘桂生同学由岭南大学转入清华历史系时，王先生得知，非常关切地向刘桂生同学询问陈先生的生活起居、健康情况等，关心之情，溢于言表。

1950年，清华历史系委托王先生担任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任务。当时我们都已知道王先生的专长在唐史，但王先生遵从系里的安排，不讲价钱，愉快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并且认真备课，热情饱满地进行教学。在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回荡着王先生洪亮的讲课声音，使许多文法学院的学生打下了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基础。那是王先生努力追求进步，关心同学，热心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如下乡宣传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抗美援朝时，下清河制呢厂宣传，王先生似乎也去过。

1952年起，王先生改任清华工农速成中学的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承担起培养新型工农干部的重任。

北大、清华、燕京三校院系调整之后，王先生先后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山西教育学院。中间又逢十年浩劫，他遭遇不少坎坷。这些痛苦经历，使人笔难尽述。直到 1978 年拨乱反正，他被调回北大，才又开始了他的科研与教学的春天，生活上也开始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在回京后，他在建立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以及认真教学、努力著述等方面的贡献，已有北大一些师生的详细阐发，不再赘述。

作为清华的一位老校友，王永兴先生回京后，仍与清华保持密切联系。每逢校庆或校友的各种集会，他都积极参加，踊跃发言。1995 年在筹备复建清华大学历史系时，他积极出谋献策，力图为建立一个内容充实、名实俱符的历史系而奋斗。当然，清华的师生、校友，也没有忘记这位为清华作过贡献的老校友。在 1994 年他的 80 岁寿辰、2002 年 88 岁寿辰、2004 年 90 岁寿辰时，清华都为王先生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师生尽欢，共颂王先生的巨大贡献。

1990 年 12 月，在王永兴先生的倡议和寅恪先生家属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到会百余人。会后出版了由王先生主编的学术论文集。

总之，王先生的一生，与清华、北大的历史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学于斯，教于斯，又无分畛域，为这两校历史系的充实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两校历史系的师生们，都应当记住他的功绩。

纪念王永兴先生

唐耕耦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时，读过永兴先生大作《唐代差科簿考释》，就知道先生是唐史专家，正式见面认识则是1963年。业师王仲荦教授从济南奉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我随同进京。永兴先生亦是点校二十四史专家，负责点校《唐书》，我们同住在一幢宿舍楼内。我在京，一面到国家图书馆阅读参考论著和敦煌胶卷，校正《敦煌资料》第一辑录文，一面撰写毕业论文，不时去永兴先生宿舍请益，将撰写的论文习作请求指正。先生态度和蔼谦虚，对我的习作看得很仔细，不吝指点，时隔四十多年，当时情境犹如眼前，有的铭记在心，至今不忘。如先生指出习作中误将丰贍的贍写成瞻，给我的反省，印象深刻。这不仅是粗心大意，形近致误，而且是缺乏小学根底表现，如果对说文解字稍用过功，是不会出现的。

同样，我讲的有些内容，永兴先生也耐心听取。如敦煌户籍人名下普遍注一空字，我大学本科的老师邓广铭教授认为空就是空的，结合户籍记载各户授田亩数，普遍达不到应授田额，就推论均田令乃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行，我不以为然，向永兴先生谈了自己看法。姓名下普遍注一空字，乃造户籍时书写格式，表示其下空白，理由有三：（1）核算敦煌户籍文书上各户人口与田亩应受、已授、未受数，都和田令规定相符，可见均田令非一纸空文。（2）户籍人名下注空，表示其下位空白，防止营私舞弊，任意添写，改变其人身分，影响赋役负担。户主姓名下注空后，又写了内容作何解释，此乃总结一户赋役负担，表明其户分别属不课户、课户见输、课户见不输，与前者并不矛盾（按：这种书写格式，与现代收支帐，写完单笔收入帐后，中有空白用一横杠将空白处划掉，最后再写总数，颇相似）。（3）唐代信函后普遍写“谨空”，也是后面留有空白（即请在空白处写上指教，以示尊重对方）。永兴先生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想法，表示他也不同意均田令为一纸空文。后来王先生在给本科生讲敦煌学课，解释空字含义时说：唐耕耦意见空乃空白（此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宋小海等旁听后告知我的）。此时，上距在中华书局交谈已有十五年以上，我这未出茅庐的无名之辈的一空之解，王先生犹能记着，并在大学殿堂上引说，可见先生何等虚怀若谷。先生对我用敦煌胶卷校正《敦煌资料》第一辑录文，也颇为关注。

由于点校二十四史计划变动，《两唐书》点校改由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即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就在上海本地组织高校教师点校，永兴先生不再参加，不久回了山西。我则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双方失去了联系。

文化革命中，听说永兴先生遭到巨大冲击，蒙受非人侮辱，弄得妻离子散，吃尽苦头。但先生顽强地活了下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研究工作，此种艰苦卓绝精神，值得钦佩。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参加编写《中国史稿》，有一天，永兴先生突然来

访。他告诉我，正在研究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〇六一三号文书，在山西找不到任何参考论著，来北京也因图书馆关门，无处可寻。从王仲荦先生处得知你曾对这一文书作过专门研究，故特来访。我当即尽我所知，倾心相告：此卷《敦煌资料》第一辑上录文有错误，日本山本达郎先生在我之先，早已作了精细研究，将因另作他用剪贴导致的颠倒错乱，作了复原。我们的研究，必须在山本达郎先生研究基础上才能前进。随后找出我在研究生时翻译的山本先生文章译稿（此译稿原打算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因停刊未发）交永兴先生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并请用了饭。说来惭愧，那时我的经济困难，月薪六十九元，除还欠债外，仅剩十七元五角作生活费，连陪先生去街上小饭馆也不可能，只是从机关大食堂买一份饭菜，聊以充饥，但两人交谈甚欢。分别时，互道保重身体，后会有期。此次见面，我感到先生虽年已近花甲，身体尚健，但面色抑郁，心情显得沉重。

1978年，永兴先生从山西调入北大，见面交谈机会增多，相互也更为了解。先生为人耿介，为学重实证，少议论。对史学界一度流行的两种治史说法，他明确表示赞同“论从史出”，鄙薄“以论带史”，反对“以论代史”。他批判文章，首先看所论是否有据，所据是否有力可靠；考察学生，看是否扎实读书。他曾经说过，某某曾向他询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唐六典》记载得清清楚楚，已经是副研究员了，怎么搞的，连《唐六典》也未认真读？这说明王先生对史学界存在学风浮躁、不扎实，是很反感的。他不知道史学界有的新进之士，不听老一辈史学专家关于治史要有坐冷板凳、甘于寂寞，埋头苦读精神，以及掌握丰富史料和四把钥匙（目录、年表、地理、职官）等工具的教导；而是走终南捷径，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声称只要有了理论就能写出文章。不仅副研究员不知道《唐六典》记载清楚的事实不足为怪，更有甚者，将名家正确的录文说成错误，作成洋洋洒洒大块文章，进行批驳，发表于专业刊物上；又有将他人的演讲稿、大学内部的交流讲义、抄家抄来的文稿、和投给《中国史研究》等刊物的稿子，或改写成文，或具上己名发表，藉此评上高级职称，有的居然成了博士生导师。王先生以他自己的行动，对批驳这种学风，做出了实际的榜样。

我从事隋唐史研究，除业师王仲荦教授，最喜欢请益的专家有二位，一位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一位就是王永兴先生。我与永兴先生的交往，首先自然是我向他请益。但我也有一点长处，日本、港、台等研究隋唐史的信息知道得比王先生多。历史研究所可谓得天独厚，日本等国外专家新著，不仅来得比国家图书馆早，而且有的新著又只有历史研究所拥有。我不需要天天上讲堂授课，又比王先生年令小十多岁，能经常跑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查找，看了新著，主动介绍，王先生也很喜听。例如日野开三郎著《唐代邸店》、《唐代租庸调研究》，听了我的介绍，前者从我手中借去，后者则从宋家钰处借来阅读。他看得很仔细，看后与我交换评价。我向王先生谈的另一内容，就是我在学习研究中的一得之见。在写成文章发表以前，或发表之后，听取他的意见。先生有赞同，也有不同。如关于李世民在太原起兵和唐初削平群雄过程中的作用，我认为夸大了。王先生以为那是翻案文章，劝我不要做。《唐代前期的兵募》发表后，得到嘉许。《唐代的资课》发表后，先生来信说：

“拜读有关资课的大著，甚为钦佩。记得曾和你面谈此问题，你有很好的见解，但在这篇大著中，你的论述太拘束了。不知是否？”我的写作技能的确不强，不能把自己的见解充分表达和突出，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学长，都曾当面提醒，指点我如何改进，与王先生交谈，更是既受益又愉快。

最使我铭记难忘的，是在我遭受诬陷挨整时先生对我的帮助。1982年3月，应《历史研究》编辑部之约，我写了《〈通典〉所载唐代课户、不课户、课口、不课口比例问题》一文，经编辑部删改后，在该刊1983年3期发表。此文是我多年来一系列研究的产物，解决了国人长期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但被指为抄袭，遭到社科院通报批评（中央国家机关转发了这一通报），停止了党支部书记工作，党籍被挂起来不予登记。并于1986年3月，不得不以花甲之年，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历史所，调到了国家图书馆。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但始终得到王永兴先生的同情和帮助。王先生深知我的科研能力，他甚至还为此向邓广铭主任提了建议，希望将我调到北大工作。最后是邓先生找我谈话，认为这样做一是会增加北大和历史所的矛盾，一是我如教书，乡音太重，讲课学生听不懂，劝我找其他的单位，这样我才去了北图。

1986年前后，王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向我约稿，先后发表了我两篇长文。邓广铭先生在第二辑的序言中写道：“在编辑这本《论集》第二辑的过程中，我们承蒙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久居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历史研究所的唐耕耦先生、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先生和本校的季羨林先生、周祖谟先生都赐以宏篇巨著，不但使本集增添了光彩，而且使本集的质量得到极大提高。这，不论对我们或对读者都是异常地欣幸并不胜其感激的事。”邓先生把我列在姜亮夫等著名专家一起称赞，我并不认为我的文章真是怎样好，而只是运气好，搭在一批名人之中，与有荣矣。时逢我因文章被指为抄袭事而蒙受不白之冤，从历史所调到了国家图书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论集，一再发表我的长文，且在著名的邓广铭先生文中得到肯定，影响大，这件事在当时减轻了我的压力，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1987年国家图书馆评审研究馆员职称，我申请参加。后来有知内情的人告诉我，馆领导将我的材料送请北大历史系鉴定，王永兴先生写了很好的评语，认为可以提升为研究馆员。馆评委会委员著名的老专家戚志芬发言，认为北大学风严谨，老专家王永兴教授所写评语可信，应该评升唐耕耦为研究馆员。虽然那次因我到新的单位不久，评委对我并不了解，又限于名额，未能评升，但我十分感谢永兴先生对后辈的奖掖之词，特别是这事发生在我最困难的时期，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纪念永兴先生，他在培养人才和学术上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广铭先生执掌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先生熟知王永兴先生在隋唐史方面的造诣。我曾多次听邓先生说：“王永兴和汪篔是陈寅恪的同期研究生，陈寅恪赞赏王先生胜于汪先生。”解放后，王先生左迁山西，专长不能发挥，邓先生一当上北大历史系主

任，就用大力将王先生调来北大。邓先生成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是他开展敦煌学研究的左辅右弼。他曾对我说：王先生长于中古典籍，对隋唐史有深厚功底；张广达先生长于外文，熟悉国外敦煌学研究，两人联手合作，无敌于天下。张广达先生也甚赞王先生对《唐六典》等古籍、对典章制度的娴熟。永兴先生调来北大，虽年逾花甲、奔古稀了，但得到了一展平生所学，发挥才能的机会。久积心头的阴霾消失，精神焕发，夜以继日，沉浸在研究工作之中，似乎要把丢失的岁月捡回。一面认真作好隋唐史、敦煌学的教学，既教授本科生，又培养研究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从1982年至1992年十年间相继出了五辑。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其中作者，相当多的是正在学习的研究生、新出现的人才。不少成了当今隋唐史、敦煌学研究领域的研究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世界著名。《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一至五辑，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唐长孺教授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探（1983、1989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韩国磐教授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6年）等一系列论著的出版，为世界学人所瞩目，提高了我国在世界敦煌学界的地位。

这里顺便讲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敦煌学会最初得到国家资助的事。敦煌吐鲁番学会作为一个学术社团，在1983年国家财政并不宽裕情况下，获得五百万元巨额资助是空前的。申请政府拨款资助的报告，是教育部章学新处长起草的，有常书鸿、季羨林、唐长孺、任继愈等二十二名专家签名，我也是其中之一，亲历其事，参加了申请报告如何修改的讨论。党中央宣传部领导廖井丹等同志为我们出谋划策，强调报告要写得扼要，有感染力，使中央领导一看，就觉得应该给点钱，值得给点钱。我当时深感惭愧，知识分子真是书呆子，连向上申请拨款也不会。报告上呈后，中央最高领导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都圈阅了。紫阳批示，原则上同意拨点钱，具体由依林、丙乾酌定。王永兴先生和姚依林是同学，亲自找了姚，当面陈说，结果拨了款。敦煌学会得到资助，出力最大的是教育部的章学新和王先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流传日本藤枝晃教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中心在日本。引起有些国人气愤，个别单位甚至出现了不能以礼接待藤枝先生访问。其实这话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位先生说的，藤枝先生只是当场表示同意。类似这样的话，早已有之，不见得错。由于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学人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能安下心来做研究，中国的敦煌学确实相对落后了。我曾在天津听过藤枝晃先生的课，得益不大，但他讲的三个问题至今记忆不忘。（1）池田温先生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附有敦煌契约等文书，受到我国学人欢迎。但藤枝晃先生认为附录这些文书，与该书主题不合，不符合体例，提出责难、批评，池田先生始终不予回答。

（2）日野开三郎是唐史专家，我曾向藤枝先生询问日野先生为学、研究状况。藤枝先生双手向左一摆、向右一摆，形象地说这算什么学问，其意是说日野只是史料排比，算不上学问。我认为史料排比，也是一种学问，藤枝先生看法偏面。（3）王重民先生等编的《敦煌文书目录索引》一书，藤枝先生评价说，这本书王重民编的法国伯希和部分，有价值，其他两部分

没有什么价值。以上，藤枝先生批评了二位日本同胞；三位中国学人，肯定了王重民先生一人；批评了中国史学界泰斗、著名的陈垣教授和刘铭恕先生。这表明藤枝晃教授不失学人本色，实事求是。自己怎么认识，就怎么说，并不因为是自己同胞，是中国著名史学家而回避不说。同样的道理，藤枝晃先生同意“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中心在日本”之说，也只是他的真实想法的表现，并不是有意贬低中国学人成绩。对此，我们不应该大惊小怪，怪罪他人，生闲气，而应该闻鸡起舞，发愤图强，切实做好研究。王永兴先生与全国许多爱国学者一起，真是这样为敦煌学作出了显著成绩，从此我们再也不大可能会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中心在日本、在法国（不在中国）的说法。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是全世界的，研究中心在中国，在日本，在法国，在世界各地。全世界的敦煌学者团结起来，搞好敦煌学，为人类文化发展增添光彩！

王先生在北大工作的这段时期，也是解放后北大历史系在隋唐史、敦煌学研究方面出人才、出成果最显著的时期。这，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大环境有了改善，邓广铭先生领导有方。但永兴先生是有力的具体执行者，功不可没，值得肯定，值得纪念！

王先生本人在隋唐史、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很出色。《唐代差科簿考释》是先生成名之作，那是在困难处境中作出的，更显得难能可贵，为唐长孺教授和日本西村元佑等专家肯定。调入北大后，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外，不长时期内出了那么多论著，有目共睹，无须赘述。仅以《唐代勾检制研究》而言，王先生写作时，我就在他的书桌上看到过部分文稿，也拜读过正式发表的论文，其后成为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慧眼独具，收入《中华学术丛书》，精装出版，蒙先生惠赠一册，仔细拜读，获益良多。此书体现了先生为学细致缜密作风。所谓勾检制，宋代避赵构讳，改勾为审，成为审稽制，属职官制度。永兴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勾检制普遍实行，并自成体系。唐史研究者熟悉唐官制三个系统，即机要决策系统、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但事实证明还存在着勾检系统。”“论述唐官制而不及勾检制，则所论述者是不完备的。”先生以传统文籍集合出土文书，论述了勾检制的普遍性和具体实行情况。唐代政府行政效率较高较快，和勾检制度密切相关。这不仅填补了唐史研究中一个空白，嘉惠后学，而且对改善现行国家行政工作，亦有借鉴作用。做好各级政府工作，一靠制度的优越、完备，二靠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重大失误原因多多，但重要原因之一为制度不完备。文革十年动乱，对国家元气损伤之大，影响之深远，无法估量，就是由于根本制度有缺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读永兴先生大作，除受益外，当时产生了一些不同想法。

其一，勾检制似属官制三大系统下之子系统，将它与决策、行政、监察并列为四大系统，觉得抬得过高。

其二，先生说门下省、中书省不设勾检。我认为不可能不设，而是有其官而未写明职掌。

因为勾检稽失、省署抄目、受事发辰，以及财物勾检，每一个办公部门不可或缺的。这和当今政府机关公事公文处理相似。一般为秘书起草文件、主任之类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文书打印，收发登记，最后归档入案。每一程序有人负责。门下省之录事、主事，中书省之主书、主事之类，就是勾官。参比尚书省之录事、主事令史、主书令史之职掌，可以推知。此外门下省、中书省之副长官给事中之类，亦承担勾检之责。

其三，关于唐代勾检制尤其是财务系统的勾检制，结合四柱式计会历等文书，还大可发挥，先生之论，似太拘谨。

以上疑问，未能在先生生前请益，殊为遗憾。

纪念先生，浮想联翩。先生对唐史研究，厥功甚巨，但与先生才学相比，却远远不够。先生高寿，在世九十五年，但中间三十年，正是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果时期，却大大浪费了。如这三十年不浪费，发挥作用，则所作学术贡献不知比现存大多少。先生是不幸者，但又不幸中之幸者。最后三十年逢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不仅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个人家庭生活也幸福，值得欣慰。先生可以含笑九泉，安然长眠矣！

2009年5月1日夜12时。

敬悼王永兴先生

北京市计算中心 董宝光

当代著名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家王永兴先生，毕生辛勤耕耘，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先生于1957年发表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史学界赢得了荣誉，在此后几十年间影响了几代学人，同时推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文革”后期，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撰写的《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可与日本第一流学者撰写的关于敦煌学的论文相媲美。永兴先生为我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永兴先生和先岳母刘开荣，均系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二人有同窗之谊，永兴先生是我的父执。我亦忝列清华校友，亦忝列永兴先生之同门，然实属先生之晚辈。蒙不弃，永兴先生和我结为忘年交，我也常至先生寓所亲聆教诲，同时略申晚辈之敬意。今先生已归道山，作为晚辈，现回忆一些先生对我讲述的生平事迹，以见先生之高风亮节，堪为后学之楷模。

命途多舛 一生坎坷

永兴先生系农家子弟，家境清贫。幼年人私塾启蒙，成绩优异，颇获赞誉。1931年9月初，入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高一。入学仅18天，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沈阳，学校被迫关闭。先生晚年撰文《我的最后一课》（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回忆了1931年9月19日学校关闭前夕，校长为全校师生所上的最后一堂课。文章深切感人，使人感受到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以及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不屈、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精神。我每读先生此文，立即联想到法国作家都德的传世名篇《最后一课》。我认为，先生此文堪与都德的名作相媲美。

为了不作亡国奴，永兴先生流亡到北平，举目无亲，在宣武门外一带过着乞讨和半乞讨的生活。经过刻苦自学，永兴先生终于在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须知，先生仅读过18天高中啊！

在清华中文系，先生有幸遇到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为他批改的作业，他一直珍藏身边。后来永兴先生加入了地下党，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大，内迁昆明，不幸中断组织关系，以后亦未得以恢复。

1957年“鸣放”期间，永兴先生已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多次告诫自己

的亲属应谨言慎行。然而，他的一位直系亲属坚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条款，出言无忌触怒了领导，被打成“极右分子”，由士兵武装押送劳教。“一人犯法亲属连坐”乃中国封建社会的陋规，永兴先生亦受株连，1958年被遣送至山西太原南郊，控制使用，从事一些与自己专业不相关的事情，开始了长达21年的灾难生活。

迨至1966年“文革”肇始，永兴先生更是历尽磨难，自己的研究资料、书籍等被悉数抄没并焚毁，尤其是当年朱自清先生为他批改的作业亦被焚毁，这是令永兴先生最感痛心的。无休止的批斗，使永兴先生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因受酷刑，他的手严重颤抖，不能正常书写，就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有一次，“造反派”令永兴先生站在一条既高又窄的板凳上接受批斗，因时间过久，永兴先生坚持不住，遂跌倒在地，昏迷不省。“造反派”亦散去。幸好夜间突降大雨，冰冷的雨水将永兴先生激醒，这才苏醒过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他又被遣送至农村，施行“管制劳改”。永兴先生曾对我感慨道：“若天假我以年，我将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此系真实的历史啊！”

从1958年至1978年，恰为永兴先生44岁至64岁，正值盛年，为精力充沛的黄金时代，然而他不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更受尽折磨，可谓历尽九死一生才赶上落实政策。

矢志传承义宁陈氏之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先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永兴先生选修了国学大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寅恪先生的高尚人品和渊博学识深深感动了他，遂转入历史系，正式名列陈氏门墙，成为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寅恪先生之曾祖父陈琢如，即以气节著称。因母体羸弱，琢如遂习岐黄之术，终成名医，悬壶济世，视患者如亲人，口碑极佳。明末关中大儒李颺（二曲）以绝食拒不降清，气节著于当时，与钱牧斋、龚芝麓和吴梅村等人不可同日而语。琢如临终前以二曲之文贻其子宝箴，以重气节教育其子。祖父陈宝箴，痛感清末朝政腐败，内忧外患，乃支持康梁变法，在湖南推行新政。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宝箴被革职，遭受迫害。父陈三立（散原）为清末著名诗人，同光体之代表作家。1937年日寇侵占北平后，散原老人绝食以殉国。迨至寅恪先生，受祖上三代之熏陶，自然要成长为重气节之人。是故，义宁陈氏已系四代忠义之家。

寅恪先生天资聪慧，又勤学苦读，继承了华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宋贤司马光和欧阳修的史学，寅恪先生直接继承并发展之。他曾留学欧美，兼擅多种语言文字，终成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

永兴先生决心一生跟随寅恪先生，努力学习寅恪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将义宁陈氏之学传承并发扬光大。

1939年7月，永兴先生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随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

继续师从寅恪先生读研究生，学习隋唐史。1942年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员各回原址。寅恪先生出国医治目疾，于1946年秋由英转美返国后，回清华园继续任教。他为历史、中文两系授课，亲自点名邀请永兴先生作自己的教学助手。永兴先生师从寅恪先生受业十年，深沐恩泽，十分高兴能作寅恪先生的助手。永兴先生在寅恪先生身边工作了两年，至1948年冬，寅恪先生离平南下，此后二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

永兴先生在被流放的21年间，虽身处逆境，仍时时怀念寅恪先生，经常在梦寐中侍奉先生之侧，聆听先生教诲。迨至1978年落实政策，永兴先生返回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才得知，经“文革”浩劫，寅恪先生遭受残酷迫害，已于1969年10月7日谢世。永兴先生对恩师的含恨殉国无限悲痛，遂下定决心，要将义宁陈氏之学传承下去！

永兴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将当年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对学生认真负责，每个星期日都要到学生宿舍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认真进行辅导，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永兴先生的学生继承了义宁陈氏之学，并沿着寅恪先生的治学道路取得一定成绩，撰写了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曾撰文《陈寅恪后继有人》（载《文汇报》1996年3月2日），对此专门作了介绍，对永兴先生传承义宁陈氏之学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对陈寅恪学派后继有人深感欣慰。

永兴先生晚年，以“九死不死，忠诚用诚，宏扬师道，终此一生”勉励自己。

永兴先生原住蔚秀园，宿舍前有荷塘，夏秋时节水面为荷叶覆盖，满目苍翠，秀美的荷花在荷叶的映衬下益显瑰丽而不俗。宋儒周敦颐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并誉之曰：“莲，花之君子者也。”阵阵荷香飘入室内，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使人心旷神怡。永兴先生遂将书房命名“荷斋”。后虽迁居燕北园，庭前已无荷塘，但荷斋之名依旧。愚意以为，“荷斋”之名尚有深意。永兴先生将恩师寅恪先生比作花中之君子荷花，自己则甘作一片荷叶，永远侍奉先生之侧。此臆测现已无从求教矣。

重友情的赤诚之心

当代著名宋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学家程应镠先生，抗战前夕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七·七”事变之后，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与永兴先生遂成同窗挚友，二人志趣相投，数十年来友情深厚。

1957年，应镠先生直言贾祸，被“扩大化”，一些亲属亦受株连。“文革”期间，程先生更是身受酷刑，历尽磨难，不仅其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而且周围某些人对他亦不理解，无人可倾诉，心情极其郁闷。某日，程先生和永兴先生在北京街头不期而遇，老友重逢且均

系劫后余生之人，遂百感交集，二人相拥痛哭，程先生终于向生平挚友诉说了自己郁结已久的衷曲。永兴先生亦以自己的遭遇劝慰之，两位老友犹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应镠先生平生较为内向，在公众场合竟有此等举动，这足以说明二位老友感情之真挚，永兴先生待人交友心肠之赤诚。

应镠先生亦系我的父执，解放后执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任该校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程夫人李宗藻伯母和我亦为忘年交，常通书信。1994年应镠先生捐馆，永兴先生撰写了悼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永兴先生曾向我深情地回忆起和应镠先生数十年的交往，以及相互间的珍贵友谊，并谓，应将应镠先生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此系极有价值的史学专著，不可随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他表示，愿承担为程先生整理遗著的工作，作为自己对老友怀念。他令我转告程夫人李宗藻伯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它方面有困难，他均愿鼎力相助。永兴先生对老友的这种肝胆相照的情谊，令我感动。

我的父执和师长

我少年时最喜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因其文笔清丽、感情真挚，且人品高尚之故也。朱先生的一些名篇，我至今仍能背诵。永兴先生系朱先生的亲传弟子，其文章和人品亦具有朱先生之风范。我有时至永兴先生寓所，聆其讲述朱先生的一些生平轶事，精神上就会得到某种满足。朱先生捐馆已届一甲子，时至今日亲承其警欵之人已如凤毛麟角，而永兴先生恰为当前屈指可数的受业者之一，现亦归道山，思之令人唏嘘。

我退休后也写点小文章，请永兴先生指正，他总是予以热情鼓励。我在阅读史书时，凡遇到疑点，辄向永兴先生电话询问，总会得到满意的指教。永兴先生是我的长辈和良师。永兴先生对寅恪先生感情极深，矢志将寅恪先生的人品和文品以及治学之道忠实记录，留传后世。寅恪先生系我的太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如泰山北斗，仰之弥高。我平时亦留意报刊杂志，协助永兴先生收集有关寅恪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当代学人撰写的有关评论文章，对永兴先生略尽晚辈之孝道。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抗战期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亦系寅恪先生的受业弟子。曾撰有《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一文，论述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先生。他认为，寅恪先生不仅仅是一位20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中写道：“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21世纪，也许直到永远。”我得到此文后，电话告知永兴先生，他很高兴，希望能见到此文。我准备赴府拜谒时亲自奉上，但因琐事缠身，未能立即前往，詎料先生遽归道山，今日思之悔恨不已。

永兴先生对清华感情很深。每年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清华校庆，永兴先生晚年

因身体关系，很少返校。“熟人越来越少，也就不想返校了。”他对我如是感慨。我有时将清华的一些新情况告诉他，他还是很关心母校的。永兴先生终生保持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虽已年逾八旬，在校园中遇到昔日师长陈岱孙先生，仍然侍立路旁，行礼致敬。

2008年春，听说永兴先生不慎跌倒，以致骨折，但很快愈合。这说明年届九五的永兴先生体质很好，我很高兴，曾在电话中表示慰问。从谈话中，我感到永兴先生思维清晰，记忆准确。他希望我去他家看望，詎料这次通话竟成永诀。

永兴先生捐馆后，人送挽联：

薪火相传，义宁治学一脉；

津梁惠溥，燕园著述千秋。

准确地概括了先生的一生。

永兴先生远行不归，我失去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辈，心中非常悲痛。先生为传承义宁陈氏之学做出重大贡献，有功于我国史学界，将永远留在世人心中。义宁陈氏学派亦将世代绵迭，惠泽后世。

祝愿永兴先生一路走好！

记王永兴先生二、三事

国家图书馆 徐自强

王永兴老师的名字，最初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知道的。当时，笔者到北京大学中关园宿舍，去看望闫文儒老师，在谈话中忆及十年“文革”中的一些悲惨往事。当谈到陈寅恪先生的高足——北大历史系隋唐史教授汪篔老师含冤去世时，闫老师突然一转话题说：为了补充历史系隋唐史教学力量因向达教授、汪篔教授突然不幸故去而出现的不足，现正在从山西调进陈寅恪先生的另一高足——王永兴教授，我现在在积极活动中。从此，我才第一次知道了王先生的大名。与王先生认识见面，则是在筹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及其以后的活动中。在前后将近二十年的交往中，深感王老师的言行足为师表，笔者受到很深的教育。但在先生去年西归时，因出差在外，未能见最后一面，敬送一程，内心愧疚。现值驾鹤一年之际，撰此短文，出示合影，以表哀思！

(一)

王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参与了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领导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工作，因而在1983年秋在甘肃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

1984年6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王先生作为常务理事出席了会议，笔者作为北京图书馆参加筹备“北京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故与王先生才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和直接的交往，开始对王先生有了一些了解。

王先生对学会的工作是十分负责的。首先，他积极活动，协助落实了学会二十二位学者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的主要内容，使学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其次，先生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承担了有关任务，1984年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术委员会”，先生担任了历史组的学术委员，1985年在新疆召开的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还作了大会发言；1988年、1992年两届学会机构改选中，继续担任了常务理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下属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开始筹建，先生又担任了筹建研究室的负责人。第三，在历次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能积极主动的提供论文参与学术交流与讨论。如1983年兰州会议提供了《我国敦煌文献（汉文）研究概况》；1985年乌鲁木齐会议提交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代勾检制度资料试析》；1987年香港会议提供了《唐代勾检中财务系统研究》；1988年北京会议提交了《伯三三八四背文书研究》等论文。第四，在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的创办过程中，不仅是积极提供建设性意见，而且还向中心推荐

北大毕业的研究生以充实研究的力量。综上所述，王永兴先生以自己的工作成绩，对我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建立与发展，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北京房山云居寺是国内外著名的石经宝库，内藏我国隋、唐、辽、金、元、明、清等历代刻经一万五千多石，其中唐代刻经，不少是以名僧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所列版本为底本加以刊刻的，这与敦煌藏经洞中所藏经本，不少是互相一致的。因此，赵朴初会长将“房山云居寺”誉为“北京的敦煌”。所以，房山石经很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王永兴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冬，当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与中国佛协图书文物馆金石组合编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收录房山石经在刊刻过程中附刻的各种题记约六千八百条，记录了唐代有关行会的经济史料）即将付梓时，引起了王永兴先生的重视，并当即向国务院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信，建议要慎重处理此事。信件原文和有关批示如下：

依林师兄：

前寄一信和《论集》一本，谅已收到，在这封信里，向您汇报有关学术文化的一些情况，并提出我个人的一些意见，供您考虑。

北京图书馆整理编辑《房山石经题刻》一书，收载了房山石经与云居寺隋唐辽金元明清民国长时期中的题刻十余万条。这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有的学者把这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敦煌文书相比，预计可能会出现与敦煌学齐名的“房山石经学”，北图所编的书四月出版，五月要送日本东京国际书展。我国这一大批宝贵文化遗产就将为日本学者所得，以日本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印刷出版情况，他们可能很快就能发表研究成果，走在我国学术界的前面。这对我国学术界是一个耻辱。

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我建议：此书不要送日本东京国际书展，也不要公开发行，应改为内部控制发行，使我国学界能抢先一步研究这批学术文化遗产。

陈述如上，请您考虑。

专此，敬请

时安

弟王永兴上

1. 15

姚依林副总理批示：

新闻出版署宋木文同志：

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来信，送上请阅处。对此事我没有研究，但是一个重要问题，请查清是由谁管，并请主管同志加以注意。

姚依林 27 / 1 / 87

宋木文署长批示：

请谢道渊同志阅，并将此书的出版情况和对来信提出的问题的意见告我，以便妥善处理此事。

宋木文 2 / 2

新闻出版署函：

送上北京大学王永兴给姚依林同志的信（复印件）及依林同志、木文同志批示（复印件），请阅处，并将意见告我们。此致

敬礼

新闻出版署木文同志处 2 / 2

谢道渊馆长批示：

致忠、自强同志：送上宋木文同志转来王永兴教授给姚依林同志的信，请尽快将有关情况及你们的意见告我，并替我给宋起草回信稿。

谢道渊 5 / 2

此事经过情况的交流与沟通，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从中我们感受到了王先生对房山石经的重视，以及对我国文化遗产的关怀。



1987年王永兴在云居寺阅读石经



1987年在云居寺举行的首届房山石经研讨会代表合影。前排左四为周绍良，左五为季羨林，

左六为王永兴。

不仅如此，1987年在房山云居寺经过几年整修后定于该年国庆时试行开放之际，王先生又同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季羨林、李希泌、周绍良、徐莘芳、黄炳章、苏双碧、于杰、赵其昌、唐耕耦、罗昭、吴梦麟等于10月15日参加了在云居寺举行的首次石经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会后还合影留念（附照片）。对此，《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于1987年11月25日作了专题报导，标题是“云居寺石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首都学术界集会讨论云居寺石经”。

（三）

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也治学严谨，成就显著，现仅就1989年11月先生赠笔者的《陈寅恪读书札记》一书和先生整理该书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证明。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由包敬弟、王永兴、李锦琇共同整理辑录。25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其书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并言》中说：

陈寅恪先生读书，有圈点，志其行文脉络臆理；有校勘，对本校或意校其为误；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批校最多且最不易整理之书，为梁慧皎《高僧传初集》，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为所见先生批校书中最难于爬梳著。

今存所见先生批校书，凡《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共十六种……

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异同，与前贤礼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综观先生批校书上述二十一种不及什之一……闻其中仅《世说新语》一书，即有批校本数部之多……先生生平所著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之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后来著书之蓝本。

由蒋天枢先生所言之陈寅恪大师读书札记的诸多特点看来，要将其整理出版是十分困难的。自身没有扎实的学识功底，没有谨慎细密的学风是难以完成的。王永兴先生等很好地完成了两唐书札记的整理辑录工作，并梓行出版，可见其整理者的学识和学风都是可以称道学习的。

2009年初春于京华

缅怀著名史学家一代敦煌学宗师王永兴教授

武汉湖北大学 程喜霖

2008年9月15日，我国著名史学家、一代敦煌学宗师王永兴教授逝世，噩耗传来，悲痛万分，不禁潜然泪下。一颗史学巨星在北国陨落了，这是史学界、敦煌学界的巨大损失。先生博学多闻，著作等身。他对史学、敦煌学的巨大贡献，泽被后世，彪炳史册，勋华炳耀。他的英名，永垂千古。

我不禁忆起2000年6月，我拜谒先生，看到先生已八十七岁高龄，仍伏案著述，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言谈中笑言：“百岁不在话下”。突兀，为何驾鹤西去，归隐仙山了呢？我虽然不是先生耳提面命的嫡传弟子，但我是王先生认可的私淑弟子。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脑中萦回，对我的教诲历历在目。

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1985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50余位中外学者麇集昆仑宾馆，历史、考古、文学、宗教等11个组交流、切磋学术。历史组提交的论文最多，王永兴教授担任召集人。在会上我宣讲《对吐鲁番所出四角萄役夫文书的考察——唐代西州杂徭研究之一》^①，因是第一次在大型的国际学术会上介绍论文，有些怯场，词不达意。王先生鼓励的眼神、巧妙的提示，给我极大鼓舞。就是在这次学术会上，我结识了王先生。

1988年6月，我受聘于湖北大学；8月，我参加北京大都饭店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季羨林会长称：“那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西德、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学者，以及台湾来的学者。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极一时之盛”^②。中外学者济济一堂，显示了敦煌学发展之盛况。王先生仍任历史组召集人，在他主持下历史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安排我宣讲《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镇戍守捉与烽堠》^③，他质询提示，鼓励我发表自己学术见解。在会下王先生与我长谈治史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方法，并向我介绍了他指导的研究生。自此书信往来，谆谆教诲，幸列门墙，为教外别传弟子。

应当说明，我在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上的成就，受惠于两位老师的教导：一是业师唐长孺先生教我治史和整理研究吐鲁番文书的方法；二是王永兴先生指导我研究敦煌吐鲁番学。有人会问有名师授业，又为何改换门庭呢？这纯属误解！我不禁想起难忘的1995年因个人恩怨所产生的流言蜚语，谤声四起，甚嚣尘上。此时北京、厦门、新疆的友人来信鼓励，而王先生年届八十却挺身而出，亲自向季羨林会长说明真相，力证我“勤奋治学，为人磊落”。

^① 程喜霖《对吐鲁番所出四角萄役夫文书的考察——唐代西州杂徭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序》，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第1页。

^③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第456—469页。

又在书信中言道：“时间会证明一切，皇天后土，公道在人心”。帮助我度过难关，学生莫齿不忘；又因为我一向反对门户之见，坚持除受教业师外，向学界老前辈求学，故问学于王师。实际上王永兴教授是陈寅恪先生高弟，而唐长孺教授自称为陈先生“教外别传”弟子。也就是说，唐门也好，王门也罢，皆源于陈门。君不见唐先生“自认是陈先生的私淑弟子”，题七绝有云：“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汪荣祖先生释云：“唐先生曾提到当年论文送审，曾得到陈先生的赏誉”。“而自愿‘教外别传’，较私淑之意，犹进一阶”^①。所以我不囿于门户之见，研究敦煌吐鲁番学，问学于一代敦煌学宗师王永兴教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我著述《过所》遇到困难，王师多次致信，从志向、毅力、勤勉等方面教示，鼓励我从汉唐典籍和敦煌吐鲁番所出过所文书深入探索，只要坚持，必有成就。当我历经七年艰辛，于1991年7月，著成《唐代过所研究》书稿，适逢王师病愈出院，不顾身体虚弱审阅书稿，并惠赐《序》。凡此表露了老师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1992年9月，北京房山举行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王永兴先生再次担任历史组召集人，我有机会再接高教，与王师畅叙平生，亲聆教诲。不仅如此，他还对我指导的研究生秦明君讲：“学习历史或治史要坐冷板凳，勤奋好学，而且要有悟性，二者缺一不可。若不然，乘早改从它业”。王师这番话是治史学人应当具备的啊！

1997年我受聘为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在赴日讲学前夕到北京办理证签证，乘机往北京大学蔚秀园教师公寓拜谒王师，他与夫人锦绣先生接待我，畅叙甚欢。王师对我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欣喜不已，他说：“你治史有陈门之风，依此走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知道这是老师的希望，我怎敢望学术大师的项背呢？王师望生成才，拳拳之心明矣！

2000年6月，我参加首都师大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刘进宝君结伴往北大造访王师，他对我和刘君谆谆嘱咐，深入研究敦煌学，并合影留念。当时我看到王师已87岁高龄，若深邃长思，似辽远胸怀，仍笔耕不辍，身体康健，十分宽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2007年6月，在武夷山敦煌学理事会上，听孙学雷女士说，她与王师通过电话，身体尚好。万万没有想到时隔一年，他老却仙逝了，令人歆歆不已！

^① 汪荣祖《义宁而后称祭酒一悼念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历史月刊》1995年3月号。



程喜霖、刘进宝（后排）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2000年

以上我回顾了从结识王永兴教授到成为他的私淑弟子的历程，先生对弟子的教泽，可归纳三端：

第一，王师在书信中引用陈寅恪先生所言：“贬斥势利，尊崇气节”^①。教导我“为学做人”。也就是说，一个史家著述，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既是学者又是一个有骨气的人。诚如王师赠《序》所言：“而是作者一颗热爱中国文化的学术良心，这样有学术良心的迂儒，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振兴的希望所在”^②。

第二，治史者皆知，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共同创导了“二重证据法”，乃研究历史、敦煌吐鲁番学的重要方法，特别是研究敦煌史学、吐鲁番史学唯一正确的方法。王永兴教授是陈寅恪先生高弟，他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著作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并昭示弟子，王师赠给我：《陈寅恪读书札记 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包敬第、王永兴、李锦绣整理）（1990年赠）、《唐勾检制研究》（1992年赠）、《陈门问学丛稿》（“1994年6月王永兴时年八十”赠）、《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1995年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1998年赠）、《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2003年赠）等皇皇巨著六部，学生恭置案头，研读学习。特别是他的著名论文《唐代敦煌差科簿考释》^③，征引《唐六典》、《唐书》、《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与敦煌天宝十载徭役文书所记互相参证，揭示唐代郡上、纳资、子弟、侍丁、亲侍丁、执衣、捉钱、充徕、渠夫、斗门、卫士、土镇、豆卢健儿、终服等徭役名色的

^①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62页。

^② 王永兴《唐代过所研究序》，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2页。

^③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7—10、12期。

内涵，将此文书科学定名为“差科簿”，纠正了原定名《丁籍簿》的舛误。王文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敦煌史学领域最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乃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可以说，王文是敦煌学术史上划时代著作，它在敦煌史学方法论上，影响一代人，亦奠定了一代敦煌学宗师的地位。

在王师的指引及论著的影响下，余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唐代过所研究》以及近著吐鲁番所出夫役文书与唐代杂徭研究一组论文，皆运用“二重证据法”，把汉唐史籍记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互为印证，揭示烽堠、过所制度形成发展的规律及重新诠释《充夫式》，试图解决唐代杂徭研究疑难问题？凡此种种皆说明，王永兴先生传授的陈门治学方法泽被学生，弟子当继承发扬之。

第三，奖掖后进：王师是一代敦煌学宗师，为中国成为敦煌学研究中心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十分关注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将在研究中取得成就的学者适时地推荐给学会，199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改选，他力荐杨际平、程喜霖、卢向前等先生为学会理事。当然理事并非实际职务，而是在一个学科的研究中取得学术成就的认可！

如上所述，表露了老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和关爱之情。最后我引用《唐代过所研究》《跋语》一段话，特志于斯，作为永恒的纪念，《跋语》有言：

我在学术上的幸运，还因一种机缘受惠于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教授。1988年夏，在北京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上得到永兴先生的指教，从此先生视我为弟子，在志向、毅力和勤勉等方面给予教诲。

尤其是本书草创艰难困惑之时，他来函热情鼓励我：“研究过所不仅要使用文书，同时要熟悉汉唐典籍有关过所的记载，要精心研究，写出高水平著作”。并引用陈寅恪先生有言：“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赠蒋秉南序》），教导我“为学做人”。1991年7月，历时七年的研究最终结成初稿，适逢他病愈出院，他不顾身体虚弱审阅文稿，为本书杀青花费巨大精力，并惠赐序言。凡此种种，表露了老一辈史学家对后学的殷切期望。在此谨致谢忱^①！

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程喜霖

2008年12月8日

^①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332页。

提携后进 诲人不倦

——王永兴先生仙逝周年祭

马世长

去年先生辞世时，我不在北京，没能与先生见最后一面，心中总有些莫名的哀伤挥之不去。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间，王永兴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

前几年，在校园里偶然能见到先生的身影。马上趋前问候，感觉先生身体状况很好，步履稳健，谈吐思维清晰。联想到先生曾遭受的种种磨难，老来能有个幸福地晚年，从心底里为先生庆幸，也暗暗为先生祝福，祈望先生健康长寿。

四月中旬，锦绣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先生的弟子们拟编辑一本纪念文集，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去年即开始筹措纪念文集一事，我一直茫然不知。因我本非先生的入室弟子，不在邀约名单之内，实在情理之中。锦绣先生专程电话通告后，我深感惶恐，自认不敢妄称是先生的弟子，但是的确与先生有一段真实的师生情谊。

三十多年前，我初识王先生的情景，浮现在眼前，许多往事在脑子里不断闪现，这些美好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

1958年我入北大历史系学习考古学，那时先生已经离开北京发配到山西。1963年毕业后，我去了甘肃的敦煌，则离先生更远。1978年，先生调入北大历史系重执教鞭，同年我则考回北大历史系，读佛教考古研究生，再作学生，这才有机会亲近王先生，听课、问学、受业。

其实我最初见到王先生的时间，还在此前，那时王先生正在办理调入北大的过程中。记得是在1978年的春节前后，我从敦煌回北京探亲，专程到中关村49号院，看望阎师述祖先生。就在述祖先生的平房里，第一次见到王永兴先生，当时两位先生谈笑风生，都很高兴，可能是几经周折，永兴先生调入北大一事，有望落实，不久即可在北京经常见面聊天了。后来阎先生告诉我，永兴先生来北京，必在阎先生家落脚，住宿吃饭，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两位老朋友经常是同榻而眠。人生难得有情同兄弟的好友，两人交情如此深厚，令人羡慕不已。我猜想，述祖先生和永兴先生同为辽宁人，本有同乡之谊，加之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又同在西南联大求学。1939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阎先生成为第一届十位研究生中的一员，专攻西域文明史，文科研究所特别聘任向达先生为导师。次年王永兴先生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寅恪先生治隋唐史。当时研究生人数不多，大家都很熟悉，述祖先生与永兴先生同在史学部，同窗加同乡，遂成好朋友。三十多年过去了，友情与日俱增，情若手足。

1978年王永兴先生调入北大后，有了发挥自己专业才能的舞台，蕴藏内心多年的强烈的工作热情，有如火山喷发一般，全部倾注在敦煌学与隋唐史的教学和科研究工作中。

那时考古专业还在历史系，可以经常见到王先生。1979年，王先生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有两位和我同住一室，因而在宿舍里接触王先生的机会也多起来。1980年，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一道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专题课。宿白先生指定考古专业隋唐考古和佛教考古的研究生，必须选修此课，我自己也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系统学习有关敦煌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基本知识，以弥补自己多年来学业荒疏的缺失。

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从事石窟考古研究。宿白先生提醒我们，研究石窟，必须注意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材料，因为很多文书记录了石窟开凿和重修的具体情况，由是我记住了敦煌文书对研究石窟的重要价值，开始对敦煌文书产生兴趣。1963年去敦煌报道前，曾替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京抄写日本出版的《西域研究》中附录的敦煌佛教大事年表，知道文书中有那么多纪年史料，何等珍贵。1974年，我回北京探亲，在《文物》月刊编辑部，看到王重民先生早年在英法抄录的社会文书，其中有多件邈真赞文和敦煌诗文等。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文物》月刊不能发表王先生的资料，王修先生善意地告诉我，这些材料你们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来可能有用，准许我手抄一份，带回敦煌。这份抄件存于敦煌研究院图书馆。在敦煌期间，也有机会接触敦煌研究所和敦煌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摩挲原件，辨识纸张，抄录文字。1964年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考察莫高窟时，允诺为研究所复制一份英法藏敦煌文书的缩微胶片，此后，在敦煌研究所也可查阅英法藏敦煌写本。我之所以写出我与敦煌文书的若干机缘，是想表明，我知道敦煌文书的价值，也了解一点文书的材料，但是如何研究一件写本，研究历史文书，应具备那些基础历史知识，以及国际敦煌学界的研究状况怎样等等，我均知之甚少。因此听说王永兴和张广达先生要讲授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专题时，高兴的恰似久旱逢甘雨，于是它成为我重点学习的专业课。我按时听课，认真记笔记，力争把此课学好，以便以后可以作点文书研究，同时也向两位先生请教没弄明白的问题，这是我读研期间，受益最多的课程之一。

研究敦煌吐鲁番历史文书，我深知原有的那点历史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又选修王先生有关唐代经济、制度、政治等专题讲座。王先生备课十分认真，把多年积累的学术研究心得，融入他的课程，所以课程内容充实。王先生讲课，不尚空谈，言必有据。用句通俗的话说，从王先生的课堂上得到的全是干货，没有水分，因此记笔记必须全神贯注，否则必有重要遗漏。

王先生教给学生整理文书的方法，是从释读文字开始，他要求释字准确，文句校释翔实。选修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的学生，还必须选择一件文书，进行释字、录文、校勘、注释等基本整理工作，同时要就文书本身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与研究。这就迫使你就要看书，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寻找分析论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完成论文写作。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对学生今后进行学术研究，实在是大有益处的。

敦煌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在敦煌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由于文革的原因，高等院校停学，没有学生，教师无书可教。学术机构停止学术研究，学术刊物停刊，学术研究人员，不是下乡，就是去干校，敦煌学哪里还有发展的条件？结果是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水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了。于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声音不时响起，有良知的中国学人，蒙受了巨大刺激，感到耻辱。

永兴先生有言：作为读书人“不雪耻自强，何以为人”？

我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发展状况与悲愤的情感，促使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决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率先开设敦煌学的专题课程。从培养学术研究的接班人入手，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以尽快改变中国敦煌学研究落后的局面。为此，永兴先生当时几乎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教书育人的教学活动。请想一想，同学们整理的敦煌文书，哪一件不是王先生精心选择的？在整理文书的过程中，哪位同学没有受到王先生的个别辅导？同学整理文书

的成果,哪件没有王先生的审读修改的字迹?这当中王先生要花费多少精力?要消耗他多少宝贵时间?没人能算得清。王先生有近三十年时间不能做自己钟情的隋唐史研究,回到北大之后已有条件集中精力整理个人研究心得,专心著书立说。这本是人之常情,所有人都会理解,可是王先生却把个人的研究,放在第二位,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

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王先生非常明确,高校教师,第一要务是搞好教学,在这点上,永兴先生完全秉承了陈寅恪先生的理念。学校老师,就应“好为人师”,讲好课,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好“教书匠”。

北大历史系当时开设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专题课,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选修的学生很多,旁听的学生也不少。为了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两位主讲先生,拟邀约在法国整理敦煌文书数十年的左景权先生,讲授他多年研究整理敦煌文书的心得和方法。这一安排和考虑,得到学校和历史系的支持。这一举措,犹如开启了一扇窗户,使学子们可以看到窗外的事务,知道国外在做甚麽,又是如何做的。左景权先生到京后,住在北大勺园,我曾陪同永兴先生一道去看望左先生。经过长途旅行的车马劳顿,左先生略有倦容,但兴致极好。能到北大讲学并看看北京,对久居法国巴黎的左先生来说,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左先生的《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是他多年整理敦煌文书的体会和思考,有诸多自己独到的创见,其中针砭敦煌文书研究中的若干弊病,发人深思,令人警醒。这些经验之谈,对我辈后学,很有启发。由于左先生身体欠安,没能多讲,不免有些遗憾。

学生整理文书的作业,陆续完成。同学都很努力,文稿大多中规中矩。我想这是对王先生辛勤付出最好的回报。有耕耘必有收获,这是一个客观的公平法则。我不知道王先生看到浸透自己心血的学生作业时,真实的心情如何?但我敢说,王先生一定从心底里感到欣慰,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而高兴不已。

学术的发展,必然是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材,没有新兴人材的接续,学术的发展一定要出现断层,学术难以恒久发展兴盛不衰。新兴人材的出现,离不开前辈学者的传帮带,没有师父领进门,徒弟再努力修行,也难成正果。

在永兴先生退休之前的几年中,把多少青年学子,领进学术殿堂的大门,我不清楚,也无需精确计算,总之是一批人。他们很幸运,受到永兴先生的谆谆教诲,得到先生的倾囊相授。春华秋实,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学子如今大多成为敦煌学和隋唐史教学与研究的中坚骨干,其中也不乏精英才俊。加之近二十多年来,许多高校也把敦煌吐鲁番学纳入教学计划或研究课题,专业学术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今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状况,令人刮目相看。

为了把敦煌文书研究的教学成果,向学术界推介,需要编辑出版文集,为此永兴先生着手安排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事宜。八十年代初,出书难,出学术类书籍更难。首先是找出版社,中华书局允诺承担出版,但是敦煌文书录文就是一大问题,别体字、异体字无法检字排版,最后商定采用手抄拍照制版印刷。文稿抄写的工作量很大,又要仔细校对。这些具体的事务工作全是永兴先生组织人员,一件一件地完成的。当时我曾帮助永兴先生,寻找愿意抄写的书家,先写样稿,检查比较后决定抄写者。抄写的规格,标点,校注的标注方法等等细节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免得返工太多,影响进度。全书的统筹编辑工作,永兴先生独力承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编辑工作本是为别人作嫁衣,燃烧自己照亮别人,1982

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出版发行，文集的研究成果，得到历史与敦煌学界前辈学者的肯定和好评。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第一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并未标出第一册字样。我不知道王永兴先生当时是如何考虑的，也许原本就打算仅出一本，没有连续出书的完整计划，抑或是第一本无需标注次第？事实是此后敦煌文书研究的教学继续进行，论文集也接踵不断，每年一本，直至第五册。这五本凝聚了王先生诸多心血的文集，产生了广泛影响。它是永兴先生教学成果的一块丰碑。

在第一册文集中，收入拙文三篇。我在敦煌工作期间，有机会仔细考察敦煌博物馆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敦煌文书。其中敦煌县博物馆藏第 85 号写本，是件地志残卷。早年向达先生曾在私人手中，观察此卷，认为很重要。在《西征小记》中称：“唐初地志传世无几，则虽残篇断简亦可宝也。”这件写本很长，长达 3 米，正面文字 160 行，背面还画有星图和占云气书，内容异常丰富。因我已经积累了该卷的若干资料，希望趁听敦煌文书研究课的机会，对该卷作进一步的整理。王先生支持我的想法，并嘱咐我除了录文外，文书涉及的问题最好都作一些研究和讨论。为此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图书馆，查找相关历史文献，抄录卡片，文书中的问题，考虑成熟一个，就先写出来一部分。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文稿基本写完了。把初稿呈请王先生和宿白先生审阅，近四百多页的稿子，两位先生细致地审读，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我重新编排次第，删削和增补，并润色文字。为了清晰，文稿分成三篇：其一是地志部分及相关问题，二是集中讨论唐代公廨本钱，三是讨论星图和占云气书，前后花去八个多月时间，四易其稿。这是我所有课程作业中，花费精力最多的一份，也是自己从中收益最大的作业。作业将收入文集，我想选地志部分就可以了，不能占文集太多篇幅。王先生坚持三篇文稿全收，认为既然整个文书都作出来了，就全部发表。我明白，王先生是看我完成作业比较努力，有意提携我这个史学圈外的学生。

三十年过去了，当时听课和写作业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回到北大之后的三十年，是王先生学术成果大丰收的黄金时期，建树颇多，有目共睹。在教书育人方面，为学术的薪火相传，老骥伏枥，呕心沥血。

做学问，当老师，王永兴先生，都表现出大家风范，是我辈后学的楷模。

王永兴先生辞世一年了，但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活在我们大家的心中。

怀念恩师永兴先生

施建中

2008年9月16日早上，接到李锦绣老师电话，告知王永兴先生于15日晚与世长逝。听到这一噩耗，悲痛之极。先生慈祥的面容、学者的风范以及近三十年来，先生对我的教导、关怀和帮助，历历在目，还是那么清晰，令我怀念不已。要写的事很多，诸如先生宽广的研究领域、丰硕的学术成果、笔耕不止的治学精神，先生为人厚道善良、教学认真负责、生活简朴，无一不可缅怀和记述。在这里只写自己亲见亲历的几件小事，以见先生之大德。

一 先生恩德绵长

我第一次见王先生是在1979年10月底。经过十年动乱，一方面是我学业荒废，特别希望在专业上能得到明师指导。另一方面，我在学校里处境甚差，文革中一、二年级留校学生、七三、七四级留校学员，都可以定专业方向，但是，系里的掌权者就是不让我这个“文革”前的五年制本科毕业留校的教师定向。当时，系里中国古代史各段都有老师进行教学和研究，只有隋唐史缺人。我既然无权挑选，便提出隋唐史暂时无人教，我可不可以以隋唐史为教学、研究方向。当权者依然不同意，这使我彷徨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好友唐赞功对我说，陈寅恪先生的高足、北大历史系王永兴先生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隋唐史，你是不是去听听。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可又担心与王永兴先生素未谋面，王先生会接受我吗？后又想，行不行，还是去试一试吧。于是，我便在先生上课的那天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去听课了。

早上七点二十分我便到了师院教学楼。历史系在三层，楼道里北窗破了，晚秋的北风吹来还真有点冷。七点半，走上楼来一位慈祥而朴素的老人，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我以为这位老人是北京师范学院的，便前去打招呼：“老先生，能不能开开教室门，进去避一下风。”老人笑了：“我不是北京师院的，是来上课的。”我当即说道：“您是王永兴先生！”王先生点了点头，问道：“你是哪一位？”我便简单作了自我介绍。王先生听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年轻教师，便说：“你不用学了。”我告诉王先生大学毕业后荒废了十几年，希望得到先生的教导，于是王先生便同意我听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课间王先生招呼我，让课后等他一下。课后，王先生对我说：“你到北大去听我的课吧。”告诉了他北大上课的时间、地点，并要我早些去。他说：“北大上课人多，座位紧张。不过，我有三位研究生，他们人都很好，我让他们照顾一下。”一周后我去北大上课，王先生的三位研究生刘俊文、赵和平、邓文宽已在教室为我找到一个好座位，并把复印的敦煌文书录文一套给我，当我要付款时，刘、赵、邓三位便说：先生交待是他送给你的。王先生对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如此

关照，让我十分感激，心里热呼呼的。自“十年内乱”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得到如此热情和真诚的关怀。

从此以后，我除了听先生的课外，还常去先生家去请教问题。每次我带着问题走进先生家，先生都耐心地、深入地给予解答。聆听先生的教诲，如沐春风。得到圆满的答案离开先生家时，感到收获很大，而心情也特别舒畅。先生还对我工作中、教学中，甚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都尽力帮助。每次与先生见面，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在思想上都能得到提高。先生每有新作，都赠送给我。自从得到先生的指导后，使我在学术上得到了充实和提高。回想近三十年来，自己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与先生的教导、帮助分不开的。我很幸运，在上大学时受到陈垣先生、白寿彝先生、赵光贤先生、赵贞信先生、陈继珉先生、杨钊先生、刘家驹先生这些名家名师的教导和关怀，受益非浅；而当我在学术十字路口，处境困难之时，得到了王先生的指导、关怀和帮助，使我真正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并逐渐摆脱困境。对于先生给予的种种关怀、帮助，我会永远铭记。

二 关爱学生

在与王先生的接触中，深深感受到先生人格的伟大。先生热爱教学而又极其认真负责、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爱护。

大约是1980年的一天，我收到先生寄来的信，信中说他的研究生刘俊文毕业论文是《唐律疏议》点校，要去宁波看天一阁所藏《唐律疏议》，先生问我可否了解去天一阁看书的手续等事项。见信后，我立即想起，一次与先生谈话时，言及我有学生在浙江宁波工作，先生留意了，才让我了解一下。我当即去信宁波，很快便拿了宁波的回信去见先生。回信对去天一阁看书的时间、手续都说得很清楚，先生看后十分高兴，一再嘱我去信宁波致谢。先生对研究生的指导是那么认真负责，以至到外地查看不同图书版本这样具体的事都予以帮助。由此我想到，先生对学生学术上的指导一定是更加地细致和具体了。果然，1982年，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作了序。刘俊文在点校说明中说：“本书的点校和整理工作是在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王永兴先生通阅了全稿。”（见中华书局《唐律疏议》1983年，点校说明）

是1980年还是1981年，已记不很清楚了。一天上午，王先生赶到我的住处，他说：“建中，你在北京时间久，在好一点的医院里有没有熟人？”我说：“谁病了？”王先生说：“刘俊文的爱人。怀疑是癌症，要找个好一点的医院复查。”当先生知道我在医学界没有关系时，便说自己再去跑一下。事虽不大，但先生那时已年近七十了，对学生及其家人如此关怀，至今回忆起来，仍让我激动不已，对先生敬仰不已！

我去先生家，多次遇到学生在先生家熬中药，这是先生为有病学生提供的方便。先生对学生的关怀、帮助，牢牢地印在我的心中。我深深感到先生的善良、先生对学生的关心、爱

护是发自内心的，是无处不在的。能做王先生的学生，得到先生的教导、培养和扶持，是人生的幸福，我为自己、也为先生的学生们感到庆幸。

三 高尚人格

王先生敬佩寅恪先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

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十分钦佩敬重。我去先生家求教，王先生总是告诉我再读寅恪先生的著述，并指出寅恪先生的研究已十分透彻。先生在我不甚明白时，便拿出寅恪先生著述，指点着给我讲解，直到我弄懂为止。王先生对寅恪先生的学术成果和著述掌握娴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80年的一天，知道我在听王永兴先生的课后，白寿彝先生便对我说：“建中，你要知道，中国隋唐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在陈寅恪先生手中。表现在他的著作中和王永兴先生的讲课上。你要好好跟永兴先生学。”第二天我便到北大王先生家，将白寿彝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对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听后很是激动，他说：“寿彝先生对寅恪先生的评价非常中肯，非常对。寿彝先生的学术评论，史学界是十分看重的。建中，你代我谢谢白先生。”王先生对寅恪先生的敬重爱戴溢于言表，深深地感染了我。

1990年代，我几次带着研究生去聆听王先生的教诲。王先生虽然已年过八十，却很乐意接待我和研究生。每次，先生总是十分动情地介绍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和学术。对寅恪先生家学渊源、爱国思想和行为、推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王先生都细细道来，如数家珍。在谈的过程中，王先生对寅恪先生高尚的爱国情怀、无与伦比的学术成就、独立自由的人格，都给予极高又极准确的评价，先生对老师的敬佩、感念，表露无遗。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了、教育了我和研究生。王先生给我和研究生上了一堂尊师重道、治学做人的大课。回来之后，研究生都很兴奋，认为听王先生介绍，收获极大，真是听王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王先生待人宽厚，有长者气度。

某治魏晋南北朝史的“成名学者”，要将其研究范围上拓至周，下延至唐。大约在1980年，他听说我在听王永兴先生的讲课，于是便来找我，要我帮他将王先生的课录下来，并说：“没有录音机，从我那儿拿。”我便问：“你得到王先生同意了吗？”他说没有。我当即拒绝道：“不行。这不是剽窃吗？”

一天，我去看望先生，在随意中谈及此事。先生笑了，劝我：“建中，让他录音好了。我是寅恪先生的学生，广泛传承先生的学术，是我的、也是你的责任。他录音，不正是传布寅恪先生的学术！”先生这样讲，一方面是对学术传布的深刻认识，反映先生对传承陈寅恪先生学术的使命感，以此教育我；另一方面，这又反映了先生长者的风度、将自己研究的学术成果供众人共享。

先生勤奋淡泊，有大家风范。

还是在 1980 年，那时我爱人在北大学习，她回来告诉我，王先生常常一人到北大南门外一小饭店吃饭，吃得很简单。过后的一天，我去看先生，谈完正题后，我便建议先生改善伙食。先生便对我说：“建中，我大半生时间给荒废了。现在情况很好，我要抓紧时间把寅恪先生教给我的，以及自己学习（先生十分谦虚，不大说研究，而说是学习）的心得写出来。”先生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从不为个人事麻烦别人，生活十分俭朴，他把时间都用来教书育人、读书研究、撰写论著。

先生一生似寅恪先生，学术造诣高、治学勤奋，笔耕不止，著述丰硕。而且先生著述十分严谨，极富创造性，其立论不受世俗影响，给人以深刻启示。

追思先生、对先生的缅怀，必将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先生的崇高品格、发扬先生的治学精神。

先生虽去，风范长存！



施建中、李锦绣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1996 年

陈门不了情

——追思王永兴先生二三事

中山大学历史系 林悟殊

收到《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的约稿信，深感欣慰。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出版纪念先生的文集，这无疑是先生生前亲友、同事、学生和晚辈的共同愿望。

近几年，我病魔缠身，疏向先生问候。去年9月17日，友人突然告诉我：

“王永兴先生前天晚上去世了！”

我大吃一惊，追问消息的来源，答云：

“网上。”

“什么网站？”

“往复网。”

于是，我打开该网站，果见一则署名 sailing 的帖子，发于16日下午1时56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永兴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9月15日晚8时逝世，享年94岁。告别仪式定于2008年9月22日（星期一）上午10点在八宝山公墓兰花厅举行。

读罢，不禁怆然涕下，哀思良久，往事历历在目。当时就想得写点东西，悼念先生。随后，浏览了网上不少颂扬先生的帖子和缅怀先生的文章，特别是钱文忠学长的文章，其间披露了诸多我原不知道的事情。关于先生的坎坷经历，我以往只是略知一二；关于先生的学术建树，我囿于学力，理解不深；而先生诸多感人事迹，以往更是一无所知。感动之余，不禁自惭形秽，深感自己对先生的了解实在过于肤浅。如跟着来写，岂非班门弄斧或谬托知己？由是，迟迟不敢动笔。如今编委会的约稿信，正好给我提供一个对先生寄托哀思的机会，使我十分感激！

我有幸拜识先生，实是托陈寅恪先生的余荫。王先生与陈先生的关系，学术界无不知晓。陈先生最后二十年是在中山大学康乐园度过的，是以，王先生对中山大学，尤其是历史系感情特别深厚。我历史系在1988年、1994年、1999年先后举办过三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王先生都光临，使我系学子得以领略先生风范。

不过，我拜识先生倒是在此三次会议之前。年代恐怕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时我研究生毕业不久，正在研习摩尼教，急需京藏敦煌写本摩尼教经（字五十六）的照片。尽管已年届不惑，但在学术研究上，刚刚起步，要想上京看敦煌卷子，甚至获取照片，谈何容易。有高人指点我，无妨与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联系，其拥有大量的敦煌写卷胶卷。缘份是有的，信不信由你。记不清王先生因为什么事到了中大，就在陈寅恪先生故居附近的林荫小道上踽踽独行。我在高人点示下，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走近先生面前施礼，嗫嗫嚅嚅地

叫了一声“王先生，您好！”然后自报了姓名。没想到王先生顿时绽开笑容说道：“你就是林悟殊，我正找你！”这真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我知道老先生旅途劳顿辛苦，路过此地，不外是要好好休息一下，绝对不敢多加打扰。赶快三言并成两语，把想得到京藏摩尼教写经照片的愿望说出来。没想到王先生不加考虑，二话不说，很爽快地一口应承，说回京后即给我寄来。然后嘉勉了几句后，希望要我为他中心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撰一篇稿。尽管当时心中无数，我还是硬着头皮，表示遵命。记得交谈不过几分钟，但心里却如沐春风。想不到这样一位老前辈如此平易可亲，如此奖掖后进。不久，我就收到王先生从北大寄来的写本照片，自是感激莫名。照片很清晰，我根据这些照片，仔细过录标点，在陈垣先生校本的基础上，重新作了一个释文，连同照片，附录在1987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中。由于此前外间难以看到该写本的清晰照片，如今书中既有释文又有照片可资对照，故受国外同行学人欢迎。其实这首先应归功于王先生。最近我读王先生弟子们的文章，对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师生情结感受更深。如今回想当年作为后辈，与王先生素昧生平，初次见面就有不情之请，但他不以为烦，对我施以厚爱，除奖掖后进外，恐怕亦出于爱屋及乌的感情。其对陈寅恪先生备极崇敬，因而对于那些研读于陈先生工作过的中大历史系后辈学子，难免也就错爱有加。

尔后，我与王先生便时有联系，或问候，或寄呈习作请求指教，他都多加奖劝，令我颇受鼓舞。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言必称陈门，对陈先生的景仰爱戴溢于言表。记得在1988年中山大学召开的第一次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王先生曾与周一良等几位先生专门前往广州殡仪馆吊祭陈寅恪先生骨灰，此事，周一良先生在十多年后撰写的《钻石婚杂忆》一书中有深情地回忆：“我去瞻仰陈先生骨灰，看到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的骨灰竟放在那样一个简陋、脏乱的地方，让人伤心不已。我赶快行礼而退，不愿在那里盘桓。”其实，在周先生写这一回忆之前，我不止一次听过王先生动容地说过类似的话，说他当时一看，内心极为凄凉，行礼后即退。可见当时几位老先生都有同感。

1989年秋我出国游学，在外八年，虽与先生中断联系，但在国外碰到北京同仁，少不了存问先生近况。1997年我回国后，便惦记着找机会登门向先生请安。刚好7月底到京参加学术会议，便由友人驱车，于30日下午到了北大燕北园。找到先生的房号后，轻轻敲门，先生开门，一见是我，显得很激动。我们双手紧紧相握，互相打量对方，除了“您好”两字，什么话都说不出。良久，先生才把我和友人引进“客厅”，让坐。我见客厅是那么狭窄，不觉有点黯然，心想一代名师，就住这样的陋室，令人唏嘘。先生叫出锦绣学长，略作介绍。我作为先生的晚辈学生，立即感谢锦绣学长这些年来对先生的照顾。锦绣学长显得很大度，谦虚地回答：“我们是互相照顾的。”之后，锦绣学长端出西瓜热情招待。先生略为询问我在外几年学业的情况后，便又进入“陈门”主题了，谆谆教诲要继承弘扬义宁史学。临别时，先生要锦绣学长把她刚出版不久的大作《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三册送给我。

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学与香港岭南大学校友会联合举办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忝列会议工作人员。记得11月26日下午,会议筹备组中港双方成员在岭南堂会议厅举行联席会议,过滤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突然,时年八十有六的王先生在他儿子搀扶下步入大厅(锦绣学长正在英国访问,未能陪同与会),在座诸位不约而同,都起立致敬。原来,先生刚从机场到达校园,听到筹委会正在开会,立马赶到会场。大家无不感动!记得先生提供是次会议的论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学习陈寅恪先生重视、保卫并发展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原来长达几万字,在会议收到的论文中,篇幅最长。需知,这几万字的长文,是王先生用发抖的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然后才请人打印,每一字都浸透着先生对陈先生的浓烈感情。



林悟殊(右一)与王永兴、蔡鸿生在中山大学黑石屋,1999年

是次会议最后一天晚上,主办单位在广州近郊番禺的一家酒楼,欢宴全体与会学者和工作人员。宴会结束后回到校园,已九时许。我和敝系的王川师弟一同跟随业师蔡鸿生教授,到先生下榻的黑石屋(岭南大学旧建筑,我校最高级别的招待所)话别。我们本来只打算礼节性坐一会儿便告辞,因为先生明天一早就得奔赴机场。没料到先生一见到我们,格外高兴,与蔡师侃侃而谈。我和王川是后辈,只是侧坐在床上,恭听两位尊者的对话。当晚王先生的谈锋甚健,所谈都是围绕是次会议的主题,包括会议论文集出版事,还有就是陈门往事。记得他特别提到陈寅恪先生年青时,与父亲讲话或在旁听父执们谈话时,必定是恭敬站立着。尔后,陈门弟子都继承这一传统。我听之后,不觉脸一阵热,坐不稳了,很想也起立。他们谈着谈着,不觉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我故意看看表,向蔡师示意时间已晚了。蔡师表示要告辞,但先生意犹未尽,又不停说着。手表的指针已指向11点,我不得不起立报时,请先生

休息。王先生站起来送走我们。我清楚记得大家起立话别时，先生还双手紧握蔡师的手，反复嘱咐文集的事，历时十来分钟；最后还一再叮咛道：日后在陈先生故居前立先生铜像，揭幕时勿忘邀他参加，他一定要来。我们终于走出他房间，互道保重离开。他一定要送出门口，当我们就要拐弯时，回头一看，他还在倚门向我们挥手。当时完全没想到这次竟是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哀哉！人生无常，其是之谓乎！

我深知，先生晚年的一大心愿就是在陈寅恪先生故居前立陈先生铜像，他能再次来到康乐园，在故居前瞻仰铜像。其实，崇敬陈先生，人同此心。我们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和历届毕业生何尝没有这种心愿。但在位于校园中心故居前草地立陈先生铜像，毕竟兹事体大，时至今日未见端倪。不过，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去年，我系 78 级校友请了广东省最有名的雕塑大师唐大禧先生，塑造了一座陈先生的半身铜像，形象极为逼真，金光闪闪，奕奕如生，充分体现了陈先生的学人魂。这座铜像已安放在历史系进门大厅正中。铜像的揭幕仪式就在先生去世不足一个月时间，即 10 月 10 日举行。在仪式上，蔡鸿生先生针对时弊，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其中言道：

仰望陈寅恪铜像，不是看偶像，不是取标签，不是捞符号，而是为了寻找日益淡化和边缘化的陈寅恪精神。这个精神的核心，通俗地说就是“二要一不要”：要独立自由，要脱俗求真，不要曲学阿世。

我深信：这一段话乃表达了陈先生“后世相知”的共同心声，陈寅恪精神必将照耀中国学术之路。王先生，安息吧！

2009 年 2 月 15 日

王永兴先生与上海师大和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严耀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历史系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多多少少有一种久旱逢甘雨的感觉，师生们都很努力，学校里学术气氛很浓。我记得无论在做研究生时，还是在留校后，都有很多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到上海师范学院来讲学或做讲座。因为那时我们学科带头人，也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程应镠先生经常说：“我们学校虽然不是第一流的，但如果多请一些第一流的学者来讲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可以达到一流的水平。”因此我在那时见过不少大学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听过他们的课或讲座，收益不小。在众多的前辈老师中，北京大学的王永兴教授是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一位。

1982年的一天，程应镠师命我到上海火车站去接一位他的老朋友，说是到我们上海师院来讲学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永兴先生，大约是王先生的学者气质和风度，使我在指定的车厢门口一下子认定了他是我要迎接的对象，一问果然是。王先生的这次讲学大约有十天，前后讲了四、五次，主要对象是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所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也有个别从华东师大等校来旁听的。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王先生前后来上师大讲学约有三、四次，时间最长的一次约有一个多月，主要是讲隋唐史及史料学。

王先生到我校讲课，不住在学校招待所，是住在程应镠先生家。平时，我们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就经常到程先生家，几乎是每星期一次像沙龙一般。王先生在沪的时候，就去得次数更多了，因为大家觉得有机会向慕名已久的老师请教，不仅是多一次上课的机会，而且能学到课堂上不易学到的知识，解决一些个人在学习上的疑难问题。在交谈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两位先生谈他们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时学习的往事，尤其是他们听陈寅恪先生讲课的一些心得。或许是两人一起谈有助于启发回忆，他们说得很细，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如说到为什么陈寅恪先生论著中多引用《资治通鉴》之文，即使是这些内容正史里面都有，甚至是原本就出于正史。程先生说，陈先生颇重文笔简练，散见于诸史记传中的关于同一事件之记载，司马温公用很短一段文字就能很清楚很完整地表达出来。因此用《通鉴》文字能使行文流畅，这也是陈先生文史结合的一个侧面。王先生说，南北朝时双方互为敌国，南北诸史立场往往相左，温公的述说就比较客观，所以陈先生就往往引用《通鉴》的文字，等等。这样就等于给我们又上了一课，使我们对《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至今，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第一年内必须把《通鉴》全部通读一遍，博士生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也是《通鉴》，这和两位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王先生在第一次讲学中，最值得一记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敦煌吐鲁番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敦煌学在中华大地上重新成为一门显学，但上海可能因为海派学风太盛的缘故，除了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先生对敦煌乐谱进行了研究外，在上海史学界，敦煌和敦煌文书好像相隔得很

遥远，在学术上没有任何反响。王先生除了介绍当时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状况外，着重讲了对敦煌文献的文本研究和学术价值。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解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是如何通过当地效谷郡设置的时间来确定一份西魏大统年间的卷子，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对均田制的研究。这些讲课使得我们这些上海学子认识到边地简牍文书对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初步的研究方法。大约从这时起，王永兴先生就成了我校最早的兼职教授之一。

作为兼职教授，王先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好几次来我校进行短期讲课外。他还与程应镠先生商议准备在我校建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室，作为在上海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基地。此后程先生就从学校争取到了成立研究室的人员编制，把当时年龄比较轻的两位研究生俞钢和张剑光委托给王先生培养，从上专业课到指导学位论文，全程由王先生负责，现在这二位已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了上海师大中古史研究，尤其是唐史研究中的骨干。为了给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创造条件，程先生接受王先生的建议，用了一大笔钱从境外购进了《敦煌宝藏》，当时在上海高校里这是第一套。记得两位先生都兴致勃勃地要在上海师大建立一个上海的敦煌吐鲁番学文献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王先生说：“上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怎么能没有一支研究敦煌的队伍呢”？王先生还特地为我校复印了一套《大谷文书集成》，因为当时在上海没有这本书。可惜不久程先生病重，建立敦煌研究室的事就被耽搁了。但两位先生的努力也没有完全落空，上海大建立敦煌学研究队伍的努力一直没有消失过，先后引进过王小盾、郝春文、方广锜研究敦煌骨干教师，收集敦煌资料的工作也一直进行着，成立了一个敦煌文书特藏室，并有着不低的利用率。当年曾听过王先生讲课的李卫国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负责人时，推动了敦煌文献的结集出版，上海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又为敦煌吐鲁番学在沪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有幸几次都聆听了王先生的讲课，以后我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能不断引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说都是从听王先生的课时打下的底子。我先后参加 1983 年、1985 年和 1988 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年会，递交给会议的三篇论文《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兵民与军政关系初探》、《麴氏高昌时期的孝经与孝的观念》和《麴氏高昌王国寺院研究》都是先交给王先生过目，经他提意见修改后再定稿，后来又分别发表在《文史》、《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并且都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1988 年后大约王先生不再参加学会的事务，以后我也没有收到过敦煌学会的会议邀请。一个人做事情有时是需要有一种压力，要参加一个特定的学术研讨会，就会往这个特定的领域去努力写文章，所谓需要是创造的动力大概与此相似。由于没有了这方面的压力，所以我后来有十多年没有写专门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专题的论文，尽管我平时文章中仍有不少引用有关敦煌吐鲁番文献的。

不过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影响却很大，不仅是敦煌吐鲁番文书形成的时间段主要在两晋南北朝隋唐，而且和宗教关系密切。而《麴氏高昌王国寺院研究》一文，正是我研究佛教的起始。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至少百分之七、八十与佛教相关，其对于佛经校勘与流传的具体情况，佛教在基层社会的影响，佛教（包括佛教造型艺术）与其他宗教、与中

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等等，都是现存其它古代文献所不能替代的。因此从敦煌吐鲁番学入门来研究佛教，是一条能够文史哲相结合的很好做学问途径。我很庆幸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子。如果说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听王先生的敦煌学讲课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缘分。由此也可见王先生对我所走的学术道路之影响。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永兴先生年事高了以后，就不大能够出来开会活动，更不用说离京到上海师大来讲课了，虽然我们每次填兼职教授名录时依然把王永兴先生的大名写上。尽管如此，王先生兼职教授的名也没有白挂着的。我们为程应镠先生逝世十周年编写纪念文集时，王先生特地为此作了序。此外，王先生还多次为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撰写稿件，而上师大古代史专业的同仁每上京，只要时间许可，也总会去拜访王先生，听他谈谈学问，谈谈往事，总能从中得到知识和鼓励。可以说他和我们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连续了二十多年，到他逝世为止。

作为多年来的兼职教授，王先生的逝世对上海师大中古史专业，乃至整个历史学科都是一大损失。对于我，更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但王先生所撒布下的学术种子，已经深深扎根在这里，使中古史专业继续成为上海师大学术氛围最浓厚，最有进取心的学科之一。

忆王永兴先生

王守常

孟子尝说：“君子之所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我在哲学系，先生在历史系，未得身受其教，但宗仰先生的人品，能算个私淑弟子吧。作为学生辈的我，有幸与老一辈学者结识，照佛教的讲法，真是一大因缘。八十年代初，我搬到朗润园 11 公寓时，文理学科的泰斗多雅集在此园，先生们于傍晚时分，常常在湖边的长凳休息交谈，我忝列其侧恭听，真的是胜读十年书。与历史系的邓广铭先生、中文系的陈贻焮先生、哲学系的周辅成先生等人的激情而浪漫式的言谈相对照，先生似乎有些木讷，先生多半倾听，稍有言语，也只是三两句。先生时常与我谈起季羨林先生、周一良先生以及史学界同辈，总是称赞有加。先生的恭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颇似我先生张岱年的性情，于同辈学者谦恭，对前辈学者恭敬。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 1948 年末，先生与陈寅恪先生辞别时，寅恪先生赠王先生“诚义”两个字的义蕴了。“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天道恒常无妄，四季二十四节气循环往复，真实不欺，先生循天道，真实诚心，毕其一生恪守陈氏学统，在隋唐代制度史方面，写出了《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唐勾检制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等专著，以及为教学科研编辑了《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等文献史料。按今天高产学者，先生的写下的文字不算多。但先生矢志不渝，守着陈寅恪先生的学统，治隋唐军事制度史，及检、勾之官研究，这虽属“冷门”，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唐代勾检官的设立，于今日政治、军事、经济审计制度的完善，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先生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细心梳理，溯其源流，重构历史的事实，这样的工作，其艰辛、其耐心，不可和今日一些把“学”当成“术”来玩弄的人言说的。先生之表可谓今之学术兴废之诚也。

先生曾告诫我：学术研究规模没有大小，小题目可以做大，能入堂奥就是正道。在朗润园、在燕北园都与先生邻居，这样的告诫不知几次了，但先生于我从没正颜厉色，而总是春风拂面。这些年来，我多用心在哲学史史料上，是受先生的影响。先生对学术研究的忠诚，对学生的关心，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孟子所说“大人者，惟义所在”。先生于学生的学业与身心无微不至的关心，可以说在北大无出其右者。先生带着学生逐字逐句读文献，课外细心指导，时常连周末都不休息，到学生宿舍去辅导。今天，在中古制度史研究中几位毕业北大的卓有成绩的学者，都是先生的学生。先生是真理解并身体力行了“大学之道”的明德、亲民、至善。

记得八九年后，季羨林先生的一学生因不白之因，不得不离开北大。王先生得知此事，先后找过汤一介先生、周一良先生商谈如何能使其留在学校继续学习。继而于夜晚前往住在人大校园的新任北大校长家，试图说服校长大人开恩。先生爱才之举，让我感慨万分！我遇

到过爱才的先生，没见到过这样不辞心苦，以近八秩老躯苦谏，用“正义”、“道义”、“信义”、“情义”、“义气”那个词可以表彰先生？先生的尊严何在？为了学生，先生能承受一切。假如八十年代有十佳教师的评选，先生必定名列第一，可我知道先生一定坚决推辞，名与利于他如浮云。

先生上路时，我没写下什么文字。在这个趋炎附势的年代，让先生清静些可能更好？弹指间，先生走了一年，锦绣来邀我写点东西，不知如何下笔，几天来，回想的都是在湖边，在先生的家里交谈的情景……。

写就这几行字，不足表达我的哀思，我的痛！读《长阿含经》中的《弊宿经》，有儒者与僧人机辩天堂与地狱之事，知道于佛教的天界、天堂不过是个“假设”，那是劝说在世时多行善事。但我确愿意相信真有美如仙境的天堂，那样我的几位先生还可以安详的继续讨论他们钟情的学问，那样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天堂，继续在他们身边做个守门童子了。

乙丑五五深夜于上地佳园

我印象中的王永兴先生

赵珩

我与王永兴先生的关系十分特殊，得以拜识王先生，既不是工作和学术上的缘故，又非他的门人弟子，只是因为王先生是我父亲赵守俨的多年老友，又是我妻子吴丽娱的育化恩师。

王先生 1978 年从山西调回北大以后，先后住过朗润园和蔚秀园，最后迁至稍远的燕北园。他在朗润园和蔚秀园的居室我都去过，但印象已不深，倒是搬到燕北园后，交通不太方便，每次吴丽娱去拜见老师，都是由我驾车。每年的春节和别的一些日子，吴丽娱总是相约王宏志、金锋同往。我在农展馆先接上金锋，再到甘家口的敦煌大厦门口接上王宏治，一直沿西四环到燕北园，近几年的农历大年初一，都是这样一个行程。新正伊始，守岁的人们尚在酣然之中，满街炮仗残衣还未及清扫，我们已然驱车上路了。他们三位都是王先生的学生，执弟子礼拜年，而我不过是司机的身份。

也许是老年人絮叨的原因，每当与他们同往燕北园拜访王先生之时，先生总会提及他与先君的交谊，又总是和他六十年代初借调到中华书局翠微路大院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事联系在一起。他常回忆与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一起工作的情景，常常提起那时中华书局的组织工作如何好，和我父亲对工作的周到细致及对他们的照顾，甚至夸赞我母亲的能干，如何在唐先生他们刚下火车之际迅速地做了可口的饭菜招待。这是王先生心情最舒畅的一个时期，但时间不长，王先生仍旧回到山西。

1971 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我父亲从湖北咸宁白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恢复工作，这也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梅开二度”的早春天气。嗣后，不少文史界耆硕相继从牛棚中走进中华，开始了新的点校工作。唐长孺、启功、王锺翰、张政烺、阴法鲁和周振甫等先生都是那时恢复或参加了此项工作的前辈学人。但是彼时王永兴先生并不在此列之中，那时他尚在山西，境遇十分坎坷，直至 1978 年调回北大前，都是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乃至查阅资料的资格。所以见面时王先生更常提起的是七十年代初他从山西到北京，由父亲安排他暂住在珠市口西大街中华书局招待所，并让他在中华图书馆查阅资料书籍的往事。这件小事他曾叙述过不知多少遍，成为我们见面时谈话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以至喧宾夺主，影响了他们师生之间交流，弄得我十分尴尬，又不好打断他，于是局促不安，尽量少说话，以避免他又要重复这个话题。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听先君提起过，可能他认为是很平常的小事，但对那时的王先生来说，却是感到莫大的温暖，以至于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有详细的描述。由此也可见先生感念故人，不忘旧情的品德。

王先生是一位尊崇道统和学统的旧式学者，他对陈寅恪先生的服膺和崇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参加他们师生的见面，谈得最多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不难看出，他正是以陈寅恪先生的学统培育自己的学生。他所希冀的学术传承当不仅仅是治学方法，而

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思想的延续。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以他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为典范的。他的重要论著《陈门问学丛稿》、《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乃至《唐勾检制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等，无一不是承继陈氏学说，弘扬陈氏治学方法的承前启后之作。我在旁聆听他问到学生研究方向与课题之时，必时时言及“寅恪先生”，那种对先师的恭敬和崇拜，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道德操守，也许正是我们今天学界所缺失的东西。



赵珩、吴丽娱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斋，1999年

王永兴先生是跻身于季羨林、邓广铭、周一良诸位先生同辈的北大学人，与他们不同的是，王先生的名声可能更局限于隋唐史方面，但他的勤奋却并不逊于这些同辈学者。或是因于中年的坎坷与蹉跎，他的学术成就更为迟暮，他的大多数著述是完成于1978年调入北大之后。也正是这最后的三十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直至1994年，他还主持了《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以此表达了他对恩师的崇敬和怀念。

我想，用“孜孜不倦”和“默默耕耘”来形容王先生是不为过的，他的最后三十年将全部心力倾注于研究，并且不断读书学习，掌握新知，在年近九十高龄之时还在学习计算机，能用计算机打字完成文稿，实在令人钦佩。先生晚年培养了几期研究生，将所领会的陈寅恪先生治学之道和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悉数奉献，使其门墙桃李获益无尽，也使义宁学脉得以传

承。

王先生是一位生活简朴的老人，物质上无多奢求。他最为珍视的是居室中一张十分陈旧的书桌，那是陈寅恪先生曾经用过并赠予他的。据说，这张书桌最初是 1926 年时梁启超赠给陈寅恪先生的，王永兴先生十分珍视，至今依然安放在他的书斋之中。我每次陪吴丽娱他们去王先生家中，都是坐在那张书桌旁边，抚摸着那斑驳的桌面，听着他讲述受业于陈寅恪先生的旧事，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我的两本随笔小书出版之后，都曾敬呈先生闲时消遣，竟被先生笑称之为“当代的《东京梦华录》”，先生谬奖，实不敢当，只能看作是前辈的鼓励和奖掖。

2008 年 9 月，王永兴先生以九十四岁高龄去世，我和丽娱都很悲痛。我们本打算拟一幅挽联，以寄哀思，恰巧先生的学生们嘱我代拟一幅，于是合二而一，拟就“薪火相传，义宁治学一脉；津梁惠溥，燕园著述千秋”一联，虽然辞句欠缺文采，但形容先生一生的业绩，也许还算贴切。

不久前，锦绣打来电话，说将要把先生的骨灰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并托我代为联系。我家的墓地即在福田，先君便是葬在那里。此外，海宁王国维先生等一大批学人也是葬于福田公墓的，我想，王先生在那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忆王永兴先生

王春梅

1978年11月11日，王永兴先生多年的愿望经邓广铭等先生举荐，终于实现了，他从山西调来我系工作了。当时学校宿舍十分紧张，王先生就住在29楼一间不到14平米的集体宿舍里。时已64岁的他，只能和青年教师及学生一样，每天到学校餐厅吃饭。在那个年代，家家都是用蜂窝煤生炉子做饭，这对王先生来说实属难事。后来系里帮助他购置了煤气罐，他才可以自己做些想吃的饭菜。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书生涯。

由于“文革”以后的二十年中，王先生不仅被迫放下了读书与学术研究工作，就连多年辛勤积攒的许多珍贵书籍也基本都被烧毁了。报到后的第三天，他就到中华书局购买了一套新校订本《资治通鉴》，并陆续从学校图书馆借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唐六典》等史籍，开始了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就在来校的第二天，周一良先生到宿舍看他，并将珍藏多年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送给他时，王先生回想起恩师寅恪先生的栽培和自己经历的坎坷磨难，想着与周先生的深厚情谊，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王先生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着研究学术、精心培养人才的优秀教师。他以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和拳拳爱国之心，与时间赛跑，珍惜来北大工作的宝贵机会，立志要打破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说法。他到校后不久，就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工作，对物质条件毫不在意，也从不计较，问他生活怎么样，他说“挺好，挺好”，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总是说“没有，没有”。1979年9月，他开始为本科生和硕士生讲授敦煌文书研究和隋唐五代史专题两门课。王先生是怎样备课的呢？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遵照寅恪先生教导我的读书、分析史料、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精神，用比一般教师数十倍的精力，全力备课。他在备课中，尽量回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内容，同时阅读《资治通鉴》和《旧唐书》、《新唐书》、《通典》诸书，写出讲课初稿，再次阅读上述书籍，并去图书馆检阅《册府元龟》有关部分，改写讲课稿。从他以上回忆片段的字里行间，足以说明他对教学的重视和备课的认真。他授课也是极其投入的，当上课后发现学生读《资治通鉴》只读正文，考异、胡注等不读时，就要求学生每周写读书笔记，交给他批改。他还把选这门课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交流读书情况与收获，每周六他都到学生宿舍检查指导，从未间断。他在讲授敦煌文书课时，将选印出的文书发给学生，要求学生课下参考唐史等有关文献，对每件文书进行分析，写出读书报告，他再对选课学生的几十篇报告一一仔细评阅，并定期就存在问题进行讲评。这样的训练方法，对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很有帮助。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王先生每学年都坚持上两门课，认真负责，始终如一，象他这样的年龄还对自己如此严格，真是难能可贵。

王先生对学生培养满腔热情，严格要求。随着敦煌吐鲁番研究及教学的开展，由于有关图书资料的不断增加，在周先生的帮助下，图书馆给王先生解决了一间研究室。王先生几乎

每天都去看书研究，也要求学生去看书。特别是晚上，他如果看不到学生在研究室读书，就会立即到学生宿舍去找，会批评学生不用功，说这样好的条件你们不好好珍惜利用。他精心栽培学生，还常常为学生的毕业前途操心。我那时在系里主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他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向我介绍他了解的学生情况，好的要我大力表扬，问题则要我注意解决，给我工作很多指导与帮助。他很为自己带的研究生骄傲，总在我面前夸他（她）们如何如何好。他爱学生，总是把学生的要求当作大事来办。他曾为自己的学生能够留校工作，不厌其烦地找校、系领导，并为解决副教授、教授职称问题，不辞辛苦，到处奔波。有一年，为使一个学生能够分配到理想的单位工作，当时我们都没有电话，他顶着烈日，先后三次走着来我住四公寓楼上的家，每次他到我家都汗流浹背，顾不上喝水休息，就急着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他的爱心与热心，终使这个学生实现了愿望。那时的王先生已七十多高龄，他对学生如此关爱，如此负责，让我很感动，也很钦佩。王先生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现他们大多都已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骨干，发挥着很好的作用。

王先生与邓广铭、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高瞻远瞩，早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就筹划发展历史学科，拟建立中古史研究中心。王先生为了这个中心的建立，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八方奔走协调。他在不断找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同时，多次去找“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及教育部长蒋南翔，还邀请姚依林来校考察和听取汇报。在他的辛勤努力下，1981 年 7 月 18 日，姚依林给蒋南翔写信，提出了支持的具体解决办法，即由北大向教育部写个报告，再由教育部转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以解决房子和有关经费及设施问题。9 月 4 日，蒋南翔部长给时任北大书记、校长的王路宾和张龙翔写信，对建立中心的方案表示支持，并请学校向教育部正式写出申请报告，学校也及时给予帮助。10 月，教育部下发 93 号文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文件指出“该中心应团结校内外有关专家，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努力创造历史科学研究方式现代化的经验，使之逐步成为高等学校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基地”，为中古史中心建设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还提出：中心用房 1500 平米、人员编制 50 个、总经费为 40 万等具体意见。虽然国拨经费一直未到位，中心现有的十几个编制也是学校自己解决的。但领导们的批示和教育部的文件，对中心后来的发展却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9 年，为争取成为教育部中国古代史研究基地，中古史研究中心改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先后两次被教育部评为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基地。中心每一次为争取学校改善条件与解决问题，基本都以当年领导们的批示为依据。在建设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文学科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教师没有必备的研究条件，系里多个教师甚至十几个教师还挤在一间房子里办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能够有现在的人员规模，能从健斋搬到今天朗润园，并具备了较好的研究条件，是与老一辈的智慧远见分不开的，是与姚依林、蒋南翔同志和学校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更是与王先生所作出的极大努力分不开的。王先生为学科发展和研究中心建立所做的重要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王先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并担任过他的助手。对陈先生治学做人都非常了解。他时刻以陈先生为楷模，治学做人一丝不苟，尊师爱师一生一世。他经常给我们讲陈寅恪先生的为人，也经常给弟子们介绍陈先生的为学之道。他从心底爱戴自己的老师，只要一提起陈寅恪先生，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很是自豪和骄傲。为传承先生的学识品德，他亲自撰写与邮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征文启事”，想方设法约稿，主持编辑出版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撰写出版了《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积极参加纪念陈寅恪先生各种学术会议并发表文章。他心甘情愿牺牲大量休息时间，整理陈先生的文稿资料，他用电脑打出的第一篇文章便是陈先生的《赠蒋秉南序》，他与先生的深情厚谊可见一般。

王先生生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退休之后，本可以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他仍孜孜不倦，著述不辍。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是坐在书桌前，查阅资料，奋笔疾书。我们劝他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他总是说自己身体很好，要抢时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呢。在他目衰手颤、书写不变的情况下，仍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他 88 岁了还学习用电脑打字写作，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王先生潜心研究，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精神，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

王先生晚年能有锦绣陪伴是幸福的。他于 1994 年 11 月 14 日与锦绣结婚，因我家距周一良先生家很近，那天，王先生与锦绣去周先生家送喜糖后，又来我家送喜糖，我衷心的祝福他们，我还与同事一起到他们的家中祝贺。那时，王先生每天上午都来系里取报，如果两天不见他来，我们就有些担心，他毕竟年事高了。他家没有电话，我就让与他住在一个园子的同志下班后到他家看看。令大家高兴的是，王先生有了锦绣在身边照顾，就可以放心了。王先生与锦绣互相帮助鼓励，一起读书，一起写作。锦绣教王先生学电脑，王先生指点锦绣深入研究学术。锦绣对王先生是敬重的，也是深情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王先生腿骨折很长时间不能动，锦绣坚持不请护工，一人悉心照料，使王先生腿恢复得比医生说的时间短。王先生去世前病重住院，我去医院看他，刚好赶上锦绣喂王先生吃午饭。王先生牙嚼不了，锦绣就把排骨肉嚼得细细的，放到勺子里一口一口的喂他吃，如同喂一个幼儿。王先生转到西山老年病院，中秋节那天，我和浦江去探望，又赶上开饭时间，王先生想吃玉米面饼，可饼太硬，锦绣就用同样的方法喂他。这一次王先生住院，如果没有锦绣的精心护理和抚慰，他的生命是绝不会维持那么长时间的。

王先生已经走了，但他为教育事业、为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的忘我奋斗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我们永远怀念他！

悼念王永兴先生

曹克俭

我第一次见到王永兴先生，是在和父母一道探望自法国来讲学的梁渭华女士的时候碰上的。那时候我刚考进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不久。王先生在跟我父母谈话中得知我少年时很喜欢看中国历史，高考的成绩也不错，而且知道我祖辈和陈寅恪先生的先人也是故交，就很关心我，一再嘱咐我虽然选了世界史作为专业，却应该在中国学问上下硬功夫。

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虽然也上中国通史课，也可以选修中国史的一些专业，但是王先生的课和我的必修课时间冲突，我听不了。王先生就让我上他家去，给我补课。

在北大的那些年里，我这个外专业的学生，成了王先生的弟子。我跟着他像一个私塾的学生那样，从最基本的功夫上做起，识字断句、讲论语、背司马迁、看汉书……。

我那时候经过十年停学，没想到又能考上北大，就很知足，没有更宏伟的志愿。只是很高兴我又能当学生，又能进入书山看书了，至于将来会登上书山的哪一层，并没有什么想法。不知道为什么王先生非常器重我，甚至曾经要我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将世界史与中国史融会贯通，成就非凡事业。真让我汗颜。我屡屡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我根本不是这样的天才，更何况当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人生最能学习的年龄早已在文革中流失了。但是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鼓励我。

我想我让王先生失望的地方很多。

我常常偷懒，借口本专业的学习压力太大，完不成他的作业。我喜欢读书，但是往往不求甚解。王先生也会批评我，但更多是勉励我。

还记得有一次，我父亲问我一些事，我答不上来。父亲就叹气说：“你们老爷在你们这个岁数《十三经》都倒背如流了。你还是学历史的呐？”我把这话告诉了王先生。他以为我至少还是知道什么是《十三经》的。没想到我也不知道。他就也叹了一口气。但是说这不怪我。还是依然如故地认为我会有成就。

我想我最让王先生失望的是在出国以后。

1983年我出国留学。王先生非常高兴。到了国外，我才知道自己的中国文化知识真的很不够，经常要请教他问题。他都一字字详加解释。比如到底什么是八股文。我们从小就批判八股文，其实我一篇也没见过，王先生就亲自复印并讲解，给我寄来。想想看王先生的手抖，写的字都是颤巍巍的，给我花了多少功夫啊。

命运弄人。我到瑞士不久，大概是因为人地生疏，有人对自己热情相助的时候，特别容易受感动吧，很快就和一个瑞士人相爱，结了婚。王先生知道后，告诫我：不要急于要孩子，学成立即回国。

知道了王先生的要求，一些同学笑了，说他太不实际了。我也知道我只有使他失望了。

但是这是在当时最敲到我心里的话。我知道我是让王先生深深失望了，而且我也知道尽管我不会有如王先生期望那样的成就，但是仅仅为人妻母不是我的生活。

真的不久我就有了两个孩子，中断了在瑞士的学习，跟着丈夫一度住在昆明，并进入云南大学读书，师从云大李埏教授。李教授对我也非常看重，也是一位我最敬重的恩师。他原来与王先生是同学，告诉我当时他的同学们都非常尊敬王先生，王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学生，比他年纪大，在他的心目中像老大哥一样。一次北上开会他见到了王先生，王先生特别叮咛他支持我完成学业。

这期间我也几次回京探望王先生，带着孩子。尽管王先生为我家庭事业不能两全而遗憾，但是看到我的两个“胡儿”时，还是马上非常喜爱，张罗着要给他们糖果，我至今还记得他慈爱地笑着看我儿子的眼光。

我在云大的学习，仍然受到王先生的关怀。特别是李锦绣老师。那时候我刚刚认识她，她就毫无保留地帮助我，甚至把自己待发表的论文也寄给我。

离开云大回到瑞士后，这样的联系仍然继续了一段。但是随着王先生年事的增高，我自己工作和家务的增长，音书渐稀，只是过年的时候匆匆地寄上一张贺年片，拜贺一下。尽管想起来有愧，但是在忙碌之中，和很多亲朋师友都水阔鱼沉，失去了联系。

终于我知道王先生已经去世了，而且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半年了。尽管这个消息不是很意外，毕竟他已经九十多岁了，还是非常震慄，深悔没有早日多问安。

往事历历，师恩深重，岂可忘怀！唯愿王先生安息。

纪念王永兴先生

王邦维

知道王永兴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正在台湾。偶而浏览网页，在网上看到报道，我立即给李锦绣发邮件，表示深切的哀悼。当然，北大历史系为王先生举行的最后告别仪式，我不在北京，也就没有能够参加，这有些遗憾。

我认识王永兴先生，其实比较晚，机会也很偶然。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因为要查一两种书，到学校的大图书馆，得到的回答是书在图书馆的某一个阅览室。我找到阅览室，进去，阅览室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在，似乎是管理阅览室的人员。问她，她说她是学生，阅览室是王永兴先生总负责，查书，应该先问王先生，这个阅览室，收藏的主要是敦煌方面的资料。于是我找了王先生，在什么地方也忘了，当然书是顺利地查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女士，就是李锦绣。

再以后，大概是在 1988 年，一天，季羨林先生把我叫去，说有一些陈寅恪先生读过的书，上面有陈先生阅读时写下的批语，需要抄录和整理，其中一部分是《高僧传》。抄录和整理中遇到一些问题，季先生已经看过一些，还有不少，要我也看一看。书在王永兴先生那里，具体的可以到王先生那里，跟王先生讨论。于是我去了王先生家。这是我第一次跟王先生比较多地讨论与学术有关的事。

那一些书，确实属于陈寅恪先生，其中包括新旧《唐书》和《高僧传》等。书中很多地方，有陈先生的批语。批语的字迹很小，也很潦草，不少地方辨识起来比较难。这项工作交到了王永兴先生这里，王先生自己承担了《唐书》的部分，《高僧传》的部分，已经有人做了一些抄录，但只是开了头，遇到了困难，就没有做下去。王先生对《高僧传》的内容也不是太熟悉，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外文。于是王先生跟季先生商量，希望找人来做，季先生想到了我。其实我当时对接手这事有些犹豫，但王先生鼓励我，加上这是季先生要我做的事，我也就接下来了。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断断续续地进行抄录，难以辨识的地方，查书或查其他的材料，中间有时候也跟王先生报告一下情况。但这事后来有了变化，大部分快完成的时候，已经到了九十年代，有人表示不满意，大致的意思是说，陈寅恪先生是名人，我们做这事，是想靠陈先生出名，不仅陈先生的学生想靠陈先生出名，连学生的学生如今也想要靠陈先生出名。当王先生把这话讲给我听的时候，我不禁心里怵然一惊：王先生和季先生都是陈先生的学生，我是季先生的学生，是不是就属于陈先生的学生的学生之列？我自己可并没有想由此出名。从此我就对这事的结局就有了几分畏惧。我把整理和抄录的陈先生的批语，最后都交给了一家出版社，算是了结了这事。后来这家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的这些读书笔记，中间的这些故事，当然不会有人再提起。对这件事，王先生有很大的意见，现在王先生已经作古，我由此想起这件事情。我跟王先生一段时间往来比较多，熟悉起来，就是因为这

件事。

1994年，我从中关园搬到了蔚秀园。一天，我骑车回家，前面一位老人，提着一些菜，走得很慢，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先生。我赶紧下车，问王先生，才知道他也搬到了蔚秀园，刚从外面买了菜，也是回家。我让王先生把菜放在我的车筐里，推车跟他一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记得他好像是住的二楼。他住的楼，离我住的楼其实很近，我们是邻居。这时我才知道，王先生当时是独身一人，所以我此后有时也就去他那里看看，跟他说几句话。王先生的家，陈设很简单，给我的印象，除了书以外，就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器具。不过，后来我知道，他最后有了人照顾，我为王先生高兴。一次，在周一良先生家，周先生告诉我，他为此写了一份祝辞，写的是“唐作之合”，周先生也为这事而高兴。

说到所谓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王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这我就早知道。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陈寅恪先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人广泛注意，或者说还没有被发现居然有这么多的“价值”，炒得这么热。我知道，在那个时候，王先生就已经在一些场合讲到陈先生的学术人格和成就，到了后来，有关陈先生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许多人都声称自己与陈寅恪有多少多少关系的时候，这方面的事，王先生似乎反而讲得少了。我想，王先生很早就讲到陈寅恪先生，怀念自己的老师，只是想报答师恩，哪里是想靠陈先生出名呢？王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内，为人所熟知，王先生本来就有名。王先生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学术界还几乎没有想到陈寅恪，陈寅恪几乎还是陈腐的象征的时候，讲陈先生，那是为了倡导陈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这与时下往往以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学生来证明甚至制造自己的身份，获取名声有根本的不同。

王永兴先生对于我，属于师辈。只是王先生研究的唐代经济、政治和军事史，以及敦煌的世俗文书等等，这些方面的学问，我大多外行。王先生一生坎坷的经历，我知道一些，不多。对王先生学术上的成就，我只能理解一部分，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就已经很佩服，不过这些都不用我讲。我跟王先生的交往，其实也并不多。从我跟王先生有限的交往，我的感觉，王先生做事认真执着，他性格耿介，直言无忌，很值得钦佩，但这一点，大概也是他一生中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老一辈的师长，这些年中，不少都已经陆续故去，他们一生不同的经历，对我们而言，部分已经成为历史，其中很多地方其实值得我们加以体验。

1997年春，我家从蔚秀园搬到燕北园。王先生不久也从蔚秀园搬到了燕北园，于是我们仍然还是邻居。我在院里，有时能见到王先生，有时还到他家里，取李锦绣从社会科学院带过来的东西或小坐一下。王先生这时虽然已经是高龄，但看去身体仍然还健朗。最近这一年，我没有特别的事，也就没去他家，在院子里也没有见到他，没想到，我在台湾时，却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过去的话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王先生不会炒作，他自己也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王先生是比较“安静”的学者，惟其如此，王先生才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正因为如此，王先生和王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更让我们感念。虽然我说这样的话，在现今看来，也许有

点过时甚至迂腐。

2009年4月14日

回忆王永兴伯伯

程怡

我父亲不会讲笑话，一讲到好笑的地方，他自己先笑到说不出话来，别人就很难听清楚下文了。但我小时候，却在父亲讲的可笑的故事里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赵荣声伯伯，他原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后来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工人日报的主编，1957年打成右派以后，在山东的一个供销社干活儿，大饥荒时期给我们带来过一包红枣，所以印象深刻。赵伯伯口吃，据父亲说，抗战时他们一起到绥远，路上看到有人卖汽水，当时这几个燕京的学生渴得要命，就问摆摊儿的汽水多少钱一瓶，人家说了价，赵伯伯就说：“吃…吃…吃…0”，摊主拿起子开瓶，赵伯伯手指着汽水还说“吃…吃…”，等瓶盖飞到了一边儿，赵伯伯的“不起”两个字才憋出来。63年我第一次看到赵伯伯，就叫他“吃不起”伯伯；还有一位就是黄刊（王永兴）伯伯，爸爸说在联大的时候，他们一起在昆明的地摊儿上看到一本法文字典，当时他们都在学法文，王伯伯身上没带钱，而爸爸正好兜里有钱，于是爸爸就买了那本字典。后来王伯伯拿了钱来找爸爸，要爸爸把字典让给他，爸爸不干，王伯伯就说：“那是我先想买的！”爸爸说：“那是我买的！”王伯伯说：“你真的不让？”爸爸说：“不让！”爸爸说王伯伯生气地走了，“他居然好几天不理我！”爸爸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所以我至今不清楚王伯伯后来怎么又和爸爸恢复邦交了。爸爸还说，当时他们都特别崇拜陈寅恪先生，王伯伯曾在没人的地方给陈先生磕头，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觉得给老师磕头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王伯伯，是80年代中期。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王伯伯就被爸爸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古籍整理研究所来给研究生讲课，爸爸把王伯伯安排在学校招待所里住，但第二天，爸爸就要我把屋子让给王伯伯住，说王伯伯想住在我们家，他喜欢家里的气氛。爸爸说：“你王伯伯可怜，一直没有个好好的家，你就到楼下沙发上去睡几天！”我挺不情愿地让出了我的小房间，妈妈给王伯伯换了干净的被子床单，王伯伯就住在爸爸的隔壁了。

妈妈那时候已经退休在家，很认真地做了几天饭，每天吃饭的时候，王伯伯总会说：“啊呀，这儿真好，宗蕻啊，我真喜欢你们的家，真幸福啊！”我发现王伯伯说这些话的时候，真的会很激动，有几次甚至忍不住拭泪；爸爸听他这么说的时，总是往他碗里夹菜，除了“黄刊，吃吧吃吧”，别的话是没有的。王伯伯不去讲课的时候，如果爸爸学校里没什么事，他们俩就会在爸爸的卧室兼书房里喝茶、聊天。有一次，王伯伯还拿一本油印的徐高阮先生的《论山涛》给我看，我尽管不能完全看懂，却非常喜欢那样的论证和文字表达。当我说我喜欢这篇文章的时候，王伯伯开心地笑眯了眼：“是吧？真是精彩极了！是吧！这完全是陈寅恪先生的风格！太好了！”很多年以后，当我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读哀江南赋》等论文以及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时，才理解了王伯伯当时的那份沉醉与欢喜。那样的学问，那样的思想方法确实是能引人入胜的。

有一天爸爸不在家，王伯伯又没有课，我就和王伯伯聊天。我那时候正在念阮籍的诗，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其中有些想法让我多少有点儿兴奋。我跟王伯伯说，我很想研究阮旨何以遥深。王伯伯居然认真地听我东拉西扯，然后他对我说：“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需要读史。我觉得你能这样思考问题非常好，但要论证的话，光读诗不够，要读史。不读史的话，研究不能深入。”不久，父亲就病倒了，那七年，我在父亲的病榻前，有过很多的思考，读书却很少。直到前年，我才写成了对《咏怀诗·其三》的几点补证。学报发表的时候，责编让我改了题目，因为“补证”这类的题目，时下或许会让人厌倦。尽管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我的这篇文章和我的“发覆”，但，研究与思考，还是让我获得了那种“适我”的快感。只是我很遗憾自己没有把这篇文章寄给王伯伯，有那么一瞬间，我确实想那么做着！

父亲去世以后，王伯伯曾经来信让我和弟弟整理他遗留的文字，“连一个纸片儿都不能丢”；但我们各忙各的，总想着这些事可以放到以后再做。再后来，就觉得做不做都无所谓了。有时候，翻爸爸留下的《通鉴》、《文选》，会看到他写在书页空白处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和签条，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爸爸病前手不释卷的样子，想起王伯伯说过的话——在他们黯淡的中年，这些书，曾经给过他们多少我们并不完全理解的人生意义啊！

好像就在那几年，有一天我去看系里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王伯伯结婚了，我很吃惊，回来告诉妈妈，妈妈很快就从爸爸的一位研究生那儿确认了这个消息，于是妈妈马上写信给王伯伯，祝贺他终于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位真正能够相濡以沫的、学问很好的年轻妻子。王伯伯很快就高兴地回信给妈妈，信里还说，他和锦绣老师坐在陈先生留下的大书桌的两边读书、做学问、讨论问题，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

十年前，妈妈去北京参加北大清华校庆的时候，还去过王伯伯的家。清贫的、简单的、读书人的生活。这就是妈妈给我们描述的王伯伯的家。妈妈说：“老天还是有眼，没让黄刊晚年孤独！”接到讣闻的时候，妈妈还是这句话。

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话，王伯伯会在那儿看到很多先他而去的老朋友。我希望那样！

中州朔望 雨露河汾

——纪念我国著名隋唐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先生

丁克诤

中国的 2008 年，风雨交加， 可谓是慷慨悲歌和英雄壮举的年代。早春，江南大地十余省，雨雪冰灾，为护佑露宿途中的乡亲，华夏儿女雪中送炭； 五月，汶川大地震， 为救三川父老生灵，子弟兵神鹰天降， 奋不顾身；夏初，为保驾百年夙愿的奥运会，五大洲炎黄志愿者风餐露宿、呕心沥血； 八月北京， 奥运健儿兵不血刃，终于一展雄风。 然而，牵挂着这风风雨雨中的所有的一切，有谁知，未名湖畔的一位饱经沧桑的思想者，我国著名隋唐史学家，王永兴先生，于 9 月 15 日与世长辞了。

清华园。王永兴先生（1914-2008）是先父则良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同学和挚友。父亲则良原来在北京四中的老同学， MIT 的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先生曾写信告诉我，他和父亲在四中同班，入清华是第九级。父亲中途休学过一年，后与永兴先生同期， 属清华十级。早年的清华，曾设有规模不大的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聘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等学贯中西的导师。部分地由于诸导师和他们学识思想的影响，清华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高等学府。

抗日救亡。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学校被迫南迁，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又搬到昆明， 成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悲惨岁月，永兴先生和徐高阮先生、汪篔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应镠先生、父亲则良等学友们一同追随恩师陈寅恪、雷海宗、钱穆和张荫麟等教授学习历史。 之后，永兴先生还做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和（可能也是当时唯一的）助手。永兴先生告诉我， 寅恪先生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使他如梦初醒。在那万民涂炭的绝望关头， 寅恪先生悲痛地指出，国可以亡，但中华文化不可灭， 只要中华文化不灭，总有复兴中国之希望。 从那时起，经世致用的史学，就成了永兴先生毕生的追求。抗日救亡，他和师友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募捐，办学校，办刊物， 发表文章。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呼吁国共合作， 呼吁全民抗战。

联大学风。想到永兴先生， 不能使人不联想到他在抗战时期所就读的西南联大、联大的艰苦环境和独特学风。据已故叔父则民先生生前回忆： 那时的历史学并不局限于历史系之内。 许多外系甚至外校的教师和同学们也慕名前来听寅恪先生等名师讲学。 经常是，人太多，教室太小坐不下。 有时，只好挪到园林里，在凉亭中架上黑板，听众们都围坐在草地上听讲。 历史系的高班生和青年教师们总是挤坐前排，边听边记。低班生们和外系、

外校师生坐在后面一点旁听，至少也长一点见识。遇有日军飞机轰炸时，大家都跑进防空洞。有一次，宿舍炸毁了，衣物、被褥、用品都没了。只要还没有伤亡的人们，稍微过了，又都回来学习。下学后，同学们去废墟里挖土，希望找回一点棉絮之类拼凑起来以御寒。尽管，环境那么艰苦，人们的工作、学习反而更努力，士气更旺。有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代之比较。讨论会采用辩论方式，由雷海宗先生为一方介绍古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由钱穆先生为另一方分析古希腊的不同格局。事前，两位教授都作了充分准备，他们彼此辩论的风格截然不同：雷海宗先生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声音如雷；而钱穆先生则构思缜密，滴水不漏，娓娓动听。雷先生讲到古罗马极盛时期，好像一座大厅里，中间有一盏巨大的灯火，光焰四射。而钱先生则讲到古希腊巅峰时期，如同在大厅的四壁上安放了众多较小的灯盏，可以此起彼伏，蓬荜生辉。如此的辩论，自然很难决出最后的胜负……但是，也恰恰是在抗日救亡的艰苦环境中，才形成了西南联大所独有的学术风格，培育出后来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和朱光亚等科学巨匠。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永兴先生，尽管历经半个世纪之后，竟仍然难以忘怀。每当谈到有关西南联大的这些点点滴滴，从他的眼里，我看到期盼的光亮和如少年般的憧憬。

十一学会。特别地，永兴先生热心参与了王佐良先生和父亲则良发起的“十一学会”。据长辈们说，学会参加者和演说者中，当时常来的既有如朱自清、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冯友兰、雷海宗、沈从文和吴晗等教授，更有同学们如王瑶、王永兴、王乃樑、王佐良、王勉、吴征镒、季镇淮、翁同文、程应镠、何炳棣、李赋宁、周珏良、杨周翰、丁则民和丁则良等。特别地，学会得到冯友兰先生和雷海宗先生的悉心关怀和支持。据先母李淑荣生前回忆，雷先生和雷太太经常在周末请父亲、母亲同去家里做客、吃晚饭。届时，雷先生总会讲古论今，给予许多指点。学会里，大家不论身份高低，不分专业，打破党派界限，兼收并蓄地研讨中外古今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社会发展和文化兴衰。学会每次由一人演讲，教授报告，则学生们听。学生报告，教授们也去听。听后共同讨论。当时，讨论风气之兴盛，内容之深入，甚至得到以史学批判著称的张荫麟先生的肯定。他曾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时过半个世纪之后，199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著名概率论专家、清华十一级的钟开莱教授来依利诺依大学讲学时，对我说，他居然还记得父亲则良当年讲话的模样。那时候，初到昆明的冯友兰先生曾为联大写下校歌歌词，一首《满江红》使人如身临其境：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
檝移栽楫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

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十一者士也。永兴先生说，越是危亡时刻就越要振作中华民族的士气，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探索中华图存、图强的方向和道路。

传承。记得是在1998年的夏天，我同叔父则勤先生一同造访永兴先生于燕北园。那天，我们幸运地获赐先生所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震撼人心的是，书中展示了我中华“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与气节，字里行间透露出顽强的思辨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求真理想。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史学，永兴先生不仅仅是勇于探索的学者，恰如寅恪先生所倡导的，他和他的挚友们从来不属于纯学院派，而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抗战时期，不少联大同学都走向国家的抗日前线，其中部分同学如程应镠、王慈衡等去了延安或参加了八路军。无论是逆境，还是贫寒，都挡不住他们兴学，办学会、刊物、出版社（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三联书店版）的激情；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走到哪里，永兴先生都重视实地考察，探求真理。即使在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虽经九死一生，他竟然顽强地坚持了敦煌学的研究。

东北汉子。出身于辽宁昌图的永兴先生，豪侠仗义，是标准的东北好汉。在震惊中外的北平一二·九运动中，清华校园被军警和宪兵封锁了。当时，他并不在校园内，并且听说军警正在通缉他。但是，当知道有同学被捕时，他毅然重新潜入校园，并且成功地组织了救援工作。被救出的同学之一是蒋南翔先生，五十年代后，他作了清华大学校长。同学们脱险之后，永兴先生不表功，更不必听什么感谢。因为他有功课要做。他记得雷海宗先生的话，全靠没有知识的人是不能救中国的。其实，即使在日常生活之中，也可以处处感觉到永兴先生的真挚坦诚，平易近人。大约是2002年，有一次共用午餐后，他送书给我，后又问我可有著作可以送给他老人家。我惭愧地说，还没有出过书，仅仅发表过一些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而他老人家竟然不放弃，说送篇文章也行。他这一讲使我很紧张。平常想，一位老前辈又是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喜欢看我写的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呢？搜肠刮肚，好不容易，在美国香檳的家里找出自己于198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数学历史观——美国数学会一百周年纪念印象记》。思忖着，毕竟这是一篇数学史文章，我寄给了他，算是交差。猜想他老人家也不见得有时间看。没想到，几个星期过后，他老人家竟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文章的意思全都看懂了，立意好，叙述和文字很眼熟，甚至使他回忆起“和则良朝夕与共的那些日子……”想不到，这文字竟然还为他老人家还带来过些许快乐，我心中窃喜。

精卫填海。1978年后，国家逐步入正轨。永兴先生调入北京大学，执教于历史系。1981年的夏天，我和母亲淑荣、弟弟克详同去北大健斋拜访他。当时他孑身住一斗室，有

床和桌椅各一，没有厨房，仅在楼道里有公共洗手间。然而，清苦的生活丝毫没有挫折他的意志。中午时分，他在燕园南门口的长征食堂请客。席间，老人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他每天长跑两千米，从而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尽管年逾花甲，他仍然为自己制定了堪称宏伟的研究计划。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要发奋研究隋唐历史，希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找到或可借鉴的线索。1998年以来，在工作之余或途经北京时，我曾多次看望他老人家。我向他介绍了近年来自己在北京及大连等地兴办科学技术、教育事业的经验，并请教了阅读《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时碰到的若干问题。记得最后一次是在2007年秋冬时节，临别时，夫人李锦绣教授还赠予新版《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共五册。走到门口，永兴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嘱咐我一定告诉在美国的孩子们，不要忘了咱们这个家——中国。最可贵的是，在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的宏伟计划在锦绣夫人的照料和协助下，铸成鸿篇巨著，为我中华战略思想库留下稀世珍宝。

华夏永兴。在我心目中，王永兴先生是一位雄心万丈而又脚踏实地的英勇斗士。我相信，他刚直不阿的品格，心系天下的人生态度和对学术、理想的不懈追求将在未名湖畔永驻，激励代代中华学子。虽然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如今，想到先生竟去了，长夜里我心痛难眠。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挥泪抚卷于先生遗著，我问苍天，五千年可有华夏神州之永兴乎？

2009年1月30日寄出于美国伊利诺依州，香槟市



丁克谔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1998年

回忆王永兴先生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郝春文

初识王永兴先生是在 1982 年 2 月。

那一年王先生应宁可先生之邀，在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为本科生高年级合开一门“隋唐史”课程（中间张广达先生和吴宗国先生也来讲过几次）。我当时上大三，也慕名选修了该课。我查阅了当年的听课笔记，第一次课就是王先生上的。可惜我第一学期的笔记没有记下第一次课的具体时间。第二学期第一次课的具体时间倒是记下了，是 1982 年的 9 月 3 日。据此推算，第一学期第一次课的时间应该是 1982 年 2 月。

当时王先生已是满头白发，给我的印象气质儒雅，和蔼可亲。他首先说明这门课和在北大所讲的内容完全一样，每周二小时，讲述一年，目的是让选修同学了解隋唐史，同时兼及学习古代史的基本训练，因而要涉及校勘学、训诂学和考据等知识。这门课是从介绍学习隋唐史的书目开始的，然后是依次讲授隋唐的政治概况，重点讲授唐代的官制和典章制度。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王先生详细介绍了陈寅恪先生考证李渊向突厥称臣的成果，使我明白了旧史的记载不是完全可靠的，出于种种原因，包括实录在内的史书编纂者要有意无意地掩盖一些事实。这样的认识提升对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高。在课堂上，王先生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读书。他提出第一要认真，从识字开始，不要急。第二要思考，消化读过的书。并注意不断总结，把知识条理化。

王先生还送到了应该怎样写论文。讲了四点。一是选题，宜小不宜大，可以探讨一个问题的一面或一个方面，题目要具体，要给人以启发。二是取材，学会用材料来说明论点。论据要来自事实。三是要考察因果关系。也就是不要限于具体事实的考证。四是要有结论。这些教诲，对于处于好写大题目、好高谈阔论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宝贵的教示。

第二学期的隋唐史是按专题讲授的，第一讲的“唐前期经济方面的史料”，是将介绍史料和考证结合在一起讲授的。第二讲是“关于唐代租税中的问题”，主要讲租庸调和两税法，王先生认为两税法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夏秋两征、户税、地税都在建中以前就有了，并不是杨炎的创新。这样的看法，和我以前看的书不同，印象很深。第三讲是“关于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第四讲是“唐朝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第五讲是“唐律”。

在第二学期，王先生还要求我们写隋唐史的学年论文。他还是强调题目要小，不能空，要有材料，有分析。要提出论点，并且要有依据。要真正把书读懂、消化。我记得我写的是唐代的公廩本钱，还为此请教过吴宗国先生。王先生一年的宝贵教示，对于我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但在 1982 年，王先生可能并不认识在座中听课的我。

1983 年 9 月，我师从宁可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宁先生要求我们到北大去听王先生的课，

我们一共听了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是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一个学期是敦煌文书研究。关于唐代政治史的讲授，第一部分是讲关于隋唐五代的史料，第二部分讲唐代的政治制度。王先生强调政治制度与官制不同，它是研究国家机器如何转动，这个看法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王先生的敦煌文书课是先讲整理文书需要查阅的工具书，次讲整理文书的程序，第三是以一件文书为示范带领同学一起整理，记得我们那次是整理 P.2005 号《水部式》，然后是每位同学发给一件文书进行整理，很多同学整理的文书经王先生指点后发表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集》上。听王先生讲这门课的同学很多，我的印象，和我们一起听课的大约有三、四十人，而这只是一次课而已。后来从事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整理文书的基本功大多是从王先生那里学来的。

王先生上课，一个重要特点是板书很多，一节课经常要把黑板写满好几次。经常是王先生在前面写，王宏志师兄在后面帮王先生擦黑板。

在研究生阶段听课，在课下有时也和王先生聊天，我想这时候王先生应该能记住我的名字了。

真正和王先生直接接触较多是因为编辑《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1988 年，敦煌吐鲁番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后决定编辑会议论文集，编选工作由王先生负责，我是会议秘书组的负责人，会后协助王先生做些收发工作。曾多次到王先生家商量论文集编辑问题，王先生对编选工作十分认真，挑选论文很慎重，对入选的论文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由我和作者联系落实王先生的修改意见。这部论文集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就我所知，王先生是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记得一次上课时王先生说到在生病时重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让我很感动，对王先生而言，读书就是养病的最好方式。退休以后，王先生仍然勤于著述。一次我去看他，他对我说：“春文，退休后我感到更忙了，很多事都做不完。”从王先生退休后出版的基本高质量著作可以知道，王先生实际上是退而不休，一直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一次和王先生闲谈，王先生对我说：“春文，你也算是我的学生。一是你曾经听过我的课，二是我参加过你的答辩”。其实，我自己也一直认为是王先生的学生，虽然我不敢以王先生的弟子自居。

草此文时，我重新翻看了三本听王先生课的笔记，感慨良多。作为学生，我会永远记住王先生的宝贵教诲，认真学习王先生献身学术、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怀念王永兴先生

张国刚

王永兴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为唐史学界失去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为清华历史系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为中国唐史学会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

我与永兴先生见面并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有那么几次。第一次是在1981年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杨志玖（佩之）先生请永兴先生到南开主持我的一位师兄的答辩。当时，我还是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永兴先生与志玖先生是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的同学（永兴先生本科毕业于清华，志玖先生本科毕业于北大）。他们之间很熟悉。我记得那次答辩，王先生对于论文的评点毫不假借，语气虽然婉转，观点却十分鲜明，因为答辩者在论文中对于陈寅恪先生关于牛李党争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显然是永兴先生所不能赞同的。虽然只是硕士答辩，但是丝毫没有走过场，我们在场的学生都深受教育。

198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几年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永兴先生，由于参会者冠盖云集，我作为一个年轻后辈，只是与永兴先生打了一个招呼。次年我就随着内子到欧洲游学去了，直到1994年暑假才回国，就在这年年底，我参加了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召开的第一次“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时，荣新江教授受基金会委托，主编一个学术杂志，究竟叫什么名字，大家议论纷纷，《唐代研究》、《唐文化研究》似乎都有人提议过，记得是永兴先生提议说，叫《唐研究》最好，结果获得大家的赞同。如今《唐研究》在荣新江教授的主持下，已经是海内外知名的学术专刊，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永兴先生对于清华历史系的建设也十分关心。曾经莅临清华历史学重建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调入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工作之后，虽然跟永兴先生联系过，但是每次都是锦绣教授挡驾。记得前年（2007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首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座谈会上，曾经宣读过永兴先生的贺词，先生热情洋溢的文字令出席会议的清华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也为之动容。

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到永兴先生的文章的，记得大学最后一年，我有一段时间一期一期地翻阅文革前的《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当时只是逐页泛读，意在了解过去的人都写了些什么文章，并没有特别的目的。永兴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关于唐代差科簿的文章给我印象深刻。文章并没有看懂，因为学力不逮，似乎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后来那篇文章增订之后在永兴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古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重新发表，我再此细读，才能进一步感受到其中的真知灼见与深

厚功力。

永兴先生的治学重点和主要贡献是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这两个领域在他那里是相同的。我刚开始学习和研究唐史就偏重在制度史尤其是军制史，因此，永兴先生的论著是必读之书。《唐代勾检制度》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内部审计制度和文书签发制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不仅是作者深入咀嚼《唐六典》等经典文献的相关制度条文而获得的心得之作，而且也是作者细致比读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研究结果。

唐代兵制史的研究是永兴先生的“童子功”。1939年他在清华本科学业论文题目是“唐代后期黄头军考”，三年后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论文《唐代的朔方军》，这两篇文章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写作的，从中可见永兴先生早年的训练成果。九十年代以来先生先后出版了《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昆仑出版社，2003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读了这些著作，我感到永兴先生把其早年治军事史的功力与中年之后治制度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的成果做了完美的结合。读《唐代前期的西北军事》，感到只有对于当时的边境形势以及诸种制度（地理、兵力、粮草供给）烂熟于胸，方才能做出如此深入细致的论述和分析。书中对于吐鲁番出土相关军政文书的考释，也无一不紧紧围绕着军事制度而展开。《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443页）、《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251页），很少引用现代中日学者相关成果，显然是永兴先生早年读书心得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论黄头军》一节仅3页纸，这本来是永兴先生本科就做过的论文题目，可见编订入书之时，作者是极为审慎的。这两部著作内容详略不一，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给人以启发。

永兴先生还给我们留下了《《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校注》、《敦煌经济文书导论》以及《陈门文学丛稿》、《陈寅恪先生学术略论稿》等著述，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著述大多是他花甲之后完成的，其追求学术的坚毅精神，真是令人感佩。假如不是历届政治运动给这位老人以太多的磨难，他一定会更加从容的做出更重大的学术贡献。

永兴先生是中国唐史学会的顾问，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顾问和杰出校友，去年在先生的追悼会上，清华大学历史系献上了一幅挽联：

沉潜石室之中，此老完千年制典；绍绪金明以后，斯人领一代风流！

虽然文字粗简，却表达了清华史学同仁对于这位前辈的深切悼念与敬重。

2009年4月26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缅怀王永兴先生

钱文忠

我特别喜欢大学教书生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必早九晚五坐班，每每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职业。而今天，我不再欢喜。几天不去学校，信箱照例塞得满满当当。我象往常那样漫不经心地整理来信，却让其中的一封击中了。

惨白的信封，右下角印着惨黑的一行字：“历史系王永兴教授治丧办公室”！我惊呆了。近两年，尽管我经常去北京，但是，都没有拜见过王永兴先生。我知道，自己对王先生感情很深。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并没有想过。这几天仔细想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习惯性地以为王永兴先生的身体非常好，想当然地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意外，因此今天推明日，明日推后朝，失去了至今想来无比珍贵的拜见王先生的机会，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哀痛。二是，距今不到 20 年前，我离开了北大。内外各种因素使然，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连自己也不喜欢的这一切，自然更和王永兴先生对我这个后生小辈的殷切期望绝不相符。因此，这使我总有点怯于见王永兴先生。这也不能不让我感到彻心彻肺的无奈。

2008 年 9 月 15 日 18 时在北京去世的王永兴先生享年九十五岁，他是和季羨林、邓广铭、周一良等先生同一行辈的学界耆宿。王先生的身体好，在北大是知者甚多的。但是，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并不是王先生与生俱来的禀赋。10 多年前，林在勇先生发愿主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不嫌我废弃在家，找我商议。我从自己的认识角度拟了一份应该敦请的学界名家的名单，供在勇先生参考，王永兴先生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王先生答应了，很快就完稿了。这就是 1999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兴学述》。可惜，这套丛书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我的治学经历”开头一句就是：“我乃农家子，少年体弱”。弱到什么地步呢？“家大伯父认为我体弱不能务农”。然而，却正是体弱改变了王永兴先生的人生道路。幼年的王先生在乡下村塾读《三字经》，很得塾师的夸奖。大伯父看在眼里：侄子虽然体弱不能务农，却应该是一块可以读书的好料。于是，竭力支持侄子读书。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王永兴先生正在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高一，不愿作亡国奴，18 岁的少年流亡到北平，过着近乎乞丐的生活。还是大伯父，在 1933 年到北平来看望侄子，问乡亲借了十元钱，嘱咐侄子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1934 年，王永兴先生考取了极难被录取的清华大学。王先生曾经讲过：“孝于家而忠于国，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我是儒家门徒，不能不守孝道”，对大伯父感念终生。

进大学以后，1936 年，王先生还患上了当时近乎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被迫休学一年。1937 年，大病初愈，他还冒着巨大的危险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业。不知道是否因为经过这样的艰苦磨练，反而使得王先生的身体康健了起来呢？这似乎没有人知道。北大

很多人都知道的却是，在经历了二十一年的灾难和折磨后，1978年11月，王先生从山西调到了北大历史系。那时，王先生已是六十五岁了。重见天日的王先生如饥似渴地研究，只争朝夕地工作。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好身体，能够弥补在疯狂岁月里被无情浪费了的生命，王先生每天清晨都在北大南操场跑步。这不是健身慢跑，而是真正的“跑步”，五圈共2000米的快跑；不仅如此，最后200米还是全力的冲刺！这是北大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对这位老先生都充满了崇敬之情。这样的跑步持续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是，一直到我考进北大的1984年，王先生依然是如此跑步的。那时，王先生已经年过古稀了。

谁又能够将如此这般的王先生和疾病联系起来呢？更何况，王先生的晚年是安宁而幸福的，志同道合的李锦绣师母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我一直知道，九十岁以后的王永兴先生依然步履康健。

王永兴先生是一位默默耕耘、与世两忘的历史学家，毕生严守着自己的专业疆域。读书界对他感到陌生，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这没有什么，王先生本人更是毫不在意。但是，作为深受大恩的后辈，我总觉得有写点什么的责任。

1934年，王永兴先生考进清华大学，起初读的却是中文系，志向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且创作白话诗。在历经艰辛抵达长沙后，王永兴先生才第一次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课后，高阮兄和我均极振奋，能遇到这样的教师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要一生从寅恪先生受教，因而要转系”。于是，去找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先生申请。徐高阮先生因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两年，王先生则是因病休学一年，倘若转系，那么徐先生的大学就要读七年，王先生则要读六年。两位年轻学子对此毫不在意，坚持转到了历史学系，后来都成为陈寅恪先生门下的得意弟子和传人。

王永兴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学术界知者甚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的说法：“南方蒋天枢先生，北方王永兴先生”。十多年来，学术界、文化界颇有好多“相提并论”者，绝大多数拟于不伦，唯独对这个并举，众口概无异辞。

这种感情当然有师生情分的基础，但是，又绝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与凡俗意义迥异的“学统”在焉。王永兴先生的治学，就是恪守陈氏学统的。《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固无论矣；《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1994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以及数十篇厚重的论文，无一不是陈氏学统的承继和弘扬。屡屡称述陈寅恪先生“我拿国家的薪水，怎么能不教书”的王永兴先生，也将三尺讲台视作是培植陈氏学脉的神圣道场。当今中国学界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学的好几位中坚学者都是王先生的学生，这就是明证。

顺便提一下，正当学术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兴未艾之际，王永兴先生命我前去，示知他想编一本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当时正是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候。我找了当时

还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唐建福兄，由他安排，1994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永兴先生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我还奉王先生之命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拜见陈述先生，拜领陈寅恪先生手迹复印件，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陈述先生。这是一本相当重要的纪念文集，可惜只印了300册，今天几乎可以“珍本”视之了。值得一提的是，主编王永兴先生除了半页“后记”，没有在其中发表文章。这充分反映了王先生的为人风格。今天想来，我总算也为王先生做过些须小事，这多少让我在哀痛中略微有点宽慰的感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王永兴先生的专业领域是冷僻的。王先生也确实在这个毕生珍爱的领域里“寂寞勤苦”，但是，对于中国文化、民族命运，王先生到老都保持着一股连年轻人都自叹弗如的热情。这是王永兴先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道统”，当然，这也不是流俗可以理解的。

1935年至1936年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我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其实，岂止是“积极参加”那么简单呢？在“一二九”运动中，王先生是以一腔热血担负过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他在当年的许多同志或者部下，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只不过王永兴先生自己从来不提而已。

前面提到过的徐高阮先生是陈寅恪先生非常喜爱的弟子，也是王永兴先生的好友，他也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他和王永兴先生一样选择了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王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很象当年的徐高阮。”我当时不以为意，其实是自己太浅薄。后来，我知道了徐高阮先生的人生遭遇，特别是他在台湾的故事，实在不能不佩服王永兴先生的眼光和智慧。

如此性格的王先生怎么能够绕开人生的坎坷呢？1957年，王永兴先生终究没有能够逃脱罗网，被遣送到太原改造思想，控制使用。二十一年的无妄灾难就此降临，读书治学自然是不可能了。王先生的全部藏书更是在1966年被付之一炬，人则被投入土牢，后来被送到农村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最让我钦敬和感念的是，这一切苦难仿佛都没有在王永兴先生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毕生养护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有一件和我有关的事情，今天是该公诸于众了。

将近二十年前，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王永兴先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北大哲学系王守常教授相伴，在一个晚上，步行爬上四楼，向新调来的北大校长说明我的情况。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却是在此后，才由守常教授告诉我的。我现在抹着泪水，眼前是这样的一幕：满头白发的王永兴先生，在守常教授的搀挽之下，吃力地爬楼，为的，只是我这个在他眼里还算是可造之材的，其实完全是朽木一般的后生-----

王永兴先生走了，已经42岁的我在给锦绣师母打电话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位毕生坚守学统、道统的真正的读书人就这样走了。我想，比起我们来，老人或许还是幸福的，因为在他身上，学统和道统不仅没有分裂，而且依然保持着历经劫难后的完美统一。

临离开北大前，我请王永兴先生赏字。几天后去拿，竟然是毛笔书写的一整张宣纸的

《海宁王观堂先生碑铭》！笔迹艰难颤巍：前面说“这一切苦难仿佛都没有在王永兴先生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是不对的：王永兴先生的手在那个疯狂岁月里被铁丝捆绑，是几近残废的。

这幅字必将是我的传家之宝。此刻我却不忍，也不敢去打开它，尽管它就在我的座旁。我知道，这是王永兴先生所秉承的陈氏学统和道统的宣言。在我面临苦难的时候，王永兴先生以它相赐，是有深意的。

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今天的我也许让九泉之下的王永兴先生，以及其他许多关心我的先生失望了。我只能说：“对不起。”然而，王先生，您或许还可以看下去，我想，我终究是不会让您太过失望的。到那时，您还会微笑的，就象我坐在那张由梁启超送给陈寅恪先生，又由陈先生送给您的书桌前，经常可以看见的那样微笑的。

良师·益友·亲人

——追忆王永兴先生

德克萨斯 A & M 大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 李平卫

我于 1989 年秋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读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学生社团请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老校友在新建成的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一个座谈会，陈岱孙先生、李赋宁先生、王永兴先生等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当时有人请王永兴先生谈一谈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的事，王先生便饶有兴致地讲了一些他多年随陈先生学习的趣事。王先生讲得十分引人入胜，成为那次座谈会的一个高潮。也就是这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王永兴先生。

我在北大时的实验室在西校门内的化学南楼，有许多次我看见王先生从我们楼下的小径走过。每每看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我心中总是充满敬意，有时心中便想，要能和这位老人相识该多好！有一次，又是在这条小径上遇到了王先生，我便上前向王先生打招呼，并请王先生解释一个我们家乡没人能够讲明白的一副春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中的典故。王先生当时就给我解释了其中汉瓦当文、周铜盘铭的含义。我告诉王先生我是化学系的研究生，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还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王先生便欣然邀请我有时间去他家中再谈。记得先生当时说：“请来舍下再谈。”我觉得十分有趣。能和王先生这样可敬的老人结缘也是我上北大求学的梦想之一。

我于 1967 年生于陕西蓝田县，文革结束后上初中。在那个填饱肚子都是问题的年代，能考上大学、考上中专，端上一个铁饭碗是乡下孩子所梦寐以求的。我初中毕业之后便考上了陕西省化工学校，跳出了农门。和现在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心中也有一个北大梦。中专毕业之后，我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大化学系的研究生。能考上北大的研究生，我自己欣喜若狂。怀着对无数大师们的敬仰，我上了北大。可是在北大有许多人对象我这样的外来户充满了歧视。当时北大流行着一句话：“北大有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研究生，三流的博士生。”许多老师和同学都看不起外校的学生，更不用说一个连大学本科都没有上过的中专生。我在北大化学系经历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冷遇。可是王先生对待我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自从认识王先生那时起，他对我一直保持着一种关心、爱护、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就凭你中专毕业的背景，能上北大就说明你很有志气，很有天分。只要你不断努力，你就一定能够成功。”他甚至给我讲诺贝尔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应该有那样的理想，为国人争光。他曾经鼓励我毕业之后去美国最优秀的实验室深造，学成之后回国工作。我想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在科研上有所成就，与王先生多年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几乎不可能选择学术和科研这条路；没有王先生的支持，我很难想象我会不会完成我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记得读博期间，与我为邻的历史系罗新同学曾告诉我王先生培养了史学界十分厉害的学生。我想王先生对每一个学生

一如既往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或许就是其中的奥秘。

我在北大读完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在我读博第二年的时候，我的老师李根培先生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我的科研课题已经取得一些突破，所以我决定延期一年毕业，等李老师回国后再进行论文答辩。可是就在我第三学年暑假之前，我从学校接到通知说学校不再负责我延期就读期间的生活费和住宿。对于三流学生这似乎是理所当然。记得我一边打算在外面找房子，一边和许多同学去校长办公室请求解决住宿问题。当时我和王先生谈到了这些问题，王先生感到十分气愤，并对我讲他可以找当时的党委书记郝斌谈谈，以求解决住宿问题。很快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这或许是王先生在其中周旋的结果，可是王先生从来没有再和我谈及此事，这也是王先生做人的风格。



王永兴与李平卫在北大燕园，1995年

1996年暑假之后，我的科研课题取得了重要突破，我获得了北京鸭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高质量的单晶，并收集了3.2埃分辨率的衍射数据。经过六年多的磨难，我可以考虑撰写毕业论文了。一个周末我去王先生家和他谈了我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他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立即和锦绣一起去化学南楼我的实验室看看我的实验结果。王先生戴上立体眼镜，饶有兴趣地欣赏我获得的第一个蛋白质的电子密度图，并告诉我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很不幸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指导老师李根培老师因没及时回国而被北大物理化学研究所除名。尽管我在科研上取得突破，很快完成了毕业论文，我在论文评阅时又遇到了一些麻烦。当我将博士论文送到化学系某老先生家中审阅时，他不仅拒绝审阅我的论文，并拒绝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他还授意其手下的一个教授严格审阅我的论文。尽管在我的论文答辩时这位老师百般挑剔，可是谁也抹杀不了我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绩。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能够完成一个蛋白质



王永兴在化学南楼看李平卫的实验结果，1996年

从分离纯化到晶体结构测定足以获得一个博士学位。直到今天我仍为那一个结构自豪。我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庆幸在北大认识了王先生这样的好老师，在这样一位对自然科学了解甚少的史学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完成了在北大的学业。在我自己至今依然珍存的一份论文扉页上，我写下了：“谨以此献给我的两位老师和挚友张旺农先生（我初中语文老师）、王永兴先生及我的祖父李炳林先生及其家族。”我是我那个村子第一位上北大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后生，如果没有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或许我在读完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回西安工作了。

我和王先生认识的时候，他住在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一套很小的两居室公寓中，当时他还没有和锦绣结婚。有一次我去先生家中看到他穿着一件我们做化学实验的大褂在那狭小的厨房做饭，当时的情景让我感触很深，我感到先生的晚景十分凄凉。我去过王先生家中多次，那时他好像连开水都没有，更不用说茶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锦绣毅然承担起照顾年迈老师的责任。我很难想象锦绣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是从历史系罗新兄那儿得知锦绣和王先生结婚的消息的。很快有一天，王先生亲自到我30楼的宿舍，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并盛情邀请我去北大西南门外的全聚德吃烤鸭。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即买了一束素雅的鲜花并附上一张对他们结合表示理解和支持的贺卡送到王先生家。王先生和锦绣的结合在北大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的同学得知我和王先生相识，便怀着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问及此事。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王先生和锦绣的结合是建立在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亲人般的关心和爱护的基础上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能有几人会理解这一切。很有趣的是在

王先生和锦绣结婚之后，锦绣还特意写信给我感谢我对王先生的照顾。实际上，我只是时不时地去先生家中看看他并和他闲聊几句而已。和王先生相识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母亲病故。父亲很快又找了老伴，突然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孤儿，尽管当时我已接近 30 岁了。王先生得知此事后，对我关爱有加。我时常觉得王先生既是一位老师，又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他真正是象在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尽管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很感兴趣，对历史学我却了解甚少，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与王先生交流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十分相似。王先生时常对我讲，学理科的也应该了解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他还告诉我他在清华时还选修了生物学。

王先生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在我和他熟识之后，每逢寒假、暑假我回西安探亲的时候，他总会让我给我年龄和他相近的祖父带去一些北京的特产。记得有一次他让我给祖父带去了一包稻香村的油茶，还让锦绣去前门内联升买了一双他喜欢穿的北京棉鞋。这对于我那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的祖父来说，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怎么可以想到一位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居然会送给他那些礼物！祖父说王先生真是有心之人。他把那双轻巧、暖和、雅致的棉鞋给邻居们看，有几位大婶大娘都说那双鞋做得十分稀样，再巧的媳妇也难纳出那样的鞋底。爷爷还特意邀请他的好友，西村的九爷来品尝北京老字号的汤茶。这一切在我家乡都传为佳话。在我返校的时候，爷爷也不忘记让我给王先生带一些用那亲手种的玉米做的碴子和一两支终南山下出产的莲藕。品尝过这些东西之后，王先生总是说北京哪有那样新鲜的东西。我觉得王先生和我祖父的心是相通的。王先生还跟我说如果老人能到北京看看该有多好。

王先生和锦绣结婚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这个时候，国内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那个时候王先生便决定撰写《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好像当时他还致力于唐代西北军事的研究。记得王先生写完《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之后，曾分给我一个章节输入电脑。记得那一段是关于宋贤史学长编考异之学的介绍，据王先生讲这是陈寅恪先生史学的渊源。那本书出版之后，王先生在书的《后记》中特意感谢我帮他打字，还特意送给我一册样书。我带着这本书来到美国。尽管我对王先生的学问没有太多了解，可是书末附的那一篇《种花留与后来人》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是一篇多棒的散文。凭王先生的阅历和水平，他可以写出几百篇、上千篇这样隽永的文章，获得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头衔，可是他没有那样做。最近在网上看《王永兴说隋唐》，似乎书中还以学术论文为主，很可惜王先生甚至连一份自述也没有留下。

96 年夏，王先生分到一套燕北园的住房。在他搬家时，我和我的同学刘载维帮他搬家。除了许多书之外，王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家具。即便如此，他还告诉我五十年代初他的书是现在的好多倍。看到书架上的几个大部头，我好奇地问王先生《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是什么样的书，王先生总是极其认真地以最简洁、最准确的几句话告诉我这些书讲的

是什么。我随手翻翻一本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图册，又问先生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文物，他告诉我这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珍贵的史料。据说王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上很有成就，曾挖掘这些史料多年，是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大专家。

在锦绣的关心和照料下，王先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精神好极了。他曾多次告诉我他一定要活到一百岁，要和锦绣一起度过晚年最美好的时光。96年春天的一天我到王先生家，他和锦绣兴致勃勃地要留我吃午饭，并说要请我品尝锦绣的拿手菜“二月兰汤”。快到中午的时候，锦绣便开始在厨房准备午饭，我则和王先生一起去蔚秀园的一片空地上采摘北大校园春天到处都是的二月兰。午饭时锦绣给我们每一个人盛上一碗二月兰汤，鲜绿的菜叶，淡蓝的小花，一股淡淡的清香，不愧是北大才女的拿手菜。王先生和锦绣在一起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而富有诗意。



李平卫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1996年

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找到一份工作。生物物理所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单位，至少我可以继续我刚刚开始的结构生物学的研究。王先生得知我要去生物物理所工作十分高兴，我至少比锦绣幸运很多。王先生告诉我他的儿子有一辆小卡车，可以送我去生物物理所。在我搬家的那天，王先生的儿子开车将我在北大积攒了七年的一大木箱书和其他行李送到了生物物理所的公寓。说实在的，我那么一点行李，自己蹬辆三轮搬过去也费不了太大劲。王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就是如此细致、周到。我在生物物理所工作期间，一有空便回北大看看，同时也顺路去燕北园看看王先生。每次到王先生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留我聊上老半天。他非常关心我在新单位的生活和研究情况。每一次，他都会留我和他们

一起吃顿饭。那时王先生的身体还很硬朗，有一次他还带我去大有庄的市场上买菜，然后大家一起做午饭，记得回家的路上他还饶有兴趣地给我讲燕北园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骚子营”。

九十年代是结构生物学飞速发展的年代，尽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可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水平和国际一流实验室还有很大差距。在生物物理所工作一年之后，我决定到国外去做博士后。王先生在我读博士期间就很有远见地鼓励我去国外一流的实验室深造。97年下半年，我收到美国几家大学和研究所的邀请，决定去西雅图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做博士后，这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研究所，现在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其工作条件非常优越，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上好选择。我选择了刚刚从哈佛毕业不久的 Roland Strong 教授从事结构免疫学研究。王先生得知我即将赴美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再三鼓励我应该有志做出最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为国人争光。当时我刚刚工作一年，生物物理所要我交 3000 元的违约金，我手头上剩下的钱连买一张机票都不够。说实在的，我没有考虑向王先生伸出求援之手，因为我知道王先生刚刚买了燕北园的房子，手头肯定不怎么宽裕。当我赴美前夕又一次拜访王先生时，王先生问我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并告诉我他和锦绣为我准备了 6000 元人民币，以备我出国所需。手中捧着那装着 6000 元现金的沉甸甸的大信封，我感慨万千。尽管王先生手头并不宽裕，可是为送我赴美，他竟如此慷慨解囊相助。在我留美几年之后手头有了一些积蓄的时候，我几次跟王先生说应该奉还他们的这笔资助，可是先生总说不必再提此事。一直到 2004 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时，我才得以说服锦绣并奉还了这笔资助。



魏西玲、李锦绣、王永兴、李平卫在王珠眉寓所，1997年

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王先生和锦绣在王先生的女儿珠眉家设宴为我送行。大家一起拍了很多张照片，席间王先生反复叮咛我出国应该注意身体，注意安全，搞好研究。实在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送别竟成了我与先生永久的分别。我在美国拼搏了十一年，一直没有机会抽时间回国看看先生，没能回到我那年迈的祖父身边。有时我常常想这一切是否值得，我似乎听到了祖父临终前的呼唤：“回来吧，孩子，不顶啥，不要老是心气那么高。”

我来美国后，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科研工作上，要在美国生存，搞好研究工作对于我是唯一的选择。很幸运我们实验室的另一位博士后做了许多前期工作，我的第一个科研课题在短短半年之间就有所突破，我用多对同晶置换法测定了一个新的 MHC 同源蛋白 MICA 的晶体结构，我的美国导师对我刮目相看，对我的工作能力充满了信心。很快这项研究成果就发表在免疫学的权威杂志《免疫 (Immunity)》上，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复被人引用上百次。在文章发表之后，我便给王先生寄去了一份抽印本，并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王先生对我很快取得科研成果感到十分高兴，他还告诉我尽管我的论文他不见得看得懂，可是这是我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同时他还鼓励我要继续努力，做出更高水平的科研工作，并殷殷叮嘱我注意身体健康，多抽时间锻炼身体。

在美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每次有论文发表，我都递一份给王先生，有时甚至迫不及待地亲手稿寄他一份。每次有重要论文发表，我都打电话给王先生，和他分享成功的快乐，并一次又一次得到先生亲切的关怀和支持。可是就是在我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时，王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在论文的致谢栏里，我写下了：“谨以此纪念一位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中国中古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先生。”如果先生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为我独立工作的成果感到更加高兴。现在我自己觉得先生真的走了，我自己也该开始独立工作了。很凑巧有一次和锦绣通电话，她说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千禧年初，我的大女儿在西雅图出生，眼看着这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我兴奋地流出了热泪。她是我生命的继续，长得又很像我自己。在孩子出生前我便给先生去信，请他和锦绣为孩子取一个中文名字。不久便收到了锦绣的复信，说先生给孩子取名渭瑶。王先生给我解释说：渭代表渭水，因为我家乡陕西蓝田地处关中平原的渭水之滨；瑶是美玉也是仙境，因为我的故乡是出美玉的地方，终南山有多处洞天福地，是出神仙的地方。他还给我讲了韩湘子蓝桥成仙的故事。王先生还特意叮咛我，等孩子长大后要告诉她，她是中华民族的后代，要教孩子说汉语，写汉字。今天渭瑶已经九岁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写一手漂亮的花体英文，可是汉语说得越来越少，更不用说读书了。我自己感到很无奈，她很自然地选择了入乡随俗。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她一定能够寻找自己的根并为之自豪。

2004 年下半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已做了近两年博士后，这时，我的导师帕米拉·比约克曼 (Pamela Bjorkman) 博士鼓励我申请美国教职。她当时收到了许多学校请求推荐人选的来信。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几家招聘单位寄去了申请材料。2005 年初，我收到了德州 A & M 大学、南加州大学、圣母大学和威斯康星医学院面试的邀

请。面试之后，我得到德州 A & M 大学和圣母大学伸出的橄榄枝，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教师队伍。对于每一个在美国留学并有志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来说，获得大学的教职意味着你将结束漫长的训练，成为一名独立的科研工作者。这对于我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从国内获得博士学位，仅凭几年博士后训练要和美国一流名校毕业并完成博士后训练的人竞争，的确很不容易。我庆幸自己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从事独立的科研工作。在我收到德州 A & M 大学的正式邀请信后，我立即给王先生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王先生当然十分高兴，但是我又觉得王先生对此并不象我自己那样欣喜若狂。他似乎想到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他告诉我在美国任教职肯定会遇到许多挑战，如何上好课？怎样搞好研究？怎样带学生？等等。当我在这个位置上挣扎了三年之后，今天我意识到王先生竟是那么有远见。当许多年轻人能够为出国，在美国获得教职而欣喜若狂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仅仅是一个新的开端而已，每向前一步都意味着新的挑战。

2008 年 6 月 16 日是王先生 95 岁生日，在电脑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我通过电脑从北京的安妮花店选购了一束鲜花，请他们在王先生生日那天送到先生家。那天我还打电话祝王先生生日快乐。王先生不愧是老一辈人，在我们畅谈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花店送花的事，而是十分含蓄地说看到那张署名“平卫与家人同贺”的贺卡他十分高兴。倒是锦绣快人快语，告诉我说花收到了，先生十分高兴。也就是在这次通话中，王先生一次又一次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再见上一面。同时他还给我讲了 1948 年他与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分别的情形。听了王先生的话，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向我暗示什么。在我工作之后的三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在为争取美国政府的科研资助而努力，每次先生询问什么时候回国时，我总是说等拿到经费之后一定抽时间回去看看。6 月 16 日那天通话时，我觉得王先生思路清晰，六十年前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讲得那么生动，我并没有为先生的身体而担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和王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三个月之后，我突然收到锦绣发来的电子邮件，说王先生已于 9 月 15 日辞世。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十分难过，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心的朋友，一位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的尊长。

在和王先生交往的十多年中，我对王先生的学问人品颇有感受。王先生是一位非常纯朴、善良、正直的老人，我总觉得先生既是一位老师又是一位亲人。他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是超过我任何一位亲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王先生总是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在北京的九年中，我随时可以去先生家，连打个电话的预先告诉他都没有必要，就象回我自己的家一样。每到先生家，他总是留我聊上老半天。在先生辞世之后，一次和锦绣通电话，我不解地问她王先生为什么连一点大学者的架子都没有，锦绣告诉我王先生出身东北农家，放猪放牛长大，哪里去学得文人的架子。

对于王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我所知甚少，从别人那儿我了解到王先生在唐勾检制和敦煌学研究上很有成就。在我和王先生交往的十多年中，我从来没有听先生给我介绍过他在史学研究上的成就。我深知王先生是一位非常谦虚的老人，做学问就是做学问，根本不应该作为

吹嘘的资本。王先生多次给我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的含义。我知道他对目前浮夸的学风很有意见，他自己一生读书不肯为人忙，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在他老人家八十岁之后，他还完成了《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唐代前期军事史》、《唐代后期军事史》几部专著。记得有一次给先生打电话，我问他正在读什么书，他说正在读《孙子兵法》。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读这部书，他告诉我要研究唐代军事史，不懂得《孙子兵法》是不行的。在我 98 年离开北京时，王先生写字手就抖得厉害，我很难想象先生是怎样在九十高龄完成唐代军事史两部专著的。王先生在治学上是我所认识的最为勤奋和严谨的人。

王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前言中写道：

吾华夏民族之优良传统：治学与为人不可分。寅恪先生读书为己，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立身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本；待人接物，以诚不以谋；不为权势而屈己志，不图名利以污己身；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其授业教诲后生，为广华夏民族之优良传统，亦为华夏民族之光辉未来，以身以言，示范作则，期诸百世也。

这是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学问人品的概括，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概括。这也是王先生对后学的期望。

和王先生相交十多年，我是蒙受先生关怀和爱护最多的后学之一。王先生待人至真至诚，他是一位最好的老师和朋友，能和王先生相识，我感到十分幸运，我理解为什么有人在纪念王先生的留言中写下了“不可能再有了！”这样发自肺腑的感慨。如今，在我自己刚刚开始从事独立科研工作的时候，先生静静地离开了。我深知只有做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才是对先生最好的慰藉。愿先生在天之灵永享安宁。

2009 年于美国德州大学城

敬怀王永兴教授

任士英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永兴先生在去年（2008年）9月15日仙逝。9月22日，我到八宝山送别了这位95岁的老人。同时，我还应命替因为赴美交流不能亲来送别的刘后滨兄在留言簿上签上了名字，算是表达后学晚辈对逝者的一份哀思。

一 一次难忘的拜会

其实，我和王先生并不相熟。

我以为，我们这一代后学者——除了他的门生弟子辈，对于王永兴教授的了解大概更多的是借助于他的论著。不过，我倒是有幸过府拜谒过王先生的。在他居住过的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到临近北五环的燕北园，我都曾来过。在我有限的几次私谒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在首都师大读书的时候。时奉宁可师之命，到王先生居住的燕北园送刚刚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次作陪的就是刘后滨兄——后滨要我代他在送别王先生的时候签名，应该会想到过这次的拜见。

此番过府拜谒之所以印象深刻，乃是因为这次是真正的为了拜见王先生而来。我的理解之中，这也正是宁可师命我送书的深意。当时，我也奉宁可师之命到未名湖畔给周一良先生送了《敦煌学大辞典》，同样是刘后滨兄陪伴。说实话，书完全是可以代转的，但是宁师嘱咐一定要送到府上，就是给我一个可以拜见先生的借口。而我在先前到蔚秀园见到王先生，其实是因为李锦绣先生要送我她出版的三巨册的《唐代财政史稿（上卷）》，那是1996年4月。我之所以能够结识包括李锦绣先生在内的中科院历史所隋唐史研究室诸位高朋师友，是因为我在1993年在历史所随张泽咸老师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我的印象中，这次见到王先生，他的神情、气色和身体都很好。因为，我听到说，到楼下取牛奶这样的事情，王先生是很主动的。李锦绣先生迎我们进门的时候，王先生正坐着在茶几上“数大米”，用他的解释是挑沙子。很少的一小堆米摊在茶几上，被王先生仔细地收拢到小碗里。由于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挑米的方式，所以留下深刻印象。也许是因为是专程给王先生送书，所以他和我们讲话的兴致很高。他说的最多的是敦煌学、是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品德和学术成就。王先生对学术发表评论，间或涉及人物之臧否。他说，中国文化最值得发扬光大的不仅仅是“自强不息”，更是“厚德载物”。王先生说，如果说仅仅有“自强不息”，那么希特勒也是自强不息的，法西斯可取吗？他说，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真是高明之至。他说，一个人不仅要自强不息，要奋斗，更要有宽容之心、旷达之心。那天，我和刘后滨兄很认真地听着，一旁作陪的李锦绣先生也几乎很少插话。听

到精彩处，大家偶尔相视，会意地微笑。

也许是言传者与倾听者都太过专注，以至于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至今难忘。那天，王先生家中突然传出一股东西烧焦的糊味。原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王先生自己用家里烧水的铝壶煮起了鸡蛋。因为忘记了关火，水壶被烧干，鸡蛋壳烧糊了。幸亏没有发生意外，水壶也没有烧穿。我们连连告罪，我突然记起曾经在老友丁鼎先生家里海聊，害得他把一锅红烧茄子烧糊的事情，就讲起了此事自嘲，同时表达我们的歉意。也正是这样的场景，我对于王先生言状之“厚德载物”历久难忘。

二 至今的懊悔

王先生对学术的执着与后学的奖掖是有口皆碑的。我听说王先生一直到离退前都坚持为本科生上课，此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后来我们因为经历了教育部对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估，其中教授每年要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是一项重要指标，我们知道此事之不易。所以，我理解他何以能赢得学生的爱戴了。

到了世纪之交，我因为策划一套《名师讲义》大型系列学术丛书，陆陆续续又和王先生有过接触，但主要是通过电话与书信了。其实，很多的时候，电话都是李锦绣先生接听的。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受到王先生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更体会到他对于后学的支持与鼓励。王先生在经过较长时间思考以后，答应以《唐代土地制度》为题支持我的策划。王先生于2000年9月14日亲笔签写了自己的名字与名章，将合同寄下。要知道，北京的九月仍然暑气逼人啊！当时，我很是激动。但是，由于出版社调整出版计划，对于《名师讲义》系列丛书的规模大大压缩，王先生的著述计划没有实现。同时搁浅的还有西南师范大学刘又辛教授于2000年8月30日签署的《论语分题新解》。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特别是对于先生的支持，我实在是无法交代。出版社退回的留有先生签名署印的合同书，我至今依旧珍存。后来，我只是通过李锦绣先生做过解释，她转述的王先生的宽大与包容令人动容。但是，我试图当面向王先生做个解释，终于因为无法直面对而没有能够找到机会。再见到他时，竟然是在八宝山了。我明白对于这件事，王先生大概早已忘怀了，但我一直是因为没有能够促成王先生讲义的出版而懊悔不已的。然而，王先生却走了。

三 先生的永恒

王先生与世长辞，留给后学的无尽怀念是永恒的。即使时光会流失，但对于王先生，他的身上有几样内容将是永恒的。

第一，他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王先生95年人生旅程，他这辈学人，经历过天翻地覆慨而慷，经历过人妖颠倒是非淆，经受过起伏跌宕，遭受过惊心动魄。然而，王

先生终以北京大学教授，对于一生问学，求索新知的人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幸事。

第二，他是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王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旨趣，无不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他不仅以《陈门问学丛稿》命名自己的论集，而且撰写《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阐幽发微，弘扬义宁之师法，庶几合乎横渠之“为往圣继绝学”雅训。

第三，他是一位拥有崇高爱国情怀的学者。这不仅是着眼于他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而是他对出自陈寅恪先生之口的“敦煌学”之研究、之成就、之认识、之信念、之贡献而言。我曾听他亲口讲过，自己身处逆境、手指遭人夹折而痴心不改。20世纪敦煌学发展中曾经承载的学术研究以外的内容，在王先生身上有着鲜明的显示。他对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而发出的“不雪耻自强，何以为人”的豪言，常常成为被人称引的夫子自道。

第四，他是李锦绣先生的夫君。他们年齿相差遥遥，但是王先生晚年得到李锦绣先生的爱情，自然是有他的魅力。然而，李锦绣先生能够抗衡风刀利言严相逼，能够顶住世俗压力，为自己赢得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姻。我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的心境是安逸的。就从王先生晚年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来看，再看李锦绣先生同时取得的巨大学术成绩，不就可以说明这一切吗？在八宝山送别王先生时，凡读到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感心动耳的挽辞者，谁人还会无动于衷？我相信，王先生人生之旅的最后路程，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是李锦绣先生的夫君。

在得到王先生逝世的讣告后，我立即写了一副挽联。联曰：

日远永追，义宁传家今独伤。

夜长兴阑，德厚遗泽更断肠。

——以此联敬挽王永兴先生并致锦绣先生节哀

这副挽联当时没有发出，而是在八宝山送别之后，用电子邮件抄送了李锦绣先生，也同时（或者用了短信）发送了几位朋友。

挽联其实对于逝者已经不甚相干，但多是为了安慰生者，寄寓情怀。当时没有发给王先生治丧委员会而是事后抄给李锦绣先生，也是这个意思。

我内心感念王先生的门生故吏为他所做的这些，也感谢吴丽娱先生、宁欣先生给我这样一个表达的机会。

深悼逝者，祝福生者！

2009年5月7日凌晨任士英记于木樨地南里之德风堂

跟随王先生念书

邓小南

2008年秋，我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9月里的一个晚上，突然得知王永兴先生去世的消息。当天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当年王先生教我们“念书”的片段场景，一幕幕回放在眼前。

30年前，我从生活9年的北大荒回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所在的中国史78级，是日后颇为老师们称道的一个班；但当我们入学之际，至少我本人，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上到二年级，刚调入北大不久的王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合作讲授敦煌学研究课程，我们有些低年级的本科生也跟着研究生们去上。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先生们手把手教我们“念书”的过程。

先生们课堂上讲授的研究背景，提到的语汇、书名、人名、地名，对我们来说都十分陌生。为了便于指导，弥补我们的“先天”不足，王先生要求我们把课堂笔记交上去，逐一批改纠正，有时还会找学生去面谈。大到研究脉络，小到笔记字迹，先生都亲自过问指点。在这种严肃学术精神的感召下，学生们也协同尽力。记得有一次去先生宿舍的路上，为了先校正自己的错字，有同学边商议边俯身在路灯下修改。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健斋王先生的宿舍里，听先生讲学问、谈人生，看先生批改我们的习作。那时已近30岁的我，真有重做小学生的感觉，也深切体悟到什么是学术道路，感受到内心中强烈涌动的“再生”之情。

当时我们在先生的指示下，编为不同的学习小组，有时利用晚上的时间集体阅读讨论。读到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我们几个同学左右查考，反复讨论。天色已经很黑了，王先生来到21楼我们的宿舍，听罢大家的发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淡淡笑容。后来班里的男生曾经说，有次天下大雪，王先生顶着满身雪花，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参加了他们在宿舍中的讨论。

王先生对于国家、民族，对于学术事业的责任感，给学生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心中，一直有寅恪先生的精神风范，有振兴华夏文化的期盼；他说过在山西几乎走上绝路的苦痛，他挣扎下来是为了未竟的义务。为建设中国的敦煌学，先生研究不辍、诲人不倦，竭尽全力；为成立北大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建立学术研究的基地，先生以古稀之年上下奔波。在讲台上，先生总是从为人讲到治学；在课堂外，先生也引导我们学习阅读。念书时，一个个术语、一段段文章，如何理解到位，字斟句酌，从不含混。为培养学术队伍、播布学术种籽，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正是在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们这些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当年的课堂上，也走出了一批今日唐史学界、敦煌学界的学术中坚。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没有当年的王先生，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我的第一本小书《宋

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出版时，先父邓广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真肯使用四把钥匙治学的青年学子当中，邓小南竟也是厕身其中的一人。照实说，她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陈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王永兴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这一治学途径的。王永兴教授所开课程是隋唐五代史，隋唐的职官制度、隋唐职官制度中的铨选制度，属于王教授的重点讲授内容之一，使听课者均深受其益，而小南则又把她所传承于王先生者推衍到宋代职官制度和铨选制度的研究，终日甘居于寂寞之滨，孜孜矻矻地乐此不疲。

书出版后，我捧给王先生，先生读到这段文字，感到兴奋而宽慰。先父勉励我“甘居于寂寞之滨，孜孜矻矻地乐此不疲”，这种精神，也是从许许多多前辈学身上传承而来。



王永兴、张广达与1978级部分学生，1981年。前排左起庞永成，荣、王先生、张广达、马小红、卢向前；后排左起冷鹏飞、金锋、薛永洪、蔡治淮、邓小南、王亚勇、李明德

对于我，王先生是有所偏爱的。每当想起这一切，心情就很难平静下来。我感觉到这偏爱，主要不是在30年前的课堂上，而是当我毕业之后。自从先生搬出朗润园，平日里很少见面，相互间似乎离得远了。但在晚年的先生心中，却从未忘记我这个学生。偶尔在校园中遇到先生，我总是陪伴走上一程；若逢先生离校，就送出西门去帮忙打车。先生每次见到我，总会握着我的手，谆谆询问的也总是同一句话：“小南啊，最近在念什么书？”许多时候，我竟一时语塞。自己经常忙于杂冗之事，难得专心念书，面对这般切的期望与关心，真觉得愧对先生。

先生对我们这些后辈的情感，体现于时时处处。数年前我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为先生做九十寿，我们在门口迎候，搀扶先生走进院落。那时先生已经认不出我，但在他的发言中，却数次提到“小南”。今年初春我从台湾回来，锦绣告诉我说，王先生去世前，一直挂念着我，在病榻上还反复念叨“小南”。话音未落，我已经满脸是泪。我知道，我们这些学生牵动着王先生初到北大时期的深切记忆，也联系着他对于学术事业薪火相传的期待。

跟随王先生念书的日子，是我们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也是人生中充实美好的时光。逝去的光阴不会再来，但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志在学术的追求，将永远深藏在我们心中。

感忆王永兴先生

王小甫

王永兴先生去世以后，寓居海外的张广达老师在第一时间发来信电，电信原文如下：

发件人 zhangguangda <gzhang17@hotmail.com>

发送至 xiaofuw@gmail.com

日期 2008 年 9 月 17 日 下午 3:13

主题 condolences on Prof. Wang's pass-away

小甫，你好！

从《往复》网上看到王永兴先生过世的信息。先生是我系寿星，而今仙逝。先生一辈子也是坎坎坷坷，想来令人伤感。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你代我向系里有关方面表示我的哀悼之意吧。

广达

我接信后立即转发给北大历史系主任牛大勇，牛主任迅即把此信贴到了系网站首页上。我在这里之所以提起张老师的这份唁电，是因为回忆起王先生，我的主要感想也是：可谓一世坎坷，鞠躬尽瘁！我虽然不是王先生的入门弟子，但我自 1978 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有不少机会接触、了解王先生，后来读研究生还正式选修过先生开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耳闻目睹和印象较深的感想写出来，以表达对王先生的哀思。个人记忆或有偏差，还请识者有以教正。

一 杂忆

我记得王先生上课多半会在课前讲一些文化传统，我对先生自身经历的一些了解，多半也是在这时候听说的。记得有一次先生讲到他因何成为陈寅恪先生弟子的时候提到，自己老家在东北。“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王先生不甘被日寇奴役，逃到北平成了流亡学生，就像当年那首著名歌曲《松花江上》写的那样。王先生到北平考进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因为到历史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程而为陈先生的学识所折服，于是转到历史系师从陈先生治国史。

王先生问学陈门，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就在隋唐史和敦煌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他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做学术研究的条件，下放到偏僻的地方教书，“文革”

发生后，又被赶到农村去教小学。我记得听王先生在课堂上讲，当时悲愤绝望的他甚至连跳崖去死的想法都有了，可又想到自己死了这帮农村孩子就没人教了，才又转身回来。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王先生去县文化馆，看见屋角里堆了一套《册府元龟》，就小心翼翼地问管理员能不能借回去看。大概管理人员也不懂《册府元龟》是什么书，竟然同意让王先生借走了。于是，王先生得以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对《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做本校工作（即利用类书各部、门间的重复文字进行互校），从而保持并锻炼了学术功力。

“文革”结束后开始改革开放，邓广铭先生当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就把王永兴先生调回北大历史系任教。我的印象王先生调来主要是招收研究生，最初的几届隋唐史研究生都是王先生和张广达老师合招的。我们班是改革开放以后北大历史系第一届全国统招中国史专业本科生，同学们追求专业学术如饥似渴，记得当时王先生开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我班半数以上的同学都去选修，包括一些后来毕业论文做近现代史选题的同学，甚至世界史专业的同学也有选修或听课的。王先生秉承北大历史系的学术训练传统，要求大家读《资治通鉴》作为专业知识基础。他不仅在课上号召、布置，有时候还到学生宿舍检查督促。当时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学校里正兴起跳交谊舞，同学们到周末也有放下书本去跳舞的。听说有一次王先生到学生宿舍督促学习时正赶上周末，发现有些同学不在宿舍读《通鉴》却跳舞去了，先生深为其宝贵时光白白流逝而惋惜。

王先生做学问特别强调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读书先从识字始”。好像是1981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傍晚，我跟着同学们去给王先生拜年。那时候王先生住在未名湖边健斋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记得开门进去的时候，王先生正坐在写字台前透过手持带灯的放大镜凝视着面前的一张敦煌文书照片。同学门进去坐下以后，王先生和大家谈起了自己研究敦煌文书的方法和经验。我记得当时王先生告诫研究文书的同学们不要性急，辨识文字不要贪多，“一晚上只读五个字！”我后来琢磨理解，就敦煌学研究的文献整理工作来说，王先生这就是提出对同学们的高标准、严要求啊！试想，字形不辨，字义不识，专业语词不通，何谈对文书史料价值的认识和利用？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听说后来有一次王先生在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出名词解释题的时候，十个名词考的全是古代的字书和韵书。

1984年我从新疆考回母校读研究生，正式选修了王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王先生说他这门课是一门实践课，就是先由他讲几节课，介绍作为史料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概况，讲解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课程的要求，然后给每位选课同学布置一份敦煌出土文书，要大家用剩下的课程时间作文献整理和相关研究练习，期末就用练习结果考绩。我记得就是在这个课堂上王先生提到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要同学们发愤努力。王先生当时讲话的情绪，让人感到犹如读陈寅恪1929年撰《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王先生为我选的敦煌文书是一份后唐时期“沙州净土寺入破历”，我的印象这份文书特别长，光录文好几百行就抄了一厚叠纸。尽管我自己在王先生这门课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成果，

但是，通过对出土文书的录文、认读、释词等工作，不仅接触了原始史料，而且实习了古典文献整理的工作程序，受到了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基本技能训练。这些训练作为中国古代史专业“三基”传统之一现在仍为北大历史系所继承发扬。

二 感想

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亲炙弟子，在隋唐史和敦煌学方面多有建树，为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历来是我国敦煌学重镇之一，然而，由于发生“文革”，北大的敦煌学研究一度中断。“文革”后王永兴先生调到北大，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北大的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我记得王先生特别在图书馆二楼申请了一个研究室，专门用作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那个研究室里调集了学校图书馆的相关专业图书和资料，以便进行有关学习和研究。当时敦煌文书大多都是缩微胶卷形式，阅读起来很不方便。这个研究室冲洗了一套敦煌文书照片，尺寸比缩微大多了，便利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当然，王先生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功绩还是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我听业内的一个专家说，迄今在北京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中年学者，半数以上都接受过王永兴先生的培养。从我个人的接触了解来看，此语似应无大差池。

王先生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建立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邓广铭先生倡议建立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创造前中研院史语所那样的研究条件和学术氛围，尽快弥补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学术断层。然而北大却很难为这样一个古代史研究中心提供必需的学术研究空间条件和人员编制。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王永兴先生挺身而出，在他的老同学姚依林来北大看望他时，把中心所面临的困难提了出来。姚依林当时已经是国家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听了王先生的陈述，就让王先生把有关问题写成报告直接呈他批示。据知，由姚依林亲自批准的建筑面积、经费和人员编制，就成了中古史中心得以在北大校园内建设起来的行政依据。

王永兴先生在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学术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学识浅陋如我者不可能对此作出什么评价。记得有一次我向本系吴宗国先生请教唐代的色役问题，吴先生对我说：国内有价值的相关成果主要是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以及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的《唐代色役管见》。众所周知，王先生的前一篇文章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此外，我认为王先生的《唐勾检制研究》也是具有同样学术价值的一项创新性学术成果。我看到郝春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说：“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相关系列论文，依据史籍中有关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记载，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勾官进行勾检的实际记录，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显然，正因为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耕耘不已，才能取

得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

王先生以前住在校内和蔚秀园时，有时还能在路上遇见他，聊上几句。后来他搬到燕北园住，就很少见到他了。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北大历史系和中古中心为他举行祝贺九十寿辰座谈会，当时见到先生还显得很硬朗，耳聪目明，应对敏捷。座谈会后站在会议室门外和先生握别，他还叮嘱我要注意劳逸结合。谁曾想这一握别竟成永别！如今只能以这些拉杂的回忆感想来纪念逝者，同时也是对自己的鞭策。王永兴先生，安息吧！

2009年2月8日星期日写于北大畅春园寓所

怀念王永兴先生

阎步克

2008年9月15日，王永兴先生在北京辞世。又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宿儒，告别了莘莘学子，这是令我们怅惘悲痛的。王先生享年九十五岁，可称高寿；他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学术遗产，如《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等。“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不是所有人的有限一生，都能如此的。

我初次见到王永兴先生，是在大学本科之时。1978年11月，王先生从山西调到了北大历史系。其时已60多岁了，但对教学工作依然勤奋认真，对学生的学习与培养非常投入。记得有一次，王先生忽然走进了我们在38楼的寝室。正在宿舍中闲聊的我们，当时感到很意外。王先生询问了我们上课与读书的情况，记得自己很拘谨，答得含糊。王先生是辽宁昌图人，说话带有东北口音，把读书习惯地说成“念书”，而我也是从辽宁来的，我的父辈也是那么说话的，把“读书”说成“念书”。加上王先生作为前辈学者的诚挚殷切，还是让自己有了亲切温暖之感。

那会儿自己刚从社会进入大学不久，庶事陌生，除了听课，跟教授们很少接触。王先生来宿舍，更多的是感觉意外。而今回想起来，王先生屡次来学生宿舍，鼓励指导学生学习，就感叹不已了。因为自己后来也做了老师，可直到现在，也没能做到这样一点，没专门去学生宿舍考察学习，督促读书。很多人都听到过王先生引述陈寅恪先生的话，“学校给我薪水，我怎么能不努力上课教书。”在后来跟王先生的交谈中，我也听到王先生说过这事。他以陈寅恪为榜样，在教书育人上，不吝精力心血，堪称师表。北大历史系的《王永兴教授讣告》中有这样的叙述：“王永兴教授回到教学研究岗位后，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认真准备每一门课，讲授详尽深透，高屋建瓴。而且在课堂以外，对每一个选修其课程的学生，都进行个别辅导，耳提面命，诲人不倦。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言传身教，王先生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他们现在大多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薪尽火传，桃李遍天下。”这一段评价，没有夸饰成份，不是套话，皆为实录。

当时王先生对我们的鼓励，一个是要好好念陈寅恪先生的书，一个是要关注敦煌学，研究敦煌文书。很惭愧，因小学五年级就遭遇了“文革”，因而多年辍学的自己，当时非常浅陋，在初读大学历史系之时，居然不了解陈寅恪是什么人。当然，随后逐渐知道了陈寅恪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大师，而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王先生1934年考入了清华大学，有幸亲炙陈寅恪先生，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学，后来曾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三年。王先生要我们念的陈寅恪的书，当时找来翻了翻，觉得异常冷僻。是后来到了研究生的阶段，才去认真读的。

王永兴先生殷殷期望学生能献身敦煌学研究，他表达了一个愿望：决不能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继续下去了。王先生要我们研读敦煌文书的期望，自己也未能承命。因为当年的自己散漫懒惰，害怕辛苦，觉得敦煌文书像天书，望而生畏，没加入其中，错过了难得的学习机会。现在从学术训练的角度回想，颇觉可惜。其他很多同学随即投入其中，得到了王先生手把手的教诲，一篇一篇、一句一句甚至一字一字地讲解，受到了良好的训练。邓广铭先生在给当年的同班学长邓小南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照实说，她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掌握了这一治学途径的。王永兴教授所开课程是隋唐五代史，隋唐的职官制度、隋唐职官制度中的铨选制度，属于王教授的重点讲授内容之一，使听课者均深受其益。”

我选修过王永兴先生的课，是隋唐史课。在课上，王先生往往会在黑板上大段地抄写史料，然后逐段讲解。有时候，王先生还会就史料中的字词提问学生。有一次就提问到我了，问的是什么叫“缉熙”。当时我怎么答的，现在想不起来了，当然是硬着头皮答的，而且可以肯定是答错了。王先生纠正我，说“缉熙”就是“光大”的意思。那好像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一次课上被提问。这样的提问让学生感到压力，有了压力就得认真对待，按要求把该读的书读了，不懂的东西就得去查、去寻找解释。现在在课上，我偶尔也会提问学生。后来有学生告诉我，这让他们有点儿紧张，我就想起了自己当年的事情。

后来跟王先生逐渐熟悉了。在向他请教问题时，他随时引证陈寅恪先生来回答。而且一如既往地经常叮嘱我，“要好好念陈寅恪先生的书”。王永兴先生作为弟子，一生伏膺陈寅恪先生，继承其论点学说，遵循其路径方法，宣讲其学术成绩。自己刚从“文革”过来，“文革”时所受到的教育，都是鼓励青年人“造反”、“反潮流”、“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对王先生这样恪守家法、伏膺师说的执着态度，最初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以后就逐渐认识到了，博采众家是一境，自创一家是一境，恪守一家也是一境。那种看似传统的态度，也是学术传承、文化绵延的一种途径、一种方式。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学术流派，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的。

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不由得产生了若干感想，曾讲给王先生听。我觉得陈寅恪不仅仅“考证”，主要是在“论史”，即，不泥于订短考证，而是从大处着眼，由小见大，以独到的眼光，勾稽重大政治线索，发掘重大政治问题，而清人赵翼也略有此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像“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莽时起兵者多称汉后”、“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之类，往往能以其独见启迪后人。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在“论史”的风格、手法与眼光上，或者说在“问题意识”上，陈寅恪与赵翼有相承或相似之处，虽非陈先生刻意如此。但王先生并不赞成这个看法。他告诉我，陈寅恪认为清代史学很卑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王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是上承司马光的，是司马光之后的第一人。王先生举例说，王鸣盛认为王导“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但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则云：“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

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二者的高下是绝不相同的。其实王先生在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已明确提出，“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与清代史学之比较评论如此，对宋贤史学评价极高，评清代史学地位则甚卑下，则他究竟师法宋代史学还是清代史学，读者可以判明矣。”

我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王永兴先生不是我的导师，见面机会不多，但每逢见面，王先生总是给我以勉励，还要我注意身体。王先生每次见到我的妻子，也忘不了要叮嘱她，说闺步克身体单薄，要照顾好他。长者对后辈的期望与关怀，是我所难忘的。在探望王先生的时候，他总会讲起陈寅恪的故事，以及他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求学经历。我有时想，我们这一代以上的学人，与现在的青年学子很不相同。现在的青年学人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从专业上说是治历史的，可是自己没有历史。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再往上的人，却往往有自己个人的历史。不过进一步说，这几代人之间也还是有不同的。像我自己吧，就总也摆脱不了身上的那股知青味儿。估计那知青心态会伴随我一生的。而王永兴先生那一代学者，很多人在经历了颠沛流离、风云变幻之后，依然是醇正的学者气象，令人肃然起敬。

王先生后来搬到了燕北园里。小小的三居室里，用品、摆设都很朴素，甚至给人简陋之感。床头、桌边都是书，局促的空间里书籍文稿触目皆是，没有“享受生活”的物质气息，一看就是一位学者之家，念书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多余之物。不知怎么的，心里就浮出了在小学课文里读到的方志敏烈士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有一次王先生对我说：“我已经退休了，不教课了，国家还每月给我三千块钱，真的很感谢国家。”这话引发了我的纷纭感慨。

王先生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思维能力与记忆能力大大下降了，有时候会不认识来客是谁。但这时候，王先生仍然有一个癖好，一个很多人不会有的特别癖好：念《资治通鉴》。当然，他已不能像先前那样思考钻研了，那不过是他毕生生活习惯的一种自然延续而已。我看着王先生半躺在床上，手捧《资治通鉴》，很专注地念着，一页页、一行行地念下去，心神全被笼罩在书里面，显然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这时我在想，就算王先生已不能充分了解他所念的是怎么了，但他一定从中感受到了心灵的安宁，感受到了生存的意义，感受到了一位毕生以“念书”为务的学人生命的继续。当年陈寅恪先生要求他研读《资治通鉴》，他也曾为陈先生朗读《资治通鉴》；后来他指导学生念《资治通鉴》；在临终的时候，他又以念《资治通鉴》，送走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庄子》有言：“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在写完这篇短文之时，再次为王永兴先生祈祝冥福，愿先生安息。

2018年10月30日

忆王永兴先生

陈苏镇

我是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入学后不久便认识了王永兴先生。

那时，同学们读书如饥似渴，但对如何学习和研究历史大多一头雾水。一天晚上，几个同学相邀去王永兴先生家，想听他讲讲学习方法。我也跟着去了。王先生刚调来北大不久，住在一间单身宿舍中。房中陈设简单，最显眼的是一张硕大的写字台。王先生告诉我们，那是他的老师陈寅恪的写字台，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说起了陈寅恪。听得出，王先生对陈寅恪十分崇敬，每次提到他都要恭恭敬敬地称“陈寅恪陈先生”。

王先生在历史系开了几门课，都是隋唐史和敦煌文书方面的。同学们选课很踊跃，我们这个班多数同学都听过他的课。我虽然对隋唐史和敦煌文书并不很感兴趣，但也选了王先生的课，而且获益良多。

那个年代，文革刚刚结束，“臭老九”还没彻底翻身。系里的老师们，尤其是老先生，仍然心有余悸，对学生很客气，考试都很宽松，上课点名更是极少见的事。但王先生不同。他的课，人总是很多，教室中坐得满满的。但他仍然经常点名，而且态度很严肃，发现有人旷课，便很生气。我在他的课上曾两次旷课，都被他发现了。

一次是读本科时，王先生的课被排在一、二节。当时北大的作息时间和现在不同，上午第一节课七点半开始。有一天因为睡得晚，早上起不来，我和同宿舍的金锋打算旷一次课。但刚过七点半，卢向前便气喘嘘嘘地闯了近来，说王先生点名，发现我们俩不在，命他回来叫我们，还说要和其他同学一起等我们到了再开始上课。我们赶紧爬起来，没洗漱也没吃饭便赶到教室。王先生一脸严肃地站在讲台上，问我们为什么不来上课，听了我们勉强的解释后，才让我们坐下，开始讲课。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旷王先生的课了。

另一次是读研究生时。当时我已结婚，家离学校较远，骑车需一小时。一天因家中有事，没来上王先生上午三、四节的课。但中午十二点刚过，我便到了学校，准备上下午的课。我刚到宿舍，同班的宁欣便进来了，说上课铃响后，王先生向教室里扫了一眼，便问：“陈苏镇为什么没来？”然后命宁欣转告我，要我当面向他说明原因。我立刻赶往朗润园王先生的住处。王先生正在湖边散步，听了我的解释，语气马上缓和了，问我课程作业打算写什么。我当时正在考虑隋朝的散实官问题，便简单说了说我的想法。王先生很高兴，说这个问题前人没有注意，是我提出来的，很重要，值得仔细研究。王先生对隋唐官制很熟，他的话使我颇受鼓舞。这篇作业上交后，王先生给了我88分，那是全班最高分。后来经过修改补充，这篇东西以《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为题，在《北大学报》发表了。

王先生讲课和其他老师不同。他好像从来不用讲稿，每次进教室总是抱着几本书，书中插着几张小条。我印象较深的有《通典》、《唐六典》、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等。

王先生上课，通常是先打开书，往黑板上抄写史料，自右向左竖着抄，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字自然是繁体，书名、篇名、卷数等也都抄得一丝不苟，例如“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通典职官五吏部郎中员外郎”等等。有时一边抄还一边念叨，“写板书应该竖着写”，“卷数要写汉字，不能用阿拉伯数字”。我曾对白寿彝先生说起此事，他听后大笑，说陈寅恪先生当年在课堂上就是这样写板书的，有时黑板写不下，还会写在墙上。抄完史料，王先生便开始讲解。讲完之后，擦去再抄。每堂课大约都有一半时间在抄板书，王先生往黑板上抄，同学们往笔记本上抄。那感觉不像在上课，倒像在读书，而且读得从容不迫。记得本科一年级时，刘乃和先生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做学问要从容不迫”。当时觉得学习应该只争朝夕，不知如何才能从容不迫。在王先生的课上，我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读书应该沉下心来，扎扎实实，一字一句，真正读懂，而不可一目十行，浮光掠影。老一代学者的深厚功力，应该就是这样读出来的。王先生在夸奖某个学生时，常常会说他“读书很细”。如今，我也常对学生说，学历史懒不得，也急不得，要求他们读书要细。

王先生开设的敦煌文书课也很有特点。他不仅讲解敦煌文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更鼓励和带领同学们从事研究工作。这对当时的本科学生来说，很深很难，也很有吸引力。班里有不少同学跟着王先生参与了研究工作，每人选若干篇文书，先作录文，然后结合其他资料进行研究，撰写论文。这对培养同学们的研究能力，起了积极作用。王先生曾在课堂上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却在日本，这是我们的耻辱，大家要共同努力，把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夺回来。那种使命感，令人动容。类似的训练，还有校点《通典》。当时中华书局计划出版《通典》校点本。王先生承担了这一任务，并组织我们班有兴趣的同学参加。记得我们每人分到两卷，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先校勘，再标点，从而获得了一些文献学方面的知识。

上本科时，我和王先生接触比较多，遇到问题，总想和他谈谈。毕业那年，班里同学都忙着申报学位论文题目，并选择指导教师。我和阎步克当时都想做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题目，但历史系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老师。一次在王先生家，他问我毕业论文打算做什么题目，我便说了此事。王先生很热心地建议我们去找系主任邓广铭先生，让系里出面与哲学系联系，请张岱年先生来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我听了很高兴，便和步克一起去了邓先生家，但邓先生连说了两句“谈何容易”，便一口拒绝了。之后，步克转向明清史，做了一个经济史方面的题目。我向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报了《先秦两汉的“孝”》这样一个题目。由于教研室没有老师熟悉这方面的问题，指导我的任务没人愿意承担，最后便落在了教研室主任祝总斌先生的头上。这又促使我和祝先生从此结下师生之缘。

王先生是那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退休后不再任课，但仍笔耕不辍，1994年出版《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1998年出版《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2003年出版《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2006年九十二岁高龄时，又出版了《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每次得到王先生亲笔签名的赠书，我都即高兴又惭愧。那段日子，王先生很少来学校，我们和他见

面的机会少了。但每年春节团拜，他总会参加。有两次，我见他没和领导们坐一桌，便坐到他旁边，陪他说说话，顺便请教学问。不记得从哪年开始，王先生连团拜也不参加了。2003年初，我和步克夫妇一起去王先生家看望他，见他身体很好，仍很健谈，心中甚感安慰。没想到，那竟是我见王先生的最后一面。

认识王先生三十年了，与他有关的那些往事始终历历在目。我虽不是王先生的门下弟子，但他对我一直很关心，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所以，我在拙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的《后记》里，在向师友们表示感谢的文字中，特意写下了“王永兴先生的鞭策和教诲”几个字。

王先生辞世了，但永远活在我心中。

春天里的思念

马小红

北京大学七八级历史系的同学谁也不会忘记王先生。

三十年前，作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全国统考生，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一年，中国史专业共有学生四十名，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从十六岁到三十多岁不等，我有幸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是应届生，靠着“死背硬记”和“运气”闯进了最高学府，无论是书本知识还是社会阅历都无法与在工厂、农村、军队、机关等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同学相比，好在那时的人都很善意，我羡慕大哥大姐们的知识阅历，他们羡慕我的年龄，相互间的帮助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温暖。

一年后，修完了通史课程，记得系里的负责老师王春梅告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课。我当时还真不太明白自己的“情况”，只是看到大哥大姐们纷纷选“敦煌文书”课，也就比照选了一个，尽管那时我连敦煌在哪都不知道。全班二十多人选了这门课，还有其他专业的一些学长。王春梅老师说：“开这门课的老师是从山西调来的年纪近七十岁的王永兴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上课的时候不要忘了给老师带壶热水。”“欺小”是各处的通例，为王先生带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其实那也真是当年的大哥大姐们对我的厚爱。

第一堂课，班上的饱学之士听得如醉如痴，手中的笔不停地做着课堂笔记。我被王先生的开头语所震撼。王先生介绍了敦煌文书的来龙去脉，当说到“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时，王先生说“为什么要研究敦煌文书，我念一下陈寅恪先生为陈垣所写的《敦煌劫余录序》，希望大家能记住。”王先生一字一句地念着，并不时停下来讲解，为什么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为什么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等等。先生那平缓、苍老并对我们充满期望的声音重重地打在我们心上，这也是我在后来虽然听得有些晕头胀脑却一直坚持着上课的原因。王先生说：“尽管有些同学不了解敦煌，不了解敦煌文书，都不要紧。只要努力，你们就能赶上世界学术新潮流，就能把敦煌学的中心搬到中国。”

第一堂课下来，王先生的“传奇”在同学中不胫而走。王先生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与助手、因受夫人连累反右时被下放到山西、又被夫人揭发成为右派遭到迫害、离婚，独自一人，醉心学问。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科学春天”里，回到了北京大学。而王先生本人对晚年能在北京大学教书也充满了自豪，言谈话语对党、对领导和同事都充满了感激。他住在北大健斋的一间宿舍里，类似于“筒子楼”，但他却十分满足，没有丝毫的怨言。他真的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记得他在散步时只要看到有人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就会走过去，很严肃地教育人家要爱护草地。有时连陪他散步的我们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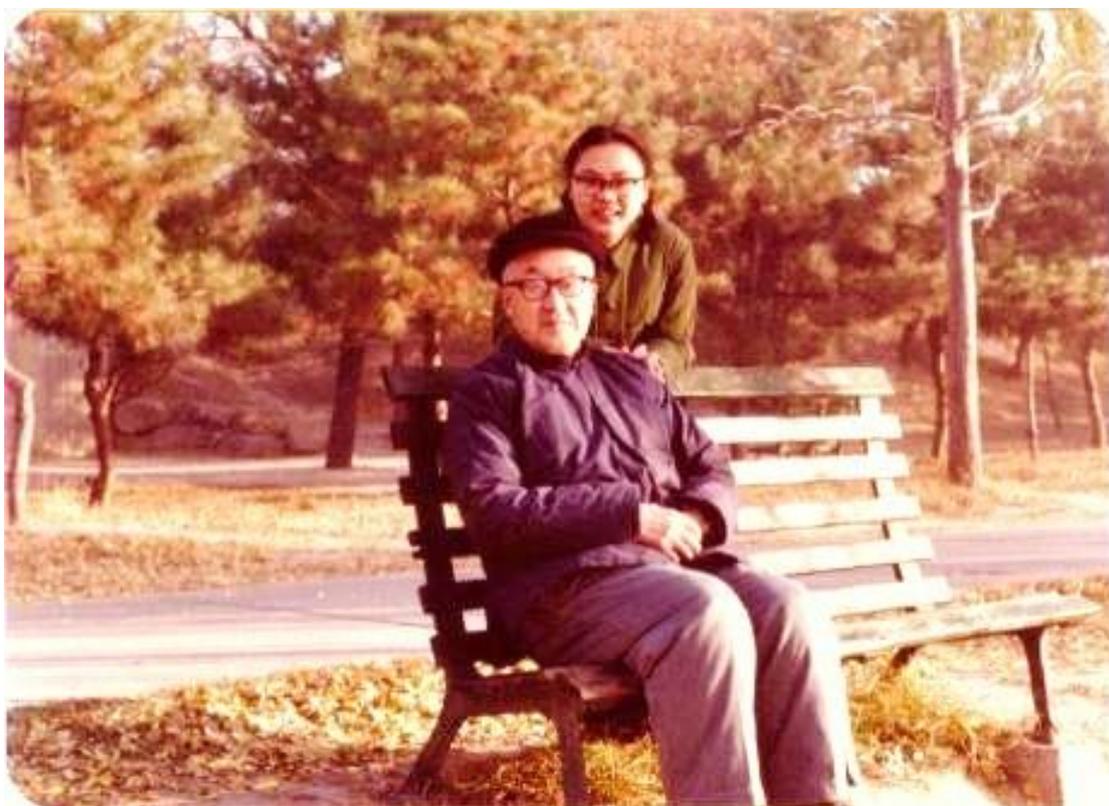
到不太好意思。他努力在图书馆要了两间房子，为的是学生有一个固定的学习地方，方便学生的课下讨论；他将自己的线装书拿出来，让我们标点，提高我们的古代汉语水平；他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分给学生，并告诉学生这个课题应该看那些资料；他每天都到图书馆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有时甚至到宿舍看看我们买了什么书……很快，王先生的周围就聚集起一帮志同道合的学生，拿现在的话来说，王先生身边有了一批“粉丝”。

在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下，在同窗友好切磋探讨中，我对历史慢慢有了感觉。我不仅自觉自愿、尽心尽责地为王先生的每一次课准备茶水（茶由大哥大姐们出），而且还增加了上课前后的接送。一次，当将王先生接到教室，倒好茶水后，猛然发现自己忘了带书包，在同学善意的笑声中我跑回了宿舍取书包。下课送王先生回健斋的路上，我有些忐忑，想解释一下自己的丢三落四。不想王先生却说：“小红，忘了带书包，固然不好。可是你没忘记带水和来接老师，这说明你是一个值得教的学生。”我很意外，因为在中小学我挨老师们的批评最多的就是“粗心”。在回宿舍取书包的路上，我一遍一遍地想起自己在中小学上课时忘了带铅笔、橡皮、课本等等的事情，想起老师们说“学生上课忘了带铅笔（或课本、橡皮之类），就如同工人做工忘了带工具，战士上战场忘了带枪。”原以为一向严格的王先生也会如此教训，但没想到先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重，反而得出了令我欣喜又疑惑的结论。由此，我感到了先生的和蔼和与众不同。

上课下课，宿舍、图书馆、健斋、食堂，在大学二年级后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在接送先生的路上，我了解了先生的心愿，知道了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原因，也听到了饱经风霜的先生对人情世故的感慨。那时，我几乎每周都要到健斋好几趟，汇报先生布置的作业（标点古汉语、背诵古文）和工作（整理敦煌文书研究目录，后来登记国家图书馆，那时称北京图书馆翻拍来的敦煌文书照片）。最令我难忘的是先生对我背诵古文的关注，每次都选好篇目，规定时间，并准时检查。有时我背得不太流畅，先生就会说“背到这种程度不行，隔一段时间就会忘了。背古文应该是十几岁时的事，你现在背已经有点晚了，一定要背熟，背流畅了，才能记得久。”在寒暑假期间，先生曾布置过我看《资治通鉴》，并要求做出读书笔记。

说到王先生的心愿，不能不说到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王先生说，遇到七八级历史系的学生，是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事情之一。他要想办法，让这些学生能留下来，作隋唐史的研究，作敦煌文书的研究，作中古史的研究。那时，正值“文革”后的恢复期，全民对被革了命的文化有着一种负罪感和崇拜心理。对学术研究的恢复，那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百废待兴”。先生决定找老同学姚依林副总理，申请设立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即“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事情开始进展得很顺利，先生说姚依林副总理接待了他，认真听了他的设想，后来又亲临健斋，为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启动批了40个编制和25万元。先生笑着说中南海的警卫让他今后穿体面一点，而先生则教育他们不可以衣帽取人。中心主任邓广铭先生曾对我们说，中心的设立王永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们不要辜负了王先生。后来事情的进展似乎就不那么顺利了。中心的编制如何用、启动经费是否到位、研究重点是什么等等，先

生似乎都有一些设想未能实现，先生在中心也从未担任过任何职位。这也许是先生的选择，因为先生说设立中心的目的就是要留下一些专心学术的学生。先生曾有些疲惫地对我说：“小红，现在办点事情很难，人际关系也很复杂。你们就安心读书，现在老师还是能处理这些事的。”先生又说：“学问是最可靠的，你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你。”从山西到北大，被学术界封闭了几十年的先生丝毫没有落伍，在先生的邀请下法国著名敦煌学者左景权来到北大讲学，日本的敦煌学名家池田温教授也来就敦煌文书中的一些问题与先生交流。先生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希望我的学生在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中能成为敦煌学的‘核心’人物。”造就一批有水平的隋唐史专家和敦煌学学者，传承学术，是先生的最大心愿。所以，有时先生对待遇和坎坷也有过怨言，但更多的时候是高兴。看见好学向上的学生先生高兴，办成了中心先生高兴，读书写作是先生能够基本保持愉快心境的最重要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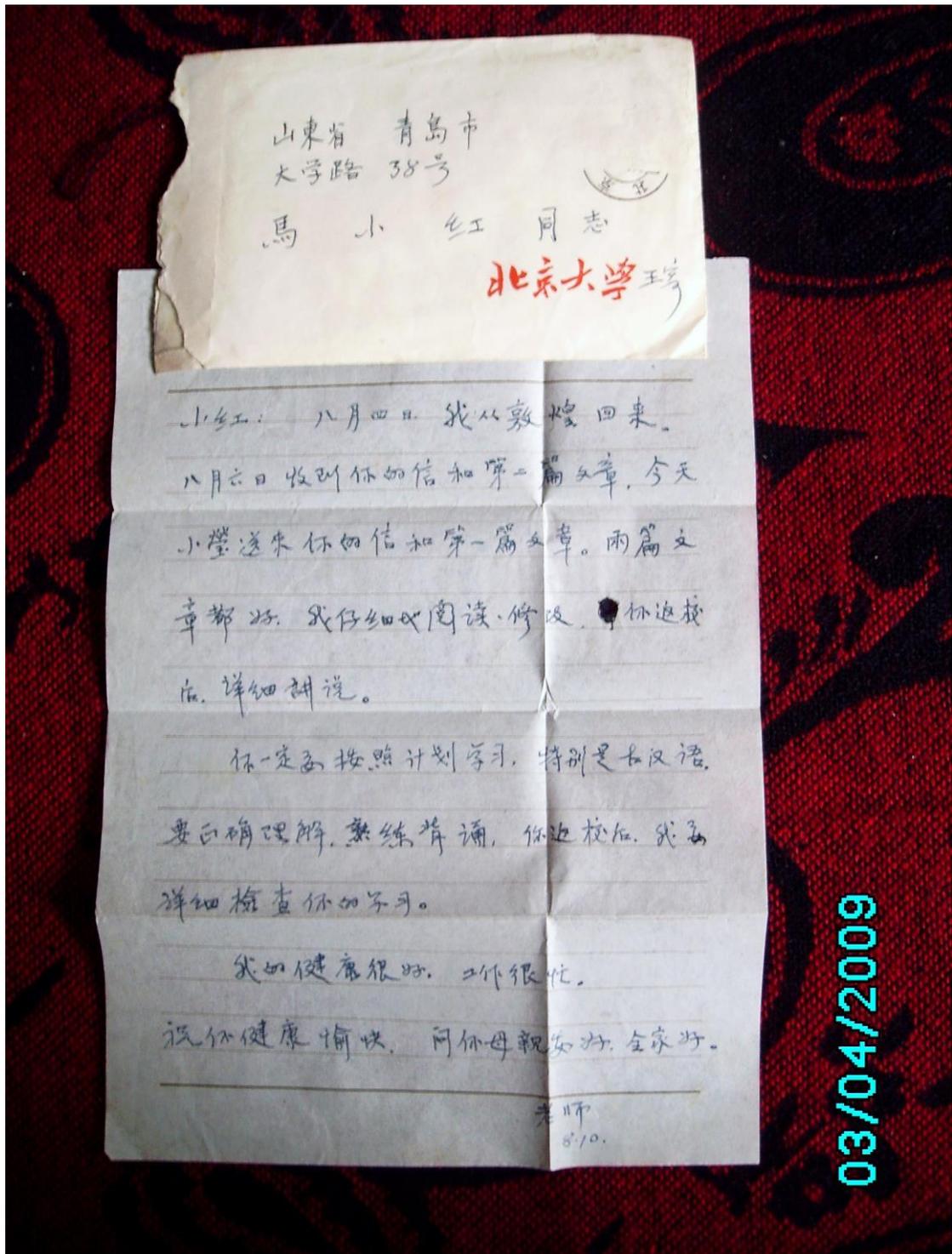
马小红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园，1981年

说到先生对学术的追求，就不能不说先生对他的老师陈寅恪的怀念。先生说“寅恪师手不释卷，宠辱不惊，心无旁骛，完全沉醉在学术中。”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将陈寅恪三个字的读音读准，即“恪”一定要读成“que”（四声），而不能读成“ke”。其实，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跟随先生学习的日子里，无论周日节假日，到先生家，最常见的情景就是先生伏案，在那张陈寅恪先生送给他的大红木桌子上堆满了史书。一般的程序是：我们敲门，先生喊“进来。”我们进屋，先生说“先拿本书自己看。”先生继续伏案，每次长短时间不等，先生会放下手中的笔或书，说“好了，现在该检查你们的学习了。”或布置我们到图书馆去查

书、借书，或说敦煌文书的课又有了什么新的研究成果要讲，什么新资料要解释。我记得在讲《唐书》时，先生说：“历史研究要不怕费力气，欧阳修作《新唐书》，太注重文学修辞而对史料的功夫有所欠缺，所以史家说‘文省事增’。即记载太简约而使一些史实非考证不得明白，反而增加了读史人的负担。但即使如此，《新唐书》中也有许多可以与敦煌文书相印证的史料，不可不看。”当时的《通典》、《册府元龟》都是影印本，先生有时眼花看不清，就让我们帮着看。并说读史料，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手边要放一本《康熙字典》”。先生很少给我们讲下放到山西的坎坷，但是好几次都得意地说在下放的学校资料室中竟然发现了不全的《册府元龟》：“这下，我有事干了。”先生每次都会如此说。由此，先生对《册府元龟》似乎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常常说“《册府元龟》的史料价值还没有被学界所认识，其应该是研究唐史的必读书”。

先生对学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学生的悉心指导方面。他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格外重视，只要你好学，他就会诲人不倦。我曾经给先生交过一篇作业，至今想来都惭愧。那时广播和电视中正播放刘兰芳的《说岳全传》和《杨家将》。年轻人嫉恶如仇，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将潘（仁美）、杨（继业）两家的是非断个清楚，就用横格笔记本写了两页半纸的作业，撕下来交给了先生，题目是《杨家将的精神永传》。先生拿到作业后，先说“以后写文章一定要用正规的稿纸，标点符号也要占一格”，过两天又说“写历史论文，一定要有史料，史料越多对事情的理解就越接近真实”。大约过了一个学期，我也感到了自己作业的幼稚，想再做一篇作业时，先生说：“和毕业论文连起来，先做一个制度方面的吧。容易入门。”于是就给我定了一个题目：“唐代的散官制度”。先生指定了一些参考书，基本都是原始史料，如《唐会要》、《通典》、《唐书》、《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先生已经胸有成竹的题目。先生嘱咐我“不要先看现代人研究的论文，那样容易被引导，产生偏见。先看资料，自己有了见解再看别人的研究成果”。几乎一年的时间，真是先生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写学术论文。毕业时，先生表扬我说：“小红读懂了陈寅恪先生的书，所以毕业论文我要给她最高分。”

先生的性格是我写此文最难落笔处。先生不擅长人际，对人真诚而固执。他丝毫不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人，常常将事情想得非常简单。他注重真实而过于忽视形式。回想起来，我与先生的分歧也许是因为性格上有点类似。1982年，我留校后，琢磨着报考研究生。但是先生明确表示反对。先生认为我的学习环境已经很好了，与同学相比，年纪又偏小，所以不必着急考研，先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手头的工作，即整理翻拍的敦煌文书目录。他举了很多自学成才的例子，最近的一个就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他说：“学问是货真价实的真功夫。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最让人瞧不起。社会不会歧视有真才实学的人。”先生用给陈寅恪先生作助手的经历来说服我，自信学位问题不会成为我学问路上的缺陷和阻力。“再说，你又年轻，真到非考不可的时候再考也来得及。”先生显然高估了教授在学校的发言权。最终我还是报考了法律系的研究生。当我将报考的事情告诉先生时，先生可以说是震怒。他



王永兴给马小红的信

将我从图书馆为他借来的书全部还给我，并告诉我今后不必再去找他。考完研究生后，我硬着头皮到先生家，先生的气显然已经消了许多。他说：“考上考不上都没有关系，不会耽误你做学问。你喜欢法制史，也很好，五代时期的法律就很值得做。”先生拿出一篇准备好的纸，我接过一看，题目是“五代立法研究”，子目之下列着需要读的资料，具体到卷，甚至

页。从先生那里出来，我心里有些空落，我虽然并不为自己报考了研究生而后悔，但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还有资格去做先生已经拟好子目的论文。直到十多年后，我在社科院法学所为了编辑《中国法制史考证》找先生约稿，先生还问：“五代的立法研究做的怎么样了？”我很惭愧。

先生走了，冬季里我接到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的约稿函，在对先生的怀念中迎来了春天。春天是一个思念的季节，谨以此文献给将我引上学术之路的先生。现在我也身为人师，想到先生那种对学生的负责与关怀、对学术的无私和陶醉，则只能用“见贤思齐”来鞭策自己。

2009年清明

读书须先识字

——记王永兴先生的教诲

荣新江

去年九月，王永兴先生不幸去世，他的弟子们倡议编辑纪念文集，我虽然不是王先生的正式弟子，但在他的几乎所有弟子成为他的弟子之前，我应当算是他给予教诲较多的“弟子”。

1978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和那些经过“文革”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相比，显得年幼无知，他们中间有的人《资本论》读过两遍，有的通读过《资治通鉴》，而我除了《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背得滚瓜烂熟外，其他好像没读过什么正经的书，所以开始的一年多，都在借助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按照自己的兴趣，无目的的读书。

大三时，王永兴和张广达两位先生给我们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他们俩，一位“文革”时被发配到山西而不久前才调到北大历史系来任教，一位是二十多岁被打成“右派”而刚刚获得讲课的权力，所以都非常认真地给我们讲课，在课下与学生的交流和指导也非常多。当然，这门课的主要承担人是王先生。而我，因为是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因此也就成为这门课的课代表了，我的工作就是协助老师们上好这门课。

王先生是我们敬仰的陈寅恪先生的弟子，给学生上课也秉承陈先生的做法，用一个大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他当时住在未名湖北的健斋，而上课一般在文史楼，所以我每到上课的时候，就骑车先到健斋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遍聊一遍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可惜那时候没有数码相机，如果把镜头记录下来，那的确是八十年代初叶师生之间情谊的真实写照。

王先生上课，也是按照他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来的方法，强调“读书须先识字”，所以他讲敦煌文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个词一个词地考释。那时他以敦煌文书《天宝十载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例，来讲解敦煌文书的研究方法和史料价值。在此之前我们上的课都是“大路货”，政治事件、战争、经济制度、主要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此等等，不涉及具体的问题。王先生的课“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对于敦煌《差科簿》记录的每一种色役，都做了详细的解说，并从其中某种役在唐宋时期的变化，来看某些制度的演变、人身依附的逐渐减轻等等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是同学们平日较少深入的领域，所以大家听的津津有味，并不嫌繁琐。记得有一次王先生讲到“僦”，这是给节度使等高级官员当差的人员，像后来担任了安西四镇节度使的封常清，年轻时就曾是一个僦人。就这么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僦”，王先生整整讲了一堂课，我们都十分过瘾，而那堂课正好来了教务处的人旁听，下课的时候问我们：“有必要讲这么繁琐吗？”我们回答说：“有用。”

就在王、张两位先生在北大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的

方式，换来了全部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的缩微胶卷，北大图书馆马上复制了一套，同时也把先前北图所有的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和北图所藏《敦煌劫余录》著录部分的缩微胶卷也一道购回，其中法、英藏卷中包含着大量的世俗文书，虽然六十年代初公布的英藏世俗文书已经被日本学者先一步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当时的中国学界其实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多，而法藏文书虽然有日本学者用挖宝式的方式获得了许多珍贵文书加以研究，但全部公开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所以对于大多数世俗文书来说，都还没有人整理研究过。——这就是八十年代初我们热衷于敦煌研究的一个契机。

王、张两位先生不仅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的课程，而且由于他们的倡导，在他们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羨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都和这个圈子有或紧或松的联系，这些先生的研究生和我们78、79级中国史班的一些学生，更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把图书馆新近购得的法、英、中三国所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全部存放到这个研究室里，还特别允许我们从图书馆的书库中选取几百本书，集中放到这个研究室，为这个圈子的人来使用。北大图书馆有老北大、燕京、中法大学三个学校合并的图书，特别是敦煌学家向达先生曾任馆长，其所藏有关敦煌的中外文图书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张广达先生又以其对中外图书的熟悉，把大批极富参考价值的图书集中起来，这中间包括罗振玉只印了一百套的《鸣沙石室佚书》，有日本敦煌学的“金字塔”《西域文化研究》六大册，有钱玄同送给胡适的签名本《敦煌零拾》，有斯坦因、伯希和等西域考察探险家的考古报告和调查记录，有西方语言学家关于于阗、粟特、回鹘、藏文的研究著作，比如我经常翻阅的Khotanese Texts等等。我作为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我拿着这个屋子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这中间来的最多的当然是王先生，所以我和王先生的来往也就日益密切，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斋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

王先生给每个选修“敦煌文书研究”课的同学选择一件文书，按照他讲授的方法，先做字词的注释，然后做历史的考释，最后结合其他文书和文献材料，来讨论本文书所能推进的历史问题。王先生当时交给我的文书是P.3016号文书，文书的正面是题签不详的书状和一件牒文，背面是正倒相间抄写的五件牒状，其中包括《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和《天兴九年九月西朝走马使口富住状》，这里的“天兴”被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看作是北魏的年号，但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于阗王国的年号，年代应当与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相仿的唐末五代宋初。我感到我没有能力做这样一件文书，因为一来我一直在抄有关经济史方面的资料卡片，比如《白孔六帖事类集》中的“格”呀、“式”呀之类；二来我作为本科三年级的学生，

图书馆规定不能进外文期刊阅览室，我从一些目录上知道于阗的研究散在许多西文日文刊物上，可是我没法进一步阅读。邓小南从王先生那里领到的文书是 P.2555《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和吐蕃史有关，与她自己感兴趣的制度史无关，所以她和我一起找到王先生，希望给我们换个题目。王先生脾气很犟，说这是练习，谁都不能换文书，他让邓小南去民族学院找治藏学的王尧先生，让我去和张广达先生好好谈谈这篇文章怎么做。

后来我战战兢兢地和张广达先生谈话，说要做于阗的研究，需要看 Harold Bailey 的文章，而我连外文期刊阅览室都无法进去，所以没办法做这件文书。结果张先生把他在“文革”期间用长镜头的照相机和过期相纸拍的一篇又一篇的 Bailey、Pulleyblank、Hamilton 等人的文章借给我，我一篇篇地读，然后和张先生讨论，最后完成我第一篇文章《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的初稿，经过张先生的反复修订补充，大概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最后完稿，发表在王、张两位先生主持，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名义编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由于王先生为我选择的文书，把我送上了西域研究的方向，所以我在大学的最后两年里，主要是阅读西域史和西北史地方面的论著，等到最后考隋唐史的研究时，王先生曾经表示希望我回过头来跟他做隋唐史，但那时我已经在西域史上走的很远，而在隋唐史方面落后于其他同学了，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跟从张广达先生学西域史，当时的系主任周一良先生也确定我为张先生的研究生。

从上研究生到毕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虽然仍协助王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共出五辑），但因为专业的关系，受到王先生教诲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在我大学期间给予的训诂、考证、补史、证史方面的教育，让我一直受益匪浅，也感激不尽。

2009年4月13日

往事杂忆——缅怀王永兴先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帆

王永兴先生去世已经半年有余。一直想写一点纪念文字，但琐事缠身，心境烦乱，几次下笔，都不知从何处写起。我与王先生的接触其实不能算多，研究方向也不同，要想正面讨论王先生的学术成就或学术思想，实非力所能及。思之再三，还是只能从个人角度作一些回忆。所言或失之琐屑，若能从中窥见先生风范之一二，那就是很大的满足了。

一 错过跟随王先生学习的机会

我大学入学的时候，王先生年近古稀，在当时的北大历史系已经算得上是“老教授”了。资格更老的，只有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寥寥数人。几位老教授中，王先生与本科学生接触最为密切。不仅频繁给本科生开课，而且还很注意在本科生中搜访人才，亲自进行专业训练。现在的本科教育提倡“宽口径”，像王先生那样将本科生甚至是低年级本科生当研究生来带的做法，差不多绝迹了。即使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很少见。其举是否完全恰当，或者还可以继续讨论。不过，王先生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在北大历史系乃至整个史学界都是著名的，这与他“早选拔、早培养”的方针，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

记得198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班主任李孝聪老师突然来到我班宿舍。当时我们已进入大学二年级，王先生嘱托李老师，在班里寻访愿意跟随他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同学。以我班同学当时的水平，还谈不上对哪个朝代有特别的了解和兴趣，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更是完全陌生。但许多同学都感到机会难得，踊跃报名，李老师很快大有斩获，满意而归。

这里要插一句，其实当时我班绝大多数同学对王先生的学问并不了解。拿我来说，并没有见过王先生，只隐约听说他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对于王先生有哪些论著，并不清楚，更不要说读过了。其他同学的情况，我相信也差不多。大家之所以踊跃报名，主要是出于对教授的崇拜。当时北大历史系在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副教授或讲师，教授没有几位。我们上了一年学，除去在开会等公众场合远远瞻仰一下外，基本上没和教授接触过。现在居然有教授“礼贤下士”，前来招募学生，准备亲自指导，而且还是一位老教授，还是陈寅恪大师的弟子，其吸引力岂可小视？要是放到现在，教授车载斗量，已经失去了神秘的光环，学生见多识广，不会轻易趋之若鹜，大概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当时踊跃报名的同学中并没有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大早带着饭盆离开了宿舍，在食堂吃完早饭后，直接去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看书了。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吃完早饭回到

宿舍，逗留一会儿才出门。因此李老师前来“招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中午回来后，知道了这一信息。同宿舍有三位同学已经报过名，情绪仍然亢奋，鼓动我去找李老师“补报”。我考虑片刻，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所支配，觉得既然你们这么多人都已报名，我就不凑热闹了。于是故作矜持地说：“敦煌吐鲁番文书太难，估计我也学不会，还是你们去学吧。”就这样，我错过了跟随王先生学习的机会。

命运有时候很奇怪。事后我多次想，要是那天早饭后我在宿舍的话，一定会抢先报名。因为我已经决心要学中国古代史。至于学哪一段断代史，当时还没有很明确的想法。虽然对魏晋南北朝史比较有兴趣，但紧邻这一段的隋唐史，肯定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时候在王先生“教授效应”的感召下，必然会被吸引过去。但偏偏我不在场，情况就改变了。如果那一天我投入了“王门”，以后不知道会怎样发展？如果有幸一直跟着王先生，能否在隋唐史领域做出一些成绩？但王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又能在他的门下坚持下来吗？时光流逝，白驹过隙，这一切都不会有答案了。

二 与王先生遭遇

我初次与王先生接触，是在一年多以后。那是一次意外的遭遇。

当时王先生在北大图书馆有一间专门的研究室，房号是 213。屋子很大，实际上是一个有里外之分的套间。屋里的书架上置放着与隋唐史研究相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包括《册府元龟》、《全唐文》等大书。王先生的弟子，包括研究生和作为研究生预备队培养的本科生，都可以在里面上自习。王先生经常亲临巡视，督促学生学习，并解答学生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北大的教学条件还很差，学生上自习比较困难。图书馆的自习室座位很少，我们一宿舍七个人总共才有一张阅览证，只能轮流使用。也可以去教室上自习，但没课的空教室同样难找，而且往往需要提前抢占座位。在班里，只有王先生的弟子不必为上自习发愁，引得大家十分羡慕。个别胆子较大、心理素质较为坚强的同学，有时候就混入图书馆 213 室上自习，反正王先生不一定会随时都来。一旦来了，再逃不迟，只是逃的时候难免有点狼狈而已。司马迁记载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用来形容我们这几位同学倒很合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有几回班里的王先生弟子说可以带我进去。但我是个虚荣心较重、心理素质脆弱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羞于“遁走”的，因此虽然心动，但却未敢轻试。

1984 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晚饭后宿舍突然停电。室友 L 君于是鼓动我和他一起去图书馆 213 室上自习。当年我班“踊跃报名”投到王先生门下的，大概不下十人，但没过多久，或慑于王先生要求严格，或感到敦煌吐鲁番文书枯燥难学，又纷纷打了退堂鼓。坚持下来的不过两三人，L 君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在海外有亲戚，后来出国了，并没有跟着王先生上研究生），与我是好朋友。我想王先生总不会在周末晚上来巡视吧，何况宿舍停电，确实无事可做，就一同去了。213 室那天晚上没有别的同学，只有我们两人。看了一会儿书，听到

房门一响，抬头看时，只见王先生走了进来！我顿时大为紧张，心下叫苦不迭，慌忙起立，向L君投去求救的目光。L君赶快介绍说：这是我班同学张帆，因为宿舍停电，才一起来这里看书的，云云。没想到王先生不仅没生气，而且和颜悦色地说：张帆，嗯，我听说过，学习很好。又继续表扬说：你们两人很难得，周末晚上还来学习。现在好多学生周末都去跳舞，不求上进，要是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我不打扰你们，继续学习吧。说完，就起身走了。我吃此一惊，书却是再没看下去，也赶快收拾收拾，回了宿舍。这就是我和王先生的初次遭遇。

初次遭遇王先生，让我感到很意外。同学们都说王先生为人古板，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可以说是严厉。但那天我见到的王先生，却非常慈祥，与传说迥然不同。后来王先生每次见到我，也都十分和蔼，从未摆出严厉态度。这种反差可能也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不少老师，对待自己的入室弟子十分严格，常加敲打；但对于门墙外的普通学生，要求的尺度就不一样了，小善必录，总以鼓励为主。具体到我自己，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是上大学时年纪较小，心无旁骛，学习比较努力，死记硬背的能力也强，各门课程成绩都很好。二是日常生活不修边幅，经常是敝衣破履，囚首垢面，可能会给包括王先生在内的老师留下一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印象。其实当时在班里，我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手头比较宽裕，不仅买了很多书，有时还能借钱给同学，外号“张有财”。所谓节约和朴素，本质上不过是吝啬、懒惰而已。君子可欺以其方，王先生对这些背景又怎么能全部了解呢？

还有一次与王先生的遭遇让我铭记不忘。那是在198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已经上了元史研究生，也选了王先生的课（下文另述）。那天我去图书馆借书，在图书馆南门外西侧停自行车的地方遇到了王先生。王先生和我聊了一会儿，特别谈起了专业学习。记得他严肃地说：“张帆，你要自爱呀！你搞历史很有前途，要好好努力，将来做出成就……”我听了感到一阵震撼。“你要自爱”这几个字，是我上学期间从老师那里听到语气最重的勉励和鞭策！此后二十多年，我的专业道路总体上比较顺利，上了博士，又留系任教。其间也曾遇到一些挫折，不无情绪低落之时，但从事史学工作的决心从未动摇。这与王先生那一次谈话，实在有很大的关系。只是年逾不惑，成绩寥寥，有负王先生厚望多矣，思之赧然！

三 选王先生的课

我上本科时，没有选过王先生的课。其原因，主要是大家都说王先生的课内容比较难，作业很重，评分也偏低，还经常点名，不准缺课。彼时年少无知，选课时总希望负担轻一点，所以就退避三舍了。等到上研究生以后，觉得没选过王先生的课实在说不过去，就在研究生一年级、也就是1986至87学年，选修了王先生的“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我的研究方向是元史，兴趣主要在元代政治制度，而元承金制，金朝又标榜沿袭唐制，所以王先生这门课在内容上对我日后的研究帮助很大。至于在研究方法、思路方面受到的启迪，那就更多了。

这门课连续开设两个学期，布置了很重的读书任务，一共要写期中、期末共四篇论文，

确实压力不小。我当时下了决心，要弥补以前没选王先生课的损失，上课态度十分认真，尽量严格地完成读书和写作任务。四篇论文加起来写了五六万字，花费不小功夫，以至于后来和人开玩笑说，我虽然是元史研究生，第一学年上的却是隋唐史研究生。两学期的成绩，印象中分别是 87 和 88 分。这在王先生的课上就算是高分了。

更重要的是，王先生在这门课上，给了我平生第一次上台讲课的机会。第一学期前半段的课程内容，主要是隋唐制度渊源，因此我期中论文选了“唐以前御史台机构的演变”为题。放在今天电子文献检索十分方便的时代，在历史系即使是一个本科生都可以轻松地写出这样的论文。不过在当时，主要得靠自己翻阅史料，充其量再利用一些类书，因此还是花了若干精力。上交以后，王先生在一次课上宣布，张帆的期中论文写得不错，下次的课由他给大家讲这篇论文。这对我可是一次严峻考验。我上大学的时候，口头表达能力很差，有时还有点口吃，因此在课堂上从不发言或提问，甚至还以颜回“终日不违，如愚”来自我宽慰。即使在讨论课上，除非老师点到我的名字，也肯定是徐庶入曹营，一言不发。与今天北大绝大多数小孩能够旁若无人、侃侃而谈相比，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王先生让我讲课，他就坐在下面听，这可如何是好？想来想去，毕竟有现成的文稿在手，只要以此为线索，将从史书中摘录的重要史料讲解一遍即可，实在不行，就照稿子念。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在讲台上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是 1986 年 11 月初一个上午的 10 点 10 分到 12 点。

我已经忘了那天是怎么讲下来的。只记得衣冠楚楚（穿着蓝布中山装，上衣口袋插两只钢笔），强打精神，讲课时根本不敢直视台下的王先生和各位同学。为掌握时间，把我的“上海”牌手表放到讲台上，但因为紧张，又没想起来去看。由于毫无讲课经验，进度完全失控，直到下课，准备的内容才讲了不足四分之一。下讲台时昏昏沉沉，把手表丢在上面，还是王先生提醒我说：“手表，手表！”才在同学们的低声哄笑中取回。时过境迁，我现在已经是将近二十年教龄的教师，讲课得到的评价还算不错，获过国家级的教学奖。谁又能知道，当年初登讲台是那样一副惨状呢？饮水思源，又怎能不想起王先生呢？

四 到王先生家

我总共到王先生家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 1987 年秋天，当时刚上研究生二年级。去的原因，是有几位本科同学返校，说想去看看王先生，我于是陪同前往。王先生住在朗润园，我们是晚饭后去的。王先生热情地和各位同学聊天，询问了每人的现状。因为去的人较多，基本是泛泛而谈，大家也怕影响王先生休息，没坐多久就起身告辞。

第二次则是在六年以后，2003 年的秋天，也是一个晚上。此时王先生搬家到了蔚秀园，而我已经博士毕业，留系工作。一位同学受人之托给王先生送书，我就一起去了。记得那天还在王先生家里遇到了他的高足、现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卢向前教授。坐的时间也不长，但王先生和我谈起了专业，因此记忆深刻。王先生说，你留在系里了，很不容易，要加倍努力。

你是学元史的，有机会应该学“老蒙文”。随后以陈寅恪先生为例，讲了一番语言文字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我唯唯而退。王先生说的“老蒙文”，就是今天我国蒙古族使用的蒙文，其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20世纪前期，蒙古国在前苏联帮助下用斯拉夫字母另外创制了一套蒙文，我们有时就称为“新蒙文”，而将原来那套称为“老蒙文”，以相区别。王先生本人不以外语或民族语文见长，但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对语文工具的重要性自然十分了解。学蒙文的事，他以前就提醒过我，这次又很正式地说了一遍。

令人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认真听从王先生的教诲。我的语言能力很差，一两门基本外语都没学好，更别提民族语文了。我的研究生导师余大钧先生通晓多种语文，但他待下宽厚，对我比较放任，不常督促。我当然也知道蒙文之重要，却总是找“没人教”、“没时间”等客观理由，一再拖延。直到前几年，才在系内同事的带动下开始学蒙文，距离王先生的教诲已经过了十余载。当年我不到三十岁，也算“风华正茂”，却没有趁年轻抓紧学习；眼下年过四十，头脑迟钝，重为亡羊补牢之举，追悔曷及？十几年来我没有再去拜访王先生，一方面是考虑他年事渐高，不敢打扰；另一方面也是心中有愧，一旦王先生再提起“老蒙文”，将以何辞对答？如今王先生已经仙逝，惟当龟勉进学，庶几先生地下有知，不致厚责而已。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王先生的缅怀之情。

与天壤同久 共三光永光

——追忆王永兴先生

王宏治

1977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实际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之时，虽打倒“四人帮”已一年多，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有待时日。学校开课后用的教材、教案大多仍是“文革”中的东西，比较好一些的则是个别老教师用“文革”前的教案及观点授课，这已经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了。

大约是1979年的一天，历史专题选修课忽然来了一位非本校的老先生，消息灵通的同学都很兴奋，说这是陈寅恪的门生王永兴先生，是位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开始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不少，我也在其中。王永兴先生授课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上台先在黑板上写满史料，将隋唐的《田令》和《赋役令》从厚重的古籍书上逐条抄下，然后再逐句为我们讲述。其讲解史料若剥笋剖瓜，当史料讲完，其观点结论已自然得出，令我惊诧不已。因为王先生要求选课的学生读许多参考文献，还布置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抄录资料，很多同学不适应这种须自己动手、动脑筋的授课方式，渐渐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但剩下的恰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同学。这也正是王先生在课堂上反复鼓励我们的。在此我保留了一份王先生布置我们抄录史料的要求与体例，转录于此（原文为繁体字、竖行），以纪念王先生的授课之恩。

《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抄录要求与体例》：

一、按提纲抄录，务必抄全，不可脱漏。

二、每张纸抄录一条材料。

三、用八开格纸，竖抄，用钢笔，繁体，正楷抄录。

四、材料出处抄在第一行，上端空两格，书名、传记名、志名等不另加括号。如：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传

宋会要辑稿六九五七页·一七七册·兵一二·捕贼二

五、抄录材料时，第一行上端空两格。

六、引文首尾加“ ”号，注文加（ ）号；原按加〔 〕号。如：

“政和五年正月丙辰，长宁军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岭堡，陷之。”

〔原按：此据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赵通指置圣旨追书，须愍考详。〕

七、材料中遇有年代、人名与材料不衔接时应在引文前加上，如：

大观二年正月戊寅，“河东北盗起。”

石公弼“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有号亡命社。”

八、标点符号完全照二十四史标点本之标点。

从此以后，我作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读书，摘录史料。这是我就读研究生之前对王永兴先生的初步印象。

198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我们这届入学的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记得报到时天气还比较冷，我在历史系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王玉梅老师说：“你就是王宏治呀？王永兴老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就按地址找到王永兴老师家，当时他还住在健斋的一间据说是由厕所改建的宿舍。因为在北京师范学院上过王先生的课，课间休息时我也常向王先生讨教，故双方都不陌生，很快就聊到一起。王先生直接问我打算读哪一段？我们当时考研是按中国历史上半段（隋唐以前）和下半段（宋以后）分专业，但入学后具体研究方向则根据导师再定。我说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王先生说，《唐律》是中国法制史的基础，既然要研究法制史，就必须学好《唐律》，并表示希望我能跟他学。我也就没有再犹豫，当场答应就跟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

1982年的北大历史系的中古史专业，可以说是刚从“文革”阴霾中恢复元气。一批泰斗级的教授重新走上讲坛，其中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商鸿奎、许大龄、祝总斌、吴荣曾、张广达、吴宗国等，王永兴先生按时下的话说是作为“引进人才”从山西调入北大的。北大开放的学术氛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聆听本系名师的授课，还可以任意选听自己感兴趣的外系名家的讲座，如我还选修了宿白先生的考古学、汤一介先生的佛教史等。王永兴先生的课理所当然的是我的重头戏。王先生每学期开两门课，一门隋唐史，一门敦煌学，每次授课的内容从来也不重复，所以我三年来共听导师亲授12门课。这可能是现在的研究生不能想象的。

敦煌学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我只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与隋唐史似乎稍远。王先生每次上课，将要讲授的有关敦煌学的文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我们。这种印刷方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先在钢板上用蜡纸刻版，再用一种胶滚子在油印机上以油墨印制。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尽管有油印资料，王先生仍要一丝不苟地将相关史料全部抄写在黑板上，抄完一段，就讲解一番。黑板抄满了，我就主动上前将讲过的部分擦净。三年来，王先生不断地抄写，我就不不断地擦拭。王永兴先生就用这种方式，逐字逐行逐句地为我们讲解千年前埋藏在敦煌藏经洞中，面世后又历经沧桑的敦煌文书。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鼓励我们立志于从事敦煌文书学的研究，我们在他的鼓动下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王先生讲敦煌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吐鲁番唐永淳元年汜德达飞骑尉告身研究”，二是“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研究”，三是“敦煌水部式研究”。通过王先生的讲解，我始知，做学问当从识字开始。王先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书中的字句，有时我只觉得我就是个小学生。对于经历“文革”，没有受到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受益匪浅，知道学问是怎样做出来的。刚到二年级，王先生又从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回一些“吐鲁番文书”，每人按专题分得几页，要求我们“作文书”。我分到几页唐初的馆驿文书，“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遣番不到驿丁事”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等（这几件文书 1985 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发表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上）。看着这几页残缺不全、如同天书般的纸片，我真不知道如何下手。同寝室的师弟们幸灾乐祸地瞧着我为难的样子，还要表现出爱莫能助的表情。我也只能用“笨”法子，每天到当年王先生设在北大图书馆 213 室的研究室，翻阅相关资料。王先生事先为我开了几本书目，如两唐书、《唐六典》、《唐会要》等，在这些书的指引下，利用蛛丝马迹的线索，如同刑警侦察破案一般，又像谍报专家破解密码一样，一字、一词地钻研，再结合历史背景，分析“案情”，逐步进入情况，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以 4 万字论文的形式完成了《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我毕业后，该论文发表在由王永兴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出版）上。这是王先生指导我从事科研的第一步。

隋唐史课王先生主要讲述制度史，先后开过经济制度史、政治制度史、职官制度史、选举制度史等。王先生在这些课上除了讲课，主要是要求我们读《资治通鉴》，有时课上还要检查。因为读研究生还要学习两门外语、政治和其他选修课，晚上在寝室与不同专业的师兄弟们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各种社会话题，有些时候难免应付、糊弄，一般来说总会被王先生发现，遭到训斥。今天看来，王先生的严格要求，对我的学术成长确实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饮水思源，师恩难忘。印象极深的是在读《资治通鉴》时，王先生要求我们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但又给我们引述了《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十二年》的一段文字，为说明问题，不厌其长，转引与此：

（四月）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

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皆见。（胡注：见，贤遍翻。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地球子午线的记载，今天看来，其精确度虽有些偏差，但毕竟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确信地球是圆的。王先生讲这段的目的并不在其正文，而是胡三省的注，“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王先生告诉我们，读书不可能穷尽天下学问，就像河边的老鼠喝水，不可能将河水饮干，只要自己喝饱了就行了。这对当年面对知识饥渴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及时的提醒。三年读研，时光紧迫，学海无涯，精力有限。应该抓紧时间，首先完成最重要的学业，不能虚度光阴。

三年时间的确如飞，转眼我就“修成正果”，该毕业了。我顺利地联系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工作问题解决了，也该离开王永兴先生了，但真要离开时，确有不忍之心。因此我时常会回北大看望先生。记得有一次，也许是为了让王先生欢喜，我说，争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专著，以报答先生的培育。王先生很严肃地说：“你现在还不能写专著，写出来也不会是好东西。虽然工作了，还是要抓紧读书学习，先写些小论文，把基础打好后，再渐渐写书。用一年写出一篇好论文就不容易了。不要急于求成，白纸黑字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对我震动很大，因为现实的学术风气就是让人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听从了王先生的教导，这些年来，我写文章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轻率下笔，要对历史负责。王先生的授课方式，对我影响也很大，现在虽有电脑课件，但我仍坚持用板书抄写史料，总认为板书有着各种现代教学手段不可取代的魅力。

1994年6月，王永兴先生八十寿诞那天，我出面召集王先生在京弟子为先生祝寿。我们在阜成门附近的一家四合院餐厅聚会。祝总斌先生、吴宗国先生是我们念书时共同的老师，也应邀前来共聚。卢向前特意从杭州赶来参加。王先生也显得格外兴奋。大家一起喝了酒，还唱了歌，共忆师生之情，总之，是一场难得的，也是难忘的师生联欢会。2004年，王先生90寿诞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在历史系新建的小院里。当时历史系的领导基本上是以78级毕业的留校生为主，牛大勇已是系主任，阎步克、邓小楠也都成为博士生导师。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在回忆王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课下要检查同学们上课时所记的笔记，晚间还经常到宿舍检查各位读书的情况。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别说是本科生，即便是硕士生或博士生也未必有导师如此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者。

近年来，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可能是由于年事已高而不太好。每次我去看他，他都兴致很高，经常回忆往事，其中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他的导师陈寅恪先生。除了追忆他随陈寅恪先生学习工作的往事外，主要谈论陈先生在治学方面的感想。对于当前学术界的“假冒伪

劣”现象，王永兴先生认为这是关系到民族素质的大事。他引用欧阳永叔《新五代史·冯道传》中的话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今日无所不取，无所不为的“不



王宏治（前排左一）金锋（后排左一）、吴丽娱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2002年廉、不耻”之徒，却能名利双收，又为后学青年提供了“不良”的榜样。导师理应在品德和学术两方面都优秀，即德才兼备，就像陈寅恪、王国维、杨树达、汤用彤这样的大师。说到陈寅恪，王先生特别推崇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先生在《我对义宁之学的理解补述》一文中说：

我华夏民族数千年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此禹域九州广土众民之文明之国屹立于天地之间，虽数经衰落，终能复振。寅恪先生乃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人，故特别重视并表彰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内容与形式，因其时间、空间及其他条件之不同而不同。但为维护此禹域九州广土众民之国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独立则一也，为维护华夏民族之学术文化与其发展提高则一也。

我想，王永兴先生与其导师陈寅恪先生一样，都是为了这一信仰而奋斗终身。正如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王永兴先生最喜爱的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也是我的座右铭。谨将此作为悼念先生的挽词。

2009年4月10日于北京

王先生教我做学问

吴丽娱

先师王永兴先生是我修习唐史的开蒙老师，走上问学之路是由于师从王先生，这要先从最初认识先生说起。

一 初识王先生

我从小读历史课时就对唐史有兴趣，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一些原因，错过了机会。凭着“文革”中曾自学文史和较好的古文基础，80年在复习一个多月之后便直接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史学科的硕士生考试，但是专业课成绩不及格。我为此甚感难过，公公赵守俨先生见如此，在了解到是王先生招生之后，沉吟了数日，便破例亲自去了一趟北大，请求王先生给我一些指导。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健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才发现健斋是老北大的旧式建筑之一，鬓发已苍的王先生正坐在他简陋的居室中等着我，给我的感觉是很严肃，而且顿时增加了敬畏感和沧桑感。但是王先生对我和蔼，他问了问我的情况，知道我在唐史方面毫无基础，也没有再说什么，又聊了几句当年与我公公一起修二十四史的情况，就开始和我谈起学习的计划。他说可以辅导我读书，一直到再参加考试，然后便向我布置了书目。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我已经在读的翦伯赞、范文澜通史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等书之外，王先生几乎没有给我开列什么教科书。他开的书目很简单，主要就是两《唐书》、《资治通鉴》和陈寅恪先生的几本书，其中特别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嘱我这些书要好好读，而第一次的作业就是两《唐书》的《职官志》和《百官志》。他要求我在半个月之后再来看他，就要汇报读书心得。记得他还指着我去的几个苹果说，下次再来时，千万不要带任何礼物给我。我指导你不为报酬，我和你公公是老朋友，他为你学习很感为难，我只是接受他的嘱托罢了。不过考试的事我也不能破坏原则，我只是辅导你读书，将来是不是能考上研究生，不能保证，也不能由我决定。

半个月后我便按照要求再去见王先生。记得第二次去健斋，我先就《旧唐书·职官志》中职散勋爵的官制系统按自己的理解条分缕析地讲了一回，由于事先请教过公公，所以我弄得很清楚。但是王先生听得很惊奇，他对我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将唐朝复杂的官制中彼此的关系、作用基本搞清很感意外，于是很高兴地夸了我几句，似乎也就从此愿意真正收我做学生。我又问了几处读不懂的地方，都由王先生做了解答便离开了。而我此后也是差不多每半月或

一月就去健斋一次，向王先生汇报读书心得，请教一些问题，这样大概有半年多之久。请教了什么，大多数都记不清了。但是除了两《唐书·食货志》等一些必读的志外，也聊起过陈寅恪先生的书，对于什么是“关陇本位政策”、宇文泰和府兵制度、牛李党争和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等等，经过自己读书和王先生讲解，已经初步有了印象，至于唐史的诸多史实，通过读《通鉴》，也逐渐熟悉起来，这和我后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自然地衔接起来。

二 研究生的授课学习

也许是王先生的辅导使我在唐史的基本知识方面有了迅速的提高，所以81年的入学考试总算顺利通过。考上研究生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一届王先生的学生除了我还有王宏治，经常在一起上课的还有周先生的学生杨光辉、胡宝国、郭熹微，许大龄先生的学生伍跃和王硕，商鸿逵先生的学生岑大利，另外还有宿先生的学生张小舟和齐东方，大家相识甚欢。与学校生活阔别十数年之后再回到学校，内心真是百感交集。而我们在校的那几年，正是国家百废俱兴走上正轨的时期，虽然一切物质条件也许不如今天，但是不搞运动，没有政治斗争的干扰，也没有就业的压力，学生全心全意学习，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和已经读了四年本科的师兄师弟相比，自己的学业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以丝毫不敢怠慢。反观王先生，也是在尽心尽力地带学生，似乎要将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从82年初入学，至84年底毕业，我在北大仅读了两年半书，但这两年半，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无论怎么比，我都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难得、最幸福的时期。我从不知到知，到顺利完成学业，真正走上治学道路，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这一切都与王先生的教诲分不开。

最初认识王先生，他的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和写字时的手抖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但是他一天的工作量却实在使人吃惊。那个时候，王先生是系里给学生上课最多的教师，而王先生除了教授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课程和带我们几届唐史学生外，还要写文章，编论集。将近七十岁的人了，一天忙到晚，有时还要熬夜。因为授课和编辑敦煌吐鲁番论集，所以78、79级的不少学生和其它断代史的研究生也都不断地来找王先生，但是并不见王先生烦躁着急，他从容不迫地处理各种工作和事务，一生中许多最重要的文章和著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

王先生为什么能如此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接触久了，我才逐渐从他的坎坷人生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在五十年代就研究敦煌文书，1957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关于敦煌差科簿的文章已受到海外关注，为中国学界赢得荣誉，但反右运动以后，被调到山西做一名普通中学的教师，研究条件和机会都被剥夺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西魏大统十三年户籍残卷的发现和研究，竟与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差不多同时，亦被视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有关敦煌文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文革”开始，王先生受到巨大冲击，被造反派酷刑折磨，生命几至不保。后来他曾经多次向我们陈述这些经历，难过到几乎掉泪。78年王先生在一些

老先生的推荐和帮助下，才由山西调入北京大学，这个时候的王先生已经六十四、五岁了，而他的学术生命也才重新开始，他曾经积攒的知识、学问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试想经历过如此遭遇的王先生当此之际会有何等感慨，又会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决心来回报迟到的一切？我想这是王先生焕发起全部的心力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原由。对任何人来说，六七十岁都可以认为是十足的老年，或至少是老年的开始，而唯有王先生，却是可以弥补人生遗憾的又一春天。从王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顽强和责任心，也懂得了什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当了学生，先要选课，三十几个学分是研究生第一个学年最要忙的事。而这个上课，我以为最关乎北大的变化。“文革”之初，我到过北大，见到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场景，而后来的不少回忆文章也提到“文革”以前历史系授课学习不能不受教条影响的问题。八十年代北大给我的感觉是换了人间，这不仅是由于没了大字报，也由于老师们的授课方式真正与文革前大不同。我虽然没读过本科，知识有不少欠缺，但幸运的是，我听过许多教授的课，如邓广铭、周一良、许大龄、宿白、张广达、田余庆、祝总斌先生等，当时除了商鸿逵先生错过之外，其它中古史老先生的课大多都听过，他们的讲课风格、音容笑貌也至今留在脑海挥之不去，如邓先生讲年轻时如何从方志研究辛弃疾，得到胡适的赏识申请到研究经费；许大龄先生讲宦官演兵时的神采令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还有宿白先生，虽然一行念稿子，一行画图令我们手忙脚乱，但所说从遗留在墙上的木孔形状来判断朝代的做法还是令我这个对考古毫无所知的学生觉得不可思议。而周、田和祝等先生的课都是他们所研究的最新专题，其中逻辑委婉，角度独特引人入胜，因之获得的艺术享受，非可一一胜道。每位老师所授的第一节课，必是本科所用史料，兼而有些前人重要研究成果，我想他们所授都不是五、六十年代掺杂了“大批判”概念的那一种，而是真真正正地灌注着他们自己的心血和识见，体现着个性的风采。而且他们介绍的学问是将古今中外融会其间，让我们理解到研究应当怎样围绕问题进行，也打开了学术眼界，知道了一些学术史上的事，明白什么是学问的高境界和高水平。

王先生的授课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与上述先生相比，王先生的节奏要慢许多，而且是围绕史料为主。最典型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课，一个《水部式》，就讲了很长时间。另外很多要用的史料，一一抄在黑板上，再一一说明，一些关键的字词还要特别讲解，看起来一堂课下来内容不多，但是时间久了，还是觉得这种缓慢的节奏另有味道，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知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印在脑子里。据说陈寅恪先生上课也是携带大量的书，只不过用的不是书包而是包袱皮，而这样史料抄在黑板上的方式，是与陈先生一样的。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亦步亦趋，故处处学习陈先生，他自己也说，陈寅恪先生怎么教学生，我也怎么教你们。而我觉得我们从王先生接受的是最传统最正规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继承的也许不是五、六十年代，而是直接地吸收了三、四十年代的传统思想文化理念和精华。

王先生在下课时还要布置很多作业，大都是读书，因此在讲课之前或者中间，还经常以

提问的方式做检查。被提问的多是研究生们，我是经常被提问的一个，很多时候被先生一叫，站起来张口结舌是常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唐史或者文书，记得有一次说起十三经非常重要，我那个时候对经书毫无接触，先生问起阎若璩和《尚书》伪孔传，我答不上来，不过王先生也不太责备，只是自己很不好意思就是了。有的时候是上一节王先生布置的，但是因为没看书，说的有一句没一句，或者指东打西，遭到同学们的窃笑，底下大家说起来，还要笑乐一番，上课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和欢乐的情绪中度过。

三 做卷子和校勘《唐六典》

众所周知，在大学开设敦煌文书课是以王先生为首创，北大中古史中心王先生也是主要的创建人和奠基人。那个时候，听说王先生已经去姚依林那里为敦煌学会申请到一大笔经费，而我们学生活动的地点就是图书馆的213室。213室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今天的北大中古史中心基地，那是先生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特别申请建立的。尽管当时的条件远远不能与今天的中心相比，但是有不少与文书相关的资料图书，还有阅读器可以读缩微胶卷，特别是日本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可备查阅。另外基本工具书和史料又可以去同一楼的研究生阅览室，因此一天中的很多时间我们都是“泡”在“213”的，这样对常用的一些文书资料和研究书目便逐渐熟悉了。通过上课和实际看文书、做卷子，对文书的写法、涉及的一些制度都逐渐了解，一些常用的避讳字、俗体字也见怪不怪。由于经常接触户籍、差科簿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对经济史的一些名词和制度更是耳熟能详。

跟王先生学习，比上课还重要的是做卷子。通过做卷子使学生成熟起来，可以说是王先生的一大发明创造。他在《王永兴学述》一书中说：“讲授与实习相结合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组成部分。整理研究敦煌文书，教师首先动手动脑，为学生做出榜样，学生随之动手动脑，这样，才能具体理解文书……结合我的讲课，学生自己就能解决问题，真正理解了文书。”在读研究生之前我从来不知文书为何物，更不懂如何进行研究。但去健斋时，经常见一些学生来请教做文书的事，说起一个卷子又多认出几个字，就会非常高兴。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但不知道具体作什么。没想到一上文书课，先生就一人发了几纸卷子，说是新出的吐鲁番文书，让我们做起来。尽管先生讲了一下要注意的内容，但我对要做什么还是不得要领。幸亏张小舟拿到的卷子和我的其实是一件，拼合起来都是相关车坊的，于是她将文章开了个头，我这才有些方寸。

王先生对做卷子可是要求严格。正像他说的，“学生亲自在阅读机下录文，亲自熟读录文，辨字，分句，分段；自己提出应解释的名词，读指定书，解释名词，最后，自己通解全文，这是实习的全过程。”这些程序一丝不苟，总结起来，就是先认字做录文，再作校注，然后是制度、名词解释和问题研究，对文书内容和涉及的重要史事给以说明，它将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整理敦煌文献最基础也最实用的方法。王先生自己做差科簿、

户籍簿就是采用这种做法，他又将这一方法教给我们。后来赵和平师兄整理书仪，即分录文、校记和题解三部，实际上亦用其法。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敦煌卷子的分类整理，但每当面对新发现的卷子，或者是要对某卷进行重点研究，仍习惯于这种方式，也即先认字录文释读解词，再研究相关史事。在我们理解，这种方法也是被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的。

在做卷子之前先生已说明如做好可以发表在论集上，这给了我们动力。记得我和张小舟摸爬滚打地好不容易才将关于车坊的文章写出来，拿到先生那里去，虽然听到的是鼓励的话，但结果却是不合格。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怎么结合《唐六典》等去寻找、应用基本史料，知道了哪些是常识不用讨论，哪些是问题中心必须作为重点，特别是回避前人已经研究过的私车坊而将文书中的官车坊作为主题。当时如何改动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一篇文章交去发回总不下于十次之多，我们都烦了可先生不烦，这就是王先生书中所说教师批改作业的过程。到了最后先生看我冥顽不灵，对文书反映的西北边境地区车坊的特点抓不住，就亲自手书几条，再由我去修改充实，才算完成。这个过程至少用了两个多学期，是研究生期间最重要的一份作业，写成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王先生编的论集第三辑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显得很肤浅，后来有关车坊的资料又有公布，而由锦绣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不过经过这最初的锻炼，使我初步懂得了怎样写文章，怎样发现问题。此后的研究生论文，就完成得比较顺利，题目是自己找的，是在阅读两《唐书·食货志》和《唐会要》等史书时所发现的唐后期财政三司问题。当时这个题目只有少数日本学者涉及，大陆学者对唐后期的研究很少，所以王先生一听就批准了。而且写作的过程中，先生只是听我谈谈想法和要解决的问题，写后再让修改一次就去答辩了。我后来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王先生对上课的习作这样严格而对毕业论文却相对比较宽松呢？现在想来，除了做文书是按照要发表的文章来要求，也与将文书作为基础教材有关。事实说明，能按部就班地将文书做好，掌握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那么写毕业论文也就会水到渠成，不用发愁了。

王先生以教课和做卷子结合培养学生的方式直到现在还被一些老师们用着。前几年我的学生赵大莹曾去参加北大荣新江老师的文书读书班，一去就分配做卷子，虽然学生们一开始完全不摸门，但做着做着，就逐渐熟悉起来。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同学间的交流，赵大莹也在很短时间内就了解了敦煌学的知识和用书，她所作的祭文研究，已经要在《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可见王先生的教学方式已经被继承下来。而荣新江不久前带同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对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进行的发掘整理以及大量成果，也证明这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而行之有效的一条途径。

王先生的教学是唐史与文书并重。除了做卷子，王先生给我们布置的另一项作业是校勘《唐六典》，底本是广池本，每人五卷，要求在一个暑假之中完成。王先生先给大家讲授了《唐六典》的版本，然后又讲了一些校勘的基本常识和校勘记的写法、校勘用书等等，就让我们自己去做了。记得那是我用功最勤的一个时期，整整一个暑假，我都在挥汗如雨地干这一件事，到得开学，才终于能够圆满地交上作业。我至今保存着这份由先生批改过的作业，

是《唐六典》的“卫尉宗正寺”到“太府寺”。其中对我没校出或者虽有异文却未作判断的地方，王先生都予以指出或补充，有的注明“再考”、“再查”，如关于“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一条，我只以扫叶山房、广雅本对照，并引用《职官分纪》之说，先生却批：“查出《六典》补文所引《通典》、《隋志》、《魏志》的依据，再详考之。”对于有所发现或者考订清楚之处，先生也有“是”、“甚是”之类的批语。校勘《唐六典》只是课业练习，但通过亲自动手，我却真正实习了那些“版本校”、“自校”、“他校”、“理校”的基本规则和校勘记的写法。后来我也让赵大莹做过《六典》的校勘，同样只是练习，也像先生那样批改她的作业，没想到不久后在我们整理校勘天一阁明本《天圣令》时，这些知识和训练竟然都用上了。

回想起来，我从王先生那里学到的，包括文书、文献史料校勘以及一些唐朝制度史的知识，都是唐史基础的基础。王先生注重的是基本训练，记得有一次我和他散步到东校门，王先生说：“都知道京剧演员有“坐科”，要入科班，是因为可以学得许多基本功。坐过科的演员不一定是名演员，是天才，但舞台上一招一式皆有所本。学历史也是一样，之所以要到学校里来，就是要接受基本功的训练。接受过训练的人和业余自学是不一样的，我要做的就是教你们这些规矩。”到现在我总记得王先生这些话，并且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基本功的重要性，知道无论做任何方面的研究，没有基本功是走不远的，而最精彩、最深刻的发现，也常常与对制度的理解有关。

后来，我公公知道我发表文章很欣慰，笑着说：“王先生还真是会教学生，你们几个都学得很快，看起来王先生还很有一套办法。”其实王先生的办法显然并不是一般所认为“聪明”的那一种，也不是可以不费力气的“终南捷径”，但可以让基础不一定好或者并非天才的一般学生得以领会而很快入门，并最终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却自有他不可及的长处与道理在。我想王先生的做法真正是有教无类。郝春文教授有一次提起王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研究和教授学生成材的贡献非常感慨，认为是应该在将来的学术史上大书一笔的。但窃以为先生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如果能够通过他的学生们被一代代学者传播和继承，那将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和褒扬。

四 讲授、继承陈寅恪

和王先生聊天，谈得最多的无疑是陈寅恪先生。熟悉的人都知道，王先生基本是三句话不离陈寅恪，作为他的学生对这一点都习以为常。王先生对陈寅恪的崇拜发自我内心的体会，也源于他多年追随陈寅恪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他经常讲的是陈先生如何上课，如何教学，即陈先生的教诲。他最尊崇的是陈先生的“贬斥势力，尊崇气节”，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典范，并且将自己的一生，也仿照陈寅恪先生去做，生活清贫，随遇而安，唯以学问为追求。

王先生在学界一般的看法中，从来都不被认为是陈先生最聪明和学术最有成就的弟子，但我想他至少一定是对陈先生最忠实、最本分，在教学实践中也最能够认真贯彻老师原则的

学生。王先生始终认为他有责任将陈寅恪的学问告知我们，并希望我们能够理解陈寅恪，继承陈寅恪。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写文章，发凡起例，也往往提到陈寅恪，知与不知，懂与不懂，对陈寅恪先生关注的问题多少能够有所了解，对他的研究方式也多少能够有些领会，这对个人后来的研究确实发生很大影响。

而我体会王先生自己在学术研究的很多方面也是继承陈寅恪的。不了解的人会从王先生老迈的身体动作和待人接物方式误以为他是很老派、很守旧的人，并从王先生的文章中大量史料的引证认为先生只重考据，但我知道不是这样。先生虽然不擅长像陈寅恪先生那样进行框架式、脉络式的演示和论述，但决不是见小不见大。举凡先生发现和论述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特别是经济史、制度史方面，其中五十年代初虚实钱和虚实估研究，是关于唐朝钱币和物价关系的最早、最具实质性也最有价值的研究，我认为今天虽有进展，但先生或许受寅恪先生影响，最早关注这一影响唐后期国家经济的核心问题，在论述的细致和深刻程度上也确实起到开先作用。他后来又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中总结陈先生读书札记有“关于唐代估法十一条札记疏证”，足见他对这一问题领会和研究之深。他的户籍、差科赋役与土地制度的研究、流外官的研究，均发前人所未覆，且有不少是制度难点和要切之处。更重要的是勾检制和四等官制，乃读懂敦煌文书的基础，也为认识唐代官制和行政制度的一个关键。在王先生之前，研究官制的人，大多只是从官僚机构设置和官员的一般职能出发，很少去注意行政制度的运作方式、效能与官员设置层次之间的关系，而勾检制和四等官制正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桥梁。先生的创作其实是为我们开拓了研究动态的、活的制度史的先例，这是先生对丰富唐代制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王先生自己从不写空文，也不写泛泛之论，不写糊里糊涂、东拉西扯，说了等于没说的无用文章。记得他在讲《通典》时，特别指出李翰序所批评的“而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以及《四库全书提要》对杜佑“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者可比”的赞誉，我想先生是深悟其中的。他善于小中见大，发现问题，并且进行实证研究，的确成就为详而不烦、简而有要的有用实学，因之具备深厚考据功力的问题性研究也是他本人的学术特点，许多重要的发现迄今仍无法超越。

王先生对陈寅恪学问的总结，也透出他对陈寅恪的理解，以及他本人的境界和眼光。王先生对陈寅恪的理解最见诸他的《陈寅恪史学述略稿》，其书指出陈寅恪先生史学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来自乾嘉学派，而是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论述陈先生称赵宋文化为“民族遗留之瑰宝”，继承宋贤“求真实，供借鉴”的史学思想和长编考异之治史方法，最是高屋建瓴，也最是切近陈寅恪的确论。还有他关于陈寅恪三部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其他三篇重要文章的主旨述要以及对《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的疏证，都是对陈寅恪思想和学术的切实理解和阐发。王先生所选陈寅恪三篇文章中除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外，其它二篇《吾国

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与《朱延丰突阙通考序》均为研究者不常提到。然而前一篇他指出陈先生关于追求本国学术独立，“国可亡，史不可灭”和放眼世界学术的思想，后一篇则指出陈先生立意痛矫时俗轻易著书立说之弊，加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关于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以预学术新潮流的论议，确实代表了陈先生的一些重要学术思想，也体现出王先生自身的洞见。

关于陈先生的札记疏证，王先生也一如既往地用史料和实证方法予以说明补充，例如有关黄头军，王先生总结札记共有 13 条。此项发现陈寅恪先生仅指出黄头军善战的蛛丝马迹并疑之为回纥族类。王先生自己对此课题也做过深入研究，故对忠武黄头军为回纥或者铁勒（敕勒）族类，及其平淮蔡、平黄巢和防御陇州、守陈州的一些功业，引述诸多史料给以具体解释笺证，不但能使我们理解陈寅恪观点的出处由来，事实上也教授了怎样读书和发现问题，对于今天的青年研习者尤有指导意义。



吴丽娱（右一）、王宏治（左一）与王永兴在北大蔚秀园书房，1994 年

五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学术研究

王先生在他的上述著作中对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所阐发。他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乎民族气节，“乃吾华夏民族人生及历史发展之最高境界”，为寅恪先生史学思想之根本。王先生还总结宋贤史学之精义在以民族国家之存在发展为其归宿，继承宋贤史学之陈寅恪史学也是如此。这一点不仅关乎思想也关乎学术研究本身，精密的考据之法并不是陈寅恪史学的全部，因为“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

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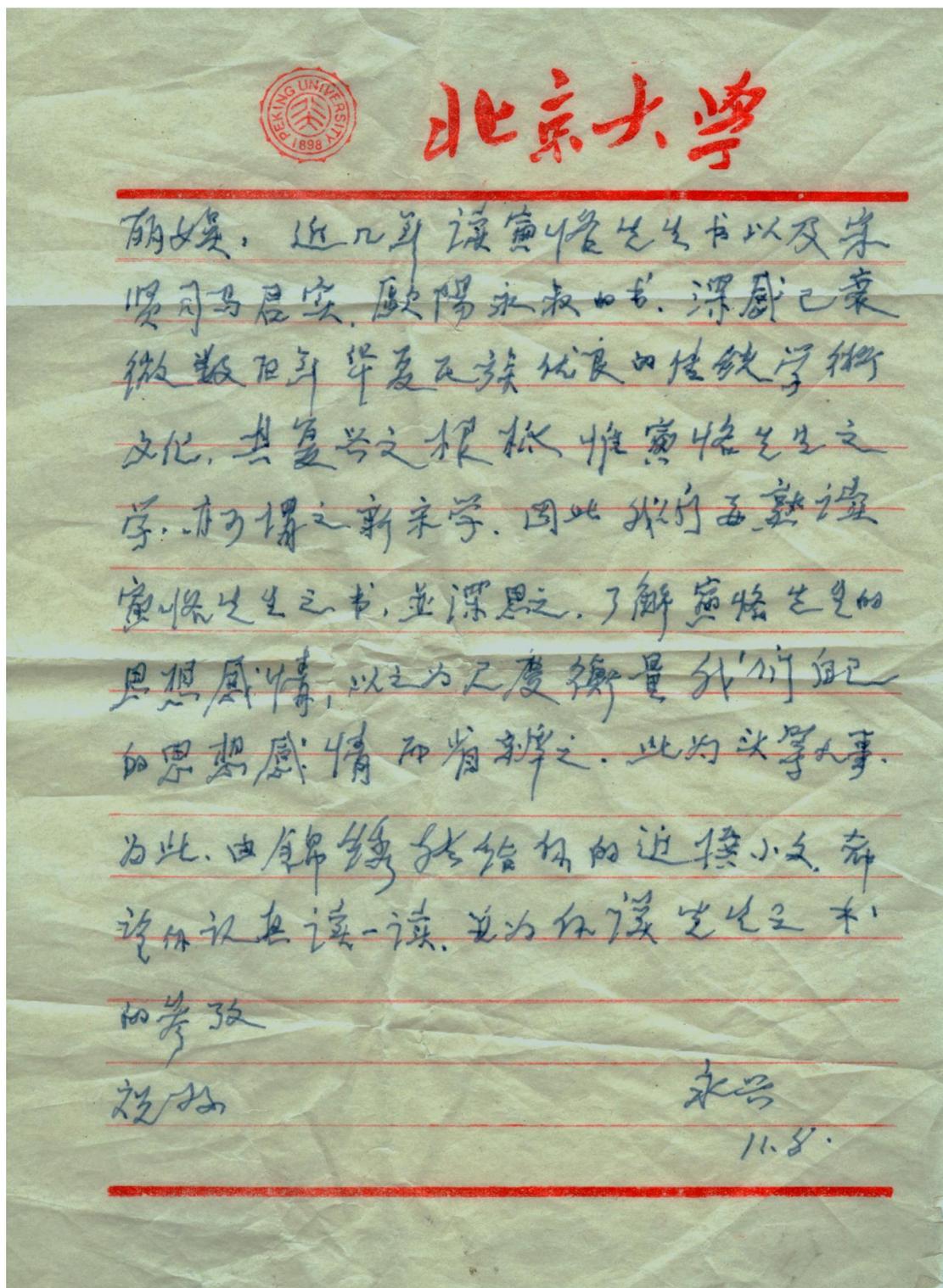
窃以为，王先生本人也有这样的思想和特点。他从来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年轻时参加一二九运动，编辑杂志，写了许多充满现实思考、鼓动人心的爱国文章。见到这些文章，就会知道当年的王先生是怎样的年轻热情，思想活跃而有着旺盛的精力，也会意会到王先生是一个要做事的人。他一生除了是读书人，还曾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有着充分活动能力、具备前瞻性眼光的实干家——后来敦煌学会的建立和王先生在其中筚路蓝缕的贡献说明了这一点。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表现机会，但也许正是这样他才更能理解陈寅恪。

和锦绣谈起来，我们都认为先生是一个具有开拓性和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在他个人的研究和言传身教中都体现了独立精神。在学问方面，先生从不囿于前人成说和为教条左右。五十年代中，他并没有陷入那个时代“五朵金花”的框框，而是从攻读敦煌卷子开始，打开了经济史研究的思路，并因此最早与国际接轨。他在命运给他的最后三十年中不畏艰难，从头做起，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他的研究虽细微而关乎大局，但他关于经济史、制度史和后来关于军事史的论述其实都蕴含对大问题、大方向的追求，且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陈寅恪，而是同样体现着人文关怀，是具有一定规模系统和独特风格、历经严密思考与实践的一家独创。他将敦煌文书结合制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唐史和敦煌学学者而言开创了一种最具实用性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赶上和超过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步伐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而正如上面所说，他的读书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但教育了一代学者，至今也仍被使用和证明为最成功的教学方式，在此基础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通过他的学生们的论著得到发扬和体现。

不仅如此，我在自己向王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他对独立思考和个人发明创见的提倡。我惊异地发现，王先生虽然从来反对“好为异说”，但对我在读书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往往非常理解，而且很快便捕捉到其中的一些亮点，鼓励我发挥出来。最初是在作毕业论文时，我向先生说明受皇帝支持的财政使职的发展与宰相中枢机构的矛盾，并认为这一矛盾构成了安史之乱后一段时间之内的政治斗争与人事纷争，元和以后财政机构才逐渐统一起来，我的想法暗合了陈先生关于中古史分期的理论，立刻就得到了先生的支持。这以后，每当我向先生兴奋地谈到自己的一些思路时，先生无不给予鼓励。而在他的教导之下，我一方面读书问学从不赶潮流、追时髦，另一方面也向自己提出要求，就是研究问题必须从细处着手，而且越细微、越具体越好，但是必须有大方向，也就是一定要注重其中的变化发展，并归结到民族国家的大问题上。而由于从研究生论文开始，涉及的就是唐后期和唐宋之际，所以以后的问题研究亦多与之有关，这使我对陈寅恪的理论愈来愈体会深刻，从中也领悟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学术研究之含义和分量。

王先生从来鼓励我们研究大问题，而且主张我们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毕业后他仍旧指导我的研究，几乎每一次去看他，他都会和我散步出来好远。有一次是在晚饭后，坐在校园

的凳子上，他问我有何打算。我告诉他准备作盐业史，他说盐业史范围太小了，为何不作财政史？你可以作财政史，卢向前作均田制和经济史，这两个题目，过去陶希圣、鞠清远他们作过，现在再作，都会有很多新内容。我那个时候缺乏自信，研究进展又很慢，所以不敢承担，也没有意会到拓展财政史研究的意义，但是先生的教导和谈话的场景一直都印在脑海中。后来李锦绣完成了财政史的课题，果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王永兴写给吴丽媛的信

想起来，我的研究在先前的一些年进展慢，既有基础不够，也有放任自己的原因。一些已经计划好的课题都没有完成，很辜负王先生当初对我的期望。先生曾经很为我着急，每次见面都要问我在干什么，要我抓紧，但没有过多责备，对我还是鼓励多，而且始终认为我能做出来。最近的十来年，我比以前抓得紧，而且从书仪开始，重点作礼制研究。先生知道很高兴，由于住在一个城市，我和先生很少通信，但最初论文写好后，我有时仍然送去请他指导。而他每次都来信提出过很多具体意见，指出创建和缺点，甚至一条条的指明细微错误，这些信我至今保留着。不过，先生最关心的是《开元礼》，经常问我所作是不是涉及《开元礼》。《唐礼摭遗》一书写好后，我请他为我写序，他在序中又提到《大唐开元礼》的重要，并且说：“理解《大唐开元礼》及唐社会通行礼仪，诚非易事，然如以坚毅之精神与实事求是之精神进行研究，孜孜矻矻，终必有成，愿黽勉为之。”这些话正是对我提出的厚望。想到先生九十岁还在写书，并且还学电脑，听锦绣说2006年他生前所出最后一本书《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就是自己用电脑打出来的，和先生比起来，我的确努力不够，不免深感惭愧。

我在之后总算尝试着作了一些《开元礼》。记得大约是先生去世的前几年，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正在从头读《资治通鉴》，想起陈先生生前曾提到周世宗其人很重要，所以准备研究周世宗问题。又说因读《通鉴》，想起《开元礼》，问我作得怎样了。我将自己的一些发现和想法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要我把已发表的论文给他送一些过去。这个电话是先生最后一次和我谈学问，竟打了一个多钟头。这次的谈话真让我感到，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关心、理解我，于是便如约将论文交给锦绣。锦绣笑说：“你的这些东西，恐怕他已经看不懂了。”果不其然，过了些日子，先生很遗憾地对我说：“看你这些文章，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好，要是寅恪先生看见，也会高兴的。”

这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我不敢自以为拙文能入老师的眼，但是我理解老师的心意。他在“八十述怀”一文中说：“留此健康的身体做什么，我要等着、看着、指导着这几个青年学生，在继承发展寅恪先生文史之学的庄严事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我知道老师心心念念都在想着发扬陈氏之学，他也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创建与成就。我后悔自己做得太少、进步太慢，但只要想着老师的鼓励和期待，便始终不敢放弃，并且决心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断地超越自己，为弘扬华夏学术作出贡献。

先生去世前的最近几年，我去得少了。但是每到春节，我和王宏治、金锋都会约齐，由赵珩开车一起去看他，给他送一些年菜和过年礼物，听他唠叨几句陈寅恪、点校二十四史，怀念与我公公的友谊，等等。生活平静地继续着，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记得病中我去看他，呆了不长的时间，他已经认不出我，而这次会面，竟成永诀。言念及此，与先生在一起的情景历历在目，对先生的哀思不绝如缕。逝者如斯，其能免乎！唯以此文，敬献于先生灵前，不知先生在另一世界可能得见否？

清明祭先生

卢向前

一

“先生走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锦绣的声音，我禁不住心头一阵酸楚，先生于我情深意切呀。我搁下电话，对妻说，王先生走了，我要去送送。妻说，应该的，是要去送送。妻跟先生并没见过面，但先生于她还是很熟悉的，在每次先生给我的信中，总是不忘在最后说上一句，问全家好，当然也包括了妻。

在告别先生仪式举行的前一天，我往先生在北大燕北园的家中走去。天下起了雨，裤脚有点湿了。我很诧异，在我这个南方人的记忆中，北京似乎从来没有过像样的雨，求学七年（1978—1985年，寒暑假在外），好像仅有一次稍具规模的雷阵雨，以至于我的雨具，只有一顶老家所带的小笠帽——莫非先生走了，老天也来送送？

先生的灵堂设在书房中，十数平米的书房中央还是原先的两张硕大的书桌，占据了六成左右的空间，桌子的一侧是两张椅子，另一侧则留出了通往阳台的狭小的过道，大约仅能容人侧着身子走过，而排在三面墙壁的则是顶天立地的书柜，满满当当的是书，书桌上还是横七竖八的书，有翻开的，有堆在一起的；桌上还有电脑，接线板也搁在桌子上。先生九十岁高龄的时候，还在学着电脑，他写信告诉过我。我没有看到过他是如何在电脑上写作的，但最后的几本书，或许就是他用一指禅法敲击出来的？我想。

进门右侧的一角有一张小小的茶几，上面放着先生的遗像，还有祭奠的苹果，又有几支燃着的香，大约是三支吧。幽幽的烟散发着清香，充盈了整个书房。我向先生鞠了三躬。先生微笑着，稍微侧着身子，眉毛上扬，嘴角也上扬着，眼镜后面是透着睿智之光的小眼睛，清澈的目光如同他往时的模样看着我，开口就是亲切的“向前哪……”我忍不住泪水，任它在脸上纵横，听锦绣述说着先生最后的日子……锦绣向我征询，明日送别先生，就用这相片，王先生喜欢的……我说，这张好的，乐呵呵的……

八宝山的仪式是北大历史系王春梅老师主持的，她依然那样干练，只是人清瘦了许多。二十余年的沧桑，在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锦绣说，先生的丧事准备，系里做得很好。北京的告别仪式与杭州的不同，杭州的还多几道程序：先让吊唁者集在大堂，由单位领导作出对死者一生的评价；接着是家属代表致答辞哀悼；然后才是吊唁者的瞻仰遗容。王春梅老师善解人意，以为先生对学生好，学生对先生也好，于是便让我们学生与先生的亲人一道先

行瞻仰遗容。赵和平、吴丽娱、王宏治、金锋、宁欣、李鸿宾、李智生、牛来颖和我等，都肃穆着，贴近着看先生最后一眼。

先生躺着，形容有点憔悴，又有点严肃。憔悴是因为读书读累了？严肃是因为要去见先师？我不知道。我呆呆地行着注目礼，脑中不禁思绪万千，浮现出与先生在一起的种种情景。

一片春光烂漫的日子，未名湖边杨柳芽儿初绽，而在春风拂面中，先生和我绕过体育馆边上的小桥。我傻傻地问先生，毕业论文要多少字，先生笑了，笑得很畅快，不紧不慢地说，寅恪先生那样的，几百字就足够了，如果是言不及义，则多少字也不行的。我底气不足，他在宽慰着我呢。

又在一个夜晚，天凉凉的，先生从成都开完唐史学会回来，我去机场接他，11点多了吧，还是走在湖边的路上（那时先生住在健斋）。先生说着会上的事，我觉出了他的兴奋。先生兴奋的原因，并不在会议如何精彩，却在唐长孺先生（是否是唐先生，我记不确切了）夸了他的学生。说他的学生好，先生比什么都高兴。

我记起金锋和我完成学业，告别先生与北大的事。那一天。先生带着我们，从朗润园先生的家中走出，漫步在校园北墙内，一直到东语系西侧的桥边，就那样踱着，两三个钟点呢。很好的太阳，不冷也不太热的和熙。小径斜斜，树木朗朗，流水潺潺，芦苇丛丛，牛来颖为我们拍照留念，令人心醉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喔。但先生有些伤感，我和金锋也有些伤感。



金锋（左一）、卢向前（右一）与王永兴在北大图书馆前，1985年

我的脑海中掠过了1992年房山的敦煌吐鲁番学会大会，先生兴致很高，参观了云居寺，又去走石花洞。洞窟暗暗的，很深，很陡峭，直上直下的有百数来档吧，都是简陋而结实的铁扶梯。我扶着先生，一步一数。我没看清石花为何物，只是为先生的矫健而喝彩，那年先生该是78岁。

我的思绪还走到了1998年，那年暑假末期，我陪着母亲携着女儿到北京观光，虽近九月，天气却闷热得很。我们三口就住在燕北园先生的家。先生不嫌劳扰，嘱锦绣每天为我们准备好吃的。先生以为我遂了妈妈的心愿，很好……

告别者排着队进来了，绕着先生的遗体一周，我们还是跟先生的亲人们一起站立在先生一旁，接受人们的吊唁。

昨日的雨把天空洗刷得瓦蓝瓦蓝，九月下旬的近正午时分，太阳很有些灼热。吊唁大堂的走廊墙壁上，贴着一些单位个人的唁电唁信，浙江大学历史系的也在上面。宽广的、层次起伏的厅前广场上，另一丧家的仪式正在进行。他们的仪式颇壮观：穿着似乎像军人礼服的引导者迈着正步，接着是洋鼓洋号，后面跟着悲悲切切的亲朋好友。但我想，先生不会喜欢这样的吧？

锦绣捧着先生的微笑着的遗像从大厅右手侧屋的步阶走下来。遗体的火化还得一些时

候，我们不便久留，也不便打扰锦绣，只是向王春梅老师道了别，就真的跟先生最后一次的告别了。走好，先生。

二

我最初单独谒见先生，应该是在 1979 年的九月吧。

那一年八月底，新学期开始了，二院走廊贴出的课程表上有一门“敦煌文书研究”。那是先生与张广达先生共同为赵和平、安家瑶他们这一级研究生开的“研究课程”（先生语）。78 级的本科学生，经历过多少年的知识饥渴，也不管研究不研究的，呼啦啦一下子去了 20 多人。第一次课，两位先生都在，他们都很高兴。张先生上第一节课，先生就坐在下面第一排。柳园，斯文赫定，徐松……莫高窟，西域，斯坦因……简单的介绍把我们引进了敦煌学的殿堂。

第二节就是先生的课了，花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戴着近视眼镜，穿着对襟的有纽攀扣的衣服，脚上是布鞋，很和蔼的一个老头——这样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一留就是近三十年，似乎什么时候都没有变过。先生以《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给我们以敦煌学的启蒙，一板一眼的讲解，声音很好听、咬字特清晰……留的作业则是通读这件文书。

课后便很认真地读起来。有的能读通，有的则迷惘；读通了，兴奋，读不通，苦恼；读通的很想显摆显摆，读不通的则希望能得到指教，于是便去找先生。

先生从山西调来不久，住在当时北大出版社边上的一幢宿舍楼里，靠近南大门。上得二楼，我敲开了门，斗室一间，白天也点着好像是 15 瓦的白炽灯，有些昏暗，家具书籍和碗筷之类零乱的随意摆放着。我便站在了先生的面前，嗫嚅着，有点兴奋，先生安静地听着，不嫌我的鲁莽，不怪我的浅薄。我记不起先生说了些什么，但我觉着先生听到后来似乎也有点兴奋——而我在先生面前的这一站，犹如先生在长沙听先师之课便有跟随之默契一样，从那一天起，我便有了立雪王门之缘分。

先生和张先生为我挑了 P3714 号背面文书作课程的研究工作，先是录文。先生的要求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录，纵是错字别字还是其他什么字，都抄录上去，容不得半点的改动。先生喜欢说“一个字一个字”的，让我们读书也是说“要仔仔细细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我记得，当时的录文是在北大图书馆一楼东北角的一个阅览室里进行的，条件稍艰苦，大白天都得把窗帘拉上，布置得像暗室似的，角落里摆放着显微机，手摇的，用猩红色的灯芯绒罩着，有点光亮，是灯光打在白色的台面上反射出来的光。暗室里面充斥弥漫着的似乎是霉味，还有胶卷因灼热而散发出来的焦臭味。把半个身子埋进机器中，目光便紧盯着台板反射出来的字，不多久，便有点想呕，是一种强烈的晕车感觉。但大家都有着投身于科学研究的兴奋，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录着文。认真的工作得到了回报，我和同学们的录文都得到了两位先生的首肯。

录文认字的不太容易，还在于文书本身的字迹就难以辨清，而翻拍的胶卷质量不过关无疑又增加了难度。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认字的事也是常有的，而一旦认出一个不清楚的字来，便犹如破出一个大案，是很让人高兴的。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而愉快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虽是无稽之谈，却令我很开心的一件事，让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北大历史系名声大噪，直到我在南方任教，学生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假期回母校见到我，还跟我说起我的“特异功能”是如何如何的厉害，如何如何的轰动呢。

“特异功能”之类的说法，追根溯源，是邓小楠的发明，但她无非是夸我的认字功夫还不错，夸张一些，则是能多认几个人所不能认之字而已。而善良纯朴天真如先生与张先生者（邓广铭先生亦曾亲自向我询问过此事，或许是邓小楠向他吹嘘的吧，我想），却宁肯相信他们的学生真有这样的本事，而为之鼓吹欢呼。于是便有了季羨林先生请我吃饭的美谈。而得以谒见季先生，领受季先生的赐食，实在是拜先生之所赐。^①

录文以后便是撰写论文。两位先生耳提面命，于是便有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发表在周一良先生作序、邓广铭先生题签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上。同时刊出文章的还有我们七八级的同学荣新江、邓小楠、薄小莹、马小红、蔡治淮诸人。

三

在先生的指教之下，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粗粗地盘点一下，从1982年起的十数年间，我的成果的发表，都与先生有着关系。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五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实际上以先生为主要责任人，我在其上发表五篇论文，^②这些当然与先生及张先生的器重提携有关，而其他各篇亦多因先生推荐而发表。比如刊载于《敦煌学

^① 季羨林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先生曾在他的博客中撰文述季先生请我吃饭之事。此事实有，但史实稍有出入，更正之，更可见季先生为人。1981年王先生嘱我读一件敦煌文书，有关“煞割令”的，实际上，此文书已全都读出，我只是在显微机下校对了一下。不曾想因了此事，1982年的一天，居然有季先生的秘书李铮先生到38楼学生宿舍，代季先生送我1982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一册，上面发表有季先生关于食糖生产制作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章，与敦煌文书“煞割令”有关。让我激动的是，在季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印刷刊物上。更让我激动的是，李铮先生还代季先生邀请我和荣新江、李鸿宾赴宴，并把时间地点告诉了我们。我们当然很高兴，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季先生赐宴的地点在北大正校门对过新开的一家西餐馆（好像是蔚秀园大门的边上，现在那西餐馆已经不在了，实在遗憾），到那天又是李铮先生把我们接过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荣新江和李鸿宾也应该是第一次吧。为招呼我们吃好，季先生还请来了邓广铭先生和先生作陪，再加上李铮先生，四位先生三个学生共7人。我的印象中，季先生基本没吃什么，只是动了动筷子，说晚上还有应酬，就坐着说说话，有点沙哑的声音，很慈祥，很有特色，听着让人舒服。邓先生和先生吃得很开心，兴高采烈、大快朵颐。我们学生当然有点拘束，但还是吃了不少。最后结帐，27元人民币，季先生买单，李铮先生付钱。临走之际，季先生嘱咐李铮先生打包。李铮先生收拾起来非常利索，似乎习以为常，而我则是第一次见到。

^② 《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和余之特点》，分载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一辑、二辑、三辑及五辑。

辑刊》的一篇金山国文字，是先生向齐陈骏先生推荐的^①，《陈寅恪先生的之史法与史识》的发表于《学人》亦是如此。我留存着的王守常先生的信中就有：“王先生将您的文章推荐给我们编的《学人》杂志，我们准备录用”云云。而《胡化婚姻》一篇，先生还与宿白先生一起，联名推荐给了《文史》^②。此后，拙文虽亦有自行投稿者，但我仍然将每篇习作请先生把关，无论何时何地，仍一如当年在先生跟前。

至今我还保留着数篇先生批阅我文稿以后的意见书及信，其中关于市估文章的一篇道：“（一）估法是官方买卖的价格依据，估法对民间交易具有约束功能。这二论点欠妥。我意，凡在市面上买东西，都要依据估价。就天宝市估案而论，交河郡市上的东西，一般都是私人的，买物者，大多也是私人，但要依据三等估。药材类，尤其明显。（二）实估（时估），虚估，省估。我曾有过虚估就是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之估的想法，如一匹绢为钱四千等等。但这一论点的证据不多，你也只举出一条例证。很不够。省估的‘省’，应指尚书省，即户部和太府寺，韩（国磐）先生的意见仍值得考虑。我一向感到省估即虚估，但又有一些史料解释不通，可是省估高于实估。实钱可能据实估所定之钱，则高出者就是虚的。总之，这一问题又涉及到实钱虚钱，很不容易解决，应再考虑。（你说的）‘省估亦即实估与虚估的折中’（27页），也缺乏证据。（三）通篇有不少新的意见，很可喜。但论证不够严密，应注意。”

先生批阅有批评，有肯定，有分析，有建议，有先生自己的读书心得，对于我的启迪当然是很大的。而说我的篇目中也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大约不会过分吧。自今以后，想有如此之帮助则不可得也。思念及此，不禁黯然。

离京以后，我到杭州工作，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他怕我在外地资料不足，遂与季先生一起为我申请了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课题经费，让我能有钱买一些书。这可是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笔个人科研资助经费。

先生还从全局上为我把握着研究方向，他在一封信中说，“关于你目前从事的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研究，你已经抓住头绪，很好。我想（希）望这一科研项目最后成果应是两大类，（一），如三百年货币^③一样的一大批高水平总括全局的论文。（二）一件件经济文书的整理研究（包括一个个问题（的）解决）。”

当我向先生讨教为研究生开什么课，如何讲解时，先生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你给研究生开课，我建议为：唐史专题（或唐史选题），一年，每周二课时，讲的内容：多年来你研究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心得和创新，分若干题课（课题？），着重讲读书方法和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对）学习寅恪先生读书及研究方法的检阅。也可以少（稍微）讲一点目录学和版本学。”

我曾有一段时间因职称问题而烦躁，人谁没有那样的时候呢。又是先生宽慰我，并且积

^① 《金山国立国之我见》，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② 金锋说，他曾收到先生与宿白先生联名推荐信。金锋当时在中华《文史》编辑部。是文后来由先生抽回，未在其上发表。

^③ 三百年货币，即拙文《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先生记忆似误。

极推荐，让我的一些成果得以结集出版。我的同事们说，你这可是第一个，我们这里的老先生都还没有出个人论集的待遇呢。我想，先生为我着急，为我焦虑，为我奔走呼号，这一切的一切，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偏爱吗？也许是的，但又不仅仅如此——我完全相信钱文忠先生所说的年迈的先生到新任大学校长那里为一个年青学子诉说的真实性，先生做得出来。

先生的帮助，先生对我的好，我是永远记着的。

四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的上课应该是努力地向陈寅恪先生学习着的。先生说起听陈先生的课，是一脸的神往：挟着蓝印花布包的一大包书，进教室，打开，翻开书，往黑板上抄，满满的一大黑板，讲解；擦去板书，又抄，又讲……陈先生的一方块的印花布，在先生那里换成了黄色的帆布包，很大的，沉沉的，由李智生扛着，由牛来颖扛着走进教室。我还记得马小红好像也扛过，但我没有扛过，先生自己也经常扛着书包走进教室。于是，在我们的注视下，先生照样地抽出书，照样地抄着，也是满满的一黑板……而听过先生课的，则深深地记着“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的声音，郝春文就对我说起过这件事。赵和平也对我感慨过，咱们先生严格要求读六典，我能背出六典的不少条目，哪像现在的学生……说来惭愧，我是过去的学生，但我不会背，我也只能是现翻书。先生，对不住。

先生上课有时也提问，大家都有些怕被先生点到名。而我则是经常被点到名却不怕站起来回答的少数几个学生中的一个。能回答得出来，当然不怕，还有点得意，但这是少数的時候，更多的次数却是回答不出，但我也也不怕。这原因一在脸皮厚，而更重要的，则是我直说不知道，我找准了先生的弱点。先生最烦的是不知道却瞎说，他常念叨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低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就因为不知道先生的脾性，不懂偏要装知道，站起来瞎说一气而当场被先生拍板砖的。有时候，我也弄些似乎是玄虚的东西，但那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不糊弄先生。记得一次课上，先生曾问吐鲁番文书中西州土地制度的问题，我心里没底，于是便这个特殊性，那种普遍性，这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绕来绕去，似乎把先生给绕糊涂了，于是，他很高兴地让我坐下，认为我答得不错。课后，同学们大乐，耻笑着说，老卢的哲学战胜了先生的历史。这真是师生间开心的时候啊。

实际上，我知道，先生对我，是宽容的，宽容得甚至有些偏袒。我这个人，写错别字不多，而读错音的事则常有。比如“租庸调”的“调”，我总是弄不清该读阳声还是去声。锦绣说，王先生是因人而异的，人家读错了是水平问题，你读错了，只是（南方人的）读音问题。锦绣也只是调侃而已，有些人被先生批评并非全是水平问题，更多的则是掩着掖着，没有知错认错勇气。

当然先生对我也不是一味地宽容，我也尝到过先生严厉的滋味。记得一次写论文，引了《全唐文》的材料，先生掷下，要找出原出处，我心里一阵发凉。那时不像现在，电子版一

检索全都有了，上哪儿找去？但还得硬着头皮去翻书。三天以后吧，也不知道翻了多少书，找到了，在《唐文粹》上，其乐何如，其乐何如！谢谢先生。

先生还为我们的学习搭桥牵线，让我们请益于各名家。荣新江在《读书》2002年第6期上提到与我一起到周一良先生那里去的事，我记得就与请益有关，让我们去的就是先生。^①而如果宁欣还记得，则有我们二人一起到周祖谟先生家的事。周祖谟先生的家是出东大门往东走，走了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如农家小院的样子，平屋，外面围着参差不齐的树枝的栅栏，似乎还有一些砖石堆砌的围墙，干枯的树枝，有半人高的，也有长过一人高的。大约先生早就为我们联系过，所以推开栅栏门，长得清清秀秀的周先生便迎出来——北大的老先生都很讲究礼数的。我们跟着进门，也是一张很大的桌子，也是书，不过很整洁。外面的太阳温馨地照射到屋子里来，周先生坐下，让我们也坐下。我们把作业奉上，我的是归义军纸布破历有关萨毗、璨微对音问题的。周先生看了看，不说什么，只是向宁欣问宁可先生怎么样，身体好之类的。说了大半天，我正沉不住气的时候，周先生转过身向我说了，这是明摆着的事，你弄那么复杂干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懂音韵学，所以说得多一些。周先生也就不再就此事发表意见了。回去向先生汇报，先生倒是没有作大的改动就发了。另外有一次，我记得是先生带我到城里去见孙楷第先生的，坐公交，可惜没碰到，错过了见识孙先生的大好机会。

先生还过问我们听课的事。现下说到北大的蹭课，是如何如何开放，其实也不尽然。一些大课好像是开放的，只要老师不点名，或者是点名而不加理会，便有蹭课的机会。但一些严肃认真的研究课，还是大有限制的。郝春文他们听先生的课，就都办过听课证的。而宿先生为考古专业本科生开“隋唐考古”课，就不让人随便听。（后来的“隋唐佛教考古”也一样。）只是先生帮我们说了话，于是我们就能安然地坐在教室里听宿先生精彩的课。^②李孝聪则不然，他听宿先生的课可谓是三起三落。最初先生跟宿先生打招呼，孝聪大约不在其列。一上课，宿先生就让孝聪自报家门，一听不对，二话没说，提溜出门。下一次课，孝聪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埋着头，“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去”，自以为得计。但宿先生眼尖，一阵痛斥，孝聪只好背着书袋子怏怏而出。后来也是先生说情，才算是宿先生登堂入室的弟子。

周一良先生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开的课，又是先生打了招呼，我和金锋等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听课的。（周先生的脾气可没有宿先生那么大，即使没有先生的说话，他也肯定不会像宿先生驱逐孝聪一般，当堂把我们撵跑的。）

先生还为我们学生的学习而创造种种条件。我们那时代的同学们，肯定记得起北大图书馆的219室与213室的。这可是先生与张先生的杰作，是我们进行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根据地、

^① 荣新江关于电话约定之事的记忆似有误。当时电话尚不普及，我们也没有这个习惯，于是，造访先生都是贸然地闯进，周先生那儿也是如此。

^② 先生与宿先生是东北老乡，私交极好。先生常说起宿先生，我到现在还记得先生说宿先生“对目录熟极了”的口音呢。我未曾单独拜谒过宿先生，而因了先生的关系我至少有两次受惠于宿先生。一次便是前文提及的《胡化婚姻》推荐事，另一事是对我的关于《归义军破布纸历研究》的那一篇稿件留有一处批阅的痕迹，好像是关于“金步摇”的。

工作室。是向图书馆借来的，我们多少的美好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219 室在图书馆二楼的北面，十数平米，先生们调来了相关的书籍，我记得就有罗振玉影印的《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遗录》。当年，胡如雷先生应邓广铭先生之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就曾踱进 219，翻过那几本书的。219 嫌小了，于是换成了 213。213 在图书馆的西面，有三五间屋子大，中间三五张阅览桌，边上是书架，所调书籍更多，比如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法文版的马伯乐著的那本樱红书皮的书等等都在。学生在这里更能施展得出拳脚，读书，讨论，争辩，写文章，俨然成为一个学习的中心。而到这里的同学，不但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不但有本系的，还有中文哲学的，我的音韵学的知识就得益于中文系的一位低年级同学。先生很关心着同学，他总在每天（周六闭馆除外）晚饭后，大约 7 点多到 213 来坐一坐，看看年轻学子读书，即使不说话，脸上也现着笑容，有时要说话了，则总是先一声感叹：“哎呀~~~”。有时白天也来，但没有固定的时间。他就是来看看学生的学习，而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温馨的感觉。

就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先生不但敦促图书馆单独开辟出了一大间的显微机的阅览室，（有三间屋面吧，）购进了电动的显微机，还请图书馆配备了一个专职的管理人员。非但如此，他还有着一个宏大的计划：既然我们看不到文书原件，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文书都翻拍成相片，如同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那样，做成橱柜抽斗，以类相从（或以号相从），收藏起来，若欲阅读，则取出就行。这样的计划部分地付之于行动了，当我离开北大的时候，已经有若干的文书翻拍成了相片。

为学生的事，先生可说是不遗余力，而这又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吐鲁番学在北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此一领域的重镇，至今仍是如此。

五

同学赵国华当年曾经说起过先生的一件事。北大图书馆东面的草坪，他亲见巍巍的先生跟抄捷径的学生争执对峙，只为竖着的牌子道：请勿践踏。国华虽然帮先生，但也担心着，若是无良少年，当胸一推手，年迈的先生可能受得住？

我当然相信国华的话，我相信先生会那样做的。先生虽年迈却并非是文弱书生，他魁梧，甚至有点儿伟岸，身体颇健康。钱文忠先生在博客中说到过先生跑步的事，我也听先生自己多次说过。先生说他在五四操场能长跑多少圈，又说，最后冲刺能像年青人那般飞快。不过对他的话，我还是将信将疑。七八十岁的人了，还能飞快么。或许先生所说是理想的浪漫主义，我的怀疑则是历史的现实主义。但毋庸置疑的则是：先生有一颗年青的心！

当先生受邓广铭先生邀请，从山西又一次迈进北大，正与我们这届本科生同一年，那一年先生 64 岁。先生与我们一样，有着壮怀激烈的抱负。于是，当他听说日本学者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时，便是那样地义愤填膺。这当然可以理解，国仇家恨，自

身遭际，他都有资格怒火中烧，何况先生又是性情中人！而在学术上赶上日本学者，超过日本学者，以高水平的研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愧于崛起的中华，则成为立在他面前的一杆标尺，即使他那一代不行，还有下一代，再下一代^①！这是年青的心的强烈搏动。

历史的偶然性与它的必然性就这样围绕着一句话，戏剧性地交汇在一起。有着与先生同样信念的老一辈学者，很快地走在了一起。经过充分的筹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而为之身体力行的就有先生。他以年迈之身躯一次次地挤着公交，奔走于城里城外，呼号于上上下下，鼓吹于学界政界，游说于各级领导。这一切，因为他跳动着的是年青的心。

我想，当时参加学会筹备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先生是有着特殊的贡献的。这倒不是说，先生不参与其事，其事便不能成，而是说先生的作用在于加快了这样的进程。我知道，当年发起其事的带头人为季羨林先生，而先生本人不仅积极参与了成立全国性的敦煌吐鲁番学学术组织的活动，并亲自前往中央领导人处申请筹办经费。就像钱文忠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所说的，作为一二九运动一个学生干部的先生，还是很有一些领导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当年与先生一起干革命的同学、其时的中央领导，也深知学术振兴对于中国整个国家振兴的重大作用，于是先生的游说也便大起作用，一次性批给了经费若干。我就曾作为记录人员参加过学会的一次筹备会，同去的似乎还有宁欣与李鸿宾。会议在东语系的一间很宽敞的会议室进行，议题是学会理事会的组成，还有一项则是通报学会挂靠事宜。季羨林先生主持，教育部副部长、曾为北大书记的周林先生也在，周林先生对于学会的成立当然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而先生除了他的特殊作用以外，也是运筹帷幄不可或缺的一位人物。刘进宝曾约我写敦煌百年纪念文章，但在我看来，百年的回顾，我们做得够多的了，而三十年的回顾，还大有文章可做。比如，我知道在学会筹备工作中有一位教育部某处长章先生，所起的作用就颇大。前些日子，我还向柴剑虹先生询问过他的情况呢。

当着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紧锣密鼓地筹备时，曾有一段被邓广铭先生形容为“处在惨淡经营的难产过程中”（《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1984年）的经历。先生在此期间却不畏其难，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中心”的最终呱呱坠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亲见先生与中华编辑为《论集》是“文献”抑是“文书”一辞而据理力争；我亲见先生四处发信，力邀各路名家比如王仲犛先生，比如姜伯勤先生，为《论集》增光添彩；我曾陪同先生多次往北大出版社，与编辑先生为铜版还是克罗版（具体的我记不得了，是否为这样的概念我也记不得了，大约是吧）诸问题进行探讨商量，以至于好心的女编辑感动得恳请苍苍白发的先生无论如何不必大驾光临，只须差人交待就行，我在旁边则有“哀兵必胜”之感慨。无论如何，我想，先生用自己心血留下的五辑文字或可成为一个时代的“文献”。更可一说的，当年在教师编制整体甚紧的情况下，在先生与中心诸先生的努力下，竟然有以十数之名额下批，^②实在可称是一件奇迹。而这，不知道又花费了先生的多少心血，不知

^① 据传此话出自藤枝晃先生之口。但先生于日本友人并无私人的恩怨，后来，他对于藤枝晃先生的态度就很友好，曾多次说过藤枝先生是他敬重的一个学者。对于其他日本学者，先生也都抱着友好的态度。

^②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63个名额。

道先生又跑了多少趟北京城，而我知道的则是，当年的海淀实在算得上是郊外，而先生却是挤着公交去的呵。

既有远大的抱负，又有踏实的步伐，但还得有全局的观念。我以为，从根本上说，在最初，先生就为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先生多次说过，我招的不是敦煌研究生，我招的是隋唐史研究生。为敦煌学的发展奋战了半辈子的先生，说出这样的话，绝非是贬低敦煌学，他应该有着棋高一着的全局的观念。当多少年以后，人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更可见先生们深谋远虑的布局——他是为敦煌学的更深层次着想呵。

而这一切，都因为先生有一颗年青的心。

六

先生是个很可爱的老头。他没有什么嗜好，他喜欢工作，喜欢读书，喜欢上课，喜欢学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人是没有什么节假日的”。他的生活就是对于这句话的实践，而作为学生的我，则经不起大千世界太多的诱惑，总是愧对先生的。

和先生聊天的时间常有，多是听先生说寅恪先生的事，但似乎有过一两次也说过京剧。师生间说些“黑头铜锤”的外行话，蛮有趣的。先生说 he 喜欢听黑头铜锤二花脸，我也喜欢，于是便有了共同语言。其实我并不明白黑头铜锤是何等角色，我只是把大花脸、二花脸这类声音在鼻腔里打转的都当作这一类，觉着他们唱得好听，我的京剧知识也就是看过几个样板戏而已。但我在北大正宗听过袁世海先生的讲座，听他在三尺讲台上讲曹操，看他的脑袋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忽儿肩膀东倾，一忽儿又向西倾，一颦一蹙演示曹操出场目空一切的样子^①。我不知道曹操的角色是否是黑头铜锤，反正我在先生面前就摆出袁先生的样子说曹操，又说李勇奇，又说关团长，还说一说包龙图，逗得先生大乐之。这也是师生间互动互乐的时候吧。

^① 那一次讲座，讲台下学生起哄让袁先生唱鹧山，他婉言推辞，执意不唱不道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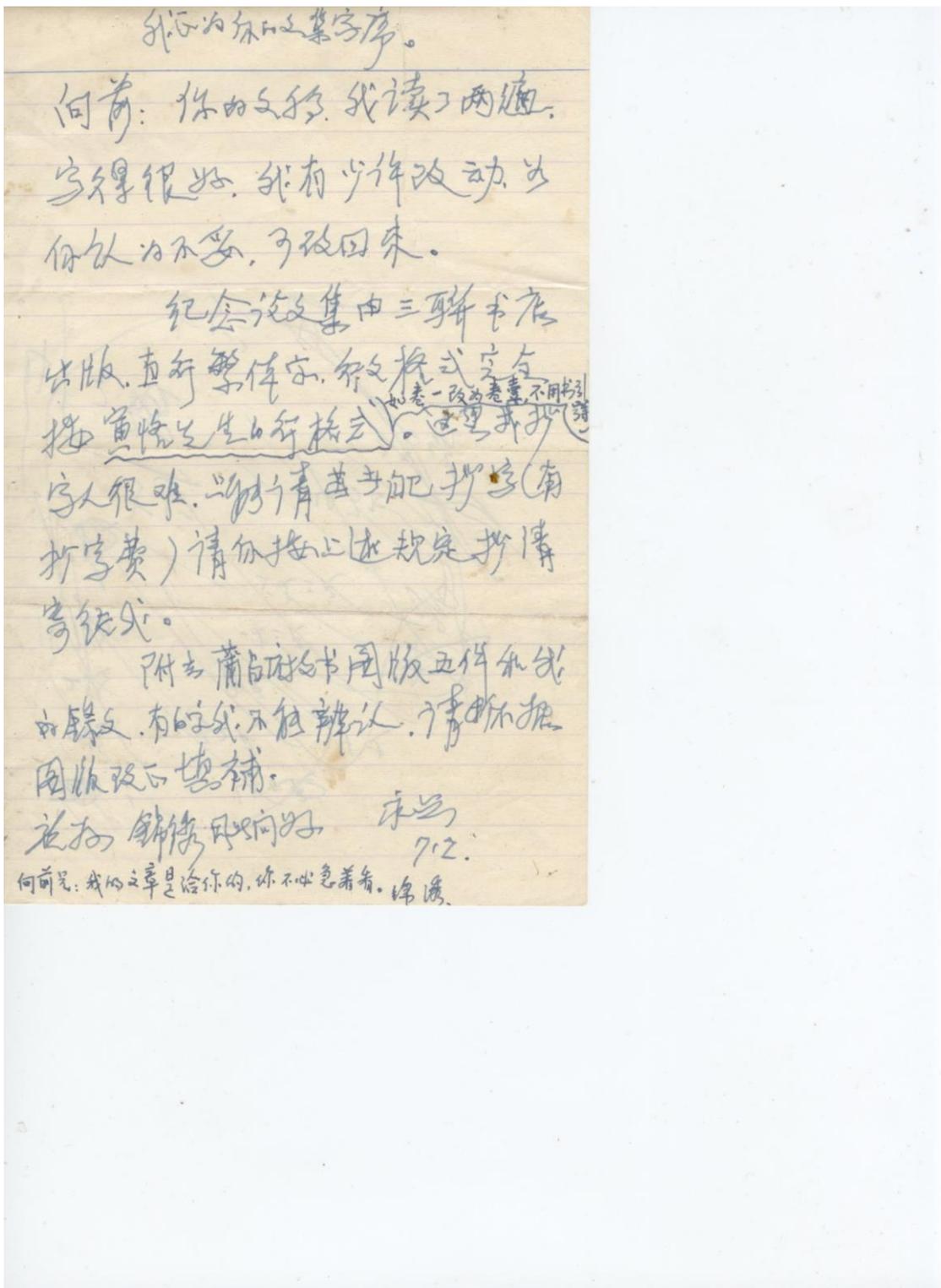
卢向前（左一）、金锋（右一）与王永兴，1994年

我有时也会用一些小伎俩“哄骗”先生，先生呢，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总是很开心的样子。比如1984年九月十月间的一件事，马力、李鸿宾和我毕业考察，出行新疆甘肃陕西河南诸地，预期一个月。回程中，至兰州，马力往宁夏走，我和李鸿宾在西安分道扬镳。我在西安有亲戚，便稍作停留。在计划中，还得跑三门峡、洛阳诸地，而华山虽在计划外，又是我特别想上的，屈指算来，时间大大超出了。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为了使先生同意我的行程特别是计划外的华山却让我耍了一点小聪明。于是，我就给先生写信，称司马迁因遍历名山大川而成就传世之作，习史者陶冶性情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乃应有之义云云；恳请先生同意稍延时日，以能登顶华山，圆我跋涉登攀“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梦想云云。我的信显然起到了效果，虽然由于大雨实际未能登顶，但当我回到北京，先生向我问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华山，知我未能成行，还直为我惋惜，连称“可惜可惜”呢。

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老头。

先生已走，一切都成过眼烟云，我心中念叨的只是他的好。史家又有为尊者贤者讳的教训，但在我看来，留下一个真实的先生，更是有意思的事。

前些日子，我路经杭州某中学，举目所见便是高楼挂着的两条大红竖幅：“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德，品德决定命运”。我为这绕口令式的四句话五对前后连续因果关系的概念所吸引。但细加思量，却觉得不对：品德果真能决定命运嘛，未必；思想能决定行动吗，不尽然，它颠倒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圣人之意。我想，改一改，简单一点，是否可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呢，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话接在先生身上大约没错。



王永兴给卢向前的信

先生有赤子之心，眼里容不得半点砂子，又胸无城府，喜怒爱憎形于颜色，还有点小性子，数者加在一起，难免要吃点亏的。自己吃点亏无伤大雅，有时却会因此种性格而伤及他人，他人厚道，或能体会先生之心，如果他人不地道，反噬之，就要吃些苦头——有时，我真的会带着崔永元那样的坏坏的笑想，先生的到山西或者就有这样的原因在吧——我不知

道。

先生是学者，学者多认真，先生便是认真的人。但如果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我曾用这样的话劝谏先生冷静，先生也答应我不再激烈，但他在给我的信中还是说：“关于‘乡愿’（也作乡原）的议论，是我近年来接人处世的感慨。我读近三百年学术史，先贤中为我最赞赏的是讲究德，其中包括刚直。有些人认为那种八面玲珑随风倒的‘老好人’属于有德者，这是极大的歪曲，相反的，刚直不苟合的人，才能谈到德，当然也要能兼容并包和其它。‘兼容并包’常被引申为乡愿而作为八面玲珑随风倒的同义语，这是完全错误的。”唉，先生，我无话可说。

我离开北大时，先生 71 岁，他还在职。随着年岁的增高，便有从第一线退出的制度规定。那时的先生心情不是太舒畅，依我看，无论是职级，还是退休，都引发了先生的牢骚满腹：真是一展身手的大好辰光，就被发配到山西；而身体健康而颇想有所作为以报效国家时，便要退出棋局，这是何等的令人不开心颜呵。年青的心与“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便在先生那里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冲突，郁结着便成心病，奔突发散出来，又使人觉得舛怪，发散得不得体，还有可能会伤及他人。至于他人如何，则又当别论。唉，先生，我无话可说。

七

现在，先生带着微笑向寅恪先师行去，先生对于先师的感情，可谓至深，其态度可谓至敬，甚至深厚尊敬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先生一日不提及寅恪先师，则此日难过，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还是在背诵着寅恪先师的诗句，这是锦绣对我说的。先生是背诵着先师的诗句向先师行去的。

我想说的是，尽管寅恪先师伤心至极而有“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逝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之言，但依我看来，先生无论如何应该跻身寅恪先师门下七十二人的行列。至于先生热切期盼学生能有所传承，有若寅恪先师戏撰之“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者，则愚钝且桀骜不驯如我，不免让先生失望的，或若不论辈分，能进入三千人之列，则幸甚矣。

呜呼，先生，尚饗。

学生卢向前祭奠于杭州之启真名苑，时当 2009 年清明

永远的“213”——深切缅怀王永兴先生

“213”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很普通的房间，但却成为我大学最后两年和研究生三年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这个房间也正是我的硕士导师王永兴先生作为创办人之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养成”之所。这个房间，是王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经过艰苦努力而向学校争取到的，他带领着我们前后几届学生购买图书，复制照片，布置书柜，初具规模后，就成为我们学习的“乐园”。每天迎着清晨的朝阳，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学生大潮涌入图书馆，不再为“占位子”发愁，进入“213”，明亮的阳光充溢着房间各个角落，除了上课的时间，我们基本都集中在这个研究室学习。旁边是工具书阅览室，同层有出纳台，每天三段时间都长在这里，上午、下午和晚上。

今年3月份去日本东京开会，遇到明治大学气贺泽教授，他曾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过一段时期，他对“213”也有深刻的印象，他尤其对我们这些“213”的学生，每天从早到晚都在“213”看书、学习、讨论问题，更是赞叹不已。记得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礼堂（现在的“世纪大讲堂”就是在原址修建的）几乎天天晚上演最新的电影，我们往往选择晚场第二场，即晚九点半开始。在“213”学到九点一刻，下楼去看电影，什么都不耽误。虽然离开北京大学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每次有机会去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是要特意“路过”一下“213”，可惜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大门随时敞开。当然现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已经今非昔比了，精致的四合院式的一组建筑，前后两进院落，实用而典雅的讲演厅，丰富而前前沿的图书馆，每个教师一间研究室，常令我们羡慕不已。几代学者在这里传道授业，几辈学子从这里成长，走向学术的殿堂。

在追随王先生读书的日子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严谨学风、教风和对学生的持续激励。

王先生经常给学生讲他在陈寅恪先生做助教的经历。陈寅恪先生晚年双目几近失明，在清华大学教书，王永兴先生和汪篔先生做他的助手。每次上课前，陈先生都要花很长时间备课，即便是他很熟悉的两《唐书》等史料，也要重新让助手读一遍，往往是陈先生先准确地明示翻到《旧唐书》（等）某卷某页，从第几行读起，所读段落正是他上课时准备引用的史料，读完，才让两个学生搀扶着走向课堂。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治学之一丝不苟的精神。王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也时时这样要求自己。记得我们在大学三年级选修王先生开设的隋唐史课，每次王先生都做充分的准备，指定一个学生担任写板书任务，另一个学生负责擦黑板，一次课下来，要写十几块黑板的史料。两鬓染霜的老先生在台前奋笔疾书，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在下面求知若渴，学术薪火也在这种激昂的氛围中传承。

王先生对学生的激励是时时进行。一方面是爱国主义的教育，一方面是学术方面的教诲。

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采取课前语的方式。我是1979年入学，高年级开始上王先生的选修课。1981年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比赛采用单循环制，经过了7轮28场激烈的比赛，1981年11月16日，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

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此后，全国刮起“排球旋风”，女排姑娘成为中华“巾帼英雄”，是全中国的骄傲。我们自然也是如醉如痴，女排战斗不息，我们则观战助阵不已。北大校园也为之沸腾过几次，通宵达旦，游行、唱国歌。一路狂欢到清华、人大和北师大，摔酒瓶、烧扫帚，甚至烧床单。记得当时北大学子喊出的口号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风靡天下，一时竟成为这段时间中国最流行的口号，女排及她们取得的佳绩也就经常成为王先生开场白的主题。主题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报道的变换而有不同，但以具体的事例和当代“英雄人物”激发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为民族献身的目的是贯穿始终。尤其是如火如荼的“女排精神”在这样一位老先生口中娓娓道来，似乎使我们和王先生的年龄距离缩小了，感觉王先生并不是钻到故纸堆中的“老先生”，有一颗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年轻的心。这类爱国主义教育，每次都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同时也感受到王先生对祖国强盛、中华民族振兴的热切期望，以及寄希望于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为祖国的历史学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

学术方面的教诲则往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王先生要求我们都在“213”读书，我们也非常愿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免去到图书馆阅览室“抢占座位”的辛苦和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原因则是“213”陆续购置了一批经常书和敦煌卷子的照片，可以利用。王先生经常“光临”“213”，每次都要检查我们的读书学习情况，解答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自己也时常坐在研究室认真的读书。我们从精神上随时做好王先生来的准备，在实际行动上则表现为坚持“坐班”，不容有任何懈怠。除了“213”，王先生还经常召集学生到他家里进行辅导，虽然有的学生并不一定选修隋唐史专业，但在大学期间，有这样一位老教授时时激励和教诲，使大家受益匪浅。谈话的主要内容基本上还是围绕着：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今后计划，布置我们看书内容，鼓励我们要持之以恒、艰苦奋斗。每次从王先生家里出来，我们都感慨万千，甚至有些惭愧，觉得多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没有做到更加努力，于是暗暗下决心要更抓紧时间，不能虚度光阴。我们就象一架老式钟表，这样定期和不定期面谈，不断给我们有可能稍稍松懈的神经重上发条，继续不知疲惫地向前奔走。

1979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后，对今后的专业方向没有更多的考虑，只是感觉文革十年耽误了太多的时光，正所谓“该读书时下了乡，该工作时重回课堂”。文革开始时，我正好是小学毕业，随波逐流，看着沉渣泛起，看着风起云涌，看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最后被裹挟到“北大荒”——“战天斗地”去了。因此，文化教育和科学素养严重缺失。幸运的是，1978年回到北京，1979年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王先生大概是在80年代初经过邓广铭先生（当时任历史系系主任）鼎力推荐和艰苦斡旋，排除种种羁绊，从山西调到北京大学。王先生历经坎坷，但对学术的执著数十年如一日。记得从我们二年级起，王先生就非常关注本科生的培养工作。他主动与学生接触，了解学生的情况，鼓励学生与老师交流，欢迎同学到他家拜访，并希望有更多的学生选择隋唐史专业。王先生了解到我的家学渊源（其实，只能说是渊源而无传承），明确鼓励我选择隋唐史作

为今后的专业方向，从此也就确定了我的学术研究领域。“213”创立后，王先生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的工作中。在“213”，王先生布置我们校读《六典》，督促我们通读《资治通鉴》，指导我们以《六典》为本，参看两《唐书》对读，希望我们能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敦煌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1949年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沉寂多年。王先生对敦煌文物和文书流失海内痛心疾首，对中国学术界“敦煌学”的迟滞进展而忧心如焚，在课堂上屡屡提及“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这一话题，更注重的是落实在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的实际行动中。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同时打开了学术交流的大门，也给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带来了新的生机。王先生牢牢把握学术发展的动向，亲自开设了“敦煌文”研究课程，他与国外的学者加强联系，购置和印制了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及照片，指导我们读文书。从那些似乎枯燥、干涩、残缺、难懂的字、句中，我们感受到历史在指尖中的流淌，也更深刻认识到我们探索历史真相的任重道远。

本科生毕业论文，我在王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选择了以敦煌文书为基本依据，对唐朝敦煌地区的农田水利做些基础的研究。P.3560《唐沙州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章程》文书自发现以来，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武藤ふみ子等人也都对此件文书做过颇见功力的整理、研究工作，对于我们了解此件文书的性质、内容作出了不少贡献。我的论文就是试图在进一步整理此件文书的基础上，以其为基本线索，结合其它有关史料，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农业水利作一概观的描述。当时还没有出版各种精美和清晰的图录，我利用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的缩微胶卷阅读器，反复地读卷子，辨认文字，释读句子，在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从懵懂、茫然的状态进入到略知其然的境界，历时半年，终于完成三万多字的论文，并且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毕业论文。虽然论文还有很多不仅如人意的地方，也只是我学术研究的起步习作，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王先生不仅传授给我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也传授给我对学术的严谨和专注精神。

研究生阶段继续跟着王先生，我也遇到了我现在的研究生经常遇到的困惑，即如何选题的问题。当时脑子也很乱，有很多宏观设想，也有不少微观的构思，但总是飘在面上，没有抓住真正能展开研究的中心点和创新点。王先生及时加以点拨，提出是否可以以唐监察制度在前后期的变化为主要线索，重点研究后期的变化，还提示我要注意唐后期“出使郎官御史”的性质和作用。遵照王先生的指导，我缕清了思路，从唐朝监察制度的构成、职能入手，分析了御史台监察职能前后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重点放在唐后期监察体系的重新组合和新的职能上，对“出使郎官御史”、“巡院”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做论文的过程一路磕磕绊绊，完成的论文现在看起来也是瑕疵百出，但选择从研究官制入手，也为我在攻读博士时的可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213”学习的日子里，有快乐，也有苦恼，但我们始终怀念着这些难忘的岁月。从

这里走出了？届研究生，大多数都学有所成，成为学术科研的骨干，王先生的学生也成为京城隋唐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军”。王先生严谨的学风、厚重的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是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

王先生仙逝已近一年，他给我们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凝聚着他的心血和追求，也凝聚着他对学生的期望和托付。虽然不知道“213”今后的命运和归属，但我们的怀念是不会泯灭的。

2009年4月14日上午11点半

回忆我的导师王永兴先生

我跟随王永兴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有六、七年之久，这段历程在我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之大，以至每当回首或总结过往的岁月时，不能不触及它。现今王先生虽已仙逝，以九四之整岁计算，亦属高龄辞世，人生磨砺将近百年，已非常人所及。作为受业的一个弟子，先生康健之时，每有所思及，如今阴阳两悬，王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就更使我常常想起。现借此一篇幅，略抒往昔，以表达我对先生的缅怀纪念之情。

在我的记忆之中，回忆长辈，或者亲朋好友，总会带给自己愉快的心境。可是近些年的回忆，与以前相比，却有某种不一样的感觉：以前的回忆，似乎是少年和青年的幻景，没有太多的时代沧桑；然而对先生，或我故去的父亲的回忆，时不时的有自己也已步入中年的感触，而此种感受和记忆的背后，隐藏着我自己数十年来的所思和所想，特别是伴随着自己成长拼搏、安身立命的甘苦。因而，我对王先生的回忆和纪念，不仅针对着先生本人，而是透过纪念这种形式表达着我自己成长过程中对事业、人生、品质，乃至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众多事项成功与波折的感情，由此而言，对故去的人的怀念，是活着的人自身的某种（或某些）情绪的宣泄，特别是那些有着纷繁复杂过程的人，就更是如此。我的经历虽然不算复杂，也没有“大风大浪”的磨难，但也许读了一些他人的论述，对古今中外的际遇略有知晓，在缅怀先生之时，也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

一

怀念王先生，使我想起了那段美好的时光。

我之所以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可能有如下几层含义：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名气和人脉，使她成为青年学子向往的殿堂，我能够进入这所大学学习，是千百人中间的少数，也是自己拼搏奋斗的结果，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千万要珍惜。这样的事情，当然值得回味。另一个原因，则是以前曾经在书本上读到过的大学者，现在就在眼前，其学业之钻精，学问之影响，为人之风度，都令我感觉他们与常人一不一般。跟随这些不一般的先生学习、受业，自然有受宠若惊之感，这也是值得我怀念的地方。第三个原因是与王先生有直接的关系。我是1979年9月入学的，上学之后不久，听说王先生对学生的学业，特别是做学问很关心，我所在的79级中国史专业的班里先后有宁欣、张京华、曲爱国、白兴华等同学跟随王先生读书，记得是阅读《资治通鉴》和其他文献的部分章节，我很羡慕他们，后来也想参加进去，事情是成了，但参加的具体情节却记不大清楚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不上课的时候就去图书馆的219室，后来转去213室，这里较219室大，而且朝东，白天中午之前都有阳光，219室朝北，冬天房间里的暖气又不好，感觉很冷，所以我们就去213室学习。那时候大家学习的热情特别高，图书馆是学生们争着去的热门地点，里面的环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

蛮舒服的，尤其是冬季，外面天冷，里面则温暖如春，大家都在认真地阅读，那气氛真是好极了。正因为这样，图书馆每天异常的拥挤，去得稍微晚点，就没有座位了，所以冬天天还不亮，同学们就挤在了大门口，一旦开门，争先恐后，冲进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占座位；我们这几个跟随王先生学习的学生，因先生获得图书馆的同意，借两间房子供历史学系为将要成立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专用，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天看书不用早早起来占座，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房间很大，看书时还可以讨论，累了还能休息聊天几句。这也是促成我跟随王先生读书的重要条件。

这是三个具体的原因。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还有不同的境界。说到这里，我对“回忆”这个词汇发生了兴趣，即如我前面提到的，人的回忆是充满回忆者个人的情怀的，这种情怀在当初未必感觉得这样分明，往往是与回忆者后来的经历相互结合的，换句话说，回忆之所以发生，特别是令人感觉“爽”的那类，是在对比和衬托中涌现的。与王先生最初接触的那种感觉，是我后来在高校学习氛围的烘托中增加了新的内容而形成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与后来出现差异之间的对照。

那个时代，从今天角度讲，是有点特殊的：十年“文革”，基本上打断了高校正常发展的路径，而十年人才的积聚，顷刻之间以恢复高考的形式重新爆发，进入学校的都属“身经百战”的优秀分子；有如此丰富的社会经验，又有超长的精神耐力，智商高自然不必多说，情商也非常的优秀，所以当时学生中藏龙卧虎的甚多，他们对知识孜孜以求的热心、对真理正义的刻意追寻，使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充满了理想献身的道德情操，这种“真精神”在今日物质追求与个人境遇改善的现实主义情氛之下，其理想、感真的一面，立刻凸显出来。于是，以今日观感衬托旧日情怀，其感性的、理想主义的成分迅速飙升，构成了我追念的“美好”成分。这就是我对“那段美好时光”回忆的理解。

二

现在我就自己感知的王先生对我们的教益通过几件事情描述如下：

一件是王先生对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创立所花费的心血。

当时我们之所以有条件进入图书馆的专门房间看书学习，是得王先生之便利。如上所说，历史学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打算建立一个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重点进行这段历史的研究，因为“文革”对北大历史学系造成的破坏太大，中国古史又是传统研究的长项，“文革”结束之后，一切走上正轨，经学校同意，开始筹建，其中王先生就承担草创工作的重头戏，也多为具体琐碎的事情。为此，在图书馆里借用两个房间，用于购置图书、筹集资料，当时更多的是复印，我记得复印的有日本学者的著作，特别是魏晋隋唐的专著，还有传统字书，个别的英文专著也在收罗之列；另一项任务是到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复制敦煌文书的胶卷，还要翻拍照片。这些工作大概主要由王先生负责，而我们这些学生就听从王先生的安

排，做具体工作，我自己做的最多的是到北图去拿胶卷，特别是收录照片。当时的北图还是文津街的老馆，从北大校园到那里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最清楚印象就是乘坐 103 路无轨电车的景象，特别是从西四往回返的路程。现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收藏的这些胶卷和照片，就是那个时候逐步收集和整理的。在资料的汇聚、图书的购置这些基础性建构的工作中，王先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当然，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整体安排和部署，离不开历史学系、特别是系主任邓先生等领导的支持，不过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学生了解不到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形还是在毕业之后看到的资料介绍和其他人的回忆中透露的，当时我直接听从王先生的安排，对他的呕心沥血更有直接的体会。

现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已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教育部首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的一个基地，在学校的支持下，选择朗润园优美的景地中一处四合院落为中心的场所以，其环境之幽静、格调之淡雅，远非当年可比，亦成北大校园内之一极具特色的景观。我上本科的时候，中心的筹备处先是借助在图书馆里，后来扩展搬到未名湖北岸的健斋，再后来，就到了现在的地址。中心的名气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成为国内外学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看书学习的好地方，自己也时不时地回去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或到资料室里查书，徜徉于此，每每就会想起创办的当初，尤其是自己亲历过的此情此景，心中的感受自不同于他人。而王先生在其中做出的贡献，也就跃然于自己的记忆之中了。

一件是王先生对学生专业的培养所下的工夫。

王先生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出，那就是他对学生的关怀很突出。当时历史学系的各位老师对学生都充满了关心，课堂上认真教课，课下热情地辅导、答疑，有的还请学生到家里讨论，那种情景深深地熏染着我们，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字，叫做《我在历史系学习的点滴记忆》（刊载于王春梅、王美秀主编《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 年），在这篇文章里，我回忆了许多老师，多集中在我能接触到的，特别是教过我们课程的，印象就更直接一些。在这样一所盛名的高校中，老师们如此关怀学生、对事业精益求精的品格，时时感染着我们，我就是在这种虔敬的心情下与老师们打交道的。王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我着墨并不多，当时我写的目的就是更多老师的形象描绘出来，先生的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再写。事实上，如上所述，我接触最多的当然就是王先生，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也突出。他对学生的关怀，表现在把我们召集到图书馆 213 房间里集中看书学习，特别鼓励我们认真阅读原始材料，比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还要求学生背诵《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篇章）的部分内容，一句话，就是阅读原典。我最初接触文献资料，应当就是从那个时候（1979 年底、1980 年初）开始的。由于时隔太远，很多具体的情节不是很清楚，只有依稀模糊的印象了。记得最清晰的情景是王先生要求学生们背诵大段的古文，就是上面说的《春秋左传》什么的，我们学生多数都比较惧怕这个，因为以前没有练过童子功，加上其他很多课程还要应付，特别是课外的诱

惑如晚上的各类讲座很有吸引力，还有就是周末的电影和其他活动也在召唤。与班里其他同学相比，我的课外活动是比较少的，我有意地把它压缩到最低的限度，当初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考上大学不容易，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读书和学习，此外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必要。即使看电影和娱乐，也属偶尔为之，每次看电影，都有“奢侈”的感觉。当时看电影有两个地方，夏天一般是在东操场，票价一毛钱，有时则免费；冬天就在大饭厅，即现在的百年大讲堂，票价也差不多一两毛，读研究生的时候，票价稍贵，那时大饭厅也进行改装、鸟枪换炮了。

有这些任务压在身上，通过死记硬背古文，对我们多数学生而言，就成为负担了。王先生每次听学生的背诵，他坐在那里，眼睛微闭，听着背诵的声音，有的因为种种原因背诵了一部分，或者磕磕巴巴，先生的表情看起来就不大高兴，嘱咐学生下次什么时间之前要背好，等等，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算暂时放了下来。遇到背诵好的，他就大加表彰，而且很是感慨，说得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但对背诵这档事，我自己的记忆中好像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我也具体说不清楚了，反正没有遇到大段的背诵，心里的负担还算可以，也许我做的工作多了一些，获得先生的特别允许了吧。

我记忆中的另一种关怀体现在王先生对学生学术训练的要求上面。

跟随王先生学习没有初始的准备阶段，一上来就进入到专业的研究层次。先生要求我们学习古文，不是为了学而学，而是为研究做积累。王先生当时关注的隋唐史问题，有规章制度，有经济财政，也有政治法律，但更多的是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唐史。对我而言，敦煌资料还是很新奇的，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一经接触就要进入研究状态，一切从头开始，但要求高，也就是说做学问的开始没有过度期。我们这些跟随先生在图书馆学习的学生，每人都选择一份敦煌卷子做文章，从卷子里的字句认读开始，到里面的制度、社会具体的问题讨论，再过度到卷子所涉及的唐史一般问题。这样一路走下来，能够很快地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动向，在今天看来是明显的走专家路线的方式。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件事。当时系里一个负责行政事务的人对这种训练学生的方法颇不以为然，有一次在学生会的大会上要大家不能陷入“狭窄”的研究领域，而要打好基础云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了解我们的情况，或者是不是针对我们而言，反正我听了他的这番话也颇不以为然，他说他的，我们做我们的，继续跟随先生学习和研讨。直到今天，我仍旧觉得像北大这样研究型的大学，应该给学生以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特别注重研究方面的训练，因为当时的本科生与今天的不一样，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急需研究型人才，而大学生多经过社会磨练，比较成熟，年龄也相对大一些，进入大学后有能力直接接触学术，或者自身投入到研究中，为今后走向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大学生尚数少数，属“精英”层次，更应该有学术的积淀和训练，所以我内心里一直存在本科学生应当有相应的学术训练的想法。如今的情况与当初有很大的差别，大学教育进入到普及阶段，本科生的学习已属工作之前的必备基础，研究性的训练似乎有所降低，即使这样，我仍旧认为在一些有实力的大学里，本科学生初进校门之时，能进入专业研究领域，是培养学术人才的一个有效的方

法。回想当初王先生对我们学业的训练和帮助，对我后来的发展很有好处，今天旧事重提，我对他充满的只有感激。只可惜，自己在学业上面没能达到王先生的期望和要求，今后继续努力。

一件是王先生对自身学术使命追求的精神。

我上学后接触王先生，是他刚刚来北大历史学系工作的时候。最初的印象是白发苍苍的先生，走路也呈慢慢的状态，但他身体素质好，虽然外表有老年的相貌，接触时间长了，就感觉不到外表显现的年纪了。尽管如此，当时先生已有 66 岁左右，在那个年纪，一般人已进入安度晚年的状态了，而王先生的学术研究似乎才从此开始，不停地工作：为中心筹集资料，准备胶卷和照片，不断地与校内外学者交流。他在这段期间主编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前后 5 册，16 开精装本，这些琐碎的约稿、编辑，甚至找出版社发行、稿费的分发等等，都由先生具体负责。我作为学生之一，也按照他的要求，协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那时作者的文稿既不是今天的电子版，也不是铅字版，而是他专门请人用毛笔誊写的，写好了之后再送出版社照排。可能因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除繁体外多有别字和俗体字，出版社没有这项处理功能，就只能用手写的稿子。我负责过联系作者的稿子、给他们寄书、送书，经常跑作者的家里、邮电局等处。对这些文章，作为主编的王先生，事事都亲自过问，与那些挂个名、牵个头的主编比较起来，王先生可谓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主编了。这种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我工作时也曾经主编过几部著作，既然当主编，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要弄好，这是最起码的准则。先生具体而细微的工作作风，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长久的。

王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追求，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在看来，王先生当年勤奋努力，除有学术本身的追求之外，还跟他常年遭受迫害和冲击造成的损失有关，好不容易有了返回高校从事教学研究的机会，尽管年近古稀，也要拼搏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再找回来。王先生一生坎坷波折，我当时知道的具体情况不多，先生从来不向我们谈起，只是偶尔流露出这样的感受，且多是对我们进行教育如抓紧时间好好读书的时候涉及的。我只记得王先生经常有文章问世，特别清楚的是他的《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一书的出版，在那之前，先生所出的书不多，只有《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 年）和那篇著名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 年第 12 期）论文等。稍后，特别是我毕业工作之后，就不断见到先生的著作，一本接一本，比如《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中华书局，1987 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王永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昆仑出版社，2003 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等等，还主编了《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年）。这些著作，都是先生步入老年之后的呕心力作。这话一点不假。做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就是占有资料，在翔实的资料中找出论点，

进行总结。先生的行文风格有点像陈寅恪先生，而他作为陈先生的嫡传弟子，在教导我们的过程中，每以寅恪先生做榜样，他自己更是终日不忘陈先生当年的教诲，这种尊敬师长的品格，也影响了我的为人处事。实际上，我今天对王先生的怀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先生纪念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影响的。

上面说到先生晚年孜孜以求的精神品格，在当今人们中间，的确不常见了。有时候自己想想先生，真的不简单，支配先生老有所求的精神，如果不太强烈，是不会有这样扎实的成果问世的。如上所说，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不是家常话似的聊天，也不是晚年的老生常谈，而是一条史料、一个数据那样考证出来的。史学文章多注释，是因为说话要有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先生文字的背后，付出的是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没有苦工夫不可能完成。所以，到晚年，先生出版的作品加起来，在同代人和晚辈中，也属著述丰富、质量高乘，代表了大陆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高水平。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也挺好玩的：我们学生很好奇，就是想查查历史学系的老师，特别是名家学者的著作谁的多谁的少。记得好像与刘浦江等人打开历史学论著的目录，看到历史系诸教授的著作成果，以邓广铭先生居冠，其次有周一良先生，其他先生的著作则不算多。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等到 90 年代，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王先生还不断有新著问世，而且是在高龄状态下写就的，心中不免充满了敬意。

三

上面我从三个方面回忆先生的情景，都是比较具体、细微的，正是这些小事，才能反映出先生生前对我们教诲的具体景况。细微而具体的情节，能够感动人，因而也记得住。但也正如我在前面的表述那样，今天回忆先生对我成长付出的心血、给我的具体指导、帮助我们成才，这些回忆和纪念，还因时间的流逝、自身经历的成长和阅历的深厚，都有通过回忆纪念的方式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和追寻的附加内容。所以下面这一节，我主要是从当下的学术研究期盼，从自己能够理解的角度谈谈先生的学问及其意义所在，特别是在追求学问当中保持的学术品格对我们现今的启示。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至少在大陆（港台因其情况与大陆差别太大，学术研究的旨趣与追寻有诸多差别，此处不论），表现出一股浓厚的学术反思的倾向。不论是史学所在的人文学科领域，还是社会科学各界，均发出了要重振中国学术的呼声，或者说要在全局的语境下探询中国学术的出路。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做学术研究的科层化与具体化、细致化的纵深发展，同时也有打破学科畛域的、多学科领域的相互渗透与相互结合的诉求，有些超越者则在追寻或创造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在这些呼声的背后，则是西学迅猛冲击、强烈影响和浸透中国学术的势头，特别是西学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已经到了离开西学的语境就不能自成语的地步。无须多想，现今，没有西学训练的社会学科，乃至人文学科，单凭传统自我的那

一套，在今天基本上找不到市场了。呼唤中国学术的体系，或学术的中国声音，正是回应西学影响并决定中国学术命运的行为。就史学而言，传统以乾嘉考据为特征的学问，说得绝对一点，至今也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

与学术呼唤中国声音迅猛的同时，还有另一种情形：现今的中国学术逢遭西学并与之结合的趋势，早已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如果说古有佛教文化冲击中国传统，并与传统结合，形成新的文化，那也需要数百上千年的磨合始能成为一体；而今日中西文化之交合，无论从规模、内容、幅度，还是速度、频率，都远非当日文化交融所可比拟。中国今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呈现的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给更多的人从事学术研究创造了机会，更多人的参与，反过来又扩大了学术自身的容量，伴随这种现象出现的负面之一，则是学术研究的虚浮化，甚至泡沫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者的功利化趋势。现在的学者，发表百十篇论文、十数部著作已是常象，指点江山、大发宏议，成为学者成功的标志。相反，坐拥书城，或青灯白卷，在故纸堆里孜孜钻研，通过点滴记载而做学问的人，似乎越来越稀有；人们从细小微弱“纯粹”性的学术，转成上问今古、通达内外而博取社会受众欣赏的术业表演，似乎越来越为俗世社会所青睐。

在这种状态的衬托下，想起王先生，另有一番情境。我能想象得出，他还是寓居家室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商谈而讨论，或者上下寻找书籍和史料，陶醉于自己的精神幻界之中。王先生的学问，是在广泛阅读原始文献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他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唐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那些东西远离社会，他却不为时髦的学术所动，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辛勤而努力地耕耘。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到达一定的境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先生的学问，基本保持着早年受学陈先生形成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是他学业走上顶端的关键，也是成功的秘诀。在当下中西兼容、尚未形成中国自身学术系统、中国呼声尚待发出之前，坚守本业、不为利益所诱，以自身学业为人生幸福追求的目标，是王先生治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记。确实，中国需要这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许多像先生一样的学术守望者，正是他们，坚挺中国学术的基业，昭示未来的发展！

难忘师恩——怀念王永兴先生

孙顺华

清明节刚过，同窗好友李志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北京的师兄、师姐们准备出版王永兴先生纪念集。我曾经受教于先生多年，毕业后离开北京，心中一直深藏着对先生的感恩与怀念，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表达了。

去年9月15日18时，王先生以95岁的高龄驾鹤西去，史学界失去了一位皓首穷经、成绩斐然的真正的学者，我们失去了慈祥和蔼、师德高尚的敬爱的导师。由于任教于青岛，我不但没能在先生病中前去探望、稍尽绵薄之力，而且连遗体告别仪式也未能赶上参加，这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也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半年多来，先生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梦中的先生永远是70岁左右的样子：身穿中式对襟褂、身体微胖、满头银发、圆脸宽额、长寿眉毛、说话沉缓、时而慈祥、时而严厉。

初次见到王先生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1981年我上大学二年级的一个晚上，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在一位学姐的带领下前往朗润园拜访王先生。王先生微笑着把我们迎进了他的书房，安排我们坐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既是一位儒雅学者，又是一位慈祥长者，他缓缓地给我们讲起了读书学习、唐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提到“敦煌在中国，敦煌文书的研究中心在日本”这一说法时，王先生非常痛心，他认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耻辱。他鼓励我们好好读书，为国争光。这次拜访，可以说对我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读书、做学问、教书成为我心目中最崇高的事情，是唯一值得我一生去从事的事业。我后来跟随王先生学习唐史，毕业后选择当老师，都与这次拜访有关。可惜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功力所限，我远离了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高深的研究领域，甚至也没有深入到唐史研究中，为此我深感愧疚，甚至羞于面见先生。不过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始终遵循先生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读书研究力求扎实，教书育人以为天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本科三、四年级，我上了王先生的《唐史》课，与先生的接触多起来，经常接受先生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古代史必须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这就要求有一定的古汉语能力。我当时基础很差，尽管中学、大学都学过古汉语，但这点水平难以顺利阅读大量古代文献。针对这种情况，王先生从基本功抓起，他把自己的线装本《新唐书》、《旧唐书》拿出来，让我们练习句读，每练完一本，就交给他批阅，他当面修改、解释、指导。王先生非常爱书、惜书，他曾教我们读书前先洗手，这么爱书的一个人，竟拿出自己珍藏的书让学生练习句读，可见他热爱教育的赤诚之心和无私高尚的为师境界。

由于阅读史籍经常会遇到生僻字，手头上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已经不够用了，王先生建议我们买一本《康熙字典》，可当时新华书店缺货，于是王先生亲自联系中华书局的朋友，帮我们买到《康熙字典》，并教我们使用。至今这本字典还摆在我的书架上，是我读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1984年，我有幸成为王先生的研究生。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读书学习环境，即设在图书馆里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这是王先生经过多方奔走协调于1981年创建的。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学习场所，不用忙着“占地儿”了。研究中心里有许多文献、资料、著作供我们参阅，我们平时除了上课，几乎天天在里面学习，王先生也几乎天天到研究中心，有时查资料，有时指导或检查我们的读书情况。

王先生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要求是有区别的，我明显感到了这种区别。对于本科生，先生强调基本功训练；而对于研究生，除了基本功，还要求有一定的读书研究能力。上研究生后，先生布置我们读《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通典》等大量古代文献，本科阶段的句读等基本功训练在这时发挥出了作用。

王先生常常跟我们谈到陈寅恪先生，他回忆陈寅恪先生的时候总是充满深情，我深深感到他对陈寅恪先生人格的敬仰和学问的崇拜。他不仅自己时刻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治学做人，一丝不苟；而且也用陈寅恪先生的人格精神、学术风范培养学生。王先生告诉我们：陈寅恪先生通晓十几种语言，二十四史大多数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通典》这些书，他都能背下来；寅恪先生五十多岁就双目失明了，可他依然教书做学问。王先生说：寅恪先生是天才，我们都是中等之才，大多数人都是中等之才，但中等之才用功努力也会做出成就。王先生要求我们精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我把这两本书反复读了好几遍，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从中体会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这两本书成为我理解唐代历史的钥匙，使我受益终生。

王先生一生坎坷，1957年到1977年，经历了“浪费生命而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二十年”，调回北京大学后，他非常珍惜时间，勤奋读书，潜心研究。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研究生基本能做到心无旁骛，抓紧时间用功读书。不过有一次例外，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大约五一前后，我们三个研究生相约出去旅游，高高兴兴地在云岗石窟、五台山玩了三天。由于荒废了读书，先生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先生的严厉，平时感受到的主要是慈祥和温和。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老师严格要求其实是对学生的一种更深刻的关爱。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多数研究生也许已难以理解这种严格和严厉，但恐怕也很难感受到导师对弟子学习、生活处处关注所包含的期望和温暖了。

王先生一生潜心学术，严谨求实；提携后学，甘为人梯。此谨以片段追忆以解怀念之情。先生教诲风范，留世永存！

2009年4月11日

对王永兴先生培养学生的点滴回忆

李志生

2008年9月，王永兴先生去世，在先生离开后的这些日子里，有许多先生倾心教学、全力培养学生的记忆涌进了脑海。

我于198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刚进学校时，对历史，只是懵懂地喜爱，爱读历史故事而已。本科第一年，通过中国通史课的学习，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正当思考下一步如何学习、向何处着力时，幸运地遇到了王永兴先生。王先生当时刚来北大不久，他不仅在课堂上给学生授课，还亲自到宿舍与学生聊天，辅导学生学习。对王先生的教学和研究方式，我当时感觉是非常新鲜的，也收获颇多。这样，自然而然地便选修了王先生的课。承蒙先生的不弃，使我在大学本科二年级时，便忝列于先生的学生行列中，每天能够聆听到王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当时，中国古代史中心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217房间（后搬至213室）有一个研究室，在下课后，王先生的学生都会到这里自习或查阅材料，每晚王先生也会到这里检查和指导学生的读书和学习。

王先生对于学生的培养，是非常有条理、有步骤的。在本科阶段，王先生要求学生先学好古汉语，通读《资治通鉴》和两《唐书》，为进一步的学习打好基础。记得学习古汉语时，王先生每星期会指定几篇古文，让大家背诵下来，我当时身体不好，背起来总是非常困难，王先生便破例做了通融，要求熟读即可。王先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为阅读古代文献，打下一个好基础。通读《通鉴》和两《唐书》时，王先生则要求我们在遇到难字时，必须查字典，将字义弄懂；读到重要事件时，必须记笔记，以此，能够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唐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王先生培养学生的步骤更加明确。首先是练习校勘，王先生交给我和孙顺华校勘的是《新唐书·地理志》。在校勘之前，王先生会先给我们讲解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的基本方法，并教导我们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作为对校的书籍，再辅以其他多种地理志或地理书。而在校勘的过程中，王先生更教导我们应多读书、仔细读书，否则遇到问题时，便会不知从何下手，或不知从何处寻找材料；即使有些材料过去读过，但因读书不仔细，也会漏掉或忘记出处。在校勘和以后读书的时候，确实体悟到了王先生所说的道理，很多书读过多次，但因为每次读得都不仔细，一些材料在用到时，确实会想不起出处。另外，在北大历史系工作以后，我每两年都会给本科生讲一次“中国史学史”，而在讲到《通鉴》时，一定会讲到胡注，而讲胡注，又一定会讲到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这时，我也会顺带讲一下校勘的方法，每当讲起校勘的方法时，都会想起王先生对我们的教导，想起王先生教给我们的方法。

在硕士生学习阶段，王先生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实际上，从本科阶段开始，我们就开始接触文书。在当时的217或213房间，有一台看卷子的机器，还有很多冲洗出来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照片，从这些具体的设备和材料中，我们就已经开始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了。王先生每年都会讲授“敦煌、吐鲁番文献

研究”，我至今保存着三本王先生授课的笔记，也会经常拿出来看看，每次看，都会有新的启发。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方法，识字和校勘是第一步。一些文书因年代久远，字迹或已模糊，或已残缺，这时就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辨识和添加缺字，师兄卢向前因有超强的识字能力，而每每受到王先生的表扬，他因此也成为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榜样。我曾经跟着王先生整理过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和唐代开元年间的三年抄目，这些文书的整理，真是在王先生手把手教导下完成的，这样的训练和学习，使我终生受益。

下面引述一段王先生于1985年3月4日所授“唐敦煌文献研究”一课的讲授内容，以供后辈学习参考。^①这次课讲的是“做文书的有关注意事项”：

第一，文书只有和文献相结合，文书的史料价值才能表现出来，而且卷子也才能好做。所以要整理卷子，必须熟悉史料和典章制度，而没有传统的文史之学的训练，是做不好卷子的。做卷子的基本训练包括古汉语、文字学，要看《说文解字》，小学的训练要有训诂、考据、校勘、版本学、目录学。对唐代的历史要熟，虽然不强调精通。

第二，把已有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作为参考，要吸收这些成果，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日本学者研究目录，就是非常好的方法。如果自己的文章引用了别人的成果，都要明确说明，说明文章发表的地方，成果在哪里；如果是相同的见解，也要说明。

第三，作卷子要本着严谨的态度，要按照基本要求去做。引文的格式等，都有一定之规，要按规矩写作；在说明某个问题时，虽然有一定的根据，但又不很充足，就只能作为“推测”，这在学术上是允许的。

第四，创新和务实。内容上可以创新，方法上也可以创新，可以有新的方法，但一定要在陈寅恪、王重民诸位先生的方法基础上创新，没有吸收前人的方法和成果，有时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务实。

王先生每次讲敦煌文书研究时，都会先讲我国研究敦煌学七十年来的成就，王先生讲这个内容，实际上是与他的爱国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王先生在他所撰写的《王永兴学术》一书中，曾悲愤地说道：“我爱我华夏民族数千年优良的传统学术文化，现在敦煌文书研究落后使我感到惭愧耻辱。我是个读书的中国人，不雪耻自强，何以为人！”^②所以他为中国人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高兴，为追赶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多方努力，全身心教育、培养学生实际也是王先生欲振兴、发展中国敦煌学所作的重要努力之一。

除了有步骤地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外，授课是王先生传授知识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王先生在他退休之前的十余年中，每学年坚持讲授两方面的课程，一是唐史，包括唐代经济史、唐代政治史、唐代制度史，以及唐史专题、专书等课程；一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并

^① 这是我从课堂所记笔记中摘抄下来的，因记笔记时，省略了一些修饰词，现在一些地方加上了一些修饰词。

^② 王永兴先生：《王永兴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且虽然名称上是同一门课，但实际上，王先生在不同学期讲授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还保存着王先生 1984 年和 1985 年两个秋季学期分别讲授的“唐代政治史”的笔记。在 1984 年秋季学期，王先生讲授的主要内容是：

- 1.谈“研究问题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及历史背景探讨”、“读陈寅恪书要注意的问题”。

- 2.关中本位政策：北周；隋朝；关中本位政策的深远历史意义；唐朝。

- 3.藩镇问题。

- 4.宦官问题。

- 5.牛李党争。

……

1985 年秋季学期，讲授的内容是：

- 1.田制。

- 2.租税徭役制。

- 3.租佃制。

- 4.兵制。

- 5.官制。

……

从如上举出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王先生的授课实际涵盖了唐史中的各个重大问题，通过听课，学生就可以对唐史有一个基本、深入的了解了。

王先生对待讲课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每次讲课前，都要翻阅文献；每次上课时，都将所用的文献书籍放在一个绿色帆布书包里，带到课堂上，然后在课上，将所用材料手书在黑板上（因文革中受迫害，王先生的手在写字时会微微抖动，所以一些时候是学生代抄）。大致有两年时间，我有幸在每次课前去王先生家接先生上课，帮先生背放着文献的书包，当时王先生住在未明湖边的健斋二楼，从未明湖边到二教、三教或文史楼上课是有一段距离的，而这段时间，也就成了王先生给我“开小灶”的时间，王先生经常会把要讲授的一些内容先给我讲一遍，然后到课堂后我再听先生讲，就会比别的学生印象深、记得牢。除了这种收益外，我还从王先生对待教学的态度上学会了很多东西。王先生经常对学生谈起当年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情况，陈寅恪先生是用一个布包袱包上所用的文献书籍，而王先生是用书包放入所用的文献书籍，陈寅恪先生和王先生的这种习惯，实际上传达给我们的是教学一定要言之有物，谈历史问题一定要从史料出发，而且对待史料要严谨。

最后，用我和锦绣在王先生悼词中的几句话，作为全文的结语：“王永兴教授认真准备每一门课，讲授详尽深透，高屋建瓴。而且在课堂以外，对每一个选修其课程的学生，都进行个别辅导，耳提面命，诲人不倦。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言传身教，王先生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他们现在大多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薪尽火传，桃李遍天下。”

但我这个学生不才，实是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只有未来更加努力，以告慰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2008年3月

健斋前的石阶

牛来颖

北大未名湖北畔那幢小楼健斋，和校园中的许多小楼一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静静地面对着一泓湖水，观湖上寒暑晨昏，听林中风声鸟鸣，像一位洞明世事、淡定自若的老人。塔影婆娑，柳丝摇曳，微风吹起层层涟漪，为她增添了一分灵动。和她比肩的是司徒雷登当年规划建成的融中国古典造园手法与西洋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六座建筑，这七座楼分别被命名为“德、才、均、备、体、健、全”，体现出学校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

老式的楼梯从楼外向上伸展到二层。每天，一位老人沿着楼梯石阶缓慢地走上他位于二层最东边的房间，这位老人就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从山西回到燕园并执教历史系的教授王永兴先生。追随他的是系里一群立志学唐史的学生，师生们的激情和亢奋在这所平静而淡漠的小楼中点燃，释放，遥远的大唐盛世的瑰丽和辉煌吸引着大家痴迷于对她倾注心力地探究着、寻觅着。此刻，学术的春天正悄悄然浸润着大地，古老的燕园绽开笑脸，就像湖边那一轮朝阳。

一切都始于这座小楼，想到自己求学的历路，每每竟都幻化为楼前那段拾级而上的路。

读到大三时，有了很多选修课程的自由，跟随王先生学习隋唐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先生要我们写一篇作业《我为什么要学习唐史》，为什么？在我心目中，除了心底里对大唐文明的辉煌最朴素的一份景仰和骄傲，除了学习中积累的那些最基本的了解以外，选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先生为我们本科生开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开了隋唐史的专业课，而老先生为本科生开课是非常难得的，何况先生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从这里，我们开始了解文书，在阅读器下一字一句地录文、释读，触摸古老的丝绸路上那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揭开地表和深埋地下的断篇残文中那些丰富的文化信息，所以，我选择了探险般的神秘而有趣的课题。

记得从那时开始，为了打牢基础，在那个暑假，按照先生的指导，开始了基础学习。我开始背诵《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进入正史的阅读；由《左传》《论衡》开始古代汉语的提高；由《四库提要》进入基本史书书目的掌握。在我的那部《四库提要》上，先生把为我筛选的基本书目用红笔勾画出来，在每一部书下，先生认为需要掌握的内容都一处不落勾出来，一行行，一段段，因为手抖画得也曲曲折折，我就是捧着这样一部有同于《书目答问补正》一样的“朱书”一步步涉入书海，并缘此按图索骥地选书、买书、阅读。

那个学期，每周一次，我走进健斋，在老师面前，打开一周的笔记，接受先生的检查，那时先生安排我们读《资治通鉴》，从正文到胡注、考异，逐字逐句地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句，自己解决，记录在笔记本中，并记下问题留给先生看。通过识字、释义，读懂弄清之后，再将史实贯穿于一体，形成对基本史实的了解。我幸运的是，在本科三年级开始，就在王先生的指导下，从基本作起，一步步、一点一滴地完成着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前的训练准备。从先生对我们的安排上看，处处体现着培养扎实基本功的殷殷用心。他给我创造了和中文系的同学一道接触学习的机会，选听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诸如版本学、音韵学、校勘学等等。

同时在做《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学生编委的服务中，拜望了校园内外多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们，得到许多教诲和指导，终身受益。

湖岸边的树木纷然杂陈，绿意盎然，安详地浸润着、铺张着周遭的静谧，缥缈在晴晖中，春天在这里显出格外的妩媚。每天，窗外的鸟鸣从不远处的湖滨和小树林中一声声，又一声声，将朦胧的周遭叫醒，也使灵魂浸润于那带有草木润湿的氤氲之中。迎着每一个芳香如露的早晨，先生坐在桌前，进入研读。先生的书桌是陈寅恪先生留下的，在这张书桌上读书，先生始终铭记着寅恪先生的谆谆教诲，为此不敢懈怠，焚膏继晷，笔耕不辍。先生也一遍一遍地用寅恪先生的话教导我们，每当我们面对先生接受查考时，也分明觉着面对着两位先生，另外一双明眸正注视着我们。

在那段纯净而充实的日子里，我来往于教室、图书馆和健斋之间，读书叩问，随先生散步时，聆听教益。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里，我随先生学习隋唐政治制度史、唐代经济史、大谷文书研究等，读两唐书、《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写出读书札记向先生汇报。先生留在一本送给我的书扉页上的一段话始终激励着我，时至今日，先生仙逝，但是先生的话却依然清晰如耳提面命时一样：

给来颖，愿你有大志，认真读陈寅恪先生的书，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做寅恪先生的好学生；坚强，勇于开创，为振兴中华学术，为建设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奋斗终生。

先生手抖，每次执笔写字，都是右手执笔，左手按压在右手上，帮助稳住。先生的这段话留在1984年，我刚刚上大四，从此时起，先生的话就一直铭记在心中，激励着我前行。

先生弟子填室，负笈从师者众，援疑质理，无不感念先生倾注心血培育，提携奖掖。是先生引领我走上治学之路，为我确立人生目标。蒙师大恩，永志不忘。以愚钝之我只有谨记先生典范遗教，倾毕生之心力，筚路蓝缕，实践先生“好学而深思”的嘱望，终生为之奋斗。

如今，从小楼中走出的年轻人十几个、二十几个……他们依然不减当年的热情，并矢志不渝地为自己的选择执着地坚持着，喧嚣和浮躁、磨难和坎坷，得失与沉浮，沉淀下来的是苍茫岁月中的坚守，风雨踟躅中的真挚、穿越荆棘中的执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一届带出的学生中，至今依旧在隋唐史研究领域默默耕耘者占据着绝对的多数。

对于我来说，健斋前的石阶是我人生起步的基点，也成为镌刻在我生命中的年轮。以此为纪念。先生垂世不朽！

谆谆教诲 永世难忘

2008年的春天，我因公出差去北京，特意赶往北京大学燕北园家属区，拜访了恩师王永兴先生。那个下午，在先生不太宽敞的书斋里，我们聊起了许多往事，先生虽然耳背的厉害，记事有些模糊，但谈兴很浓，神采飞扬，健康而又快乐。我连忙取出照相机，为先生、先生夫妇以及这次难得的相会留下了美好的瞬间。然而，让我伤感的是，仅仅半岁不到，先生忽仙逝而去，那次拜访竟成了我与先生的永诀。

初闻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与研究所的古典文献专业，所长程应镠教授邀请先生来校作有关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学术报告。从程先生那里略知，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学养深厚，治学严谨。尽管听先生的演讲一知半解，但深为先生的治学风格所感染，尤其是先生胸前红色的北京大学校徽特别夺人眼球。

1985年我考上程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来的研究方向是宋史。没想到，有一天程先生找我和张剑光谈话，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打算在上海师大组建隋唐史与敦煌学研究中心，考虑到我俩年轻改研究方向比较容易，安排我俩师从先生学习隋唐史。由于事出突然，我们有些顾虑，程先生开导我们说，他与先生是西南联大时的好友，非常赞赏先生的治学风格，把我们交给先生培养他很放心，让我们不必担心。末了，程先生还说，我俩研究生期间的学习计划，一切听从先生的安排，他就不管了，并勉励我们勤学有所成就。记得那次谈话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上的先生早年的代表作《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让我敬佩，由此坚定了师从先生学习隋唐史的信心。

很快，先生为我俩确定了三年的课程学习计划，记得第一学期的课程是研读《唐六典》。不久，先生来上海师大，除了与程先生商谈组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心外，专门指导我俩如何精读有关隋唐史的基础文献，并安排我们第二年去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近距离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甚至聊一些家常事，使我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叹服先生面对人生磨难的坚毅品格，叹服先生在煤油灯下研读《通典》的执着追求，我为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而感到自豪。那一次在校园里，先生、程先生与严耀中、张剑光、魏亦珀和我一起合过影，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其中的两张，先生的笑容是多么的慈祥啊！



1985年在上海师大，左起：张剑光、程应镠、魏亦珀、王永兴、严耀中、俞钢

1986年的暑假，我和剑光按计划北上问学，先生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俩住在北大历史系学生宿舍楼内，每天去设在图书馆内的中古史研究中心他的工作室，主要研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就有关隋唐史的问题进行讨论，先生重点讲析了陈寅恪先生的一些名篇，以及如何运用多种文献证史的治学方法。记得那间工作室的两边是书架，中间是一长条办公桌。先生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来工作室巡视一次，即使下雨天也不间断。我俩自然不敢懈怠，天天静坐读书，连北大校园的美景都无暇去欣赏。一开始，碰到先生严肃的发问，我俩甚为紧张，后来习惯了，就提前准备好一些问题请教先生，先生每每耐心地解答，使我逐渐领悟到了治隋唐史的一些要义。当时，我俩很担心学位论文的选题，于是先生专门就隋唐史研究领域中的哪些问题还值得深入探讨，做了详尽地讲授指导，我日后选择唐后期宰相制度作为研究课题，完全是在先生的启发下确定的。临近回沪的时候，先生邀请我俩去朗润园他家吃饭，我俩倍感亲切，这分明是一位长者对后辈的一份关爱和期待。北大问学，凝聚着先生的良苦用心，让我终身难忘。

回沪后，我潜心于撰写学位论文，不时去信向先生汇报进展情况，并请教一些问题。尽管先生手书抖的厉害，但还是认真地回信指导，关心我的学业，实在令人感动，直到现在我仍留存着先生当年写给我的多封信件。1988年我顺利取得硕士学位，留在上海师大古籍所工作。我一直铭记先生的教诲，不放弃隋唐史研究方向，老老实实地做学问，逐渐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并评上了教授，做了博士生导师。我时常想，没有先生当年的精心指导和特别关怀，就不会有我后来的学术发展，自己只有在学术上不断有所建树，才能无愧为先生的

学生。

多年来，由于京沪两地路途遥远，我没法经常去拜访先生，就以春节寄贺卡的方式祝先生健康快乐，偶尔有机会赴京一定会去见先生。印象比较深的是 1991 年的那一次，当时先生已迁居北大西门外的家属区，我去拜访先生，先生恰好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手提着小篮子，步履蹒跚，明显苍老了许多，但精神依旧，他见到我特别高兴，问我程先生夫妇可好，问我和剑光的工作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并请先生保重身体。几年后，先生与李锦绣女士结为伉俪，晚年生活得到精心地照顾，这实在是一件幸事。2008 年 4 月我去拜访先生，见到先生像老小孩般离不开李锦绣的样子，深为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份真情所感动。

先生仙逝周年在即，难忘先生的谆谆教诲，谨此寄托我永远的怀念。

菊花残 人断肠

——谨以此文悼念恩师王永兴先生

张剑光

九月的上海，还是夏天的末梢。烈日永无止境地照着大地，天空雾茫茫、阴霾霾的，闷烦而又潮湿。在那些天里，不知什么缘故一直想起导师王永兴先生，心里不时泛起些许烦躁和不安。也许自己长了岁数，步入中年，身体又不是最好，常常喜欢回忆过去；也许自己带了学生，每年新生进校时总会想到先生当年是怎样教导自己的，然而又想把学到的几招传给学生。那天，百无聊赖地在网络上游荡，突然看到了先生的讣告，顿时目瞪口呆，沉痛和悲戚涌上心头。

我把先生仙逝的消息告诉了俞钢，他不敢相信，因为春天我们两人先后出差到北京时看望过先生，那时他思路十分清晰，回忆当年指导我们读书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我感觉出，那天先生很高兴，满脸带着笑容，一见面就叫出我的名字，说起以前的一些事，先生的记忆仍是准确无疑。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下先生，那慈祥的笑容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先生的身体还算硬朗，他把我送到门口，要不是锦绣师母阻拦，说不定还想送我出门，可怎么突然去世了呢？

那些天刚开学，学校里的琐事压在身上，拖得我们无法去看先生最后一面。内心充斥着悲伤，坐在书房里手足无措，不知想忙些什么。蹲在学校门前的河边很长很久，念想先生的点点滴滴，心房的角落里一阵阵伤悲。劳燕纷飞各自天涯，先生在美好自由的天国中生活可好吗？

—

最早知道先生的大名，是在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那时我对唐宋行会制度比较感兴趣，在朱瑞熙先生的指导下阅读了不少论文。后来找到了先生 50 年代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上的表现》一文，渐渐搞清了由唐入宋过程中政府对这一商业组织的控制，认识到了唐宋的“行”与西方的行会组织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时孤陋寡闻，并不知道先生是谁，只是觉得文章虽然不长，但写作上十分严谨，切入点与一般的论文不同，对自己启发很大。

忝列先生门墙，纯粹是命运的眷顾。1985 年的夏末，与其他五位师兄一起经过漫长的复习历经艰辛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我们报考的导师是古籍所所长程应镠先生，一心想跟着程师学习宋史。没想到开学的第一天就被程师叫到了办公室，告诉

我和俞钢根据学校学科的安排，需要我们改学隋唐史。谈到学校请来带我们的导师，程先生面带微笑眉宇间飞扬起自豪，说是北大著名教授王永兴。程先生告诉我们，王先生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长，早先是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又任陈先生的助手。那段时间陈寅恪的名字从老师和学长们的口中不断听到，程应鏐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包敬弟先生等给我们上课时说到陈寅恪时都是一脸的崇敬，我们对陈寅恪精通数国外语的传闻更是万分钦佩。尽管当时经济比较拮据，但还是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部陈寅恪著作。听了程先生的介绍，自然对即将成为我们导师的王永兴先生充满着神秘感和期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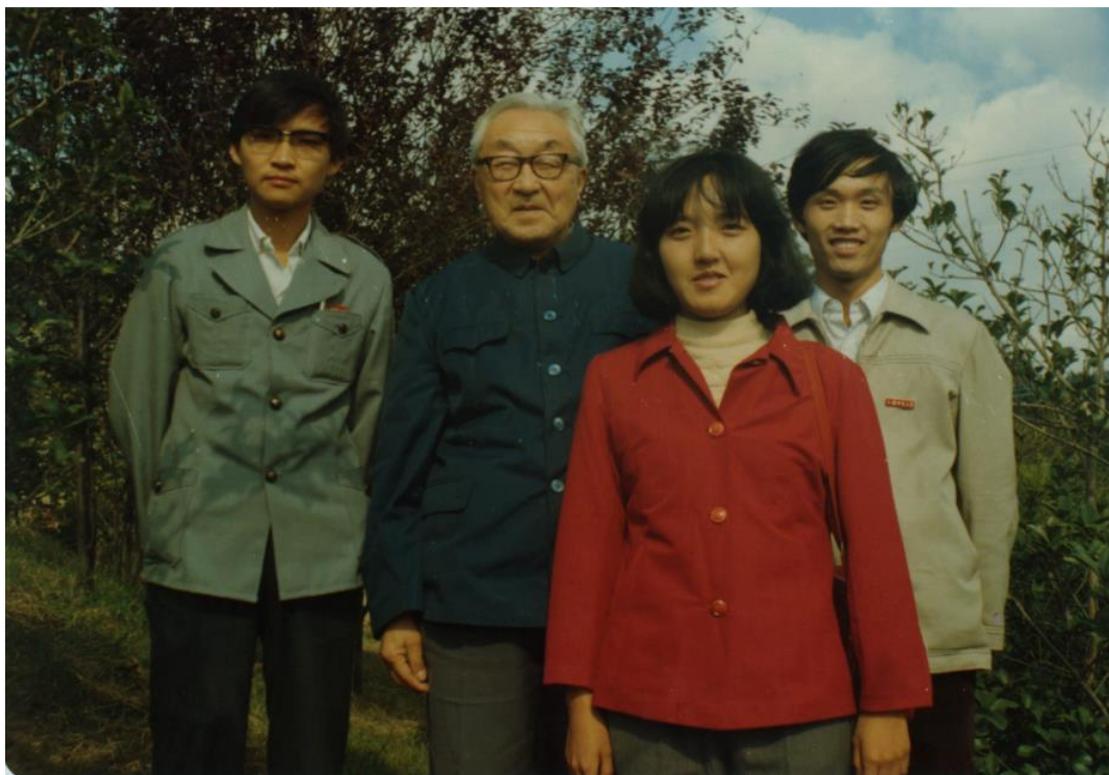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24日早晨先生来到了我们学校。古籍所借了学校的上海牌轿车，由一位办公室的女老师带了我到北站接站，进站台上了火车的软卧车厢。软卧是要有一定的级别才能坐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样清洁整齐的车厢，而且想想马上要见到自己的导师，内心忐忑不安起来，不争气的两腿竟然有些发酸迈不开步子。按号找到包间，一个身穿常青中山装头戴鸭舌帽的慈祥老人早已站着等我们，微笑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还说着“辛苦你们了”之类的客气话。第一感觉，老先生是如此的亲切、谦逊，没有高高在上的气势，心中略略放宽。

学校只有一个招待所，而且是学生宿舍改建的，先生被安排住进了西二南底楼朝南的一个房间。程先生已在房内等候，两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教授见面，却像两个小孩，既兴奋又激动，握住双手不放，数十年的情谊都凝结在两双手中。在程先生的引见下，我和俞刚就在这一天正式拜王先生为师，开始了我们研究生的学习生涯。

先生在上师大的日子里，每天早晨由我给他到食堂买早饭。办公室的老师之前已吩咐我该怎么做，所以第一天当我将早饭拿到先生的房间时，他在看书，抬头一看，说买得太多太好，我回答说是程先生安排的。先生对我说：“明早只要给我买个馒头和稀饭，加点咸菜就可以了。我没为学校做过什么事情，应鏐对我这样客气，我心里会不安的。”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也很真诚，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不但要仰止先生的学问，更要尊敬他对生活的俭朴态度。先生的中饭和晚饭安排在新开张的桃李居饭店，第一天是我领着先生去的，所办公室的一位老师等在那里，对饭店说好只要王先生来就按标准端上饭菜即可。记得先生吃的是客饭，两菜一汤。那天先生要我和他一起吃，我说我会到食堂里吃。先生说：“菜太多，一个人吃太浪费，你年轻要多吃点。”饭虽然不敢和先生一起享用，但先生的话令我很感动，鼻子酸酸的，因为我感受到了导师对学生的温暖关怀。心想，如果我将来当了老师，一定也要像先生一样去关爱学生。

记不清是先生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晚上，我接他到程应鏐先生的家里。横穿学校，和他边说话，边慢慢走着。这时我才了解先生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程应鏐先生亦在历史系读书，两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结成了数十年的深厚友谊。当见到开门的师母李宗蕻先生时，王先生十分开心，原来他们也是联大的老同学。老朋友见面，各自的脸上充溢着纯真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学生时代。王先生说他记忆中的宗蕻是梳着小辫子、手里挟着一本外语

书，很清秀漂亮的一位女学生，他和程应鏐及李宗藻哥哥等一帮男生一起谈天时她是静静地站着边上。他们说着当年的老同学，说着当年的老师，谈起当年发生的一件件事，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他们说的许多人、许多事，我并不了解，只是在边上傻傻地听；当他们谈起陈寅恪、沈从文等一些大学者的名字，我更是竖起耳朵专心致注。程应鏐师还不时给我介绍王先生以前的一些经历，如九一八事变后还在高中的王先生如何从东北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王先生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崇敬，王先生在五六十年的悲惨经历等等。最令我惊奇的是，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二九”运动，原本是那样的抽象和遥远，现如今突然知道一位最重要的发起者就在身旁，真的感到历史其实就在我们的身旁，历史真是充满着魅力。两位先生谈起“一二九”时，竟还记得当年游行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和高喊的口号，还相互说得出在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在游行时做了什么。



俞钢（左一）、魏亦珀、张剑光（右一）与王永兴在上海师大，1985年

那些天先生为我俩及古籍所青年教师魏亦珀连续开课，主要是讲授研究隋唐历史需要看的唐史史料，从《唐律疏议》、《唐六典》和《通典》开始，到《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册府元龟》、两《唐书》等。先生讲课的第二个主要内容谈的是《对陈寅恪先生治学的体会》，他认为陈寅恪的治学主要有“通识”、“自成体系”、“治学的严谨和扎实”等特点。讲课的第三大内容是《唐朝的官制》，他认为唐代的官制有决策、行政事务、监察和勾检等四个系统，而勾检系统以往是为人们所忽略的。先生的讲课形式比较特别，大概是照顾我们刚刚初学，往往开始比较浅显，稍后深入到一些关键问题，娓娓道来，看似平常，却令我们记忆深刻，大受启发。至今仍令我难忘的是先生上课时对史料的重视，往往是信手拈出几条基

本资料，然而按次序层层解剖，犹如剥笋，笋壳一层层剥掉，鲜嫩的笋肉就渐渐露了出来，先生这时也把结论告诉了我们。记得当时我对俞钢师兄说过：先生的上课好像是领着我们在一条史料的胡同中勇往直前，当我们还没搞清楚该怎么走出去的时候，已豁然开朗，来到了胡同的外面，我是没有能力学到这种方法的。俞钢说老先生们对史料是很熟的，本身就已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只有慢慢学，才能学到这种方法。

在他的房间里，先生多次查看了我們做的读两《唐书》卡片，并且解答我们看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刚接触两《唐书》，碰到的具体问题很多，如制度、史实、语言上的一些问题都似是而非，困惑不少，先生要我们耐得住寂寞，要仔细比对不同的记录，才能发现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他特别强调看书要仔细，要逐字逐词搞懂。那些天，先生一直给我们举北大学生的例子来鞭策我们，如他谈到马小红发表在《晋阳学刊》上关于唐代散官的文章，谈到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取得的成就。

先生在上师大除了上课外，还到了古籍所的资料室。他发现我们关于唐代和敦煌的资料不多，所以一再向程应鏐先生建议要购买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回北京后，他还复印了许多资料寄给资料室，这些资料至今保存在古籍所资料室的敦煌文献特藏室中。

二

先生于1985年11月1日晚7点51分乘22次列车回北京，当时我和俞钢送他上的车。临走前，对我们接下来的学习进行了布置，明确指定了每个学期必须要看的基本资料，要求我们写出读书笔记。先生还提出让我们在一年后到北大去学习一段时间，这样先生既可以当面指导，又可以让我们在北大中古史资料中心阅读一部分上海没有的书，主要是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

先生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对我们的指导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办法。一方面，北大同学听先生讲课的笔记本寄给了我们参考，另一方面，北大同学在先生的要求下将所有上课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定期寄来。由于当时用的是老式的TDK之类盒式磁带，一堂课要好几盘，所以数量很多，我们不断收到从北大寄来的装在木盒子里的磁带，然后再认真地听磁带对笔记。寄来的听课笔记，是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唐代经济史》、《敦煌学》以及对一些敦煌文书的解读。此外，其他相关老师关于唐代法律、唐代军事等课的笔记本也寄来供我们学习参考。我们也是在一个阶段后通过写信的方式向先生汇报具体阅读史料的进度和碰到的一些困惑，先生收到信后及时给我们回信作具体的指导。先生其时七十多岁了，写字的时候已是十分颤抖，速度不是很快，但他还是十分负责地给我们提意见，一些问题的讨论十分详细。当年他给我们的信由于多次搬家，有的已经遗失了，但仍有几封至今还保存着，每当打开这几封信再次阅读时，常常为自己由于年轻而没有毅力坐冷板凳辜负了先生的教诲而感到十分惭愧。如85年12月9日先生来信督促我们的学习，信中说：“久不写信，不知你们的学习情况如

何？俞刚、剑光要写一份读两《唐书》笔记，其内容为：读书心得、读书中不能解决的疑难、一些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的评论、新旧《唐书》本身的优缺点等。学期结束就寄给我，写字不能潦草，作为你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86年3月1日，先生“小病一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但还是对我们的学习及时来信进行指导，他在信中说：“俞钢和剑光的读书笔记已经收到。俟阅读后即提出意见。……两《唐书》读完，俞钢和剑光即通读《唐六典》，并结合《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选举志、百官志》写读书笔记。要写问题，目的是深入理解唐代典章制度，一定要深入思考分析问题。所谓读书笔记，即是提出各方面的问题，不是抄书。”

1986年暑假期间，根据之前的约定，俞钢和我到北大学习。在北大，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先生对我们的关怀。为了替我们省钱，他为我们联系了学生寝室借住，为我们在食堂里的吃饭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原打算七月就到北大的，先生本想通过学生为我们私下解决住处问题，但先生熟悉的学生和研究生按系里规定下乡调查，要到7月末才能回来，我们到北大的时间就只能等到8月初了。先生曾与北大房管处谈了两次，想借学校空着的宿舍让我们住，但学校认为校外来人是不能住宿舍的，于是先生在7月5日专门来信请我们“鉴谅”。我们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北大的两个多星期，几乎每天都是白天连着晚上来到资料室看书，因为资料室里有不少日本和港台赠送或复印的书籍，有的我们虽然知其名，而没有看到过书。王先生每天白天和晚上都到资料室来一次，一方面督促我们的学习，另一方面分外关心我们的生活，看我们吃住是否习惯。我们写的读书笔记，他认真修改，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记得他曾问我的读书笔记里写的一些结论：“有依据吗？”我说是推理得出的。他说如果没有具体资料的话，得出这些结论其实很轻率，有一分资料才能说一分话。我的读书笔记先生从总体上说是不太满意的，但先生还是以鼓励为主，同时又指出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北大的时候，先生和我们还谈了硕士论文的选题。我当时想以唐代商人的内容作为论文题目，并对先生谈了一些我在这个问题的看法，先生要我有意识去选择阅读相关资料，为论文撰写搜集史料。回上海后，关于论文的具体撰写，我们仍与先生不断来信商讨。由于当时有不少关于商人和商业的论文陆续发表，在我确定选题后，发现我原来的设想与有些论文比较接近，估计能写出的新意不是很多，所以我打算换题目。先生知道后，写信来表示同意我换题目，他建议我对杜佑和《通典》进行研究，并拟了几个大的方面供我参考。他详细谈了对《通典》研究方法，强调要认真阅读史料，找出史源。说来惭愧，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写得并不理想，虽然后来先生进行了修改，但我悟性不高，资质愚钝，文章没有达到先生的期望，有愧于先生的教诲。

我和俞钢毕业留校工作时，程应鏐师因身体原因已经退休，我们不再忍心去打扰他了，因此很想继续得到王先生在学术上的指导。继任的古籍所所长范能船先生对我和俞钢非常关心，决定继续聘王先生为兼职教授。88年秋天时，我刚结婚，乘到北京的机会带了妻子一起到北大来看望王先生。前一天正好与先生在北大校门外的路上碰到，先生在散步，于是说

好第二天晚上到他家去。我们按时去了，把古籍所的聘书递给王先生，先生很高兴，说：“凭了与应鏐老同学的情份，能帮上师大出点力是应该的。”那晚先生一再叮嘱我，并要我回来后转达俞钢，要将《资治通鉴》唐代部分再次认真阅读，要认真学习陈寅恪写作论文的方法和手段，认真揣摩他选题的角度。他说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不管什么时候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写信去询问，对我和俞钢的关心溢于言表。他对我说一定要甘于寂寞，要认认真真的读书。先生的谆谆教导仿佛就像昨天的事情，至今仍在耳边回响。那天在回到住处的路上，妻子感叹说：“你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位老师，既和善又情真！”

这些年来，我和先生的联系渐渐减少。因为先生年纪大了，我不敢再去打扰他。有时写了贺年卡或是信后，也是锦绣师母回的信。俞钢师兄有一次看望先生回来后，说起先生身体状况尚可，心里真的很开心。有时严耀中老师看望先生后也不时告诉我们先生的一些情况，转达先生的问候，心中暖融融的。先生弟子众多，我们碰见时急切地打听先生的近况，知道先生身体很好而且笔耕不辍，十分钦佩先生对学术和理想的坚定追求，内心遥祝先生身体健康。先生虽年事已高，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著述，《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等书填补了学术空白，影响巨大，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更应该向老师学习，酷爱学术，追求真理，所以见到他有新作出版，马上买来认真学习。

08年3月，我到北大开会，又见到了先生。多年不见，先生气色仍然很好，倍感亲切。先生站立的时候，身躯仍是挺拔高大，他对着我微微一笑，我马上感受到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对学生的拳拳之意。先生的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他说起了85年带我和俞钢的许多事，有的我自己记忆已经模糊，而先生却说得十分详细。他反复强调到上海师大和程应鏐先生的见面是他那些年里最高兴的事情，他深情地回忆起和程先生之间数十年的珍贵友谊，听后令人激动。先生十分关心我和俞钢的生活和工作，详细询问了我目前在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到北京开会的内容，叮嘱我千万不要放松学习，不能丢了学术。临走前，锦绣师母对我具体谈了先生的身体状况，当说到先生仍经常拿了《资治通鉴》阅读时，我浑身一震，深深地感受到了前辈师长对学术矢志不渝的精神。

三

作为一个学生，我感受最深的是先生对自己的导师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传承。从一开始与先生接触，他就告诉我们他是陈先生的入室弟子。然而，先生与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一样，有不少人是打着陈寅恪的牌子来抬高自己，述说与陈寅恪的交往经历却是为了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加重自己的学术份量。而先生对陈寅恪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他对我们讲述陈寅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陈寅恪的学问，让我们知道陈寅恪研究历史的成就。尤其说先生以爱自己的导师而出名，毋宁说先生更爱导师的学问，他是想发扬光大陈寅恪的学术思想。

先生讲课时常谈起陈寅恪，不过他主要是为我们介绍陈寅恪治学的方法和思想，他要我

们去学习这种方法和思想。当我重新翻看先生上课时记下的笔记，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对导师的一往情深。先生说陈先生的学问不限于史，于文学、佛教、语言等学问上深有研究，而先生所学的只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的部分。他认为陈寅恪不仅精于考据，而且精于理论和史料。他说陈先生的学术主要部分不是考异，而是通。他举了《金明馆丛稿二编》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内中陈寅恪一再提到“通识”问题。他认为陈寅恪《论韩愈》一文的结尾就是具有通识而得出的结论。他说要学习陈寅恪的学问，首先要学习通识。先生还让我们学习陈寅恪先生做文章的选题方法，认为陈先生做学问很少有吓人似的题目，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小见大”。先生举了《金明馆丛稿二编》的《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作为例子，认为赵郡的李栖筠在天宝时而不是安史之乱之后搬家，说明天宝年间河北地区已经胡化，很多士族迁到洛阳等地去了，陈寅恪是从士族搬家来谈当时的形势。先生认为这种“以小见大”的方法在陈寅恪的一些文章中都是如此，他谆谆告诉我们切忌去做大题目，千万不要“一论几百年”。他特别强调陈寅恪做学问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精神，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在上海期间他联系好了陈寅恪大弟子在复旦工作的蒋天枢先生，两人虽同是寅恪先生的弟子，先后在陈门学习，却从未见过面。在某天下午，我和俞钢陪着先生来到了复旦。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整理校勘全是蒋先生承担的，蒋先生还编著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所以能陪王先生到复旦使我无比兴奋。当我们来到蒋先生的家门前，我注意到王先生突然恭敬地正了正帽子，还拉了一下衣服，然后走了进去。蒋先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十分兴奋，王先生伸出双手的同时还一个鞠躬。两人的手用力地握了很长，久久不肯放下。我们在蒋先生的书房里坐了下来，我和俞钢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交谈。两人讲到先生时竟然动情地落了眼泪，他们说着先生的遭遇，提起了先生众多学生的名字，谈到了陈寅恪先生在一些史书上有大量的批校内容还需出版，王先生还谈到了要筹备举办陈先生的纪念大会等想法。去年在先生家里，先生提到了与蒋天枢先生的会面，他对会面的过程记忆犹新，说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见面。我插话说是我们陪着先生一起去的，先生笑着说：“好像是你们陪着去的。”

作为一个学生，我更感受到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和帮助。自跟随先生学习以来，无时不感到先生对我们的期待和厚爱。当时古籍所新分来的青年教师魏亦珀也想跟随先生学习，先生并不因为她不是自己的学生而敷衍她，而是尽心尽力加以指导。在他寄给我们的信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魏亦珀，如85年12月9日的信中说：“亦珀考研究生事，我近日又给程先生写信，他日内来京，可面商定。你仍要读《左传》、读英语，一定要读懂读细，要能熟练地背诵。”86年3月1日的信中，他问：“亦珀的读书，准备功课，进展如何？希望抓紧时间。”

88年看望先生回上海后，我曾将自己的学习情况向先生汇报。那时年少气盛，研究生毕业后对学术研究多少有点急躁情绪，在北京的时候和后来的信里也有所表达。先生及时地

发现了我身上存在的问题，于89年3月21日给我来了一信，专门谈了学习态度问题。先生在信中说：“目前学风不好，我说的几条可能更应注意。首先是读书为己的、扎扎实实的，尤其坐冷板凳，没有这一条，就不能真正作研究，因为读书为名利，是不可能真正把书读懂。当时我嘱咐你和俞钢，要注意基本功，从读《通鉴》开始，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考异》、胡注也要同时读。不要图快，要真正读懂。同时，要读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读史而不懂地理是不行的。这两条，你实行得如何？你是一个好学生，勤奋读书会有成就，但道路要走对。我说的两条，就是道路。请你来信说说你的读书研究的具体情况，我会继续教导你的。”先生不但指出了我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我继续打好基本功，同时还及时地对我进行鼓励。这些年来，我常以先生的这些话来作对照，用来鞭策、激励自己，即使碰到再大的困难，自己对学术的态度决不能改变。

先生走了，一个与世无争、毕身耕耘在学术疆域的老人离我们而去。有首歌唱道：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先生走了，再亦不能指导我们了，悲痛的我们只能默默地思念。白云悠悠，人来人去，先生真诚的音容去了却不会再来，先生温暖的笑貌远去却永不再复，但我知道先生你还在我们的身旁，你的精神、你的学术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先生，你在天堂可好？

“义宁之学”的传人

胡守为

自廿世纪八十年代始，陈寅恪先生的事迹成了热门话题，至今其热度不减，专著有多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世人称之为“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师从陈寅恪先生多年，一生又努力钻研“义宁之学”，先后撰写《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学述》、《陈门问学丛稿》等论著，以陈学思想方法著述有关唐史、敦煌文书的作品数十种，可谓得“义宁之学”的真传，今试举其一二略加说明，个人之见，未必能准确阐释王先生的深意。

陈寅恪先生一生的贡献，当以史学成就最为突出，谈论陈寅恪先生事迹，也以这方面者居多。在众多义宁史学的论著中，我认为王永兴先生的阐释尤其深刻准确。

论史学，其根本在于史学思想。王永兴先生概括义宁史学思想为两点：1、独立精神，自由思想；2、重气节。

陈寅恪先生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说：“读书不肯为人忙”，即读书的目的不是为取悦他人以求名利，已透露其学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学术界被广泛称颂。此理念在其一生中，身体力行，因而在《赠蒋秉南序》便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今独立自由思想被称之为治学发展创新的最高境界。王先生解释说，独立之精神包括个人独立、民族独立两个方面。个人独立在史学研究中就是不为俗谛所囿，追求真实，发前人未发之覆。王先生将此义更引伸为民族独立的学术文化之精神，他说：一个民族的学术文化乃此民族所创造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宝贵财富，为此民族独立存在建国兴邦精神上之基石，我国数千年来虽屡经挫折冲击，由于民族独立的学术文化精神稳固，故能分裂又复统一，落后又复前进。今日我国之假冒伪劣，不廉不耻，至于其极，兹已浸入学术文化界中，为害之烈，令人发指。社会上的假冒伪劣，不廉不耻，当有多种原因，而学术文化在精神上与民族素质息息相关，此王先生不但诠释独立自由之义，且认为学术文化乃民族素质所由以纯正之一途，学术文化发展与大学关系密切，自应担负本国学术独立之重任，而当其事者乃教师也。王先生身为大学教授，对当前民族素质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深感痛心，而作为大学教师亦感到应肩负己任，与陈先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言论：“夫吾国学术之（落后）现状如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之说相合。

独立自由思想与重气节紧密相连，道理明显。王永兴先生说：“重气节是吾华夏民族优良传统史学思想之一”，他举陈先生著述中多次提出学术研究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观点，并解释其所以为史学思想，说：“夫所谓史学思想乃据历史进展所产生且又指导历史研究发展者也；同时，史学思想必须卫护本民族之利益与独立，否则必为本民族所唾弃”。又指出

陈先生“以尊崇气节的史学思想去论史，首先他自己就具有崇高民族气节”，香港为日军占领后，陈先生冒险逃离，赋诗曰：“故丘归死不夷犹”，气节凛然。在《与刘叔雅论国宝文试题书》中，痛诋学术忘本之人，并说：“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便可见其学术研究也不能忘本的态度。陈寅恪先生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还曾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的是当时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多是日本人，学子群赴东邻受教，陈先生以为是中国学者的耻辱，并寄言“要待诸君洗斯此”。陈先生早年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特别对数学有研究，留德期间写下的学习笔记，中有两本是关于数学的，可以证明。为何后来转而研究历史？其原因就有以身作则“洗斯耻”的因素。他确实将中国史学提高到世界前列，这是东邻的学者也承认的，池田温先生撰《陈寅恪先生与日本》一文（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中有一段话：“日本近年刊行之隋唐史或中国古代史之著作不遑枚举。而于唐代政治史方面之叙述，不受‘关陇集团’、‘党派分野’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诸说影响者鲜矣”，可见其一斑。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成就，固有其天赋、勤奋及环境等条件，但为国洗耻的思想，亦应是其治学的动力。遵照“要待诸君洗斯此”之意，王先生曾说：“我爱我华夏民族数千年友良的传统学述文化，现在敦煌文书研究落后使我感到惭愧耻辱。……在这样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支配下，我开始了敦煌文书研究。”经过二年刻苦研究，1957年他写成《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此后又钻研敦煌文书户籍部分，考释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敦煌郡敦煌县某乡计帐户籍，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王先生还特别记述，研读敦煌文书之时，使用空间性、时间性及人事三者结合治史之法。陈寅恪先生教导学生，要把历史学提高如地质学、生物学一样具有较高的科学性，除要求搜集大量史料外，还必须准确地鉴别史料的真实性，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订史事的时、地、人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著文介绍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时曾引用过此事，后来一位在香港的学者发表文章，说此乃傅斯年先生的之论，有张冠李戴之嫌。其实我读书少，当时并未知傅先生有此论，而王先生说：1937年选修了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是第一次听寅恪先生讲课，在这一次讲课中，最使我们赞颂的是先生的治史方法，即时间性、空间性（地域）与人事三者相互关系之法，要从这三方面来确定一件史实。先生论述此一治史方法，不意二十年后，我习用此法，研究敦煌文书取得了一点成绩。可知陈先生第一堂课便以此教导学生，而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学生受益终生。他与傅先生有相同见解，是两位大师对史学方法有共通的科学见识。

此外，王永兴先生关于唐代典章制度以及唐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亦受陈先生的启发，贡献颇多。他在北京大学讲授敦煌文书研究，便以《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的解读为开端，阐述陈先生关于敦煌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他对“义宁之学”既力行之，又弘扬之，薪火相传，在“众人皆说陈寅恪”之时，王永兴先生的地位应受重视。

注：文中引王永兴先生所说，均出自《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学述》、《陈门问学丛稿》。

考释详实 正本清源

——读王永兴先生《田制文书考释》

郑学檬

我知道王先生之名是在六十年代，那时我讲授隋唐史，参考过他的论文《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认识他是在九十年代，那时因唐研究基金会会议常在北大举行，我是理事之一，得以有机会拜见王先生。

王先生的唐代经济制度史研究论著，详于考释，举类求证，令人信服，读后往往敬佩不迭。这里以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经济文书导论·田制文书考释》（1994年）为例，说一点感想，以作为对王先生的纪念。

我曾写过《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只是王书再前，而拙文在后。我是在2001年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讲课是才对本题作了初步解释，成文在2002年。可惜当时我未读王书，只按照自己的理解发挥。

后来我读到王书，始知我的观点与王先生的论述可一说是相当一致。王先生逐一分析了请田、欠田、退田、授田文书，指出：“这些出土文书都是依据田令而修造的。要准确理解并使用这文书，就必须准确理解田令，并把田令与出土文书结合起来。”所论正确。我在拙文中说：秦汉以来都有田令，汉代亦有“田令”和“田律”，北魏源怀上表称：“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至于北齐和北周，正如王书据《通典·田制》所述，也是田令。唐田令，由于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抄本公开，所附唐田令，足以证明，秦汉以来皆有田令说。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多延用《册府元龟》关于“均田制”的提法，其中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是我见到最早称唐田令为“均田制”的著作，以致人皆知均田制，而多有不知田令者，并由此产生许多歧见。所以，王先生明确指出土地文书的法源是田令，说“这些出土文书都是依据田令而修造的”，具有澄清事实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其次，关于“请田”的分析。我在拙文中，已就“均田制”破坏后，由一个“请田制”来代替的论点，作过驳议。并介绍了杨际平先生的观点：“请田”与授田、赐田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请田是处理官荒地的一种办法。王先生在《田制文书考释》中，指出：池田温氏辑录的开元二十九年“给田关系牒”残文书，“应称之为请田文书”。此论正确，足以纠正一些研究者的误解。王先生又依“大谷1227”等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64TAM/03”，分析说：《唐律疏议·户婚律·诸里正》“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的记载，“所说的是退田簿和授（给）田簿，但里正所造并送县的还有请地簿和欠地丁簿。”请田簿也是由里正所造，是我所不知的，经王先生之明

示，才茅塞顿开。

复次，关于“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寡妻妾的当户者”的口分田应是三十亩，而不是二十亩的论断^①。2006年10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收录的《田令》卷二十一有关文字为：“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寡妻妾的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可证王先生1993年的结论是正确的。

最后，关于鬲田的论述。王先生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的考释中，提出鬲田问题。他认为：“鬲田不属于开元期间“及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的屯田或营田。鬲田大多为另散土地，营种所得即为镇戍烽铺兵士的食粮。”当然，鬲田也属于屯田或营田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纳入正式管理范围，类似镇戍烽铺的自留地，耕垦者自种自收。王先生考释之细致、准确于此可见一斑。

王先生在论述中按流行的观点也把唐田令称为“均田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田令史实、法源是非常清楚的，故其《田制文书考释》足资参考。

斯人已逝，其功彰彰。著述等身，惠及后学。考释辨误，犹称精当。吾也碌碌，敬之诚惶。

2009年3月10日写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点涛斋寓所

^① 见《唐研究》第十四卷（2008），罗彤华《丁女当户》一文。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读后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 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P7）这一问题。对此，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P6）先生指出：“寅恪先生反复申论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清代史学地位卑下，又深知取法高则陈义高的精义”（P7），故其治史实取法于“宋贤史学”，而与清代史学绝无渊源。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指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P6）

显然，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与经学，本身就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学问。首先是学问路径上的不同。史学因“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而可以求真，且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的论述”；经学则因“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只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或“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次是治学目标上的不同。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是治史者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治史者所应追求的目标；而“经学一途”，本身即缺乏“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的可能性；至于清代经学，由于治其学者往往贪图“声誉既易致，利禄亦随之”，已失去了学问的意义。据此三

点，王永兴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之史学绝无可能出自清代经学。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之盛，无如汉朝和清朝。班固著《汉书》，对汉代经师亦有如此评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汉书·儒林传》）班固之鄙薄汉代经学，与陈寅恪先生鄙薄清代经学如出一辙。宜其同为史家，非偶然也。

论者或谓陈寅恪深得清代考据之旨。王永兴先生对此也大不以为然，他说：“时下研究者多称赞寅恪先生擅长考据之学，这当然是对的；并学习他的精密考据方法，取得治史成绩，这当然也是可称赞的。但这还不是陈寅恪史学。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P34）显然，在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有很高的史学立意；考据是史家功夫，而非史学本身。

二 “宋贤著史之规模”的精义所在

对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王永兴先生有多方面的总结；对陈寅恪先生继承宋贤，并在此基础上之创获，王永兴先生多有发明。王永兴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P4）特其师承有自，深通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旨，所论则皆能具体入微。

“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P4）此皆陈寅恪先生所言。但是，要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史学渊源，还须深入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先生引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至大。”（P5）先生指出：“所谓‘吾国学术风气转移’即由清代不振之史学向‘宋贤著述之规模’的转变，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者，即因为其‘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也。”（P5）

何谓“宋贤著史之规模”？先生认为，其最根本的就是两条：

一是“求真实，供鉴戒”。如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供鉴戒”；“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就是“求真实”。亦如欧阳修所言：“自君臣善恶功过与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先生说：“求真实、供鉴戒的主要内容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大事，其目的则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即此，则可知所谓“求真实、供鉴戒”，不仅是在一时一事的史实上求真，更在于在一长时

段的历史中求一“贯通”之理，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P19）只有这样，才堪称是“宋贤著史之规模”。

一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宋贤史学思想有极深的渊源。（P35）其一方面是固然是鄙视“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另一方面则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欧阳修自谓：“予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力，于是就而学之……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也。”（P32）而所著《新五代史》，则斥冯道“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其可谓无廉耻者矣”。亦如司马光斥冯道“臣而不忠，虽云其智，安所用哉”，而盛赞张巡抗击安禄山，为“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P33）凡此，都与提倡“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有关，也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有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以“始得于韩”一语，以表明自己学术思想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也特别看重“欧阳永叔少读韩昌黎文”。先生引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中“呵诋释迦，申明夷夏大防”，“以谏迎佛骨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等语，谓陈寅恪先生的用意，即在于赞扬韩愈之“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精神（P36），并赞扬欧阳修及宋代新儒家对这种精神的继承。先生又引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言：“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P39）以强调宋代新儒家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先生认为：“独立之精神，包括个人独立、民族独立两方面，就个人而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独立，此气节问题；民族独立，寅恪先生概括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P31）然则，所谓“宋贤著史之规模”，亦为一种气象阔大的人格与精神境界。

综合上述二者，王永兴先生指出：“‘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P31）先生说：“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P40）先生又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先生之言乃有所为而发。不以本民族之独立为出发点，吸收输入外来的思想习俗，致使本民族或民族历史的一段时期或一部分地区失去民族之独立性，因而改变历史性质以及历史面貌，非鲜见之史实也。因此，先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史学思想，即民族学术独立及民族独立之思想。”（前言）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三 长编考异和神游冥想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及渊源，王永兴先生举以“长编考异之法”、“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总汇贯通之法”和“时间、地理、人事之法”。其中最重要者，为长编考异之法和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

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盛赞杨树达先生的“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合，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乃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P67）先生引此而认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首先要了解长编考异之法”（P68）；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李焘撰著《续资治通鉴长编》，陈寅恪先生撰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使用的都是长编考异之法。（P68）先生指出：“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可分为三个层次：（1）修丛目，即广搜群籍也；（2）在此基础上，比较异同，有所取舍，修长编；（3）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相参证，撰著成文。”（P111）对于前两个层次，先生均有具体的分析和总结。如丛目编撰的方法，先是设“事目”，其下依年月集注大量史料，而后由诸多“事目”集结为“丛目”，（P69）取材则“过多不害”（P77）；长编编撰的方法，则是在丛目的基础上，“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P78），“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P88），“宁失于繁，无失于略”（P108）。这两个层次，即所谓“长编考异”。而先生所谓第三个层次，按我的理解，即所谓“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关于长编考异之法，以及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治史方法的推崇，王永兴先生举证甚详。但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具体阐明了陈寅恪先生“发展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使用长编考异方法的目的上，“从探讨个性真实以求借鉴，发展为向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着眼，使用此法求得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之真实，求得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教训”。（P121）这里所谓“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就是“从多数个性真实总括而得”的历史的“通性真实”（P26）。而所谓的“教训”，亦即“借鉴的引申”，“不仅限于道德上的善善恶恶、乱臣贼子惧，也不仅限于供皇帝或官吏资治，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关系到华夏文化的生死存亡”。（P30）其如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吸收外来之学”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一个“通性真实”的问题。此其一。在用之于长编考异的材料上，陈寅恪先生于诗歌、佛道典籍、医籍、历算、考古资料、域外资料无所不取，“广泛超出宋贤”。（P121）此其二。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先生认为，这三个方面，在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中均有体现，而“不论所取为何种材料，寅恪先生皆以长编考异之法一之，寅恪先生这种多重考证、尽可能广、精、深地取材，正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宋贤长编考异史学方法的发展。”（P125）

陈寅恪先生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

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P126）先生引此，而以陈寅恪先生关于宇文泰、苏绰制订关中本位政策的论述为例，具体而宏观地把握了陈寅恪先生对“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的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这一问题，指出：“寅恪先生通识魏晋南北朝之政策军事文化形势，洞察宇文泰苏绰等人之思想性格及心理状态，故能神游冥想并理解同情宇文泰苏绰不得不创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之苦心孤诣。此即‘神游冥想’之‘真了解’也。”（P128）先生还以唐太宗对魏征“恩礼不终”的论述为例，具体而宏观地把握了陈寅恪先生“太宗赋予魏征的责任仅在于‘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苟征之行动逾越此种赋予之限度，则必启太宗之疑忌’”这一问题，指出：“寅恪先生神游冥想，真了解当时关陇及山东文武三大势力所构成复杂关系以及太宗之对策”，“故能在千余年之后，发其覆而求得历史之真实”。（P130）即先生所举之两例，可知“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必须是在更阔阔的历史视野下，在相关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联系。陈寅恪先生若非对于关陇、山东和江左历史的全面把握，又如何能“神游冥想”宇文泰、苏绰确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苦心孤诣；若非对关陇及山东文武三大势力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的把握，又如何能“神游冥想”唐太宗对魏征“恩礼不终”的莫测心思。

先生又以陈寅恪先生批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为例。王鸣盛指责《晋书·王导传》“殊多溢美”，“其实乃无一事”。陈寅恪先生说：“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王导之功业即在勘破此重要关键，执行笼络吴地士族之政策”。因举王导笼络吴人的种种“屈尊”细节，而推见“导之苦心”。王先生说：“王导不惜屈尊而为之，唯寅恪先生知之，因先生神游冥想，与王导处于同一境界，同情王导，真了解王导的种种言行，一言以蔽之，求得王导之真实，故称之为民族大功臣……而王鸣盛致误如此，与史识有关，也与他的治史方法有关，他不能如寅恪先生运用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也。”（P128）王鸣盛不能“通识魏晋南北朝之政策军事文化形势”，就《王导传》而论王导，故于《王导传》所言之“用意与对象”，自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神游冥想”，而对王导的历史功绩有一个“真了解”。先生批评王鸣盛“致误如此，与史识有关，也与他的治史方法有关”。据我的理解，先生这里所谓的“治史方法”，并非仅指“神游冥想”。陈寅恪先生有《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逐条引述有关李德裕贬死的时间、地理、人事等材料，以证王鸣盛对《旧唐书》宣宗大中三年九月制之失读。先生说：“丛目考异是修长编的基础，在每一事目下汇集所有有关史料。李德裕贬死这一大事应为一事目，其下汇集史料中自应包括唐宣宗大中三年九月贬潮州司马李德裕制，可不致误……王鸣盛氏之误非偶然也。”（P139）即此可知，“长编考异之法”应为求真最基本的方法，是“神游冥想真了

解之法”的前提。

四 义宁陈氏以忠义学术传家

在论及陈寅恪史学时，王永兴先生还特别注意到“寅恪先生重气节的史学思想和他的家世密切关联”。

陈寅恪先生的曾祖陈琢如，真正是位笃行君子。母亲体弱多病，陈琢如“究心医家言”，“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无倦色”，则谓“无功德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天下“乱机牙孽，隐伏潜滋”，陈琢如则“求思所以消弭之术，欲因以识天下奇士”。（P8）大病将终，陈琢如仍“手录李二曲《答人问学书》”，“复书‘成德起自穷困，败身多因得志’二语付宝箴”。（P9）宝箴的母亲李太夫人，亦深明大义。宝箴为兴修水利，“蠲俸入万金犹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方久远之利，未宜以难自阻计。即吾日食所需，节缩以给用，累少为多，功幸完。’”（P10）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以吏能、廉洁、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后因日寇占领北平，竟绝食绝药而弃世。（P10）历述义宁陈氏之家忠义气节之史实，先生谓“寅恪自幼生长在如此重气节忠义之家，当然要成长为重气节忠义之人”，“义宁陈氏忠义之家为其史学的另一渊源也是自然的”。（P10）此亦是知人之论。

陈寅恪先生自谓：“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先生引郭嵩焘《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收功楹栋远，谁解诵《迂书》”之诗句，谓陈寅恪此处用典，亦深受其祖父的影响。《迂书》即司马光《释迂》一文。在此文中，司马光以种树“五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楹；十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栋”为喻，谓“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因以“其道阔大而不能狭，其志邃奥而不能迹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释“迂”。先生认为，陈氏祖孙二人皆以司马光所谓的“迂”自况，亦可见其学术传承有得自家教者。（P11）先生说：“涑水迂叟之言，代表宋代史学之《资治通鉴》乃二十年夜以继日而筑成之史学大厦，至于以‘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所构成之清代史学，其非‘收功楹栋远’，则不言可以自明矣。”先生又引吴宓语：“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学，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P12）

义宁陈氏，以忠义传家，亦以学术传家。从来讲论陈寅恪先生之学者，于其家世影响，未有如王永兴先生这样具体而深入者。鞠养之爱，慈训之恩，从来是最具有潜移默化的情感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写就于1997年8月。先生撰著此书，除了讲明陈寅恪先生史学的宋贤史学渊源，以及对宋贤史学的发展，还就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与论文的学术特点和史学贡献，作了大量具体、深入而精到的论述。先生阐明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其用意是非常

深远的。我以为，学术的传承，既是治学方法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治学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先生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即希望有助于将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和治史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之。

王永兴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刘进宝

在王永兴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认为，王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二·九”运动的熏陶。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核心基地是北大，那“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基地就是清华，“一二·九”又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运动。^①参加“一二·九”的学人或者说“一二·九”的骨干主要就是清华的学生。当年的“一二·九”知识分子或“一二·九”学人，如姚依林、蒋南翔、郑天翔、许德珩、于光远、王永兴、王瑶、韦君宜、杨述、杨联陞、赵俪生、黄绍湘、丁则良、王德昭、徐高阮等等，不论他们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分化，或成了职业革命家，或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成为纯粹的学者，或进入了体制内，或既想进入体制又未能进入体制，但爱国主义是他们不变的灵魂。

王永兴先生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参加了1935—1936年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当时名黄刊）。可见，永兴先生作为“一二·九”学人之一，从青年时代起，就走上了爱国之路。

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王永兴先生辗转到达长沙，选修了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后就找教务长潘光旦先生，要求转入历史系，从此与历史结缘，并成了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因此，王永兴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另一个来源就是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他主政期间“实行新法，创办时务学堂，一方面用西法培养科技方面的人才……同时设置与我民族传统学术文化有关的课程，培养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人才，国学大师杨树达先生即湖南时务学堂所培养出者。”^②其父陈三立（散原老人）也是极有气节的，“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散原老人正在病中，睡中高呼杀日寇，在日本侵略者侵入北平后，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弃世，亦以身殉国，大义凛然。”^③

陈先生一家三世的爱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王永兴先生。

王先生的历史研究，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结，即爱国。在1946年侍读陈寅恪先生之侧时，陈先生曾言“我国敦煌文书之研究，较为落后。”对此，永兴先生深有感触地写到：“敦煌文书出自我国，绝大多数是用我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我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我感到悲哀，同时也刺激我，使我产生要赶上去以至超过外国人的感情。我爱我华夏民族数千年优良的传统学术文化，现在敦煌文书研究落后使我

^① 赵俪生《箴榿堂自叙》第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 王永兴《王永兴学述》第3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感到耻辱。我是个读书的中国人，不雪耻自强，何以为人！在这样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支配下，我开始了敦煌文书研究。”^①如他的成名作、也是敦煌学的第一篇论文《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是这样写作的：50年代初翻阅《食货》的《唐户籍簿丛辑》所载 P.3559、P.2657、P.3018、P.2803 四件文书的录文，认为编者对文书的理解不确，永兴先生就在北京图书馆的显微胶片阅读机上阅读原卷，“我坚持上下午七八个小时阅读，夜里整理阅读笔记，并结合史籍文献，研究文书中的问题。这样工作两年半，写成我的敦煌文书研究的第一篇文章。”^②《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在《历史研究》1957 年第 4 期发表，在其同时，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也发表了与王先生意见大致相同的文章。50 年代末，当王先生在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点校时，“某一学术杂志发表了日本学术界对我撰写的关于唐天宝差科簿一文的评论，完全肯定我的结论。一次午饭时，在座的郑毅生（天挺）师和其他几位先生谈及此事，都为之欣喜并向我祝贺，说我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荣誉。”^③

王先生敦煌学的第二篇论文是《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547 年）的计帐户籍残卷》，其写作也是非常艰难的。70 年代初，王先生从被管制劳改的小山村回到太原后，“多少有一点行动自由”，就从友人处借来《敦煌资料》第一辑阅读，当看到标为唐户籍的 S.0613《邓延天富等户残卷》时，就又开始了敦煌文书的研究。他首先借来了《魏书》、《北史》、《北齐书》、《周书》、《隋书》、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文献，“我用了一年时间夜以继日读书写笔记，又用将近一年时间读懂文书，恢复（S.0613）十六个断片的原本顺序，以文书与史籍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问题。”^④最终将其定名为《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敦煌郡敦煌县某乡计帐户籍》。

王先生又“用两年多时间整理研究这件残文书，基本上恢复原貌，初步解决了文书内容中的问题，撰写成文。朋友告知，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数年前曾整理研究这件残文书，有文章在日本《东洋学报》发表。……（后来）友人来信说，他检视山本达郎氏在《东洋学报》发表的研究此一残卷的文章，其意见与方法与我的文章大致相同。”^⑤

王永兴先生在自述中写到：“撰写这两篇论文，使我有信心，关于研究敦煌学，外国学者能做的，我也能做，这就是说，中国人也能做。就读书研究的条件而论，上述两位日本学者优胜于我百倍；但我也有一个有利条件，敦煌文书绝大多数是用我华夏民族的语言文字写的，敦煌文书大多数的内容是有关我华夏民族的，因而研究敦煌文书之人要具有我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基础，要具有一定程度的我民族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知识和修养。由于这一有利条件，两位日本学者能做的我也能做，可以自信，但不足以自夸。我未能超过他们，是应该自省自愧的。”^⑥

^① 王永兴著《王永兴学述》第 174 页。

^② 《王永兴学述》第 175 页。

^③ 《王永兴学述》第 178 页。

^④ 《王永兴学述》第 179 页。

^⑤ 《王永兴学述》第 182 页。

^⑥ 《王永兴学述》第 183 页。

通过给学生讲授敦煌文书研究的课程，王先生认识到：“教授和研究敦煌文书，必须以我华夏民族优良的传统学术文化为基础，在学术业务上如此，在思想感情上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我们设置这门课的目的。敦煌文书是我华夏民族我们祖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要爱护它，了解它，才能进行教授和研究。日、法、英诸国汉学家研究敦煌文书的水平超过我们，我们应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但我们不能盲目崇洋……外国汉学家治敦煌文书之创新方法，自应吸取之补我之缺；但不应一味鼓吹外来方法，置我民族优良的科学治学方法于不顾；其甚者以宣扬外来学说（洋学说也，是否有价值，宣扬者亦不知。）以自诩自抬身价，以傲视他人，对我民族传统的科学治学方法，恐毫无所知也。此类人此类事与无耻商人在国产商品上不书中国文字名称（非外销者），但大书外国文名称（洋名）以抬货价，实为同一可耻之事，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耳。”^①

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本书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由我们自己的专家编成的”，并比较了刘铭恕先生编著的《斯坦因劫经录》与英人翟理斯所编《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的异同，指出二者各有优长，但刘录较翟录为优。对此，永兴先生认为：“‘我们自己’表现了王重民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敦煌文书出自中国，中国人有能力根据华夏民族自己的需要编制具有自己特点的敦煌文书总目录。”指出刘录优于翟目是有具体资料为证的，并不是空话，也不是自夸，但“有些人过分贬低刘录并抬高夸大翟氏目录，是不符合实际的，其根本原因是崇洋思想。60年代如此，今天不仅仍是如此，且远远超过之，这对于维护华夏民族传统的独立学术文化是极为有害的。”^②

王永兴先生治学，深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1946年，陈先生从海外回来，眼病的治疗失败，双目失明。他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由王永兴和汪篈先生作陈先生的助手。“他备课要读的第一种书总是《资治通鉴》，然后是《通典》、《会要》、《六典》、两《唐书》等等……常常是读完《通鉴》某一段，就要我去查出在两《唐书》里，在《会要》、《通典》里所记载的和这一段有关材料，读给他听，然后，他指出这几种书所记载的有哪些不同，哪个记载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不只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讲课所涉及的史料、与讲课有关的每一条材料，他都作了严谨的校勘与考证。在备课的过程中，我懂得了什么叫严谨的学风，应该怎样读书、怎样教课，这对我一生的教学研究，都极有教益。”^③

陈寅恪“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了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④

^① 《王永兴学述》第193—194页。

^② 《王永兴学述》第186—187页。

^③ 王永兴《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08—2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④ 王永兴《种花留与后来人——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原载《学林集林》卷9，此据《追忆陈寅恪》

我们今天读永兴先生的论著，都会常读常新，尤其是其论据的充分，史料的丰富，解读的细致，让我辈真是汗颜。如他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者”字的解析，就是陈寅恪先生“读书先从识字始”的最好注解^①。因为“唐代许多官府文书，符中有牒，牒中有关，牒中又有牒，纷繁复杂，很多层次，很难解读。对‘者’字的正确理解，是我们解读这类文书的钥匙。”^②对《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中“兵”、“散”、“吏”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传世文献（以《晋书·职官志》为主）与出土文书“二重证据法”的完美结合。^③对“职资”一词认识的修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对学术真理的追求。^④

可以说，永兴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按今天世俗的眼光来看，他所取得的成绩与得到的荣誉似乎是不相符的。他几十年孜孜以求，以一个纯粹的个体（不是领导，可以有许多人由其调遣；也不是学术团队，可以主编；也没有学术助手）完成了这样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真的是人间奇迹。其精神毅力就是值得我辈努力学习的。程喜霖先生在其大著《唐代过所研究》^⑤后记中写到：“1988年夏，在北京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上得到永兴先生的指教，从此先生视我为弟子，在志向、毅力和勤勉等方面给予教诲。尤其是本书草创艰难困惑之时，他来函热情鼓励我：‘研究过所不仅要使用文书，同时要熟悉汉唐典籍有关过所的记载，要精心研究，写出高质量的著作’”。这种志向、毅力和勤勉，不仅仅属于程先生一人，应该说是永兴先生给我们的共同精神财富。

至此，我有一点实在不大理解，即永兴先生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而且也曾经作过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和助手，陈先生应该是了解的，为什么还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到：“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⑥ 这难道是陈先生对王永兴的提醒和希望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陈先生的提醒是及时的，其希望也完全实现了。因为永兴先生的治学，是完全恪守陈氏学统的。而且在寅恪先生逝世后，永兴先生更是将继承传播、发扬光大陈先生的学说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学界“南方蒋天枢先生，北方王永兴先生”的并举，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另外，同是“一二·九”学人的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先生，于2007年11月逝世后，社会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等报刊，

第224页。

^① 王永兴《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的性质和作用》，原载香港《九州学刊》第5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3年），又见王永兴著《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 《王永兴学述》第200页。

^③ 参阅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第43—51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④ 参阅王永兴《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的计帐户籍残卷》，原载《历史论丛》第二辑，齐鲁书社1981年，又见王永兴著《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第60—70页。

^⑤ 中华书局2000年。

^⑥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讲义及杂著》第464页，三联书店，2002年。

都有专文评价或纪念，尤其是乔幼梅、王学典的《又为学界哭英灵——痛悼赵俪生先生》^①，声情并茂，使本来就为大家熟知的赵俪生先生更加引人注目。



刘进宝（左一）与王永兴、李锦绣在北大燕北园书房，2000年

实际上，除了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不同外，王永兴和赵俪生，有许多的相同。他们同是清华大学1934级学生，王先生入的是中文系，赵先生入的是外语系；同是“一二·九”学人，抗战爆发后，王先生辗转长沙转入历史系，赵先生则到山西参加中共抗日武装，但最后都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先生生于1914年6月，逝世于2008年9月；赵先生生于1917年4月，逝世于2007年11月。他们两位都曾有坎坷的遭遇，1957年王先生被迁送到山西，失去了20年的学术研究生命。赵先生到了兰州大学，又被山东大学补划为“右派”；他们在1957年前，都已有了“看家”的成果——王先生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赵先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1978年后，他们共同焕发了学术活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王永兴先生先后出版了《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学述》、《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学术专著，赵俪生先生有《中国土地制度史》、《寄陇居论文集》、《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和《赵俪生文集》六卷问世，奠定了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王先生成了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公认权威，可以说是专家型学者，赵先生则从政治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到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再到文化史，不断转移研究方向，而且都能取得巨大成就，

^① 载《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4期。

可以说是通人的代表；他们都培养了一批学界精英，虽然赵先生只招收了一届硕士生，即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两个专业的那“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品种，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再加上研究生“答辩风波”使他们备受关注。正如赵先生自己所说“谁带的徒弟像谁”^①一样，赵先生的学生也以学术面宽而闻名，王先生的学生大多都成了唐史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中坚（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的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领域，唐长孺先生和王永兴先生的弟子占据了半壁江山）；他们两位都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即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贡献，与社会给予他们的并不相称，甚至都未能当上“博士生导师”。

当然，相对于王永兴先生来说，赵俪生先生的人生经历更为丰富多彩一些，个性也更为张扬一些。而王永兴先生则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心潜心学问，在生前就不争名争利，逝世后的寂寞也可能正是其理想中的天国生活吧！

2009年4月6日

^①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182页。

怀念王永兴教授

池田温

隋唐五代史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永兴先生，于 2008 年 9 月，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此事是我在今年正月接到夫人李锦绣女士在当年十二月十日寄来的《王永兴纪念文集》编委会的邀请信才知道的。谨对王先生多年来对学术界的贡献及对教学工作的赤诚奉献，表示衷心敬意，并谨致深深的哀悼。



王永兴与池田温，1995 年在北京大学勺园

我开始知道王永兴先生的大名，最早是在 1957 年拜读王先生在中国历史界的代表性刊物《历史研究》1957 年 12 期上发表的大作《敦煌差科簿考释》(71-100 页)时，至今已五十余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研究生，在西嶋定生(1919-1997)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唐代均田制等有关唐代社会经济史。当时最早向学界介绍唐代为征发徭役，每年由全国各县制作丁男、中男的名簿，乃是那波利贞先生(1890-1970)。当时他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开始对该名簿进行精心抄录，写成了《关于正史中记载的大唐天宝年间户数与口数的关系问题》一文(发表于京都史学地理学同考会编辑的《历史与地理》杂志第 33 卷 1-4 号，1934 年，抽印本第 69-116 页上)。那波氏在此论文中，把唐户籍(包括男女老幼全部登录在内)与男子籍这两种东西区别开来，并介绍了西域文书中甲~壬、子~卯共计 13 类的原文。与此同时，他还阐明了《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全国 11 道 159 府州每户平均人口数目，并将唐代一家平均人口数与户籍等第一手资料中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仔细考虑了户籍的可信性问题。但他当时还没有对男子名簿上各人名下所记的赋役名称、内容等进行更

深入的考证。

当时中国也注意到了那波氏所辑录的资料。陶希圣（1899-1988）在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的第四卷第五期（1936年8月）上，用38页的篇幅，介绍了其他有关学者的情况，并将上述内容，题为《唐户籍簿丛辑》，将其集录在一起，把男子名簿冠以“丁籍”乃至“丁籍簿”的名称，发表了其中十七——二十号四件文书。

关于上述的“丁籍”，曾我部静雄（1901-1991）在其专著《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讲谈社，1953年出版）中，曾加以解说。他明确指出，唐代征收杂徭的帐，即称为“差科簿”。其后，西村元祐（1913-1982）的论文《从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以大谷探险队携来的敦煌吐鲁番古文书为参考资料》（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法藏馆，1960年出版）。其后，西村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第467-706页）中，更有详尽的说明。

今天回头来看，王永兴先生在上述论文中，对差科簿中每人名下所注记的有关公务、劳役关系的三十多种名词，一一加以正确的解释，从而阐明了差科簿的本质，把对唐代徭役制的理解建筑在牢固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果。著者把上述名词按其范畴，归纳为职役、胥吏、职事官、免徭役者等四大类。对徭役制的各种现象作了明确而又通俗易懂的说明。只要一读原文，就可以使人对于难懂的徭役制的整体，立刻了然于心。至今思之，不禁使人对著者产生敬畏之心，并且对他不胜怀念。当然，王永兴先生在该论文中，适当而正确地利用了正史《旧唐书》以及《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资治通鉴》等书，并且引用了《樊川集 唐故处州刺史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和《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全唐文》所收李峤《上中宗书》，以及其他如 A. Stein 的《Ancient Khotan》、H. Maspero 的《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Centrale》等西文书和《鸣沙石室佚书》、《敦煌石室遗书》、《敦煌掇琐》等敦煌资料，以及日本玉井是博（1897-1940）的《唐代防丁考》等资料，其苦心孤诣，广收博览的精神，令人深为佩服。

王永兴先生在二十几年后，又发表了《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63-166页），对前文进行订补的同时，还向学界提供了差科簿全文的新校本。在文中，补充了前文对遮收、平水、徧与帖徧等三个名词的解释，还对下列四个问题重新进行了考察：

- （甲） 差科簿体现了杂徭制和色役制的特点和征发这两种徭役的需要
 - （乙） 关于勋官荫子制的一些意见
 - （丙） 土镇兵役沉重与中女问题
 - （丁） 色役制研究
- （一） 色役制的种类、特点、性质
 - 1. 文散官四品已下九品已上当番服役
 - 2. 武散官四品已下九品已上当番服役

3. 勋官服役
4. 三卫服役
5. 亲事、帐内
6. 防阁、庶仆
7. 杂匠服役
8. 幕士服役
9. 白直
10. 仗身
11. 门夫
12. 执衣
13. 士力
14. 乐人服役
15. 乐工、兽医、骗马、调马、群头、裁接等服役
16. 番户、杂户服役

再者，文中论及诸色役的源流时，曾言及南北朝的事例。

（二）色役制的转变与消逝

（三）唐色役制的渊源

当考察白直、防阁、仗身、事力、幕士五种身份文中曾追溯到唐以前的沿革。

著者在上述问题中表现的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钻研精神，充分反映了著者作为历史学家的本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唐史学会和敦煌吐鲁番学会曾经成为国际学术讨论的园地。笔者曾参与其中，因为有与王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后来，我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退休后，曾被派到日本外务省管辖下、由国际交流基金承办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工作一年半（1992年4月—93年9月），向专攻日本学的硕士研究生讲授日中比较文化。当时，我每天乘公共汽车往返于设在北京外语学院院内的日本学研究中心与住处友谊宾馆之间。中国方面派李德先生（1922-）为伴，他能如日本人一样用日语交谈，学生们也都懂日语，对于汉语不流利的我，也并无不方便之感。而北京大学（旧燕大校舍）距日本学研究中心较近，在下课后和假日里我常去北大，因而常有见到王永兴先生。在北大的朋友中，来往最为密切的，年长的有周一良教授（1913-2001），年轻者有荣新江氏（1960-），常受到他们二人的格外关照。北京大学又格外赐给我殊荣，在1993年9月3日，由校长吴树青颁发给我客座教授的豪华聘书。

王先生尽管很忙，还特地带我到北大图书馆参观。特别是他使我能到善本阅览室，亲手展读南宋版《唐六典》等贵重书籍，不胜铭感。

王先生1914年6月生，辽宁省昌图县人。他1940年由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1943年毕业。其后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务。在大学中，他主要讲授隋唐史、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隋唐经济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等课程，研究课题有：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史学思想、唐开元天宝十节度研究、隋诏敕拾遗、《唐

大诏令集》校补、五代十国诏敕拾遗、敦煌吐鲁番文书军事文书考释等。著作有：

1.《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87年4月，1065页，2800部，6.90元。

2.《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212页，2000部，5.90元。

3.《陈门问学丛稿》（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441页，2000部，14.70元。

4.《敦煌经济文书导论》（敦煌学导论丛刊1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6月，455页，精装10.4元，平装8.6元。

5.《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442页，1000册，35元。

6.《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465页，24.50元。

7.《王永兴说隋唐》（大家说历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252页，5000部，28.80元。

以上共七种，都是专门学术著作，都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课的原稿基础上写成的。他最早出版著作是1987年，对于1914年出生的先生来说，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专家了。

据该书的开头（编辑体例说明）中所见，该书共由下列七个部分构成：

（一）阶级和阶级关系

（二）土地所有制

（三）农业生产

（四）手工业生产

（五）交通运输

（六）商业

（七）财政

上述（一）“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内容有：

第一章 阶级

第一节 官奴婢 官户 杂户 工户 乐户 太常音声人 私奴婢 部曲 客女 随身 女妓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客 客户 庄户 庄客 佃户 寺户 民间工匠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各种特殊身份户

第四节 氏族志 姓氏录 姓望氏族谱

以上各节，分别由九、三、五、一项构成的。

第二章 阶级关系

第一节 租税制和徭役制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和其它经济关系

第三节 乡里制和五保制 团貌和丁中制 户等和户口 计帐和户籍

以上各节分别由四、四、三项组成的。全书是共达1065页的巨著。如果不是深刻掌握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专家，是不可能构思出这样雄伟的方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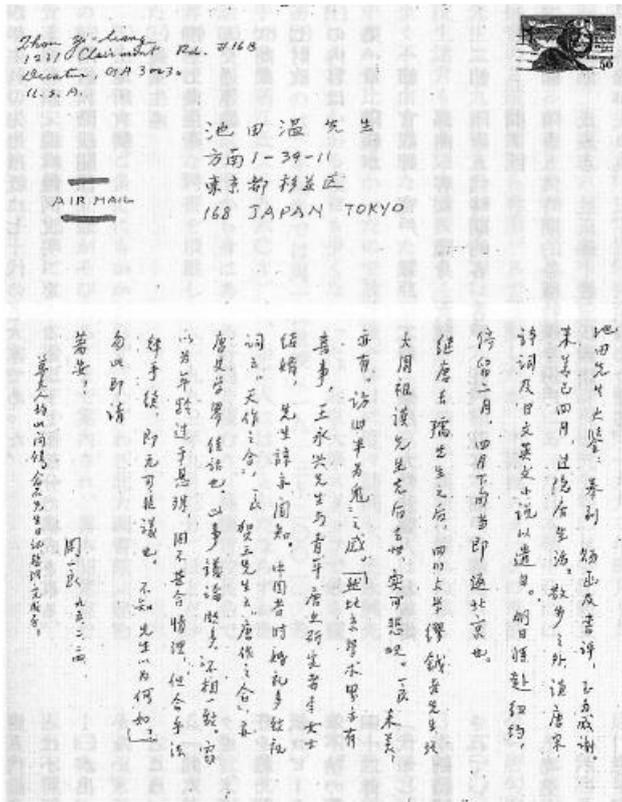
从第一部书，即《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的第（一）“阶级和阶级关系”部分完成以来，迄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第（二）土地所有制以后刊出的时间，我不得其详。

对于王教授的一生而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与他的学生李锦绣博士的结婚。



1995年8月池田温送王永兴、李锦绣结婚贺仪

这个值得纪念的话题，我是从在美国周一良先生给我的信中才知道的。那是在我北京就任期满归国后一年半左右1995年3月初的事。周先生下笔甚健，这是很多人所熟知的。从1982年1月19日至2000年1月6日为止，他赐给懒得写信的我的信件，累积起来有42封之多（后来有他人代笔的）。



周一良致池田温信（1995年2月24日）

他在1995年2月24日由美国给我的信中说：“然北京学术界亦有喜事。王永兴先生与青年唐史研究者李女士结婚，先生谅已闻知。中国学者昔时婚礼多致祝词云：‘天作之合’，一良贺王先生云：‘唐作之合’，亦唐史学界佳话也。此事议论颇多，不相一致，窃以为年龄过于悬殊，固不甚合情理，但合乎法律手续，即无可非议也。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唐
伯
之
合

永
兴
同
志
嘉
礼

周
良
敬
贺

邓
毅

周一良送王永兴、李锦绣结婚贺卡（1994年12月）

后来，李锦绣博士的大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三册，下卷二册）出版了，这是学界都知道的事实，其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刊之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15+411页，有任继愈、祝总斌二位先生的推荐文，目录15页。

序、前言、第一编唐前期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

上卷第二分册，1995年7月，第二编唐前期的财政收入，415-801页。

上卷第三分册，1995年7月，第三编唐前期的财政支出，805-1277页。（全三册，69.50元）

下卷第一分册，2001年6月，第一编财政机构及职能 目录19页+607页。

下卷第二分册，2001年6月，第二编财政收支 611-1355页，任继愈、祝总斌的推荐书 1356-1357页（全二册，78.00元）

王先生雄伟方案中放在最后的（七）财政，由于李博士的《唐代财政史稿》，从而得到圆满的实现了。

贯穿王先生整个著作的，乃是对陈寅恪教授（1890-1969）的倾倒之情。在我所列的上述王氏著作目录中，3.《陈门问学丛稿》中的所谓“陈门”，即指陈寅恪。在这个论文集的开篇，就收入了《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一文（1990年，共10页），以及《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1986年，共10页）两篇文字。前者曾发表于《清华校友通讯》的《陈寅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刊上；后者是王先生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进入七十岁的老年时，为追念当年向陈先生受业时情景而写的，其中分“着重通识”、“朴素的辩证方法”、“重视客观形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研究方法”等四部分。

目录中的 6.《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是他晚年之作，最为详细地论述了陈寅恪的人格与学问。他回忆了师从陈先生所受的教导，从 1937 年 10 月在长沙由南开、清华、北大三校南迁合并成的临时大学听陈先生的课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陈先生因受迫害，1969 年 10 月 7 日清晨在广州中山大学西南区 50 号宿舍病逝为止。他还对陈先生的三部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的主旨，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对学者颇为有益。

王先生在陈寅恪影响下，很尊重宋代史学重视节义的传统，把欧阳修、司马光二人尊为传统史学的最高峰。在著者的陈寅恪论之后，中国在现代化与经济文化飞跃发展当中，正在集中展现研究陈氏著作的热潮。

由陈寅恪、王永兴夫妇所发展起来的隋唐史研究事业，在 21 世纪，将进一步为国内外新一代学者所继承，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愿王先生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夏应元译自《东方学》第 118 辑，2009 年，第 134-139 页，略有删节）

追忆恩师王永兴先生

——我的北京大学留学回忆

日本 明治大学 气贺泽保规

一 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开始

1985年9月16日的夜晚，我孤独地走出北京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口。因为所乘飞机严重晚点，旧北京机场的航站楼中已经灯光昏暗，人影稀疏。本来约好来机场接机的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未见踪影。当最终航班的旅客离开后，航班楼开始清场。机场职员要为出入口上锁，他们没有因为我是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而法外施恩。我被不客气的推到外边。机场已经内找不到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默默地等待。虽然才9月中旬，凄凉的夜晚还是使我感到隐约的寒意。四周建筑物的灯光逐渐熄灭，黑暗在蔓延……，为期一年的中国留学生活就在这样的寂寞中开始了。

我真正开始立志学习中国历史是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即便在文革结束后，紧迫的政治局面仍然持续，外国人访问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只有被称为「友好人士」特定人群能够去中国旅行，这种机会与我无缘。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接纳留学生（高级进修生），可是，已经就职的我不符合接纳条件。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候，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政府）和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院缔结了学术交流协议。根据该协议日本大学的文科院系可以每年派遣一名研究者去中国访问留学。这对于在富山大学任教的我无疑是一个福音。我幸运地通过了选拔，获得了一年的科研休假，满怀热忱地来到中国。

当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学者的动向所知甚少，除了文革后较早开始学术活动的几位著名人士外，我们不掌握其他人的信息。在与我有关的研究领域，可以列举的只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先生，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厦门大学的韩国磐先生。关于王永兴先生，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外的人大多不知道他在哪里从事研究。我的研究方向是隋唐史，因而打算将北京和西安作为留学活动的基地。通过各种渠道查阅了这两座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机构和隋唐史研究人员的资料，觉得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永兴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先生适合做我的中方接纳机构的教授，所以冒昧地直接给两位先生写信，并得到两位先生的允诺。虽说如此，但是，我对两先生的具体的经历和研究领域还没有直接的认识。当时，日中历史学界的关系是那么疏远。

二 与严师王永兴先生相处和授课情景

在不太愉快的气氛中我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不过，入住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宿舍勺园4

号楼 506 室之后,心情逐渐好转起来。以这里为据点,可以去许多地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接触中国社会之一角。在北大我最初拜会的人就是接纳我的教授王永兴先生。

在到达北京之后一周的 9 月 23 日下午,我接到历史系的事务室通知,要我在未名湖畔竹林中的临湖轩外宾接待室与王永兴先生会面。关于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在回国后整理的《留学报告》中这样记述着(《中国历史学界一瞥-中国留学报告》《富山大学教养部纪要》20 卷 1 号,1987 年 8 月):

下午,去校区内未名湖畔的临湖轩,拜会王永兴,周一良两位教授。寒暄之后,我说明来中国留学的目的,以及现在的研究课题。还谈及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所推进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历史系的体制等话题。王先生和我商定了在北大的学习计划,决定在研究生(大学院生)课程中选择适合我的科目,通过课堂接触,接受指导。我以前在日本曾拜会过周一良先生,不过与王先生却是第一次见面,过去只有过书信的交流。尽管那时王先生已超过了 70 岁高龄,而且,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打上右倾的印记,经历了长时期下放山西的艰苦生活。但是,先生对研究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多年来他对恩师的深深敬意没有丝毫改变。在中国历史学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周一良先生也是其弟子之一。

通过这次会见,我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希望听讲先生为研究生准备的课程,并通过听课与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交流,因为他们担负着未来中国史研究的重任。王先生很理解并支持我的想法。于是第二天,我出现在新学期的研究生的课堂上。

先生的课一般是早上 8 点开始,教室时常变更,有时因出差停课,晚间要补讲。作为外国人很难及时把握这些临时变故,并准确找到新的授课地点。每次,王先生总是派他的研究生来我的宿舍,引导我寻找教室。在北京大学的广阔校园中找教室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生授课时要求严格。如果从早上 8 点开始上课,全体学生在此之前都在教室安静地等候。在此期间,部分学生为老师准备茶和热水瓶,放在桌子旁边。授课中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需要擦去的时候,总会有学生默默地去擦,以便不妨碍老师继续书写。以前只听说文化大革命严厉批判了师道尊严,教师的权威扫地。看到那样的风景,难免吃惊。

关于课程内容,记得星期一上午是敦煌吐鲁文书研究,星期二和隔周的星期五的上午是唐代经济史讲义。先生每次都是站立两个小时,声音清晰而富有张力。学生们则鸦雀无声地作笔记。老师的热情和活力,学生诸君的认真与执著令我折服。

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在某次的授课时,先生就史料问题提问了一位学生,那个学生没能明确回答。先生很严肃的让学生站在那里,教训说:在清华、燕大时代,不会有学生连这样的基本问题也回答不上来。文献资料不但要读,最重要的是要读懂。听到这些教诲,我的心也不由的收紧了。长期被强制下放到山西农村,直到 70 年代末才得以返回母校的先生,为了挽回时间上的损失,努力培养更多出色的人才,可谓用心良苦。



气贺泽保规与王永兴在北大朗润园，1986年

三 在北京大学邂逅的年轻学者以及敦煌文献资料室

对于王先生来说，我恐怕是他从国外接收的第一个研究人员。也许出于这种原因，先生给予我各种的关照，还介绍我拜会了北京大学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和考古学的宿白先生。两位先生和王先生同住朗润园的教授楼，他们都鼓励我做好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特别是宿白先生，为了方便我外出调查，还特地写了介绍信。当我谈起准备后半学年转到西安研究的时候，宿白先生劝说我：西安现在还不太开放，不如把在北京的时间延长。王先生也持有同样意见。

当时北大图书馆的二层有一间敦煌文献资料室。在王先生门下学习隋唐史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经常出入这里，成为他们学习的地方。王先生对我说，如果需要，可以使用这间研究室。

出入北大图书馆，每天看到的是学生们伏案勤奋学习的身影；可是，回到勺园留学生宿舍看到的却是一些优闲自在，无所事事的人，感到反差很大，心中有一种郁闷和不满。于是，我遵从先生的劝导，每天晚饭后去敦煌文献资料室查阅敦煌文献的卡片，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晚上10点是图书馆和自习教室的闭馆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这个时候离开图书馆，在昏暗的校内道路上和从其他教室出来的学生合流，淹没在返回宿舍的人流中。委身于这样一种激动的潮流，使我体味到某种充实感。

在敦煌学文献资料室学习的学生们总是喜欢占靠里边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年长的原因，

协调这些事情的是宁欣(现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印象较深的同学有孙顺华(现青岛大学),她空闲时总是帮我练习中文会话;还有李鸿宾(现中央民族大学)、牛来颖(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学雷(现国家图书馆)等。李锦绣先生(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那时还是本科生,尚未进研究生院。记得她总是坐在资料室的一隅,埋头学习。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她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已经确立了致力于唐代史研究的目标。后来发表的大作《唐代财政史稿》,也许从那时起已经有了构想吧。

大家在同一个研究室并肩学习。王先生每晚八点左右会来到资料室关照同学们,看到学生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做一些简要的指示后便离开。老师走后空气会有几分轻松,但是,同学们绝不至于怠慢。现在回忆起来,在资料室学习的大部分是女生,男生比较少,或许是在逃避老师的严格指导吧。无论如何,通过资料室的共同学习,构筑了我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值得自豪的人际关系。

有一天,王先生带了一位年轻的研究者访问我的宿舍。并嘱咐我:如果今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忙。他就是先生最寄以厚望的弟子刘俊文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讲师。由于我和刘先生年龄相仿佛,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后来我们每个星期见一次面,讨论各自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刘先生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积蓄和动向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热心地倾听我介绍了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情况,包括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以来京都学派的观点,以及东京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西岛定生、堀敏一等的学说。日后,刘先生到京都大学的谷川道雄先生那里留学,并积极的向中国介绍日本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促成这一事业的机缘。饮水思源,这些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都是通过王先生的介绍结识的。

四 追忆王永兴先生和北大的良师益友

蒙王永兴先生的关照,在北京大学我有机会聆听周一良、邓广铭、宿白等著名学者的教诲。周一良先生曾多次询问我生活中有无困难。我也时常访问位于北京大学燕东园一角树林中的周先生的家,主要话题是图书馆善本室的利用和所藏拓本等,偶尔也言及先生过去和日本的关系,以及在美国的生活等。后来,周先生的自传日译本出版(《毕竟是书生》周一良自传,日本·东海大学出版会)。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周先生在北京的家中亲口对我讲述过。86年的8月中旬,回国之前,我去周先生处辞行,先生全部用中文和我交谈,我也很自然地用中文回答。先生了解我刚来中国时的中文水平,对这一年里我中文的进步给予了表扬。我很高兴,似乎有些飘飘然了。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我还结识了张广达、祝总斌、吴宗国等老师。吴先生和祝先生出席王先生主讲的唐代经济史课程,对研究生所作有关赋役问题的报告进行评论和辅导,我们得以结识。吴先生在那个时期没有担任授课,此后时常访问我的宿舍,谈论学术以及我在北京

的生活问题。张广达先生当时担任研究生的唐代西域史地课程，我去听他的课，不时被他严谨而明晰的论述所打动。在12月末没有暖气的教室里，寒风不时的从窗缝袭入，张先生充满魅力的授课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回国前夕的86年8月中旬，在历史系二院的一室，经当时历史系助教李开元先生（现日本就实大学）的介绍，拜会了研究魏晋门阀制度的著名学者田余庆先生。房间闷热，没有空调，田先生十分健谈。他一边擦着汗，一边援引陈寅恪的学说谈论隋唐统一时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的重要性。田先生指出：至今对该时代的研究还是以陈寅恪为出发点的，没能超出其学说的框架。然而，现在年轻的一代学者超过陈寅恪，提出新学说的时期已经到来。期待10年之后看到这样的成果。听着先生严谨透彻的分析，感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

很早就史学界崭露头角的荣新江先生当时正好是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助教，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曾偶遇，约定日后访问研究中心，遗憾的是我没有搞清地址，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读研究生的赵和平先生（现北京理工大学）和我一起听王先生和张广达先生的课。我曾多次访问过研究生宿舍，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共同用餐。这一切都已成为美好的记忆。

作为一名外国人的我，从当初连左右都分不清的状态开始摸索，在经历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后，比任何人都幸运地接触到许多老师、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这与众多学人交流关系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存在，就是王永兴先生。我所邂逅的学者们都为我在王先生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感到高兴。王先生是以治学严谨闻名的隋唐史专家，而且在反右派和文革运动中又有着令人同情的辛酸经历。他们了解先生艰辛的过去，对先生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先生自己很少提及往事。只有一次，86年元旦先生招待我到家里过年。先生风趣地说：我家的饭菜是北京风味参合山西风味，不经意间流露出长期在山西生活的痕迹。也许是因为喝了些酒的缘故，他提起了自己的同学，文革中遭受迫害撒手人寰的汪篔先生。话语间充满哀悼之意，还谈及《汪篔隋唐史论稿》的出版。

在我留学的85年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推进经济改革，人们的表情变得丰富、开朗。可是，王先生没有时间沉醉于改革带来的新气氛中，他终日考虑的是如何挽回过去不幸事件造成的研究滞后局面，努力培养后继人才。望着先生的背影，我能够体味到他的心情。

五 王先生治学风范的启迪

1986年的8月末，我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归国之路。如果可能，真想继续在北京、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当我开始在中国生活时，曾经为自己设定了目标，与中国人站在同一块土地上，用同样的视线观察、行动、思考。回顾一年的留学生活，我不敢说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不过，结交了那么多的良师益友，至今仍然保持着友谊，使我为之骄傲。我在北京和西安两座大城市各度过大致半年的留学生活，同时独自一人去各地旅行。去过西北地区：敦煌—吐鲁

番—乌鲁木齐；兰州—西宁·青海，华中·西南地区：武汉—重庆—成都；华北地区：大同—太原；郑州—洛阳—开封等等。当时和现在十分不同，购买列车和长途汽车票手续繁杂、十分困难。多少次几乎陷入绝望，最后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地方博物馆和大学的老师们的善意帮助，这些困难都被化解了。

回首往事，往昔的苦恼已经变成一种愉快的记忆，深深印记在脑海中。留学生活使我能够观察到真实的中国的社会和家庭，中国人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最重要的是接触到黄土地上淳朴的农村。这种体验对我后来理解中国史料很有帮助，因为存在于史料背后那个立体的，富有色彩的世界会立即浮现出来。这对我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的生活体验使我亲身感受到一代宗师陈寅恪影响之巨大。诚然，在日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大都知道陈寅恪的名字。如果是有志于隋唐史研究的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都是必读的书籍。然而，能够全部读懂也是相当困难的。我在中国遇到的老师几乎都提起过陈寅恪的名字，并且意识到其与自己的学问的关联。我知道王先生长期作陈寅恪先生的助教，对恩师抱有特殊亲密的感情。几次想向先生请教关于陈先生的事，又担心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勾起伤心往事。所以欲言又止，没能从先生那里听到更多的事情。回国以后，我开始认真通读《陈寅恪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那充满重量感的笔致和敏锐的历史意识让我震撼。我后悔当初没能向王先生请教更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往事。

在王先生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了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研究的重要性。我所利用的北大图书馆二层的敦煌文献资料室中有经过整理的卡片和照片。王先生嘱咐过，如有需要可以使用。不过，当时我还没有驾驭这些资料的信心。此后访问武汉大学的时候，拜会了唐长孺先生，以及陈仲安、朱雷、陈国灿等著名学者，他们再次向我介绍了吐鲁番文献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文书整理过程的艰辛。虽然当时我还不具备自如运用出土文献的能力，但是，深深体会到今后如果不认真对待这方面的资料，研究将走向片面。

86年8月，回国前夕，王先生和刘俊文先生一起让我在大约15名研究生面前做敦煌文献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关于西魏大统十三年文书的负担体系和丁兵制的研究》。此前，王先生曾经发表过《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的计帐户籍残卷》(《历史论丛》1981年)，先生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户口·税制，我变换角度，着眼于“六丁兵”的丁兵，发表了不成熟的看法。想不到得到先生很高的评价，说我尝试从迄今未有的新视点来探讨该文书。这使我深受鼓舞，至今难以忘怀。这篇报告的内容与日后出版的拙著《府兵制的研究》有若干关联。

回国时，王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南门附近的北京烤鸭店为我饯行。先生说：自今年夏天起将不再担任历史系本科生的授课，只承担研究生的指导了。但是，自己的研究将一如既往，不会发生变化。先生从教育第一线引退难免感到寂寞，可是已经年届七十，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在先生活跃于教育和研究两条战线最前沿的最后一年，有幸坐在听讲席上聆听教

海,是十分幸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先生的的确是我的恩师。

退居二线后,先生依然笔力不衰,不断地发表论文。而且,《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著作也陆续刊行。每当看到先生的新作,我都会因为自己的学问进步太慢而感到惭愧。我曾经有一个想法,邀请先生来日本,看一看日本学术研究的情况。但遗憾的是这个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在我的心目中,先生永远是坚强的,是一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研究的学者,永远不会逝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先生这种治学风范,至今仍在启迪、鞭策我不断努力。

20多年前在北京生活的光景,至今仍鲜明地印记在脑海中,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退色。那时没有象现在这样的壮丽建筑物群,也没有服饰鲜亮人群。道路上涌动着自行车的洪流,人们生活简朴贫寒,可是大家目光清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希望。那个时代,正好是“旧”体制的中国向“新”体制的中国变化的转折点。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的变革时期,我有机会在留学生活中遇到王永兴先生以及各位史学界的良师益友,学习中国史的本质,并以此为研究活动的新起点,实乃人生之大幸。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自勉。为了回报师恩,我唯有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研究和教育事业之中,以新的发展,新的成就告慰恩师在天之灵。王先生,安息吧。

2009年4月 后学门生 气贺泽保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永興先生の歴史学

日本 京都府立大学 渡辺 信一郎

私が王永興先生に直接お会いしたのは、三度である。初めてお会いしたのは、1983年10月24日、四川大学で行われた唐史研究会座談会の席上でのことだった。このときは、日本の唐代史研究者14名が訪中団を結成し、唐史研究会年会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ただ何か事情があったらしく、座談会形式での開催となった。比較的大きい会議室に日中の研究者36名が一堂に会し、中国から5人、日本から3人が出て、交替でおたがいの研究の現状を紹介しあった。中国側の出席者は、唐長孺・王仲犖両先生をはじめ、名だたる研究者ばかりで、私は、活字で読みなれた諸先生が眼の前で動き、話されるのにひたすら感動した。このとき王永興先生は、開設されて3年目の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の活動とともに、「敦煌・トルファン研究の現状」を報告された。私も「日本关于唐宋变革期研究的现状与课题」という小論文を用意して宣読する予定であったが、錚錚たる参加者に恐れをなし、論文の提出だけにとどめた。別れに際して握手したそれぞれの先生の手は、皆な柔らかく暖かだった。

二度目にお会いしたのは、北京市西北郊外、円明園の近くにある先生のお宅だった。1997年1月から10月にかけて、私は、社会科学院経済研究所の受入で、研究のために北京に長期滞在していた。唐代の財政史研究を手がけていたこともあり、北京に着いて間もなく、旧知の張沢咸先生を歴史研究所にお訪ねした。このとき張先生から、『唐代財政史稿』上巻を出版されていた李錦繡女史を紹介していただいた。李錦繡女史は、王先生と結婚されて間もないころだったと思う。2月1日に北京大学の西門前で、李女史と待ち合わせて、一緒にお宅へ連れて行っていただいた。先生にご挨拶すると、最初に四川大学で会ったことを話題にされた。十数年の歳月が一気に縮まる思いがした。しばらく三人で話したあと、先生は、若い人同士で研究の話をするのがよいとおっしゃって、自らは書齋にひきあげられ、ときどき顔をみせて、話に加わってくださった。

三度目は、2001年8月14日、大同で開催された北朝史国際学術研討会の帰りに北京に立ち寄り、お宅に伺ったときである。このときは、夕食のご馳走にあずかり、先生の書齋で椅子を並べて話した。先生は、谷川道雄・堀敏一両先生の近況をはじめ、日本の研究動向について質問され、また先生が東北から北京に出てこられたころの老北京のたたずまいを、現状と比較して懐かしげに回顧された。そのとき一番の話題になったのは、陳寅恪先生の学問と人となりについてであり、また書齋にかけられた陳寅恪先生の写真や、遺品である眼の前の机の由来についてもお話があった。先生からは、数部しかない『陳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の初版本をいただいた。

日本に帰って、あらためて『陳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を読んでみると、後記の日付は、1997年夏になっていた。二度目にお眼にかかったときは、丁度この著書を執筆中だったのだ。王永興先生がどれほど陳寅恪先生を敬愛されているか、この本を読めばよく分かる。私も、初学のころ、先輩から南北朝唐代史を研究するなら、陳寅恪先生の三部作を必ず読んでおくように言われた。陳寅恪先生の訃報を耳にしたのも、そのころである。私は、こうして『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からはじめて、『元白詩箋証稿』その他の論文に眼をとおし、それ以後陳寅恪先生に私淑してきた。大学の教師になってからも演習に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をとりあげることが多い。

王先生の『陳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を読んで、陳寅恪史学の全体像を再確認した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はじめて理解できたことが二つあった。その第一は、陳寅恪先生の歴史学が司馬光『資治通鑑』をはじめとする宋代史学の継承発展であること、そこに貫かれているのが独立之精神と自由之思想であったことである。私は、漫然と、陳寅恪先生のみごとな論証をささえているのは、清朝考証学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た。『陳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の中で指摘されたことは意想外であり、また眼からうろこの落ちる思いであった。構想雄大な陳氏三部作の歴史叙述は、考証の単なる集積だけではなし得ない成果である。私は、あらためて独立之精神と自由之思想に支えられた陳氏三部作の歴史叙述を読み直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と思っている。

二つ目は、陳寅恪先生の歴史学の根柢を解明する作業自体が王永興先生ご自身の歴史学の本質を語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最後尾に附録された「八十述懷」のなかで、王先生は、1931年9月18日に始まる日本の侵略によって沈陽が占領され、北京に流亡を余儀なくさせられ、3・4年の間、乞食同然の生活を送ったことを述懐しておられる。三度目にお会いしたとき、先生は17歳で北京に出て来たとおっしゃった。そのとき私は、大学入学にしては、少し早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たが、その経緯を質問しなかった。私は、老北京を懐かしむ先生の言葉の奥にある苦渋の体験に思いをめぐら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一人の日本人として、自分の想像力の欠如を恥じるほかない。

先生の五指にあまる著述を含む研究成果は、前半は日本の中国侵略の苦境の中での学問形成の結実であり、後半は壮年期における文革期の21年にわたる研究の中断をへて成し遂げ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それは、独立之精神と自由之思想を根柢に保持しなければ、なしえない業績である。『陳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は、陳寅恪先生の歴史学を闡明するものではあるが、かえってそれは、王永興先生自身の歴史学の根柢にある独立之精神と自由之思想を叙述するものでもあり、若い世代の歴史研究者に期待する宋代史学以来の中国史学の精髓でもある。

最後にお眼にかかったとき、王先生は、わざわざ階下にまで降りてきて、夫人とともに見送ってくださった。カバンの中に写真機を入れ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私は、不覚にも

そのとき写真をとることを失念してしまった。先生との記念は、いまはただ 1983 年の座談会の集合写真として、手元に残るだけである。

真情悼念王永兴教授

日本琉球大学 长部悦弘

我是1986年由日本文部省派遣的交换留学生。1986年3月，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之后，从9月到1988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高级进修生，接受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永兴教授的指导，就读中国历史。

1986年9月10日，我怀着对前途的不安与期待，从大阪国际机场起程。一路上，从飞机上鸟瞰中国大地，当蜿蜒的银色河流落入眼底，心中便涌出了一种莫名的感动。经过了三个半小时的旅程，我到了北京国际机场。那天，秋高气爽，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住进了北京大学留学生楼一一勺园。北京大学建筑物古色古香，鳞次栉比，充满了严肃的气氛，使人能感受到一种传统与历史悠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天后，我去朗润园，第一次拜访了王永兴教授。王教授很和蔼，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可是当时，我的汉语听力还不够好，没太听懂王教授所说的话。王教授有些犹豫，不知道如何指导一名听不太懂中文的学生，所以他希望我先听为留学生所开的汉语课。



辻正博（左一）、长部悦弘（右一）与王永兴在北大朗润园书房，1987年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听力有了进步之后，王教授才开始指导我读专业书。经过与王教授商谈，我决定研究隋唐国家制度这一内容。他要我在家里读《通典》和《隋书》，然后每隔一周，到他那里接受指导。王教授很喜欢我提问，每次都很耐心的回答我。如果我没有疑问，

他便要求我尽量找一些问题准备下次提出。王教授这种对工作的热心与认真的态度深深的感染着我。

我到中国以后发现，北京大学的老师们都比较尊崇陈寅恪先生，而且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我 1978 年左右在日本看过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著作，深受启迪。当时，我认为陈先生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和当时中国流行的研究有所不同。来中国以前，我并不了解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所以没想到陈先生的研究竟受到这样高的评价。甚至，还有很多老师直接继承了陈大师的学问研究。

我进了北京大学，才知道周一良、王永兴两位老师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当我听到这件事时，真是又惊又喜。王教授告诉我，他曾在清华大学做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教，而且建议我应该反复熟读与体会陈先生的著作。不仅如此，他还向我介绍了陈寅恪先生的教学方法。王教授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这种指导方法也用在了我的身上。我知道这种方法是为了帮助学生主动地深入思考。

在留学的两年中，北京大学的校园风景，随季而迁，每个季节都会有优美的景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春时柳絮飘舞，夏日绿林蝉鸣。秋叶变红，冬雪覆地。所有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来往于王教授的家与勺园之间，在这样的优美环境中，受到博学多识的老师的指导，使我不禁有一种幸福感洋溢心头。

两年的留学生活，通过从师王教授，使我领会到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并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对将来更充满了信心，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我留学的最大收获。王永兴教授和周一良教授能一起收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外国人作学生，并为我安排了如此优越的读书环境。至今，我的心里都一直深深地感谢着这两位恩师。两位恩师虽已长眠，但是他们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部长悦弘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2001 年

王永興先生の思い出

日本 京都大学 辻 正博

王永興先生には、私が1987年9月から一年間、北京大学歴史系に高級進修生として留学した際に指導教官となっていて以来、二十年以上にわたってご指導いただいた。9月初旬に北大に到着し、留学生辦公室での手続きを一通り終えて少し落ち着いた頃、一年先に留学しておられた先輩の長部悦弘さん（現琉球大学教授）に連れられて、当時北大キャンパス内にお住まいであった王先生のお宅を訪問した。当時、先生は何名かの博士研究生を指導されていたものの、規定上は「退休」年齢に達していたため、講義は担当しておられなかった。しかし幸いなことに、長部さんに続いて私も、学生として受け入れて下さったのである。

初めて先生にお目にかかった日のことを、私は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いる。先生は穏和な表情を浮かべて初対面の私を出迎えて下さった。型どおりの挨拶をし、これからの研究計画などをお話ししたつもりが、実はあまり通じておらず、また先生のおっしゃることも恥ずかしながらあまり解らず、どうしようかと思っていたところ、先生は私にこう告げられた、「まず漢語をきちんと勉強しなさい」。



先生の言葉に従い、私は早速、留学生楼内で開かれていた漢語の授業に（かなり真面目に）出席した。その一方で、先生に無理にお願いして、二週間に一度ほどの割合で、『大唐六典』講読の指導もしていただいた。自分で読んでいて疑問に思った箇所や不明であった箇所を、その時にまとめて先生に質問するという形式の、文字通りの「授業」である。最初の頃は漢語の能力が全く不足していたために、質問したいことを説明するだけでかなりの時間を要してしまったが、二、三か月を過ぎると徐々に先生とのやりとりもスムーズに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ただその頃になると、大学での生活、そして北京での生活に慣れてきたこともあって、友人たちと国内を旅行して大学を不在にすることも再三あったため、「授業」の時に先生からは「君はいつ大学にいるのかね？」と小言を頂戴したものである。

旧正月の折には、長部さんと私は先生のご自宅に招かれ、お手製の水餃子をご馳走になった。先生は東北のご出身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たいへん美味しかったことを覚えている。

先生は折に触れて自らの経歴についてお話し下さった。制度史の史料を読んでいただい

ていたこともあり、陳寅恪の学説に話が及ぶことがあったが、その時、私は先生が陳寅恪の助手を務めておられたことを初めて知った。後日買い求めた『国立西南聯合大学校史資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の中に先生のお名前を見つけ、また、後年刊行された『陳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の王先生の著作を拝読するにつけ、私は、陳寅恪が先生の学問に及ぼした影響の深さを思い知ったのである。

北京が春を迎えた頃、留学生辦公室が「指導教官と留学生」というようなテーマで、写真パネル展を開いた。それに先だって、辦公室の係員がカメラを持って先生のお宅を訪れ、そこで先生とその指導を受けていた私を撮影した。どことなく「やらせ」のような感じもあったが、できあがったパネルを見てみると、実際以上に自分が真面目そうに写っていて（写真1）、面映ゆかったことを覚えている。

留学して一年目の夏休みに私は帰省し、その時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の助手の採用試験を受け、幸運にも採用された。帰国前に留学期間を半年間延長したい旨を先生に願い出て許され、事務手続きをとっていたのだが、急遽帰国することとなって、先生の「授業」をもう受けられないかと思うと、残念で仕方がなかった。失礼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私は先生に書状をしたため事情を説明したが、先生は私の就職を心から喜んで下さった。

帰国後も先生と私とのやりとりは続いた。旧正月前には、先生から自筆の年賀状を頂戴した。先生のご自宅を訪問する機会は、遺憾ながら2度ほどしかなかったが（写真2は、2002年8月に撮影したもの）、親しくご指導を受けていた頃と少しも変わらず、夫人となられた李錦繡さんと一緒にご自宅でお元気に研究生活にいそしんでおられたご様子も今でも目に浮かぶ。先生のお暮らしぶりはきわめて質素で、まさに「学究」そのものであったと思う。

先生の訃報を知ってから直ちに北京に飛ぶこともできず、忸怩たる思いを抱いていたが、この3月ようやく先生の霊前でご冥福を祈ることができ、李錦繡さんとも先生の思い出話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その折にこの追悼文集への寄稿のお話しをいただいた次第である。

先生の薫陶を直接に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は僅か1年に過ぎないが、先生の学生の末席に名を連ねられることを心から誇りに思っている。先生の学恩に未だ十分に報い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は恥ずかしい限りであるが、留学から帰国して隋唐時代の制度史研究を志し、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に手を染めたことは、紛れもなく先生の学問の影響であろう。師の残されたご業績はあまりに偉大であるが、その後を少しでも追いかけてゆきたいと思う。

先生のご冥福を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辻正博与王永兴在北大燕北园书房，2002年

漫步在北大蔚蓝的天空下

李 锦 绣

北大的早晨，宁静、清幽。

黄刊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从校医院出来，穿过梧桐树叶交织的茂密的林荫，经过芳草茵茵的静园，绕过蜿蜒曲折的幽径，来到翠竹、古树掩映的临湖轩前，仰望着两株苍劲挺拔的白皮松。这是黄刊最喜欢的，据说是明代的古树，已经巍然耸立了几百年了。



王永兴、李锦绣在北大临湖轩白皮松前，1995年

晨曦透过茂密的枝叶洒落下来，光辉柔转，远处葱郁的绿树、近处草地及棘丛里的顶着露水的小花都生机盎然。偶尔一只鸟鸣叫着飞过，更显得静寂。空气是清爽而芬芳的，夹杂着一些泥土的气息。

黄刊倚靠在轮椅上，眼睛也不愿睁开。这是他因肺炎住院的第十二天，也是我第二次在早晨推他出来。高烧虽退去，他的血液中氧气较低，二氧化碳仍高，医生建议我推他出来走走。燕园丘岗起伏，林草丛茂。参天的古槐、银杏，依依的杨柳，低矮的白杜、红瑞木、金银木、荚蒾，丛丛的山桃、丁香、紫荆、刺玫等，都枝条舒展，连绵不断。这样的环境中，氧气一定是很充盈的。在各种古树新枝中，我选择了松树，更爱把黄刊推到油松、雪松、白皮松前，让他在松下停留，大口呼吸，尽情吸收青松的氧离子。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更希望他融入青松之中，吸进青松旺盛的生命力。

可是黄刊依然无力地靠着轮椅，用一两个字，勉强回答我的问话。昨天他就是这样几乎闭着眼睛出来的，什么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今天该怎样让他说话，让他深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呢？我有些犯愁了。

突然想到了黄刊住院前经常捧在手里的《陈寅恪诗集》，我似乎想到了办法。在松树下，我背起陈寅恪先生的诗：“汉家之厄今十世”。我停顿下来，一会儿，我听到他接了下来：“不见中兴伤老至。”顾不上心头的狂喜，我连忙背下去：

一死从容殉大伦。

他仍在继续接下来：

千秋怅望悲遗志。

于是我们就这样一人一句，环绕着松树垂下的苍翠的枝条，背完了这首长长的《王观堂先生挽词》。

陈寅恪先生，真是他心中永不忘却的回忆啊！我欣喜又感动。此后我才明白，陈寅恪先生的诗，不仅陪伴他和我在医院的两个月，而且作为他心中的支柱，支撑他走过一切风雨，走完了一生。

二、

推着他沿着绿树成荫的小路往回走，我一边感慨，一边回忆着他住院十几天来的日日夜夜。

黄刊这次生病，比以往的几次都严重，他咳血，也因缺氧而昏睡。而且随着年龄增大，许多事都忘了，许多话、许多年都记不清了，甚至出现了时空混乱，不知身在何处，思想飘向久远的过去。

每当夜幕降临，我心中都感到恐怖。因为夜里，他的思绪飞速地游离现实，似睡似醒地固执地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时空，让我不知所措。

在医院的第一夜，他在咳嗽、喘息逐渐安定，安睡了一两个小时后，突然精神起来。他

问我，“电源插好了吗？”在我愕然中，他又说：“出来了！”，于是双手忙乱起来，手指不停地动。一会儿说：“帮帮忙，这些字跑了！”一会儿又说：“快来，它怎么又不见了！”紧接着，又喊：“我要另起一行，怎么办呢？”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在学电脑，这些表现，正是2001年他初学用电脑打字时的常态。

说起学电脑的因缘，我想起9年前我在英国时，他给我写的书不成字的信：

我现在手写字越来越不行了，同时脚走路也越来越不行了。原因何在？我自己不知道，但却引起一个思想：自强是必要的，还要加一个“忍”字。手抖，要忍下去继续写；一走路，脚就沉重，似乎抬不起来，但要忍，终于抬起来向前走了一步。走路慢，但终于向前走了；我进步没有停止。至于抬起脚迈向前的几分钟，似疼非疼比疼还要难过之际，脚可以放下去，不向前走了。不！我要忍“似疼非疼的难过”。我向前走一步。手抖心也似乎在抖，把笔放下不写了，但我要忍“心也似乎在抖”，写下去，终于写出了给你的信，这是用心写的，妻子是知道的。

你来信中多谈敦煌吐鲁番文书，这原本是我很熟悉的，现在似乎虽有兴趣但已忘了许多。这两天，我有时想把已发表的大约二十几篇论文，严格选择可得十篇，多数是几万字的长文，改与补，几年来就想补的已很具体，用一年时间成集，朋友可帮助出版。这一想法多次，每一次的结论是自我批评：不自量力，妄想。叹息一次。我的双手还能写什么？我知道，爱妻会说，你帮助我。我的爱妻，这绝对不可以！因为你现在有比助我更重要的事要抓紧做好。

文革中受到的酷刑到了晚年仍在影响他的身体，双手写字越来越困难，到了世纪末，手写字已不可辨认了。他还想写文章，又不忍耽误我时间帮他抄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学习电脑打字了。我成了他的电脑老师。

首先要教他输入法。五笔对他太难了，而且我也不会。我惯用的自然码输入法是双拼的，需要记一些元音和辅音，也不适合他。智能ABC比较容易学，前提是要能准确拼音。我觉得这种输入法对他来说比较容易掌握，但他并没学过拼音，也有一定困难。于是我先对他进行拼音启蒙。拿着《现代汉语字典》，我告诉他元音、辅音的拼写，然后让他对着《字典》练习，他口中念念有词地学习着，很快就会拼出一个字的拼音了，拼不准的也能通过查字典更正。接下来，我告诉他辅音b、p、m、f和元音a、o、e等在键盘上和英文字母的对应关系，他认识了，进步很快。等认全了拼音和字母之后，我再教他识别和使用键盘上常用键的键，并画出示意图，如翻页、取消、空格、回车键及各种常用符号键，这样，经过多次练习，他终于能够拿着字典一边查一边打字了。等到一个个字打出之后，又教了他一些编辑方法，如剪切、复制、粘贴、格式调整等等，他由于手抖，控制鼠标困难，进步不大。我还试图教他指法，希望他能五指运用自如，但他习惯于食指和中指，我看“两指禅”并不影响他打字，只是慢一些，也就不再强迫他了。

我告诉他只要指法准确，是可以盲打的。他不禁大发感慨，他惋惜寅恪先生没赶上电脑时代，因为那样寅恪先生就可以不用口述而自己打文章了。他说他曾试图给老师设计一个可

以写在一个个框子里的木板，但因笨手笨脚的，设计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成为他的终生憾事，有时在梦中，还会设计写字板。

看到他已掌握打字方法，我就拿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让他练习，他不肯，坚持要打寅恪先生《寒柳堂集》中的《赠蒋秉南序》。《序》文中的字多是不常用的，频繁的翻页、查找，他又不熟悉键盘，不熟练操作，更加困难。但他不辞辛苦地打着，往往坐在电脑前几个小时不动，坚持着不放弃，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他敲出了第一篇文章。经过校对后，他让我用打印机打出，强调一定要打得大一些。我用四号黑体打在稿纸上。他拿在手里，反复诵读，至“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瑰宝。孰谓空文于治子道学术无裨益耶？”一段，激昂慷慨，令人动容。之后，又打印了寅恪先生《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丁亥春日清华园作》、《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等诗。这些诗或直抒寅恪先生胸臆（如圣籍神皋、迂叟、续命河汾），用意良深，或关乎他的身世（如九一八及清华园），都是他最喜欢的。他一字一句地打着、诵读着。在这次生病住院的时候，我推着他背诵的最多的，除《王观堂先生挽词》外，就是上面这些，他记得最准确，至死不忘。

就这样，他艰辛地完成了“换笔”历程。之后，除了生病的日子，他每天都会坐在电脑前，启动按钮，看着电脑屏幕飞速变幻，用中指使劲敲一下回车键，踌躇满志的样子，俨然是一个横刀立马的将军，气定神闲地指挥着千军万马。他用电脑撰写了《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唐人小说红线的历史背景》、《论李靖》、《论北周武帝宇文邕》等多篇论文，以之著述《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疏证、《回忆录》，更重要的是，在90岁的高龄，自己一字一句地完整打印出近20万字的《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我只是帮他调整了文稿的格式。

夜深了，病床上的黄刊仍挥动双手，不停地打字。他在打什么呢？

三、

第二夜，他的思绪又往后退了一些，在这一夜的时空中，已经没有我了。他的眼前，仿佛是历史系108的会议室，他正在系里的教师面前发言，谈如何培养学生问题。

他慷慨激昂地讲着：

第一，要学风严谨、平实，重视基本训练。这包括两点：其一为言必有据，要有大量的依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绝不空疏，不作空头史学家；其二为对史料要审查精细，一丝不苟，但不是单纯排比、罗列材料。严谨、平实基于基本训练，包括基本史料（包括敦煌文书）、治史工具（训诂、校勘、考证、语言文字）；严谨、平实基于艰苦用功。

第二，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第三，要有通识，包括通性之真实，个性之真实。基础要广，要深。

第四，历史系学生的责任，是要艰苦学习，向 78 级学习，从严、从难、大运动量；历史系教师的责任，是要培养一支研究队伍，要敢为天下先。我们要清醒认识和估计现在的实际情况，包括研究的实际，队伍的实际。认识实际情况，就是要改变现状。怎样培养人材？从实际出发，大量招收研究生，要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和基本训练。一字一句读懂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文书要严谨全面整理，要提倡求真务实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要多做艰苦工作，出成果，出人材。

要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一生忠诚于学术研究，将全部心血投在学术研究上，不因环境顺利或逆境而改变其节操。在名利之前，不改初衷，抓紧时间。

铿锵有力的语言，振奋、坚定的声音，在后半夜的医院中格外清晰。没有咳嗽，没有喘息，仿佛回到了 20 多年前。我为他摆脱了病痛而高兴，但也担心他影响了相邻病房中其他病人的休息。黄刊不停地说着，那火热的声音，在病房中久久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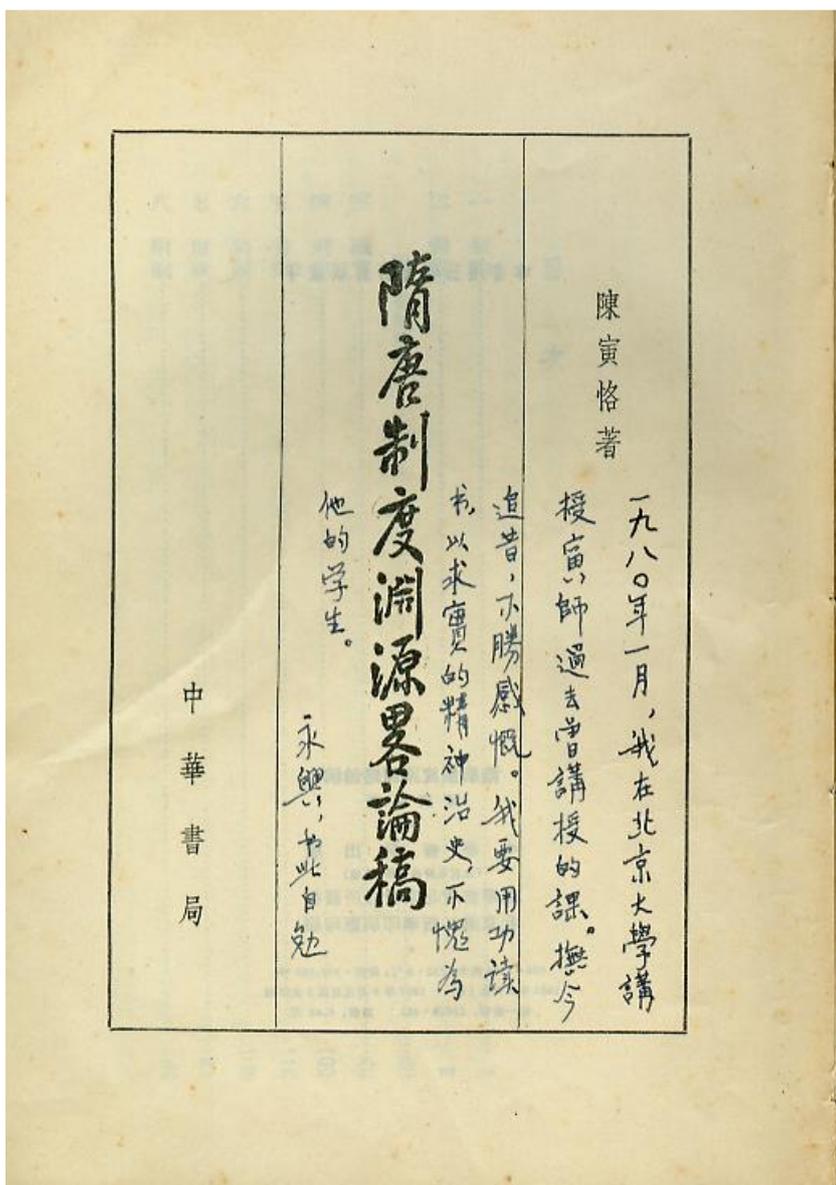
不知过了多久，他沉沉睡去，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熟悉的话语，和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时依稀仿佛。我也忘记了时空，燃起了干云的读书豪气。

黄刊曾说过：“我做事认真，绝不偷懒，有十分力量，绝不使九分。”我问他：“在北大教书，你使了多少呢？”他回答：“我已使出了十二分。”

自 1978 年末他调来北大，就长期超负荷工作，体力已远远超支了，支撑他这样拼搏的，是顽强的毅力和压抑二十年之后的喷薄而出的热情，而在这背后的，是对寅恪先生坚定的信念。在他使用的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扉页上，他写道：

一九八〇年一月，我在北京大学讲授寅师过去曾讲授的课。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我要用功读书，以求实的精神治史，不愧为他的学生。

永兴，书此自勉。



有着这样的感情，所有的苦楚、委屈和挫折都不重要了，他就这样拼命地工作着。

第三夜，他还沉浸在八十年代那火热的日子。他一遍一遍地说，要去给学生上课，甚至不停地乞求、哀求我，让他起来，快到上课时间了，学生在等他，他要去上课。我使劲解释，也无法让他安卧。泪眼模糊中，我回忆起刚成为他学生时的情景。

那时 1985 年，我看到的他，就象一架昼夜不息的高速运转的机器。他马不停蹄地奔忙着：办学会，筹备会议，办中心，建立研究室，购书，复印照片，编论集，跑出版，抄稿子，编资料，写文章，计划丛书。而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上课，是带学生，培养人材，这是压倒一切的。他带学生的方法也是独一无二的，除认真备课、上课外，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课外辅导上。他辅导学生读《资治通鉴》，辅导学生做敦煌吐鲁番文书，辅导学生读古汉语，背《左传》、《史记》，甚至辅导学生写毛笔字。他讲授敦煌文书课，力主实践。在学生实习的时候，他预先挑选文书，思考文书中的问题，看能不能做成一篇文章；在列举史料，心中有底后，再交给学生整理。他先教学生整理方法，再提供史料，然后是改论文，辅导分

析，帮助提高，最后找出学生作业中的闪光点，鼓励、激励他们，使之发扬光大，形成论文，再一遍一遍地修改，直到能够发表。这些研究课题，他都无私地交给学生，让学生得到训练，让学生走入学术殿堂，登堂入室，成为新一代学术的擎天支柱。他没有自己和别人的学生的概念，只要有向学之心，他都热心指导，倾囊相授，毫不保留。即使受到伤害，也一如既往，痴心不改。他的桌上，永远放着需要批改的学生作业、读书报告、文书录文，有时甚至批改学生的听课笔记。他不停地奔走着，在教室上课，到图书馆借书，到北图洗文书照片，去红楼查核吐鲁番文书录文，并考核原貌，到研究室看书，到学生宿舍检查功课及辅导，到邮局，到北大同事家中，到出版社，到书店，到各级领导家中，谈各种事情。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出租车，一切都靠他亲自写信，亲自跑，经常要去挤公共汽车。他也不会骑自行车，诺大的北大校园，不紧不慢的步履，略微弯曲的身躯，他就这样不知疲倦地走着。

我遇到他时，他正在激情四溢地高速地转着，连带着我也跟着转动起来。当然，即使是机器，也有停歇的时候。在1986年初，他就因肺炎住院了，那应该是他来北大之后的第一场大病。

透过X光片子，我才知道，青年时的肺结核和胸膜炎的积水已毁了他的右肺。从1937年到2008年七十年那么漫长的日子里，他只能靠一个肺呼吸。而那十足的中气，洪亮而激昂的声音，那冲天的干劲，又能让谁能想到是这样呢！

四、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几十年的日子，可以一晃而过，不留痕迹；而几年甚至几天的经历，就足以改变一生，贯穿一生。在医院一个个混乱的夜晚，我更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

黄刊的记忆，仍在继续在往回走。

以后的几夜，充满了血雨腥风。我最恐怖的一幕上演了。黄刊同样也没有忘记文革。他蜷曲在床上，凄厉地叫着，说有人来抓他。一会儿，他翻腾着，仿佛在躲避铺天盖地打过来的棍棒；他双手扭曲在一起，呻吟着，叫着。我把他抱在怀里，反复安慰他，试图让他平静，让他相信，灾难已经过去，他仍在颤抖着，那恐惧的眼神，让我的心剧烈地痛着。

和他结婚之后，我们隐居在燕北园小巢中，日子过得平静温馨。他不知多少次喋喋不休地给我重复过文革时死去活来的经历，总让我一脸泪水，这成为平安隐居日子中的不和谐音符。我后来要求他，现在生活不是很好吗？别想那些痛苦了，没有用的。我也曾抱怨：只有享不来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他是有福拥有幸福生活，却没有足够的福气享受这种生活。实际上，我这种貌似深刻的感慨是多么肤浅。他当时忍受的抄家、批斗、游街、毒打、酷刑，都积淀在身体里，在生活平静的时候，就会爆发。那是一种粗犷的，极强的力量，使他不由自主，不能享受平和。那些创痛是历久弥新的。

随着黄刊的挣扎，我仿佛看到了他在文革种种非人经历，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着堆满自己藏书的大车，到火炉边，亲眼看着数十年的心血灰飞烟灭；一次次被捆绑双手，高高吊起，

再被种种摔在地上；被打死扔在大水坑中，半夜被暴雨浇醒；无尽的批斗，无穷的酷刑，奄奄一息的生命，血与火的洗礼……我捂住眼睛，不忍看，不忍想，但那悲惨的镜像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我如何能让他忘记？！经历过国家民族这样耻辱的人，又如何能让他安享个人生活的温馨？！



所有的藏书几乎被烧尽了，退回来的一堆乱纸中，夹杂着一枚纸币，那是 1945 年印制的壹百元的纸币。这张纸币被贴在一张稿纸上，一道封条上写着：“王永兴长期保存的伪币一张和有意漏掉两字的一张主席语录。1966 年 8 月 26 日发现。教职工红卫兵。”这张纸的页码写的是 10，不知道他的罪行究竟有多少页，也不知道前面的罪证又是什么。可能因为纸币是没有用的钱吧，文革末期就退给了他，那张漏了两个字的主席语录没有退。这也就是莫须有罪名的一个例证吧？我保留了这一页纸，因为这成了他那个岁月的唯一记录。准确地

说，除了身体上的伤痕，精神上的创痛外，这页纸是那个岁月留下的唯一痕迹。

五、

文革中渗透着血腥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黄刊的世界还在后退着。现在他带着五个孩子在山西，六人挤在一间土屋，一个土炕上。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在发愁正在长身体时的孩子们的饭食。他不停地和我商量着如何吃饭。哪几个孩子吃一碗饭，哪几个孩子吃一个饼子，总是不够。他说，他不是很饿，就不吃了，让孩子多吃一点。他从夜里说到白天，医生护士来看他，他还在说吃饭问题。中午，历史系党委书记王春梅老师来看他，他仍停留在自然灾害时期。我告诉他书记来了，他就坚定地说：“我不特殊。”这是他给历史系的遗嘱，还是他坚持走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信念？

到了夜晚，他回到了被遣送至山西之前。他一个人哭诉着：“说她武装推翻共产党，她没有啊！我怎么批，她真的没有反党啊！我和她是性格不合，但她已经被打成极右，被武装押解出京，我不能落井下石啊！”这应该是他心灵的独白吧？

1957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妻子被打成右派，押解离京。此后几个月中，是社里漫长的日复一日的声讨和批判，他始终一言不发。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动员他划清界限，因为右派是敌我矛盾，只要他一句声明，一个表态，就可以离婚，不受牵连。但他拒绝了，结果就是被驱逐，遣送出京。时长女刚刚上中学，而最小的孩子刚1岁多。他将长女寄宿在师大附中，幼儿寄养在北京亲戚家，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3岁），离开了沙滩后街那古朴庄重、弥漫着脉脉书香的古老庭院，离开了读书和科研的环境，踏上了滚滚黄沙之路。而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和牺牲，并未能保住家庭的完整。在文革中，随着被打成反革命的他百口莫辩，死去活来，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也解体了。

我曾问过他，这样的选择是否后悔。他说：“我当时没有选择，因为我不能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听到他的话，我感慨万千。在那场没有硝烟的反右战争里，为了避免株连九族，多少夫妻陌路，多少亲人反噬，但他却顶住了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给予他对抗这样压力的勇气，就是简单的我民族传统的信和义。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黄刊永远不是俊杰。有多少次，明知万死，他选择的却是自己的良心。

这样至诚至善的人，我要怎样疼爱他，都是不过分的。

六、

一夜，我被他激扬的歌声惊醒，他兴奋地说着：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我们战士的队伍多么整齐。我以为他回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白天，他仍然激越地为我演讲着：不能以战争制止战争，美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又问土地改革进行得怎样了？我才知道他的思想在建国初的抗美援朝之时。

接下来的一个夜晚充满宁静和温暖，他到了寅恪先生身边，他在为寅恪先生读《资治通鉴》，病房中响起他的读书声：贞观二年，春正月……魏徵……李靖……长孙无忌……臣光曰……我欣慰地听着，看着他在清华大学辅助寅恪先生备课和研究。

在还在念叨着，白皮松，珠眉，珠文。那一幕我太熟悉了，他扶侍寅恪先生去喇嘛庙他的住处，去看白皮松，那是他记忆中最美的一刻；他推着小藤车漫步在颜家花园的柳荫下，年幼的珠眉、珠文在车中的嬉戏……那幸福的日子，我真希望永远停留在。

但他还在继续走。他在说着敌机，告诉我外面有狼叫，说要读书到深夜，我知道，那是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他已经不只是夜里时空混淆了。白天，他也会问我战争进行得怎样，我们今天又胜了吗？他还和我谈读书中的问题，说佛经翻译文学课上的笔记没记全，要多花些时间补。他还告诉我哪个字是梵文，哪个字是藏文，也会铿锵有力地说一声：“南天一柱”。那是他听寅恪先生课的教室。

日本入侵中国，改变了黄刊的一生。他本是农家子，幼时耕读，并没想过离开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他常常和我说，他胸口还能感受到日本兵刺刀尖的寒冷。我曾听他叙述过参加一二九时的情景，那是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岁月。我非常喜欢他参加一二九运动时写下的那些文字：“在阴郁沉闷风雨欲来之亚洲平原上，中华青年擎起民族解放火炬。在黑暗中，在血腥气氛中，在卑鄙屈辱的景色中，人类听到天真而质朴的伟大情感之流放，人类听到正生存争自由争真理响亮的吼声。感谢这些成千上万的中华青年，自一二九以来，忍痛忍苦，奔走呼号，中华民族又重新看到晴朗与光明，希望与未来，又重新走到向自由自强之路。”“献其血肉之躯，献其崇高而纯洁之灵魂，争取祖国自由，争取民族解放”。这些发在他参加主编的《学生与国家》中的文字，一遍遍让我热血沸腾。

在医院，随着他的时空倒错，我以为他会为我再现那段峥嵘岁月，我能亲眼目睹他的慷慨悲歌。谁知他没有。

一夜夜过去了，黄刊没有再继续后退，他的思想，他的世界，停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停留在从师陈寅恪先生的时代。从1937年他授业于陈寅恪先生，已经71年了。在长沙圣经学院，在昆明文林街悬有“南天一柱”匾额的殿堂，在清华园海棠花掩映的新林院的书房，他侍读寅恪先生之侧，得到耳提面命的教诲，他立志用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方法读书治学。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一直到去世，黄刊都没有再往后退，而是停在了师从寅恪先生时。是他去世之后，我才明白，他的世界里，不能没有寅恪先生。

1948年末寅恪先生离京南去，他和老师分开了，但似乎并没有离开老师。他的生活习惯都保持着在老师身边那样，如永远吃米饭，而不是象北方人一样主食是面食；喜欢吃点心；口味偏甜，而不是北方的偏咸；喜欢听京剧，尤其是昆曲，徜徉在那百转千回的断肠声里，他是否回忆着寅恪先生听曲的情景？他好像一直是在老师身边的日子，不管风云怎样变幻，历劫不改，始终如一。

他为什么会选择走义宁治学的路呢？在他 1956 年写的交代中，他说 1937 年的转系师从寅恪先生，是因为“为他的精博学识所惊倒。我那时候心情很苦闷，就选择了跟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治考证之学这条道路”。其实应该是寅恪先生的独立精神精神、自由思想，让他那洋溢澎湃的一腔对国家民族的激情找到了奔流的出口，化作埋首于线装书中的寂寥日子中的不变的壮志和深情。据翁同文的回忆，寅恪先生在南渡后的第一课，讲的是支愨度渡江，唐僧劝他不要自树新义，以负如来的事。翁同文认为，这一课含有寅恪先生“忠于学术良心，不妄树新义而藉以曲学阿世或哗众取宠的深意”。寅恪先生最后所皈依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黄刊也跟随寅恪先生，以民族文化为皈依。他那飞扬的民族感情，比一二九运动时，更深沉，更理智，也更坚定了。皈依于此，他不再回头，于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七、

黄刊的记忆衰退，并不始于住院。在几个月前，他已经有些思维混乱了，有时，他甚至不能分辨我是谁。朋友告诉我，老年人到了一定阶段，记忆是往回走，向后退的。我知道，按照记忆后退的自然规律，我是最早离开他的世界的人。生病前在家里，他不认识我时，我会拿结婚证给他看，告诉他我是他的妻子。在医院，我在纸上写下他曾书写的对联：

中华文化添锦绣

义宁学术得永兴

问他：“还记得吗？你是永兴，我是锦绣。我是你的妻子。”叮嘱他别忘记了。以后常常给他看这个对联，他想起来，就深情地看着我，叫着：“爱妻！”充满幸福和依恋。有时半夜里，也会突然想起，就这样叫着。

在医院里，如果不是陷入回忆中，黄刊会很平静，安宁，天真一如婴孩。以致直到现在，我都无法也不忍看小孩子的表情。那相似的纯真的神态，让我痛断肝肠。医生和护士也非常喜爱他，说他是配合治疗的病人。他极其善良。有一次病重，转到北医三院。因奥运在即，医院预留床位，没有病床，只能躺在一个 30 多人的急诊大厅里。他的旁边躺着一个脸色红红的发着高烧的小孩，他一遍遍让我找医生给这个孩子治病，专注得忘记了自己。他的婴孩状态，不是返老还童，而是他的本性。

随着治疗，黄刊一天天在好转，日子也在点滴中过去。大多数时候，黄刊不记得我是谁了，有时说我是他的小女儿，还有一次说我是组长，他是组员。但他熟悉我的气味，就像一个婴孩对母亲体味的熟悉。我在他身旁，他就安心，我稍微离开一会儿，他就烦躁，急着找我。有一次他说，我是照顾他的人。有一个星期二，我去上班，珠群之妻小妹照顾他。小妹温柔细致，但他依然找我。一次次地问，锦绣在隔壁屋子念书吧？小妹说：是的。他就说：让她多念一会儿吧。一会儿又找，说，让她回来吧。小妹只好告诉他我上班去了，他就让小妹推着他出去接我。没接到，怅怅而归。我回来，他正在侧躺着，小妹问：你看谁来了？他看着我，深情地一笑，欢叫着：锦绣！

每天下午，黄刊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我去取晾晒的衣服，他就睁大眼睛望着我，安静地等着。看到我抱着衣被走过来，他就欢快地笑，让我把衣被搭在他腿上，他用手扶着，爱护着，那样帮忙，那样懂事。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我们就这样相依为命地过着，就这样不舍地依恋着。

八、

未名湖畔，垂柳依依，美得象个多情的梦。湖心岛上，松树、各种不知名的花木尽情地长着，绿着。未名塔坚定地矗立着，微波涟漪，使人心中柔情万种。我推着黄刊，走过逶迤曲折、跌宕起伏的山林幽径，在起伏的岗峦背后，眺望着花木掩映的湖水。黄刊不时提醒我，要小心一些，不要压坏了地下一丛丛马兰花。

老友侯仁之先生也住在校医院，与我们的病房只隔两个屋子。黄刊多次要去看他，但因为医生怀疑黄刊可能是肺结核复发，我多次阻止他。这一天，两位老友在未名湖畔见面了。由护工推着，侯仁之先生坐在轮椅上，向着水塔方向走来。我让护工等一下，黄刊认出老友，激动地喊着“仁之，仁之！”仁先生注目看他。黄刊继续说：“仁之，我是王永兴。”仁先生身体一颤，随之眼睛一亮。护工说，那是仁先生听懂了的表现。我告诉黄刊，他的老友认出他了，知道他的关心，黄刊笑着去拉仁先生的手。黄刊是否知道，这是 74 年的老友的最后一告别。

未名湖畔的丘岗丛林，回环不尽。推着黄刊，我们漫步在燕园。经过黄刊曾经居住的健斋，我们欣赏土山之阳的四条石屏，感受湖水的幽深；透过广植松柏的岗峦，我们也望了望朗润园，那里有黄刊第一次辅导我的居室。为了保护绿草，黄刊多次制止学生践踏草坪，甚至在课堂上也提醒我们。现在小草看到爱惜她的人，尽情向守护者和知己展示自己的新绿，仿佛伸开手，摇曳地向他打招呼。

我们来到南阁和北阁。我想到了在这里发生的一件趣事。那是 1932 年，黄刊流亡到北平，和 10 个小伙伴在北平街头一起讨吃要饭。一个春日，这些小乞丐中的领袖高鹏说带大家看颐和园，于是大家从章仪门来到西郊。从颐和园出来东走，他们看到一座雕梁画栋的古色古香的校门，上面有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四个字。向里望去，只见清幽池水，上筑小桥，一对华表巍峨高耸，四周绿荫如瀑，芳草如茵，俨然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这让刚刚逛过颐和园的 11 个孩子悠然神往。高鹏想到了一个东北老乡正就读于燕京大学，就向门卫说要去学校找这个人，于是大家畅然进入。逶迤东南，绕过蜿蜒的湖水和花圃，眼前突现两座楼阁。北面的一阁中有个女孩在弹钢琴，屋内还陈设有沙发、地毯。连续走了几个小时的孩子们突然觉得累了。高鹏说：我们进去休息休息吧。弹钢琴的女孩看到十几个蓬头垢面的小叫花子进来，吓得尖叫一声，跑走了。他们十几个人冲进屋，有的坐上沙发，有的躺在地毯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被打扫卫生的女工赶了出来。从他给我讲的位置看，他们进去睡觉的地方应是北阁，当年叫甘德阁。

我指着北阁，向黄刊说着这件事，并问：“你没想到，昔日的讨饭孩子，会成了这里的主人吧？”黄刊说：“我们当年淘气，现在再也不胡闹了。”湖光塔影依稀如旧，不知南阁、北阁，是否一如当年？

有一天早晨，当我们在外漫步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用毛巾被裹好他，在松树底下犹豫不决。这时，一个男同学主动跑过来，用书包为他挡雨，帮我一起把他推到外文楼长长的屋檐下。屋檐的遮挡，隔出了两个世界：雨中的世界，烟雾朦胧；干爽的避雨处，黄刊安然地品尝酸奶和松软的蛋糕。雨停了，那个学生飞快地跑了，我们连最后的谢字都没来得及说。

北大正在举办“奥运在北大，静园观太极”的活动，静园的草坪上，严整地排列着太极拳群像雕塑，每隔几天会换一种阵形。我推着黄刊在油松下，静静地观看。一个女学生微笑地走过来，将说明和一柄刻有五环的扇子送给黄刊，说欢迎他参加“启动太极”活动。难忘她暖暖的笑容。那把朴素的小扇，和那为他遮风雨的男学生，让黄刊对他寄予厚望的后学，感到欣慰。

看着太极雕像，我问他，你还记得吗？“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他说，都忘了。我再问：天行健，君子以什么呢？他说：“自强不息。”我接着问：地势坤，君子以？他说：“厚德载物。”我知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清华的校训。

九

漫步中，我们仍在背寅恪先生的诗。绕着碧波荡漾的湖水，我突然想到了寅恪先生的《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于是我说：

道穷文武欲何求，

他接着：

残废流离更自羞。

我们继续背下去：

垂老未闻兵甲洗，

偷生争为稻粱谋。

我们都沉浸在寅恪先生诗的境界中，我把轮椅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我继续走，继续背：

招魂楚泽心虽在，

他很快接上：

续命河汾梦未休。

我手一抖，泪水旋即悄悄流下来。我以为我们的背诗，是让他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是让他忘记病痛，消磨岁月的方式，没想到，那是他完全的精神寄托，是他与现实世界唯一的联系。寅恪先生原诗作：“续命河汾梦亦休。”他改为“未休”，是想告诉我他心底的强烈愿望吧？是以此谆谆地嘱咐我吗？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记成了这样，在他心里，续命河汾之梦，

永远没有泯灭。我悲其志，感其诚，念其苦心，泪流满面，良久无语。他知道我懂了，也不再多说了。

推他回来，我累极了。他说他还想坐一会儿，让我躺在床上休息。

我看他拿起《陈寅恪诗集》，就说：“我累了，给我念一首诗好吗？”

黄刊随手一翻，给我念了一首陈寅恪先生的《壬辰春日作》诗，念一句，还解释一句：

细雨残花昼掩门，

结庐人境似荒村。

我觉得这和我们现在的情景倒是很象的。他继续念：

简斋作客三春过，

他告诉我，这句所用之典。下一句：

裴淑知诗一笑温。

他从书上抬起头，长时间温柔地看着我，笑着说：“你岂止知诗呢！”

在他温柔的注视中，我劳累顿消，深深地满足了。我在日记中写道：

余生若得长如此，何物人间更可求。

这是我医院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

十

我们相依为命、朝暮依恋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没想到他会离去。因为除了最初的七天外，剩余的日子，他没有衰弱，那振奋的神态，那充足的精力，让我误解了，我一直准备迎接他出院的。

苦热的病房的相依，是一段如诗如歌的日子。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坦荡的胸怀，真挚的感情，纯真的世界。

医生告诉我，类似的疾病，他那样高龄的老人一般也就坚持七至十天，而黄刊坚守了两个月。是怎样的依恋和不舍，给了他如此力量，又是多少话语，多少故事，多少深情，要他在两个月里告诉我。

当衰老和痴呆不可抗拒的时候，他以坚强的意志，守住心中的信念，将山高海深的情，演绎为如泣如诉的歌。他留给我山高水长的爱，这种爱，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尽；他留给我深厚的人生阅历、哲理，对国家民族的如激流飞涌般的至诚，值得我一生去解读、沉淀。

住院前，不知是否有预感，他多次问我，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什么人。在医院，我告诉他：“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以你为骄傲。”黄刊几乎尝到了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的精神，也因历经磨难而伟大，因为他真正做到了“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我没有哪一段日子，离天堂那么近，因为他在我身边，一如天使。在未名湖畔，看似我推着他，实际上是他引领着我，走向天堂。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从没有那么接近，感谢他带我一起在天堂遨游，带我享受了那样一个清纯的世界。

所有未了的情，都留在北大蔚蓝的天空下。

父亲走了

王珠群

父亲走了。

走的太突然了，却又在意料之中，平静而又自然。

这次父亲的病情就不像往年。假期中，他有些发烧，按照以往的治疗就住进了校医院。以往几乎每次都是这样：住校医院，打点滴，有消炎的，有治咳嗽的，也有些辅助的药物；三天，至多五日，就基本上退烧了。再观察三五日，也不咳了，精神也好些了，饮食都正常了，就出院回家了。多则十五，少则十日。但这次烧起来就不退烧，稍微下去一些，低烧不退，回家三四天，就又烧起来，只好又住院吧。这就不是好现象，不是好兆头。

父亲的身体原本不壮实，但是也很少有大毛病。每次去医院查体或看病，医生总是说，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几乎都正常，可不像八九十的人。血压、心脏都没毛病，头脑反应也基本正常，腿脚也还可以，不容易。只是有一项，肺不太好。这一项，要从父亲年轻时说起。

父亲一生多坎坷，经历颇多。九一八，从东北逃亡到北京来，几乎是过着乞讨的日子，晚上就在大戏台上露宿，可能是那时落下的毛病。抗战时期，在去云南前，得了肺结核，几乎就要了命。好容易摆脱了病魔，却丢掉了半边的肺。那时父亲才二十几岁，后面近七十年的人生，父亲就用一半的肺部支持着生命，走到了九十多，真可以算是奇迹了。

要说起奇迹，在父亲身上还有一个。那是六十年代在山西，大概是六三年、六四年，父亲患上了脑膜炎，幸亏是抢救得及时，又是从死神的身边擦肩而过。按正常的情况，这个病，患上一次有终身免疫的。但，在父亲的身上，却发生了两次，而且只间隔了两年。还好，没有后遗症，只是每年要打一次防疫针。

七十年代末，父亲终于回北京了。我想，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时间。父亲也最为投入，教学，带研究生，著书研究，建立研究中心等。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父亲完成了许多人生的夙愿，生命在这一段辉煌，生活中也有了可以托付的人，是最为平静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一段，值得回忆，值得珍惜。

用东北老的习惯说一句：爹爹，走过了人生九十多年，平静而又自然，爹爹走了……

王永兴先生年谱

李锦绣 编

1914年

6月16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昌图县靠河屯。父王铭书，母黄氏。为长子，行三，名中九。祖籍山东省莱州府掖县，祖父母跑关东来到前靠河屯。全家辛勤耕作，很快置有田地，建立宝勤堂。

《新家园的创建，经之营之》：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当时莱州府一带连年旱灾……我的祖父、祖母，带着大伯父、大姑、二伯父，北走东北……全家又走到前靠河屯。

前靠河屯当时有住户十来家，大多数是掖县来的。其中陈家迁来的时间较早，是前靠河屯的大户……由于陈家的帮助，佃种察罕牛录村人两天（十亩）地。得到同是从山东逃难来的张家等多数邻居帮助，盖了三间土房子。屋顶上铺了厚厚的茅草。祖父从东烧锅借了一点钱，买了一头牛和一些农耕用具。这个离河只有百步之远的新家园建立起来了。

祖父仍回县城东烧锅工作。大伯父是长子，祖父就指令他管理经营这个家园。昌图县是邻近内蒙古荒凉地区的一个小县，但土地异常肥沃，因此连年的庄稼收成都很好。我在幼年时就看到，家里用的口袋上有宝勤堂三个字，这可能是祖父为这个新建家园的命名。

我的大伯父确实是遵从祖父的意见，以勤来治家。他以身作则，每日早起晚睡。此后，二伯父以下，祖母又生了五个儿子，这样全家的劳动力就大为增加，而佃种的土地已达到十天（50亩）。

1920年

开始从事一些劳动，如放猪、放羊、拾粪等。宝勤堂也日益兴盛。

《新家园的创建，经之营之》：我在年幼时，大伯父告诉我，耕种经营五十亩田地，除纳租和家里食用之余，又买了几头牲口。大伯父善于观察周围环境，因此就建立一个小小的油坊……就是这样，每年年终，除夕之夜，在奶奶的住房，全家人奶奶和大伯父等长辈都挤在炕上，我们孩子们就站在地下，大伯父讲述这一年家里的粮食收入和油坊的收入，最后又说道又添加佃种了若干天地。此时，察罕牛录这些满族贵族由于奢侈生活和吸鸦片烟，他们需要大量的现钱，因此，所有佃种的田亩都改成出卖。吾家就买得了大约十五天（75亩）田地。这时，就在原来的土房子所在之地，扩建了五大间砖瓦房，但房顶仍然是几层茅草，为的是御寒过冬。同时，又雇佣了大约四、五个长工。稍后，在这个院落的东边，又开辟了东院。东院临街，又盖了七间平房，又开了一个粉坊。

1922年

入昌图靠河屯小学读书，同时仍参加农业劳动。

《我的治学经历》：我乃农家子，少年体弱，在乡塾读《三字经》，颇得塾师称赞。家大伯父认为我体弱不能务农，但可读书。

1926年

到离家二十里的嘎辖镇（满、蒙、汉族杂居地区）读高小。

1928年

9月，考入昌图县中学，开始初中学习，成绩优异。

《新家园的创建，经之营之》：我在昌图县城南学堂读初一时的时候，吾家又在昌图县城北街开办了一个大车店，盖了十几间房子和一个大围墙……这个大车店名为三益长。这又是这个新建立的家园一项重要收入。

1930年

6月，到沈阳去投考东北大学附中的高中。东北大学附属中学相当于东北大学的预备学校，为当时沈阳最难考入的中学。因初中尚未读完（只上了两年），未考上，但与录取分数相距不远，被编入东大附中专门为与录取分数接近的落榜者所设补习班，一年后可免试直升高中。

《新家园的创建，经之营之》：此时这个新建立的家园，已经成为周围几十里内很富有的家了。拥有一百多天（500多亩）地，在街南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这时已有十几头牲口，一辆四匹牲口拉的大车和一辆七匹牲口拉的大车……此时西院，除了五间正房之外，东西厢各盖了七间平房，东厢房四间作为马圈，另外三间给猪作猪食和堆积油渣、粉渣。西厢房七间，其中三间是比较好的房子，给祖母和大伯父去住。另外四间，磨坊和碾坊占了两间，其他是给六、七个长工住的。

大约五、六十年中，新的家园创建起来了。这主要由于大伯父遵照祖父“勤”的教诲，同时他对家人很严。既勤又严，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在昌图县被人们羡慕和赞誉的家园。

1931年

夏，自沈阳回家小住。

《回忆录》：1931年夏末，在辽河之畔寂静农村一间草屋子里，母亲和我坐在靠窗的炕上，她为我缝补整理过秋冬的衣服。她不时地看着她即将远行的儿子，她在想着她的儿子要半年之后才能回家，要多带几件衣服。她为我缝制一条厚厚的棉被，让她的不在她身边的儿子温暖过冬。这个偏僻的小村离沈阳五六百里，但也不时传来日本侵略者要在沈阳动武、沈阳已不平静的消息。她的儿子要到沈阳上学，能安全吗？她面带忧容，但不愿说出心中的忧虑。当时我已17岁，已能安慰母亲。我看着她慈祥的面容，笑着说：“不过半年，我就回

到妈身边，欢乐地过新年。”妈也笑了，并笑着说：“我是放心你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惟恐迟迟归！”对我这不肖子来说，不是迟迟归，而是久久不得归了。

9月初，升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一年级（理科）。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20日，在离学校一百多里的皇姑屯，挤上南去北平的火车。

《我的最后一课》：这年九月初旬，我走入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门。这个约有几百名学生的学校位于沈阳大南门外，靠近郊区，其性质近似于东北大学的预备学校，高中毕业的学生多数考入东北大学。这时，日寇侵占沈阳以及东北三省的罪恶行径，已不是传闻，而是迫在眉睫的事实，华夏民族正面临着抗击强敌的考验。

9月18日，全校秩序井然。晚饭后约八点钟，突然轰隆一声炮响和爆炸声，打破了沉寂的平静。日寇动手了。我们学生都爬上宿舍楼四楼楼顶，姬主任和教师们前来劝阻，但最后他们也上来不走了。日寇从所谓的南满铁路沈阳站日军兵营北向三十里外我军兵营（北大营）开炮射击，炮声过后是一道由南向北的火光，接着是爆炸声。片刻之后，又有炮声和一道由北向南的火光，接着是爆炸声，这是我军向日军兵营发炮还击。我们欢呼鼓掌，群情振奋。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只看见自南向北的一道道火光，日寇不断地向我军北大营炮击，看不到自北向南飞腾的火光了。不久，又听到从北边传来的炮炸声、枪击声。我们都疑惑不解，同时也预感到，使人悲痛之事发生了。我们都沉默不语，有些同学低声啜泣，姬主任和老师们劝导我们下楼回宿舍。事后才知，我军停止向日寇还击，因为祸国殃民的蒋介石下了不抵抗撤退的命令，爱国将士含着热泪压着心头怒火向北撤退，但有数百名的爱国将士不服从撤退命令，坚守阵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9月19日晨7时半，我和两个同学未听从老师的嘱咐，饭后想远望北校门的情况。我们缓慢向北校门走去，走着走着，看见几个日本兵，我们就停了下来。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在校门外，面向校内。校门对面白墙上贴着碗口大字的布告，我们约略看到最后一行是“关东司令本庄繁”，布告全文看不清楚，最后四个字是“格杀勿论”……

讲课之后，以三年级同学高鹏为首的我们11个人，其中多半是我同班即高中一年级的同学，最小的15岁，高鹏19岁，聚集在高鹏的宿舍里，商量南去北平。在北平、我们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但那里有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不会冻死饿死，我们不能留在东北作亡国奴。当时，我想念母亲，半年后回到她的身边是不可能了；她要悲愁，日夜想念自己的孩子。我又转念，母亲深明大义，她的儿子不当亡国奴而南走北平，她会得到安慰的。11人一致决定，明晨离校去皇姑屯，乘南去北平的火车，因沈阳车站已为日寇侵占。学校离皇姑屯一百里，一定要乘马车。高鹏说，由他去找一辆马车，明晨五时，在学校南墙外等我们。

9月20日晨5时，我们11人走出学校南墙豁口，果然看到一辆马车。一位中年男子严肃而亲切地看着我们：我们都穿着简单的夹衣，一手提着只包有两三件单衣、夹衣的小包袱。他很满意地说，你们很懂事，穿多了，带很多衣物，是不能通过日寇检查鬼门关的。他又说，

途中有两次要我们脱去衣服由日寇检查，不要说话，也不要怕，不能哭，否则，我和你们12个人的生命都难保了。

马车奔跑很快，不时看到路旁躺着被日寇用刺刀杀害的同胞们的尸体。大约走了三十多里，遇到一队日寇，马车停下，我们都下车。凶恶的日兵挥动着刺刀大声吼叫、要我们脱下衣服等待检查。我们每人面前站着一个日寇，用刺刀对准我们的胸口，我们已感觉到刺刀的刀尖冰凉，只要他的手一动，我们就要像躺在路边被屠杀的同胞一样。另外几个日寇用刺刀挑起我们脱下的衣服和小包袱掷上高空，又用刺刀拨动着我们的衣服，最后又吼叫着。马车夫要我们穿好衣服，收拾好被毁坏的小包袱，挤上马车。又走了几十里，又一次日寇检查，我们又镇静地应付过去。

大约下午四时，马车到皇姑屯，我们走下马车，由高鹏付车费。这位善良的车夫说：“我不是为了挣一点钱来送你们的，为的是使更多的中国人不作亡国奴。你们给我多少都可以，没钱，不给也可以。我也不愿作亡国奴，但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离开他们。我送你们到这里，你们到北平去，我从心眼里高兴，不在乎钱。”最后，高鹏提议，我们11个人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送给这位舍着生命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这样做了。钱不多，这位爱国善良的人只收下一半，另一半还给我们，并说：“在皇姑屯吃点饭吧，挤上火车很难再吃饭了。”我们11个人满含热泪感谢他，向他致敬。我们看着他上了车，迅速地向我们神圣的国土但现在已被日本占领的沈阳驶去。

23日，流亡到北平。举目无亲，临时居住在虎坊桥的湖广会馆的露天戏台上，开始了讨吃要饭的乞丐生活。

《北平街头的小乞丐》：我们十一个人挤上去北平的火车，两天两夜到了北平。出站后，一个穿黑制服的巡警来接我们……他领我们十一个人到湖广会馆。高大的楼房，他领我们走上三楼……他走了，我们把小衣包放在砖地上，平砖铺地，我们只能躺在冰冷砖地上。站在挤在两天两夜的火车上，又饿又疲倦，几个小同学哭了。就是如此，我们在北平过了第一夜。

我们在湖广会馆住了一夜的大屋子，南北两面无窗。我们躺在砖地上很凉，凉风吹得我们心情凄惨痛苦。两天两夜未吃未饮一口水，身体疲倦难堪。年小的同学哭了，十一个人几乎同时说：“忍着忍着，不当亡国奴，死去也好！”但终于睡了。

次日晨，那个巡警来，提着一个破筐，筐里有十一个窝头，两个小碗，还提来一铁壶开水。他说有事，走了，我们感谢他。我们每人吃一个窝头，喝开水；身体心情似乎好一些。但两天两夜未吃未喝，每人吃一个窝头喝两碗水，怎能行呢！高鹏首先说，“我们自己去讨吃要饭，不能靠这个巡警送吃送喝的”。有人对讨吃要饭，感到不好意思。高鹏说，“不当亡国奴，也不能饿死；我们向自己的骨肉同胞讨吃的，是为了打日本，光明正大！”高鹏的意见很好，十一个人意见一致。有人提出两点意见：（一）不能到墙高大门紧闭的大户人家门前去讨，我们讨要的话，门内的人听不到，听到也未必理我们。（二）我们十一个人分成三个或四个小组，分别到很小饭馆门前去讨求。饭馆内的人能听到我们讨求的话，看到我们的

衣着褴褛身体疲倦，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同情，会给我们一点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安排是可行的。

我和两个小同学一组，出湖广会馆北门向西走，在大街北面遇到一个很小饭馆。我们站在门前，向内看，两个人把蒸熟的一屉窝头抬出放在大桌上，热气腾腾，我们闻到窝头的香味。这两个人好象突然看到三个蓬头垢面的青年站在门外。我们三人互相看着，终于说：“日本鬼子侵占沈阳，我们逃到北平，已经两天未吃饭了。”说着说着，我们三人痛哭，只听室内“可怜、可怜”在说着；可能是小饭馆的主人拿着三个窝头，并说，收下吧，太少；好像他眼中也有泪水。我们千谢万谢，走回湖广会馆。

这一天，四个小组讨得十个窝头，十一个人得不到一人一个。

大约十一月末，北平的天气很冷，我们躺在砖地上睡，南北两面冷风吹着，我们如何能睡？

12月，移住至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张学良开办的收容所，与几百个东北流亡学生住在江西会馆，仍靠乞食渡日。

《北平街头的小乞丐》：十天后的奉天会馆派人把我们十一个人送到江西会馆。虽然是砖地，但有暖气，室内很暖和。我们仍要讨吃要饭，但比在湖广会馆时方便多了。此处南至菜市口，北进宣武门至西单，小饭馆很多，还有摆在地上的饭摊。讨饭时，我们穿着破烂的单车跑步，跑到小饭馆门外，我们低声说请求的话，有时说不出话，却哭了；小饭馆的主人给我们几个窝头，用纸包着，并安慰我们；他自言自语：“可怜啊！”

1932年

春，迁到章仪门里师范大学研究所破旧房屋中。参加了由流亡学生组成的东北学生军，张学良派人组织，每天实行军事训练。

《北平街头的小乞丐》：此时，东北大学已迁到北平。租用广安门内师范大学很多房屋，大部分学生宿舍和教室都在这里。学生宿舍之后，有几间破旧房屋，室内放着一些破旧木板和不少杂物。奉天会馆通知我们，我们可搬到这几间破旧房里。此时，高鹏和一个原高中三年级同学已回东北组织游击队打击日寇，两个小同学在北平找到亲戚搬走，另外两个同学在山东也找到亲戚搬走了。奉天会馆通知我们六人搬到那几间破屋子里。所谓搬，搬什么？我们六个走到那几间破屋子而已。

我们六人在院子里是捡得一堆破砖头，东拼西拼之后，把那些破旧的木板拼接铺在上面；这就是我们六个人的床了。至于吃饭，东北大学学生食堂的炊事员把每桌吃剩下的饭菜，以及桌上学生不愿吃不能吃的东西，都扫在一个盆里，然后在锅里再热一次。这就是我们六人的饭菜了。

夏，由于大伯父资助，准备投考大学。白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晚上进两个补习学校补习英文和数学。

《北平街头的小乞丐》：我的大伯父从靠河屯来北平看我。在靠河屯南十里李姓家有人在东北军中工作，是一个低级小军官。大伯父看见我在冬天穿着单衣，一面感叹一面请那位小军官买来一套很厚的秋衣，令我立刻穿上。我暖了，大伯父笑了。接着，他说全家都好，都惦念我；并着重说，“你要考大学。”说了两次，又说：“你不能没出息。”我感动哭了，并说：“我一定考大学。”大伯父回东北去了。临走之前，向李家借二十元钱给我，并说：回靠河屯还。

1933年

7月，为报考大学，用四平街交通中学毕业的王永兴的文凭，始更名为王永兴。但清华招生人员认为这张东北学校文凭不可靠，不准报名，北大亦如此。于是报考南开大学。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3年，我决定投考清华大学，但是没有高中毕业文凭。那时候，有一个东北流亡学生王永兴，他是1931年四平街交通中学毕业的，到北平交通办事处来领文凭。他已找到了职业，就把他的毕业文凭借给我，用我的相片领出了他的毕业文凭。因此，我就改用了王永兴这个名字。报考清华时，工作人员认为这张文凭不可靠，不准报名。我又去报考南开大学。

9月，考入南开大学英文系。

1934年

1月，无力交付南开大学学费，退学，仍回东北师大破旧房屋中。

8月下旬，因有南开大学录取凭证，被允许参加清华大学招收新生考试。试国文、党义、中国史地、世界史地、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国文试卷作文题目为“夏日的昆虫”、“读史书所见”。之后，参加北京大学招收新生考试。同时被清华和北大录取。在清华录取317名新生中，排名第111。

9月，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号2550。是年清华新生388名，其中一年级285名，二、三年级转学生84名，研究院新生15名。

水木清华清芬挺秀，人杰地灵。初入校园，见荷叶婆娑，芳草如茵，小桥流水，楼馆巍峨，叹为人间仙境。入住学生宿舍，免费食于清寒食堂，每月可领三元助学金，较之流亡行乞生活，如从地狱跨进天堂。

一年级不分院系，文理法三院新生选课相同。是年选修：大一国文（杨树达、俞平伯、朱自清）、大一英文（吴宓）、中国通史（雷海宗）、普通生物学（沈同）、逻辑（张申府）。勤苦攻读，也创作白话诗。

《我的治学经历》：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创作白话诗。

旧时清华大学颇重视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大一国文课是各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程，讲课教师都是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我所在的一班国文课的教师是朱自清先生，教授古文，也教授白话文。两周作文一次，佩弦先生亲自批改。这一年的国文课对于我这个只读过十八天高级中学课的学生来说真获益匪浅，加固了我此后读书治学的文字基础。

《怀念雷海宗先生》：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1935年

年初，与杨戍生（魏东明）同屋，一起阅读哲学、经济学著作。

6月5日，诗《夜半》发表于《清华周刊》第43卷4号。笔名黄刊。黄乃母姓；刊者，刻也，传也。《夜半》诗中有“草地上走过来有泪的笑脸”句，“有泪的笑脸”，正是此时期的心情。

9月，选课：中国文字学概要（杨树达）、中国音韵学概要（王力）、中国哲学史、国学要籍（文选，俞平伯）中国文学史（浦江清），大二英文。

12月9日，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向华北进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变本加厉。日本在北平郊区进行军事演习，华北的形势很危急，接着“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要成立。这样就激起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爱国情绪所激荡，我参加了这个运动。

魏东明《半年来》：一二九。在前一天夜里救国会就会同城内各校，规定了路线和会合地点，校内也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和食粮队等等预备在一二九早晨乘学校大汽车冲进城去，到第二天才证明了这都是幸福的梦想。虽然有七百多这样意外之大的数目的同学来参加，使人人都兴奋激动，可是消息传来，学校的Bus在城里被扣不能开到了。这时候只好改变方法，沿着校旁的从清华园车站通向西直门的铁路旁的小道，排了队步行了去。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僻路，冬月的严寒的早晨，使每个人都穿了过重的衣服，走到半道已经感受到它们的重量，发软的腿上津津地分泌汗液。而赶到了西直门，又碰到了第二个打击，城门紧关着，上面把守着全武装的军警……代表们跟城外的警察署交涉开城，自然又是枉费了时间。于是留下一队仍旧守着关了的城门，让他们把走出来的汗冻凝了来咬自己的皮肤，两脚因耐不住寒冷而

交互顿踉着。另外派出一批人绕着城去看，一路上喊着“反对傀儡政权”，“反对秘密外交”，“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察政委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到阜城门，阜城门关着。走到西便门，西便门也关着。在下午的时候，我们这派出来的一队，只好折回来在西直门和大队归合，开了一个大会，决定了第二次的行动，就撤回了队伍。第二天才听到了城里的同学受到了要人秘书的敷衍和欺骗，警察士兵的水淋和毒打！可是反抗的呼声在这天由我们公开地喊出来以后，整个的中国都响应起来了。^①

10日，北平32所学校相继罢课。参加“左联”，被救国会派往学联编辑《学联日报》。

《魏东明自传》：南下宣传回来后，1936年初参加下乡宣传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回校后，蒋南翔要我与赵德尊、王永兴等成立清华“左联”小组。

《陈落自传抄录》：1936年1月间，在北平市委领导下，重新组成了北平“文总”（全称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北平分盟），由张苏同志担任书记。文总领导左联、社联、教联三个组织……左联成员除了参加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发展盟员等政治活动外，在文总活动方面，主要组织公开的文艺团体，学习和讨论文艺上的各种问题，创办刊物或从事创作等。^②

16日，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被捕，坚贞不屈。几天后经学校师生声援出狱。

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十五日晚，清华、燕京接受前一次被阻不能入城的经验，组织先遣队一百余人先进城住在东北大学。

“一二一六”清晨，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千余人，步行到西直门，城门关上了。沿途邀约了未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外城的平大农学院、弘达第三院及孔德学校的同学一起游行。走到阜城门，门也关上了，再走到西便门，同样关上了。同学们奋不顾身，以血肉之躯，撞击城门。城上军警不断推下大城砖。最后我们找到一根几丈长的粗木头，经过四五十分钟，终于将城门撞开了。这次我们组织了敢死队、纠察队、交通队，四人一排，手挽着手，沿途不断冲破军警的冲击和拦阻，并将被军警包围的师大同学接出来，一同到天桥去。

城内各校也都分别英勇奋战，冲出重围。到了上午十时，打散了的队伍也都陆续来到天桥集中。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同大家商量，指挥行动，决定进前门经东单到外交大楼（当天准备宣布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会址）游行示威。清华、燕京走在最前面。一万多人的队伍，前面九人一排，后面四人一排，臂挽着臂，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街道两旁观众，人山人海，也为我们呐喊助威。快到前门时，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开始跑步。只见前门内外与东西两车站已满布军警、大刀队，也有日本人在里面，说什么“绝对不准入城”。数度交涉无效，只有冲锋前进了。水龙头冲射不散，继之以皮鞭、木棒，大刀队挥舞着大刀砍过来了，一排排枪声响了。被打散的队伍，马上又集合拢来。本来决定再到天桥开市民大会，结果不行，只能在西车站前广场开市民大会，决议提出六项要求。后来，大队在向宣武门行进时被冲为两截，北大、中国大学等校被强迫押入前门打散，清华、燕京、师大等校又被阻于宣武门外，不得入城。至夜晚，清华、燕京被迫出西便门返校，其余队伍继续在驴马市街、

^① 《清华周刊——救亡专号》第44卷第11、12期，1936年7月22日。

^② 赵石编著《洪波序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9-90页。

大栅栏一带遭到军警屠杀。^①

《“一二一六”被捕同学名单》：清华：陆瑾、许祖燧、王永兴。^②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我被关在公安局一个小院子里的一间孤零零的平房里。屋子里有个大炕。陆续被关进这里的有六七个同学，其中有清华大学的王永兴，还有记者刘江陵。门口有一个老警察，没精打采地抱着步枪，坐在凳子上，似乎是无所谓地看守着。我们在凝结着水蒸气的玻璃窗上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③

《1956年6月23日交代》：又参加了“一二一六”的爱国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我被反动公安局逮捕，关在公安局的拘留所里。到我被捕的第二天，反动公安局特务审问我一次，他问我在清华大学参加过什么政治运动？是否加入了共产党？为什么参加游行？我回答说，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其他政治活动。为了爱国，为了反对日本，我参加了游行。他没有再问我其他问题。以后，又在拘留所里住了三、四天，教务长吴景超先生到公安局来交涉，我就被释放出来。

1936年

1月2日，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根据当时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和燕京、辅仁等校编列为南下宣传团第三团……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党支部委员吴承明和救国会主席黄诚首先报名参加，共青团员丁则良、社联的杨述、韦君宜、王作民、左联的魏东明、黄秋耘、赵德尊和李昌、杨学诚、郭建、叶方、董凌云、于光远、黄绍湘、张师载等也都积极参加。^④

《魏东明自传》：我留在清华，参加了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参加南下宣传的有蒋南翔、雷骏随（李昌）、王永兴、魏蓁一、黄绍湘、高宝琦（高原）、李立睿、杨学诚、章安椿、王玉发等，还有燕京大学的王汝梅（黄华）。^⑤

4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出发。

《蒋南翔传》：1936年1月正是平津地区最冷的时候，天寒地冻。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都只穿一身棉衣裤，每人带一床薄军毯，分成四个团，整队出发了。出发之前，有的大队如清华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同学在体育馆前集合宣誓，由吴承明领读誓词：“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

第三团于1月4日早由各自的学校出发，到颐和园南面的蓝靛厂集中，下午天将黑时到达卢沟桥，住在宛平简易师范学校。当晚召集该校学生开会，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意

^①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171页。

^② 《清华副刊》第45卷第8、9合期《一·二九纪念特刊》。

^③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④ 《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2-1189页。

^⑤ 王金昌《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127页。

义，并帮助他们组织救国会。第二天经长辛店，下午到达良乡，各队分别出发宣传，帮助良乡一小和女子小学、初级小学及简易师范等四校的教职员，筹备成立各校教员联合救国会。

经过窦店到琉璃河，住在镇里良乡第二完全小学，帮助他们筹备成立各校教员救国会，同时还帮助该镇邮政局、商会等团体和个人筹备各界救国会，当晚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

次日，中午抵达河北省涿州的马头镇，镇上正在赶集，趁此机会开了镇南、镇北两个群众大会……宣传团还在乡村的戏台上演了话剧《打回老家去》。^①

9日，四个团到达河北固安。

11日，到达宫村。

13日，沿着平汉铁路走到高碑店。

《蒋南翔传》：高碑店的警察局长已预先做了布置，用武力对付宣传团。三团只好暂时栖居小学校的空屋内，各小队则分别去附近的小村进行宣传。

下午四时，大多数外出宣传的同学还没回来，警察局长突然带领便衣队和警察20多人，一下子拥进了三团的住所，他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恶狠狠地逼迫学生出来。团员们愤怒地齐声回答：“不出来”。便衣警察问：“谁是负责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负责的。”大家齐声响亮地回答。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个同学被他们捕去了，大家奋不顾身地一拥而上把他夺了回来。大家胳膊挽着胳膊紧紧地靠在一起。并且齐声高唱《开路先锋歌》。

当外出宣传的同学回来以后，他们就转移到一个小店，便衣警察又把小店包围起来。两个彪形大汉和几个打手强令宣传团员们分散居住，遭到学生拒绝。于是他们就强拉硬拽并且大打出手了。同学们也捡起砖头、石块、桌腿、凳脚予以回击。接着警察竟然对学生的住所放起火来，幸未成灾。他们用水浇学生，学生的棉衣淋湿了，因为天寒顿时结了一层冰。但没有一个人往后退，而是用胸膛顶住门，没让一个警察和便衣进来。

面对第三团在高碑店遭遇警察和便衣欲以武力强行解散团体，宣传团员们为了保持这个战斗集体免受损失，大家手携着手齐声说：“为了斗争，为了救亡，我们的集体决不能分散，坚决要求全团一起返回北平。”团员们在小店里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热烈地讨论抗日救亡的工作是不是就此结束的问题，为了不让门外的警察听懂，大家都用英语发言。与会者无不慷慨激昂，共同的结论是：抗日救亡工作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抗日团体，向日寇和卖国贼、汉奸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三团负责人蒋南翔等在会上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建议，立刻得到全团学生的一致热烈拥护。最后他们虽被强行押送回到北平，但是这个队伍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怀念则良》：则良在清华比我高一级，他是历史系有才华学习成绩卓著的学生。我们相识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南下宣传队里。在高碑店，则良站在一个土坡上，向周围几十个人宣讲抗日救国。当时，日本侵略军的军车，在天安门前压死我们的同胞，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军演习在北平大街上横行。我们的国土遭到蹂躏，人民受到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① 《蒋南翔传》，第26-30页。

周围的人们愤怒高呼，打到日本鬼子。那天夜里，我们睡在高碑店小学的教室里。突然，一大批军警包围了教室。撞开屋门，高声吼叫要我们立刻走出来，押解回北平。则良第一个站出来和军警讲理，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无罪。经过搏斗，我们寡不敌众，只能被押解回清华。

2月1日，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积极分子。当时民先队有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

7日，北平学联宣布复课。

28日，接到张申府从城里打来的电话，说明天将有贵客到清华，要做好准备，好好招待。于是紧急布置安排清华进步学生转移。夜晚，宿于燕京大学陈絮处。

《一二九运动史》：二月二十九日拂晓，四百四十名反动军警闯进了清华园，包围了各学生宿舍，实行严密封锁，甚至学生到食堂吃早饭也不许出去。一批一批的武装军警手持“黑名单”，冲进学生宿舍，进行搜捕。由于头一天就接到学联打来的电话，说明天将有“客人”来清华大学，要“好好招待”。因此清华园内的一批进步学生，包括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学联和学生救国会的干部，早已有了准备，都隐蔽到其他同学的宿舍里去了。反动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

《怀念则良》：此后，清华学生将被大逮捕的消息不时传来。一天夜里，大批军警闯进清华校园，包围学生宿舍，高声喊叫，要同学们到体育馆集中点名，进门站着一个人手持名单的军警头头，他背后却站着一个人，指指点点，所有的学生都点名走过，军警要捕的却一个也没有。感谢张申府先生，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有所准备。^①

29日，自燕京走小路潜入清华，参加指挥民先队员与军警搏斗，夺回被抓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

3月，救国会改选，被选为救国会委员，主要负责和燕京等大学联系。

《1956年6月23日交代》：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以后，北平学生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也参加了。当时领导清华学生的机构是救国会，我被选举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负责和校外联系。

31日，参加了抬棺游行。在杨秀峰的帮助下，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6年春，我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清华大学支部。介绍人可能是吴承明，支部的领导人是蒋南翔同志，他也直接领导我的工作。那时候，在清华以至于在北平市各大、中学，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跟国民党所领导的落后学生以及反动份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参加了这个斗争，积极工作。

夏，为北平学联执行委员，成为北平学生运动主持人。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6年夏初，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学联会，我以清华大学救国会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市学联的工作，负责秘书工作，后来又负责联络

^① 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

工作。

杨述《黄刊和黄诚》：北平学运初期，主持人是姚克广，后来他去做党的工作。中期与后期的主持人，便是黄刊和黄诚。

两黄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黄刊在清华大搜捕之后，即担任清华学生会工作，并在学联负责交际。

黄刊是东北人，入清华后爱写诗，“一二一六”示威时遭当局逮捕，被释后参加了宣传团，他便积极起来。他在工作上那股劲儿很足，好象不睡觉都可以似的。^①

6月13日，主持了“六一三”示威游行。

杨述《黄刊和黄诚》：他（黄刊）主持了“六一三”的示威。

陈翰伯《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北平学联发出通知，要各校同学密切注意华北形势的日趋恶化。各校时事讨论会、读书会、民先队，以及各个文艺团体，一律都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

一定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待到大家磨拳擦掌，纷纷要求有所表示的时候，又一次大规模群众行动的机会就成熟了。

比起上一年十二月来，我们的指挥系统已经锻炼得十分灵活。北平学联党团的决定可以迅速传达到各大、中学，而校内聚集人力也非常便利。

学联选定六月十三日行动。

鉴于以前几次的经验，我们准备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真正的大示威。我们也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没有指定在一个地点，也没有指定时间同时出动。我们采取游击方式，同学在不同时间零散出动，在学校附近游行，冲散了再集合，终日不断，让反动当局无法发现学生的“主力”到底是在哪一条街上。

示威的政治要求已经较前提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再次响彻街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经通过群众的嘴巴，“广播”到市民群众的心中……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这些口号还能抓住人心，历久不衰。^②

何礼《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这次游行，又一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同时以前那种和军警、保安队完全对立的情况，也明显地有了变化，基本上没有流血，没互相撕打。^③

《一二九运动史》：在“六·一三”大示威中，爱国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这些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以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逐步转到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大示威后，学生示威队伍在鼓楼召开了市民大会。市民、工人，而且工商界也派了代表

^① 《一二九漫语》，杨述（著），三联书店，1981年，第35-38页。

^② 《一二九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129页。

^③ 《一二九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79页。

参加。会上议决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武力保卫华北”等议案……这一次大示威和市民大会，成功地将工农兵学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

天津的“五·二八”和北平的“六·一三”反对日寇增兵华北的示威行动，再一次迅速地传遍全国……掀起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怒潮。这个运动唤醒了更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显示了抗日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侵略华北的气焰。^①

14日，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根据部分学生的要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3天抗议日军暴行。

28日，受到清华大学处分，被记两大过。

《清华党史》：学校当局在南京政府的密令下，贴出布告3张，一是开除救国会委员陈元、黄诚、吴承明、刘毓珩（陈其五）等4人的学籍；二是给予其他救国会委员宋士英、华道一、何玉珍、高荷琦（高原）、方左英、彭国珩、郭见恩（郭建）、曹国枢、洪绥曾、王永兴（黄刊），及纠察队长胡光世等12人各记大过两次；三是给予清华民先大队委员钟烈记大过一次。

30日，北平学联发出紧急通知，7月1日复课。

7月，为拓展统一战线，日夜奔走，广泛联系学校及社会同情学运人士，力矫运动中的极左之风。

杨述《黄刊与黄诚》：“六一三”前后，北方的社会人士同情学运，学联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的方针，他（黄刊）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还记得当时北平也有着“黑旋风”式的人物，他们主张同学们在开学时提出要求：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在未得胜利之前，不注册以抵制之。很显然这种抵制办法，是妨碍着师生团结而有利于少数教授如杨立奎之流活动的，这不合乎我们团结广大群众的路线。

当时黄刊反对了这一套，力矫此种言行。

杨述《悼王文彬》：当时北方名流感到同学们中最可接近的两位，是黄刊和王文彬。^②

秋，因强调统一战线，反对学生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与民先队领导产生分歧。

《1956年6月23日交代》：起初，对于那时候学生运动的看法，我与党发生了分歧。那时候，北平学生运动有些低落，我主张学生运动应该正常化，不要超出学生的日常读书生活的范围，要考虑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们的情绪，不要举行罢课、罢考。党批评了我的意见里的错误部分，但我没有接受党的批评。在具体工作里，我常常和党的领导人争吵，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人争吵。当时和我有同样情形的还有徐高阮、丁则良、李宗瀛。

10月，与徐芸书（高阮）等编辑《学生与国家》，为该刊发行代表人。

《1956年6月23日交代》：我们几个人（徐高阮、丁则良、李宗瀛和我）又办了一个名

^①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38-140页。

^②《一二九漫语》，杨述（著），三联书店，1981年，第75页。

叫“学生与国家”的不定期刊。这个刊物出了五期，因为没有经费，就停顿了。

10日，《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1辑出版，刊名由顾颉刚题字。是辑发表了徐芸书《论无条件统一》和蒋南翔执笔的《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希望》等文。

《目录》：敬致一点希望（王芸生）、读书与救国（吴承仕）、国难与学生（蔡维藩）、学生的地位（顾颉刚）、中日决裂的可能性（罗隆基）、呼吁统一（蒋弗华）、论无条件统一（徐芸书）、大联合（罗曼罗兰）、近代哲学思潮的倾向（张季同）、绥行日记（李宗瀛）、在前方（春茂）、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希望（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是日，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负责统战工作。

何礼《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各校公开的代表聚集在燕京大学礼堂开了“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王永兴（黄刊）、黄绍湘和我是在清华全体学生大会上选出来的，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学联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二届代表名单（大学部分）：

△清华大学：王永兴、黄绍湘（女）、何维登（何礼）、孙世实、李忻、赵儒珣（赵石）。

△燕京大学：李宗瀛、陈絮。

此次公开的成立大会贯彻了毛主席统一战线的思想，请许多教授参加。当时学联的分工是北大管组织，清华管交际（即统战），师大管宣传，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管总务（即主席）。公开学联成立以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了队伍，壮大了声势，做了许多工作。举其大者如：

为了争取公开合法，学联曾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去信，汇报学联所做的救灾、劳军等工作。学联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比当时的北平市政府还做得多。内政部正式给学联复了公函，等于承认了北平学联的合法地位。

学联拜访了大、中学的学校当局，说明北平学联的宗旨，大意是：我们要师生合作，拥护政府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也不忘记读书等，得到了各学校当局的同意支持。甚至于极少数反动的学校当局，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宗旨是对的……学联每一行动，都给各学校当局打招呼，学生一般的救亡活动皆得到学校当局的同情。

我们还进行了劳军活动。一次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用大刀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寇以后。又一次是宋哲元办盂兰会，在北海放荷花灯，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的二十九军阵亡将士超度灵魂，学联就派代表参加追悼。

除劳军外，我们还同二十九军一起开展一些活动。一次，二十九军何荃津一个团在西山红山口演习，学联事先和他们联系，清华、燕京的同学参加了这次演习。打的靶子全是日本鬼子，这在国民党军队是少有的事。誓词是我们同演习的负责人商量的。我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誓言：“我们的每一颗子弹，一定要消灭一个日本鬼子兵！”

又一次是清华同学代表学联去固安参观二十九军的作战演习，并向他们献旗，推动和鼓

舞了二十九军的士气。^①

10月25日,《学生与国家》第2辑出版。是辑发表北平各大学朱自清等66位教授签名的《教育界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作乱的土匪”等八项要求。北平学联因之发动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支持教授声明。

《目录》:敬悼鲁迅先生(徐芸书)、北平教育界宣言以后(章毅生)、一个冒险的假设(宋士英)、救国与建国(贺善徽)、学生的民族主义(陶希圣)、学生组织与精神(梁实秋)、我爱中国青年(蒋弗华)、现代作家的任务(王勉译)、在世界和平大会的演讲(王礼锡)、教育界的签名请愿运动(益世报)、甲午战争给我们的教训(王信忠)、走入歧途的中国实验教育(曹日昌)、绥行日记(李宗瀛)、日内瓦通讯、教育界对时局意见书、西班牙学生联合会的一封信。

11月2日,参加“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记录》:时间:11月2日晚8时。地点:救国会会所。出席者:彭国珩、林传鼎、蒋宪瑞、池际尚、何维礼、王永兴、黄克斯、黄绍湘。

I 政治分析(略)

II 报告:1.援助绥东抗战委员会因人选未定未能如期成立。2.本校签名单已第二次收回,本校同学均已签就。3.上星期日曾有四队宣传队出发,曾有廿九君某团长长谈。4.觉报于一二日内可出版。

III 讨论:1.交际干事二人,交际委员提出李立睿、彭国珩。2.交际干事车费每人伍圆(通过)。3.本校二年级同学不上军训案。由本会总务会同代表会主席向十一级级会主席、军训教官商量办法(通过)。4.十一月三日日军整队在北平游行示威应如何表示案。决定:A.十一月三日中午在大礼堂前举行下半旗礼。B.中午出发宣传。^②

11月10日,《学生与国家》第3辑出版,是辑刊登蒋弗华《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被1937年初开明书店胡愈之主编的文摘刊物《月报》第3期评选为“读者最爱读的文章”之一,产生了很大反响。

《目录》:青年界纪念孙中山(徐芸书)、外交成功国策失败(章毅生)、中日外交的遮眼法(宋士英)、联合战线的管见(千家驹)、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蒋弗华)、法兰西革命的精神未死(邵森棣译)、西北四省的近况与问题(梅贻宝)、国论介绍:壮丁训练与学生(邱椿)、一段历史的回忆(大公报)、关于取缔救国团体(益世报)、学校通信:十一月七日晨红山口(魏东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详记(毓森)、八里庄印象(李蕾)、内地的呼声(新民)、世界青年拥护中国解放运动。

是日,未参加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时间:11月10日晚7时。地点:办公楼本会所。请假者:王永兴。

^① 《一二九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83页。

^② 《清华副刊》45卷5期。

11月25日，《学生与国家》第4辑出版。是辑发表北平救国联合会《吾人对于时局之意见》。

《目录》：今后的责任（徐芸书）、论中日战争（马季廉）、我们最后的壁垒（贺善徽）、读“中日外交的遮眼法”以后（李珠）、救国运动的公式化（罗努生）、与闻政治与干政治（张东荪）、上海日纱厂工潮（文少华）、闻马德里陷落（何东辉）、一个美国名士致李昂伯仑书（祈广誉译）、争论（崔述）、看了“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以后（李长之）、绥行小记（王达仁）、上海的怒潮、吾人对于时局之意见。

12月12日，学联组织“一二一二”游行。是日发生“西安事变”，与徐高阮、丁则良等坚决主张呼吁释放蒋介石，和民先队少壮派意见严重分歧，被称为“元老派”。

《自述》：由于我们和党不断地争吵，当时党的华北局曾派一位领导同志到清华找我们谈话，教育我们，指出我们违背党和党争吵是错误的，要我们改正错误，加强党内的团结和民先队里的团结，但我们竟辜负了党的教导，没有接受党的批评，坚持自己的错误。

杨述《黄刊与黄诚》：但是黄刊却一天一天上层化了。他本非什么“学运元老”，但有时以元老自居，对于下层意见很漠视。

我记不得是谁将黄刊比成汉家的英布，说他出身下层，入了宫廷后便宫廷化了。

于是学生运动生了两种病态，小儿病和老头病，近视眼和远视眼。

“崎岖峻峭，未通人路之高山”，一则“不登峰巅，半途已足”，一则“于未去之先，坚持一方，决不换路”。

医治这两种病最好的药方，是群众，是群众的意见。

黄秋耘《“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清华民先队内部，主要是在党内，则有所谓少壮派和元老派之争……元老派的代表人物则为黄刊、吴之光、徐高莞等人……其中有些人（如徐高莞）还主张无条件统一，取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少壮派则反对这些主张。在民先的会议上有时也展开辩论。

关于两派的斗争，起初党内还没有作出正式的结论，主要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促使元老派改变他们的错误观点。但在党员和民先队员之间对这件事情常有议论。据我的印象，多数人都拥护少壮派，反对元老派，我也是拥护少壮派的。^①

《高承志给张宗植的信》：小徐（高阮）在南京出狱后回到清华，仍在党内负责，曾任西郊区委书记，后来又任北平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当时党内一些负责干部水平不高，教条主义，他对此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合作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是领导者，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左倾青年对此曾展开了一场辩论。当时毛泽东的著作在白区是看不到的，关于八路军及解放区要独立自主的思想谁也不清楚。小徐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还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一篇论文《论无条件统一》，蒋南翔和一些同学则反对这种思想，因此在清华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②

^① 《一二九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5-206页。

^② 《何凤元集》，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16日,《学生与国家》第5辑出版,所撰《今后的青年运动》一文,发表于该辑。

《目录》:论非常事变(徐芸书)、今后的青年运动(王永兴)、百灵庙月夜(何东辉)、我对政府与领袖的态度(宋士英)、谈上海查禁杂志事件(梁实秋)、最近南北的思想罪案(吴世昌)、自然科学家的任务(赵仲贝译)、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章璞)、国论介绍:百灵庙战役的经过及其教训(长江)、外交线上的惨败(益世报)、沈钧儒等六大案杂感(上海大公报)、读者之声(驰怀)、远方来信(刘群)。

月中,被民先队开除。肺结核病发,休学,住清华校医院治疗,脱离了学生运动。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6年冬,民先队开队员大会,提出我和丁则良不遵从民先队队部的决议,不接受批评,把我们两人开除队籍(徐高阮未加入民先队)。我因此就消极起来,丢开工作到清华校医院去养病。蒋南翔同志几次到医院找我谈,但我的错误思想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倒更严重地发展起来。

杨述《黄刊与黄诚》:老头病的黄刊终于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而隐居了。

在十二月初,北平各校总罢课,他放弃了这工作,躲进清华园……他就此离开了学生运动。“一二一二”示威之后,北平学联已经不是黄刊时代,而是黄诚时代了。

1937年

1月26日深夜,病中撰写《北方青年的回响》,发表于《国闻周报》。

《1956年6月23日交代》:王芸生(当时是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现在是天津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告北方青年”的文章,我就写了“北方青年的回响”一篇文章,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在这篇文章里,充满了对抗党和党对青年运动的方针相违背的言论。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青年应该有独立思想和人格,不要受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影响,更不要参加任何党派的活动。青年学生应该努力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党又向我进行教育,纠正我的错误,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它的错误。

2月,住进香山疗养院。

春,拒绝去陕北,脱党。少壮派与元老派之争,本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不同工作方式及不同思想之争,但随着元老派的脱离革命,元老派被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成为拒绝与工农结合的反面例证,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屡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一二九运动的叛徒”之骂名伴随他一生,历次运动,都要因之而被开刀问祭,历尽折磨,九死一生。直至世纪末,才有重新评价元老派的异于主流的呼声。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7年春,我没有得到党的同意就从学校休学到香山疗养院养肺病,从此就和党更加疏远了。养病期间,徐高阮来找我,告诉我说,党中央希望他到陕北去,如果他不能去,丁则良、李宗瀛和我几个人里去一个也可以。徐高阮说他已经拒绝了党中央的指示,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当时表示不愿意去。

黄秋耘《风雨年华》:少壮派与元老派在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很难用简单几句话加以概

括：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当然，随着矛盾的激化，元老派就越走越远了，例如徐高阮（芸书）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党的独立自主路线，主张无条件的统一；还有个别人也写文章宣传取消左派和右派之分，要搞“统一的”救亡运动。后来元老派中的不少人都自动离开了党，或者被开除了党籍，虽然他们是清华大学最早的一批党员。

在政治主张上，我无疑是倾向于少壮派的，但是又对民先队的“内讧”感到担忧，不赞成对元老派斗争得太激烈，太过火。我觉得，元老派的某些主张也未尝没有点道理，他们的最大错误只是在敌人面前把党内的原则分歧公开了出来。也许由于我的“调和派”的天性，我总觉得让一些有才能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不过，像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公开说出来。当时在大多数民先队队员看来，元老派当中某些人是必须清洗掉的，否则就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独立性。我不是政治家，对这样复杂的政治问题实在搞不清楚。对于“内讧”，我感到担心，但又无能为力。^①

李昌《回忆民先队》：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时卷起了一股右倾投降主义的逆流。早在一九三六年春天，资产阶级思想就曾一度袭击过民先队；到了这年的秋天，有些人，如当时清华救国会出席学联的代表黄刊，更进一步表现出重视联系上层、轻视下层群众、空谈理论、轻视实际工作的倾向。民先队员们把他们叫做走上层路线的人，在队员会议上对他们作了严肃的批评。西安事变之后，他们变得更坏了。徐芸书（当时还是中共党员）公开在资产阶级杂志《国闻周报》上批评党的路线，主张无条件统一，取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黄刊也在《国闻周报》上写文章，宣传取消左派和右派，要搞“统一的”救亡运动……就在北大东斋，他们与陆平、刘居英和我等展开了辩论……这时《大公报》又不断发表“致北方青年”，与之互相呼应，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诱惑和招降。这股风不仅在北平一处，在全国各地都刮得很凶。

我们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和这种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徐芸书、黄刊和张之光坚持他们的错误，终于离开了党；徐芸书后来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

为了粉碎当时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右倾投降主义，少奇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论左派的文章。这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犀利的思想武器，装备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

不久，在五月间，我和黄敬、杨学诚、林一山等同志一起在延安又亲自听到毛主席“对北方青年发表的谈话”，他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北方青年应该同这

^① 《黄秋耘文集》，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16-17页。

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历史证明了，北方青年和民先队员们没有辜负主席的殷切期望。^①

杨述《“一二九”运动简论》：在“一二九”运动后期北平党内出现了右倾主义。这和后来的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路线相类似。^②

《“一二·九运动”史要·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1936年秋天，北平党内学生运动领导核心中却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倾投降思想。

1936年10月10日，徐芸书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论无条件统一》一文，提出了所谓“无条件统一”的口号。他说：“我们应该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求无条件的统一，我们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地统一起来”。他批评反对这一口号的人，说“他们是不了解惟有无条件始可统一，也是不了解统一为目前最高原则，欲谈统一则不容任何疑问。”这种“无条件统一”的论调，其实质在于完全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不仅如此，为了求得所谓“无条件统一”，他甚至在学生运动的实际工作上，也不惜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取消党所领导的、经过各校民主选举产生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而主张广大学生都参加国民党御用的、那几个右派学生所控制的新学联。

徐芸书等还和民先队中的蒋弗华等人先后出版了《联合》、《学生与国家》等刊物。他们在《联合》的发刊词上，宣扬“平等、自由、博爱”等口号，作为青年行动的指针。蒋弗华发表了一篇《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认为“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并提出了“知识救国论”，指责进步青年“空知有救亡知识，而不知知识可以救亡”。

正在这个时候，王芸生于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5月，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徐芸书、黄刊再次出来与之呼应。他们在《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文章。他们说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就是“有党派的狭隘的色彩”，就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就是“反统一反民主的腐败思想的产物”，并声称“中共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不能不负实际的责任”。

这时，北方局彭真对北平学生运动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彭真还亲自到清华大学找了有关党员干部谈形势、讲政策，分析党同徐芸书等人分歧的实质。同时，也找了徐芸书本人，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告诉他，在党内如有意见，尽可以去延安谈。但是他拒绝了。

为了对广大青年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克服“左”、右倾，特别是右倾错误思想，1936年11月，刘少奇撰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1937年1月31日又发表了《论左派》的文章。

《一二九运动史》：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二·九”革命青年投入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历程，就是一个愿意并且实行与工

^①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前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8-137页。

^② 《一二九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8页。

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自己，从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从一个阶级转化为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过程。“一二·九”运动所撒播的革命种子，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是也有一些当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拒绝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的革命热情象昙花一现之后，就把自己禁锢在“象牙之塔”里，结果有的飘零，有的堕落；还有一些依附于反动阶级，终于被历史所唾弃，与草木同朽。^①

赵俪生《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我个人意见集中在书的第10章第3节，题目是“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我认为至少后一半不应该出这么一个提法。

这一章写的是……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和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任务徐芸书（按即徐高阮）、黄刊（按即王永兴）以及蒋蕻华（即蒋福华）等发表的一些对学运的不同意见。我与王芸生素昧平生，他当年为何写那些文章，我一概不知晓，故在此不予置喙。但与徐芸书、王永兴、蒋蕻华三人则不仅是一般泛泛的同学，而且是过从尚好尚密的朋友。其中除王兄仍健在人间，并且担任着北大“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的导师之外，徐、蒋等人早已“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的了。我认为不应该再给这些活的和死的的人头上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加一百倍说，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上在半路小站下了车的旅客；但他们都是极优秀的青年，聪明绝顶，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见，这在今天显然是允许的，在当年也不过是一种“不同政见”而已，远远够不上什么“投降主义”。

我把这些意见，直言无隐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的那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其实，韦君宜的信中原已写的很清楚了，“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这句话，就是说，这部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别人的看法。由此，我对“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我盼望，大家伙不要带着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

原因是除了这些“同路人”在主管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弱点之外，在革命队伍本身，也存在着更严重的弱点，那就是“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正如少奇所说，它长期残留在革命队伍之内，缺乏对它的揭发斗争，使他千百次地重演，损害最大。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领导者们对搞关门主义的有奖，对联系群众和同盟者的受处分。在组织上，他们深深惧怕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先锋队里来。因此，那些已经进来的必然日子很不好过，心里很不好受。久而久之，一些阶级觉悟不够坚强的人就有可能游离革命的总轨道，有的坚持自己的“民主个人主义”终身。^②

颀西《清华园感旧录》：在我怀有深厚友情又最不能忘记的有三个人，他们是同一班级的社会学系的蒋蕻华以及历史系的徐高阮及丁则良，他们都成绩优异，在清华园有相当知名度。他们抱有相同的理想追求，可是却又略带有异端的色彩：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排

^① 《一二九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90页。

^②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153页。

斥于历史的大潮流之外，或者被称为是“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一本苏联小说名）。因为他们把对于当前国是意见写成文章投寄《国闻周报》发表，后来《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把这些文章编入一本反映青年思想的集子中。这是一种过早地进行自我反省的尝试，即使对于历史具有敏锐的感知，但在当时大形势下是不会被容许的，而且也显然只是微弱的声音。^①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谢泳：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王永兴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

丁东：九·一八以后，国共态度不同。那时高调抗日的声音很吸引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他没有吸引住爱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那些不同的声音最后被一种声音压倒了。像徐高阮、王永兴当时的那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远见的。王永兴那篇《北方青年的回响》，今天读来，也是一篇好文章。

高增德：王永兴 1957 年成了右派，在山西受难二十多年，晚年才回北大重操旧业，在学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王永兴对自己当年“一二·九”的经历极少谈起，可见伤害之重。

^②

7月29日，日寇占领北平，香山疗养院解散。独自回到北平。时清华已迁至长沙，陈絜安排暂住于燕京大学，齐思和先生常馈以食物。

8月，由陈絜帮助，装扮为商人，混过日军检查，到天津。

《1956年6月23日交代》：“七·七事变”后，我从香山回到北平，那时，学校已迁往湖南长沙。我从北平到天津，预备转道到湖南去复学。在天津遇到黄敬同志和姚依林同志，那里，黄敬同志就要转路到陕北去，他们劝我和他一同去，我也拒绝了，从此，我就完全脱离了党的队伍。

10月末，扶病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同住香山疗养院病友大多去世，常感时日无多。烽火连天，中国国土日益沦丧，报国无门，更觉苦闷。

11月，在长沙圣经学院听陈寅恪先生授课，如醍醐灌顶，找到了一生要走的路。于是转入历史系，师从陈寅恪先生。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37年十一月我到了长沙。我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为他的精博学识所惊倒。我那时候心情很苦闷，就选择了跟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治考证之学这条道路。从此我就开始了不问政治躲在旧书堆里的一段生活。

《八十述怀》：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清华大学南迁长沙，我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课。先生讲课有股巨大的力量，我的思想感情完全被吸引；并由此决定：我要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我一生要像先生那样为人治学。一个23岁的青年，坐在长沙圣经学院（临时备用）教堂中，苦思冥想，为自己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

^① 鯤西《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② 丁东、高增德、智效民、谢泳：《“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书屋》2003年第12期。

《我的治学经历》：我冒着很大危险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我选修了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徐高阮学长兄也选修了这门课。这是我第一次听寅恪先生讲课，也是我一生从先生受业的开始。记得上课铃声响过，先生抱着黑布包着一大包书走进教室……课后，高阮兄和我均极振奋，能遇到这样的教师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要一生从寅恪先生受教，因而要转系。高阮兄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我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我们即刻去见教务长潘光旦先生，陈述我们的申请。听完我们的话，光旦先生笑了，他说：“你们选择了最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一生从他读书学习，一定有成就，我同意你们的申请。”我们极为欣喜，向光旦先生道谢。但光旦先生指着高阮兄说：“你已耽误二年（高阮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二年），现在转系，你的大学要读七年。”接着，又指着我说：“你患病已耽误一年，现在转系，你的大学要读六年。你们二人，不会后悔吗，是否再加考虑？”我与高阮向光旦先生坚决地保证，绝对不后悔。光旦先生笑了，说：“很好！很好！”从这一天起，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是寅恪先生的学生，寅恪先生是我们做人与读书治学的导师。这一天的决定，对我一生治学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对我一生作人也是如此；对高阮兄也是如此。6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深情地回忆着这一幕时，我仍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庆幸不已。只是寅恪先生、光旦先生、高阮兄均已远行不归，我深藏心底的感激亦无处可诉了，思之怆然。

是月，转系后补修了西洋通史（皮名举）、中国近代史（邵循正）、数理逻辑（沈有鼎）。

1938年

2月，随学校离开长沙。时学生徒步走，沿途兼作调查，惟女生及体弱多病者得乘舟车。因重病不愈，未能参加步行队。

4月，转道广州、安南，到达云南蒙自，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翠湖图书馆苦读。

《我的治学经历》：清华、北大、南开南迁时，图书亦同时运来，但绝大部分只能藏在大木箱里，因无房屋也。云南省立图书馆（亦称翠湖图书馆，因在翠湖公园内）虽藏书不多，但我们要用的书大多数都有，先生指定的必读书都能借到。因此，除了上课外，我们每日都在翠湖图书馆读书。

5月6日，开始上课。

8月23日，自蒙自迁回昆明，与徐高阮、王勉住于文林街光宗巷，常与住在附近的程应镠、李宗瀛、丁则良、翁同文、王逊、钟开莱等畅论学问、时事。

《怀念应镠》：一九三八年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从云南蒙自迁昆明。徐高阮、王勉二兄和我在文林街光宗巷赁一小屋而居。程应镠和李宗瀛住在文林街先生坡，两处相距不远。他们的租屋宽敞，所在庭院大而整洁。宗瀛和应镠都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当时转学到西南联大。一九三五年，高阮兄和我已与宗瀛相识，应镠则是初次见面。他们二人都是翩翩佳士，对人热情诚恳。应镠喜欢谈诗，他的案头摆着杜少陵、李太白诗集。我与高阮、王勉

二兄经常是宗瀛、应缪的座上客，当然来访的还有西南联大其他同学。大家聚集在他们这间收拾整洁的屋子里，有茶，有时还有花生米。日子久了，大家都熟了，谈论历史、诗、文，也谈论国家大事。宗瀛、应缪都善谈，常常有精辟的见解，使满座惊服赞赏。大学历史系三年，我们几乎朝夕相处，我获得了终生的益友。

《怀念则良》：在昆明这段时间，文林街先生坡流金（程应缪）、宗瀛（李宗瀛）的住所较宽敞，课余和节假日常聚会有六人：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和两位先生，翁才子（翁同文）也时常参加，谈抗战，谈读书，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则良又和王佐良先生合办二良学会，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不利。虽然贫穷，大家的精神还是振奋的。

9月，选修佛典翻译文学（陈寅恪）、欧洲中世纪史（雷海宗）、中国史学史（姚从吾）、法文（闻家驷），补修大二英文（钱钟书）。

《怀念雷海宗先生》：他劝告我，学习中国中世纪史，也应懂得欧洲中世纪史。我听从事了雷先生的教导，选修了他讲授的欧洲中世纪史。我的英语程度很差，但在他的教诲指导下，一年中读了几本论述欧洲中世纪史的书。

10月，程应缪、徐高阮等创办《大学论坛》壁报，参加撰稿。

虞云国等《晚于青史识苍凉——程应缪传》：自1938年9月起，程应缪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①

是年，肺炎高烧，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被村民推车送至昆明医院。幸赖医院刚到一批第一代磺胺，用之，始获救。

1939年

春，选修两晋南北朝史（陈寅恪）、西洋近代史（皮名举、刘崇鋮）、史学名著（毛准）、庄子（刘文典）。

9月，选修隋唐史（陈寅恪）、法文（闻家驷）。

《我的治学经历》：我的精力及时间大半用在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学习上。先生指定必须阅读的书很多，《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特别是《资治通鉴》，必须精读熟读；先生嘱咐，《通鉴考异》与胡三省注，必须与《通鉴》正文同时读，《考异》与胡注均极重要也。先生又嘱咐，必须认真读书，只听课，不读书，或不认真读书，是不能学好这门课的。

^① 虞云国、严耀中、范荧撰，载《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1940年

2月，选修隋唐史（陈寅恪）、白居易研究（陈寅恪）。

春，撰写毕业论文《唐代后期黄头军考》。

《我的治学经历》：毕业论文是在寅恪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题目是“唐代后期黄头军考”。先生讲授唐后期元和平淮蔡之叛，以出自铁勒族的李光颜率领的黄头军（即忠武军）之功为多，黄头军乃胡兵也。我的论文搜集史料较多，寅恪先生审查通过；但对于我提出“黄头军”之名出自黄头室韦，先生认为不确，应再详考。

7月，毕业，是年历史系毕业生4人。

暑假，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史学部研究生，导师为陈寅恪、郑天挺。同时录取者有李埏、王玉哲。

《怀念郑毅生先生》：临近毕业，（寅恪）先生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禀告说：希望继续从先生受业，学习隋唐史，努力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先生赞许我的计划，并表示以我向学之志，告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领导人。暑假期间，先生要去香港看望师母，我报考研究所以及考试期间，先生或尚未返回昆明也。当时，先生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研究生考试是一次答辩，在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教师宿舍楼下一间大屋子举行，参加答辩的教师约十人，座位成半圆形。教师座位之前摆一小凳，我坐在凳上答问。答辩会由郑毅生（天挺）先生主持。会前，毅生先生向我说明应注意事项，并抚慰我不要紧张害怕。但我怎能不紧张呢？十位教师集中注视我，提出的问题大多超出我准备的范围。一个半小时的答辩，最后我语无伦次，满脸是汗，几乎站不起来。毅生先生扶我走出会场，送我到一间小屋子，要我休息喝茶。我几乎忘记了一个半小时中说了些什么，感到录取无望，情绪低劣。但出乎我的意料，半个小时之后，毅生先生走进来，笑着向我祝贺，教师们一致通过我的答辩，我被录取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导师是陈寅恪先生，副导师是郑毅生先生。

9月，入住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宿舍。

《我的治学经历》：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教师宿舍是一座旧式三层小楼，已很破旧。一层的一间大屋子是研究生宿舍，可以居住十人。录取后几天，我搬进这间大屋子，一个小木床，一张小书桌，一个书架，这在当时是被人羡慕的读书研究的最佳条件。更佳的条件是借书方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我们可以从史语所借书，拿回宿舍，我的小书架就摆着《资治通鉴》、两《唐书》，白天黑夜都可以在宿舍读书。

1941年

从昆明市里搬到城东北郊的龙头村，与任继愈同屋，终日苦读。因寅恪先生滞港未归，

由郑天挺、向达任导师。

《我的治学经历》：一年后，北京大学在昆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上建筑十几间草房，三届研究生约 20 人迁居宝台山。史语所就在山下，借书更方便了，两人一间房子，读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我的同屋是任继愈学长兄，二人终日苦读。

《怀念郑毅生先生》：先生经手在昆明城东北二十五里的龙头村侧的宝台山上，修建七八间土房子，名副其实的土房子，两个学生住一间，俞太然先生负责供应我们灯油用纸住一间，炊事师傅和厨房一间。院中有几棵高树，巢居两个猫头鹰，每到深夜，哀鸣不止，屋后时有一二大狼白天窥视，深夜蹲坐对月嚎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读书到深夜。没有节假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夜夜如此。长时间坐冷板凳。我说到这里，先生笑了，并说：这就是我们没有出一个废品的奥秘所在！

从 1937 年 11 月至今日，我从陈寅恪先生受业，研究生三年的前半导师为寅恪先生和毅生先生，后半的导师为毅生先生和向觉明先生。他们都是品德高尚、勤于读书治学、从不曲学阿世的贤者。

1942 年

仍在宝台山勤苦读书。

《王玉哲来信》(1998 年 7 月 27 日)：在我印象中的老兄是个缓步而行的“老学究”、“老夫子”。在蒙自时你就给我这么个印象，在昆明，尤其是在宝台山上，你是最不好动的同学之一。

《王玉哲来信》(1998 年 12 月 25 日)：记得日机轰炸昆明时，我们在宝台山上不受影响，可也出去坐在山坡上远望天边上的敌机。那时我耳朵不如你，但眼睛比你强。我两个互相配合，都是你先听到敌机飞来的声音，我即向空中张目四望，找到小如飞蚊的敌机，指给你们，大家才都看到了。当时的情景，不知你还记得否？再有就是晚上咱们都睡得很晚。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时期都在图书室夜读。好像你的桌子在我的前面，我后面是幼舟（李埏）。幼舟晚上一面看书，一面吸着烟斗，所以他一直不困乏；可是，我不成，一会儿眼就困得闭上了。你在我前面，一回头，便学着我的河北乡音：“又和着眼！”（即闭着眼）我赶紧提起精神继续读。有时一夜晚叫我好几次。另外，还有一些这类的花絮，有时在记忆中浮现出来，令人回味无穷！

夏，撰写《论唐代朔方军》一文。

《我的治学经历》：1942 年，我写成《论唐代朔方军》一文，此文乃据寅恪先生之启发而写成者。先生讲授唐史时，曾指出：安史叛乱中，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我撰此文，乃先生学说之注释。朔方军之所以强大，因其主力乃胡族之部落兵也。此文撰成于 1942 年夏后，未能得寅恪先生审查，先生已离开西南联大，在广西大学任教。

秋，与刘淑珍结婚。

1943年

春，撰写毕业论文《唐代牙兵》。

7月，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结业，未参加答辩。

《我的治学经历》：一日，毅生师告我，学校正式决定我留校任教，协助毅生师讲授唐史，是否参加答辩，由我自己决定，不答辩，为毕业，不影响我留校任教也。于是我未参加答辩，留校讲授唐史课。

10月12日，被西南联大聘为历史系教员，讲授隋唐史。工作甫定，或以恢复原王中九之名相劝，断然拒绝。因十年前王永兴慨然相助，不求回报，义薄云天。若无其文凭，也许已饿死沟壑或葬身日寇铁蹄之下，焉能如今日于大学执教。遂决定终身用其名，以彰显其侠义盛情。

年底，从昆明到西安。

1944年

春，与刘淑珍从西安转道洛阳回到北平。在北平过着家居生活，读书研究历史。多次找寻慨赠文凭的王永兴，但已不知何往了。对其感念终生。

1945年

秋，任北平临时大学讲师，在补习班第二分班（文学院）教中国通史。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在北平接收了伪北京大学，创办了北平临时大学，由郑天挺先生（当时是昆明北京大学秘书长，现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负责。郑先生是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他约我到北平临时大学任讲师，教中国通史。

开始购书，认识琉璃厂来薰阁书店学徒郭纪森，与之结下一生的友谊。文革后期，屡得郭纪森帮助。

1946年

年初，仍任北平临时大学讲师，对学生要求极严。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时向郑天挺先生请教。

《郑天挺日记》（1946年3月25日）：第二分班四年级学生补习中国史考试，教员王永兴用隔坐法以防学生有抄袭情事。学生不遵，多数退场，并阻挠（其他）同学考试，有一考试男生并被殴。

《郑天挺日记》（1946年4月14日）：王永兴来谈，以西晋何以国祚甚短为疑？余以为或由于开国时无通盘策划，事事苟且，无开国规模与长治久安之经制也。永兴亦以为然。容

详绎之。又言丁则良谓阉阉始自东汉，其说亦是。盖门阀之成，一在族大，一在通显久，一在婚媾多，东汉窦、马其例也。

5月，任教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46年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从昆明迁回北平，我又回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研究助教。

暑假，回沈阳，并去靠河屯看望睽违了十五年的父母和大伯父等家人，母子团聚，悲喜交集。时宝勤堂已扩展至沈阳，颇具规模，年幼弟妹均已成家。大伯父仍夙兴夜寐，终日在农田里劳作。

10月末，陈寅恪先生返回清华任教，双目失明。因助手徐高阮暂不能来北平，请王永兴助其教学工作。

《陈寅恪致郑天挺信》：毅生先生史席：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俯允，即希赐覆。专此，敬颂

著祺。

弟陈寅恪敬启

11月1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陈寅恪先生助手。

《1956年6月23日交代》：陈寅恪先生从英国治眼病回到清华大学。因为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有人帮助他讲课、研究。我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员，一方面帮助陈先生工作，一方面我自己从事于历史研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8年十月，陈寅恪先生离开北平。

《种花留与后来人》：1946年10月，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住在北平城里。一天早晨，郑天挺先生（当时郑先生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打来电话说，雷海宗先生（当时雷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电话中告诉郑先生，寅恪先生已回到清华，目疾治疗无效，双目失明，他提出要王永兴作他的助手。郑先生还说，北大已同意，要我这两天就去清华。放下电话，我匆忙赶到西单大街坐清华校车到清华。我走到新林院五十二号门前，师母正在院子里，我行礼拜见师母，跟着她走进书房。先生显然听到师母和我在院中讲话，站在书桌前等着。我行礼毕，先生握着我的手，他面容清瘦，但精神还好，笑着说，“你来得这样快”。同时，摸索着书桌旁的沙发，我扶着先生坐下。十多年不见，先生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感到凄怆，含泪坐在他身旁。先生问我的生活，接着就说到备课，先生决定在历史系开一门课，讲授唐史。此时，雷海宗先生来访，他转述校长梅贻琦的话，劝寅恪先生休养一二年，等健康恢复后再授课。先生婉辞，雷先生不再提开课，只说，在家里讲课吧，要学生们来。先生同意了。

午饭后，先生命我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他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当时，先生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从我和先生见面后几个小时，看到先生双目失明和健康不佳，内心一直感到凄苦。听到先生的话，我冒失地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

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先生看了看我，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先生开了两门课。

《我的治学经历》：1946年秋，先生由英转美返国，回到清华园旧居。遵先生之命，我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职，任先生助手。时先生赴英治目疾无效，已双目失明。我从先生受教十年，先生对我恩泽深厚，自应侍读先生左右，为先生效劳也。此后至1948年末。有一天、有时上午在先生家，我的工作：先生备课时为先生读书，先生教课时，我在黑板上书写要用的史料，到图书馆借书还书、查阅抄录先生使用的史料及有关学生作业的批改等琐事，工作一天或半天，我极愉快。

2日，开始协助寅恪先生备课、上课。

《种花留与后来人》：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先生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一丝不苟。从1946年到1948年，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他认为是平常事。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需要时先生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首先听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先生在清华新林院的住房相当宽敞，书房对面一间大屋子作为教室，先生指定讲课要用的史料，在上课前，我写满两块大黑板。先生准时讲课，我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学生听。两节课，中间虽稍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我做些有关备课和学生作业的事。

中午，我在先生家吃饭。我扶着先生坐在饭桌旁，师母在厨房帮助忠良（忠良姓陈，在先生家工作十多年，人如其名，实为先生家人）。饭、菜端上来，我按习惯禀告先生，并按

先生的指定把各种菜都放在先生面前的盘上，把汤放在先生面前的小碗里。每餐先生吃的都不多，饭后，我扶着先生走到阳台上。先生习惯散步片刻，然后午休。

《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是年，长女珠眉生。

1947年

1月，在寅恪先生帮助下，清华为之安排了西校外喇嘛庙（颜家花园）一套三间宽敞住房。

《种花留与后来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把清华园作为兵营。礼堂和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马圈，房屋大量被破坏。日本投降后，清华返回故园，住房缺少。我当时年轻，居住城里，清华的紫白校车每日从早晨七点到晚九点，有多次班车，来往很方便，我没有想到向清华校领导请求分配住房。1947年1月中，清华庶务科通知我说，分配给我三间住房，在西校外喇嘛庙（即颜家花园），要我去成府找颜惠庆的管家，由他领我去看房子……但我还是踏雪去看了房子，一所大花园内的三间宽敞大瓦房，在西校门附近。不久，我搬入新居。同时向先生禀报并形容这所花园的情景：花园的前半部，也就是我的住房所在，是一处松林，还有几棵高大的白皮松；花园的后半部是坍塌的殿堂，周围杂乱生着很多花草树木。先生告我，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延烧了喇嘛庙后半部，高大殿堂坍塌了。颜惠庆买了喇嘛庙，所以又名颜家花园。

1990年……刘桂生先生和他的弟子欧阳军喜君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他们查阅清华大学校史档案，在1947年档案中有如下一封信：

月涵吾兄先生左右：

王永兴先生住宅事当由雷伯伦先生面商，兹再由内子面陈一切。鄙意有二点请注意。

（一）规则问题：清华住房之规则或有困难，但王先生系北大之教员，暂时以友谊关系来住清华，助弟授课，若以客人之身份暂住适当之房屋，似不在前定之规则限制之内，可否通融办理，或有其他办法则更佳。

（二）事实问题：若王先生无适当之房屋，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勉强继续此种不安之情态，恐亦不能过久。则弟之工作势必停顿。思维再四，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解决之法难求吾兄曲念苦衷及实际困难情形，设一变通之策，谅亦不至有他种同类情形援此例以阻碍规则之施行也。详情悉由内子面陈，敬希鉴谅为荷。专此奉恳，并候俚祉。

弟寅恪谨启一月十三日

敬读四十三年前先生致梅贻琦校长的信，我如大梦初醒，悲感万分，为了我的住房，先生写信，师母亲临梅家。几十年中，先生和师母从未说过。长时间中我受到先生的护持也竟不知，而今稟谢无由，至感悲愧。

28日，写信给郑天挺先生，为搬家向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款，由任继愈代办。同时转禀汪篔在长白师范学院的困难状况及请求重返北大的愿望。

《致郑天挺信》（1947年1月28日）：毅师大人赐鉴：生前数日得汪述彭同学来信，彼已安抵永吉。惟长白师范学院情形极劣，校中无图书馆，无教员宿舍，述彭同学至今犹寓旅馆中，且欠薪数月不发。非惟不能读书研究，且亦艰于维持生活。故彼决于暑假年终了时即辞职返平。彼甚盼能重返文科研究所，嘱生先禀知吾师，彼即当专函详陈。

4月，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助教。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中国文学系：又与历史系合聘助教一人……其与历史系合聘之一位，系帮助陈寅恪教授工作。^①

夏，陪侍寅恪先生去喇嘛庙看白皮松。偶尔进城为寅恪先生购书及唱片等。

《种花留与后来人》：这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天空晴朗。先生心情愉快，和师母说，他要去喇嘛庙看看那几棵高大白皮松和旧日园林。我陪侍先生乘车前往，先生在松林中徘徊，四处顾望。先生的双目还有一些光感，角度适当还可看到一些景色。我扶侍先生走到每一棵白皮松前，他抚摩着挺拔矗立苍劲的树干，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思考着什么。在一棵白皮松前，先生仰望树顶，他看到了在阳光照耀下一片苍绿，问我：“这是最高最老的一棵吧。”他双臂围抱树身，可能是要量一量这棵矗立天地之间的大树。它经过多年动乱仍然自强不息地在增长着。接着，我扶侍先生看看坍塌殿堂和许多不知名称的花木。先生有些累了，我请先生到我的住房里休息喝茶。我领着我的长女珠眉到先生膝前，孩子向爷爷问好，先生抚摸着孩子的头发，笑着问着。

回到新林院时，师母站在阳台上等着，先生笑着说，出去的时间稍长一些，但他并不累。

从城里迁居喇嘛庙后，下午我也常在先生家里。看学生作业和到系里校里办事。

先生喜欢听京剧，特别是张君秋唱的望江亭。一次，有客人来访，说张君秋唱的望江亭改了几个字，已灌成唱片，市场上可以买到。我知道先生的心情，向他提出我进城去买改了几个字的望江亭唱片。先生笑着同意了，并嘱咐我，改变的是哪个字，在商店当时就听一听，我按先生的嘱咐买回唱片，先生很高兴，立即听了，并说，是改动了几个字，更好了。

8月，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员，月薪210元。协助雷海宗编辑《社会科学》。

《怀念雷海宗先生》：当时，清华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清华学报》上，少数亦有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清华周刊》是发表有关学生间的一般科研及其他有关生活间的事情，伯伦先生感到发表师生间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不够，因而倡议创办第二种《清华学报》，即《社会科学》，由伯伦先生主编。这件事，使全校师生都感到有必要和高兴。

自1946年秋季以后的三年里，已双目失明的寅恪先生命我为他的助手。我每天早晨8点到先生家，午饭在先生家与先生同桌而食，以便协助先生。下午，我在先生家工作的时间不长，大约5点钟左右，先生命我回西校外颜家花园我的寓所。途中路过伯伦先生家，我

^① 《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

每次都要进去看望伯伦师和师母。伯伦师的第一句话总是问寅恪先生的健康情况，我也协助伯伦先生做些有关《社会科学》约送稿和出版的事情，为之感到高兴。

是年，长子珠文生。

1948年

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员，月薪220元。

春，与季羨林、周一良、汪篔扶侍寅恪先生去来今雨轩观赏紫藤花。

季羨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篔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贱、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清华薪给丰渥，衣食无忧，在郭纪森帮助下，大量购置图书，不但大部头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等购置齐备，而且也不乏善本，藏书之丰，在北平小有名气。此时助寅恪先生读书、授课，归家后研读唐代经济史，闲时用小藤车推一对儿女在小河旁林荫道上、白皮松下散步，是一生难得的平静幸福时光。

《种花留与后来人》：侍读先生之侧，我很愉快，感到幸福。

12月，含泪送别寅恪先生离开北平。

《种花留与后来人》：1948年12月，自东北南下的解放军攻占昌平，国民党败兵有些逃到清河，离清华园不远，清华校内人心惶惶。先生师母都已年老，又都体弱多病。在战火临近之际，只能回避南去。北平城内的胡适先生打来电话说，一二日内有飞机飞南京，可能是从北平南去最末一班飞机，可以给寅恪先生一家保留座位，要求寅恪先生一家立即进城等待，明日早晨派汽车来接。事情这样紧急。晚饭后，我立即来先生家，在书房里，先生、师母、忠良和我商量明晨进城的准备。时间很短，先生吩咐：我协助师母挑出先生要带走的书籍稿件，装满一皮箱。又说，先生师母全家走后，家具等等由忠良整理，移出清华，存放它处；我负责整理书籍，装箱，移出清华，存放它处。夜深，师母回卧室，忠良回后院。我侍坐先生身旁，心中感到凄苦，先生南去，不知何时再回清华，不知何时再为先生读《通鉴》，再为先生写黑板，再陪侍先生散步。先生很平静，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如何安排。师母本已嘱咐我不要问先生南去后的计划，免得先生不愉快。我忘了她的嘱咐，突然问先生，到南京后如何安排？先生看出我心情不平静，不仅未生气，反而平静而慈祥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谈话，但万万想不到，此

后就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1949年

2月，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员，讲授隋唐五代史。

4月，《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发表于《社会科学》第5卷2期。

《我的治学经历》：1949年，雷海宗先生主编《社会科学》杂志，它是又一种清华大学学报。雷先生命我作文，因而有《中晚唐的估法与钱币》之作。该文主要内容为：唐由于产铜少，因而铸钱少，又由于佛教盛行，已有的铜钱大量消耗毁坏，故而出现铜钱少的严重问题；建中两税法以钱谷为税额不能改变，因此在财政收入与支出上只能折用一部分匹段，这样就产生了以虚估实估为特征的估法。寅恪先生在讲课中提出唐后期的估法问题，并谓它是唐代后期经济财政中的重大问题。此文之作乃受先生之启发，试图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问题，只是用较多史料阐述这一重大问题而已。

9月，负责历史系一年级新生管理，后被正式任命为一年级导师。讲授中国通史。

（胡）如雷《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段》：1949年9月，我在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后，紧接着又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新，信末署名“王永兴”，当时我估计是学生会的干部，竟没想到是我的老师。^①

11月，代替吴晗讲授联共党史，同时担任政治经济学课辅导员。升职为讲师。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49年十一月，历史系主任吴晗先生到苏联云，他担任的联共（布）党史一课程由我代课。接着，我被学校提升为讲师。那时候，王亚南先生在清华讲授政治经济学，我在班上任辅导员，一方面跟王先生来钻研，另一方面帮助同学学习。

是年，次子珠全生。

编年文：《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

1950年

2月，讲授中国近代史。

4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录》公布所担任课程：历史学系教员王永兴：政治经济学班教员；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编辑、中古史史料选读。^②

（胡）如雷《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段》：清华历史系的全体教师，有教授、副教授八、九人，讲师二人，助教二人……按照当时清华的规定，助教也不开课，所以能开课的教师不过十人左右，他们不但要开本系的基础课和大量的选修课，而且还要为外系（如政治系）开中国通史课。有的时候一位教师同时就开两门课。几乎每人每学期都有课，很少有人能享受一学期不开课的清闲……教学任务尽管这样繁重，教师们却没有因此而放松科研

^① 《学林漫录》第7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6-33页。

^② 《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工作，大家都是一面讲课，一面撰写论文，两条腿走路。平心而论就凭这为数不多的十位教师，把系里的各项工作搞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清华历史系称得起是“两个中心”，当之无愧。

夏，清华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被历史系派去担负部分教学、行政工作，与顾越先等青年教师辛勤讲授，颇受佳评。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50年我先后参加了工会，中苏友好协会，在工会宣传部里担任一部分工作。就在这一年夏天，清华工会指定我负责清华职工业余学校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也作出一定的成绩。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一九五〇年，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建国之初，全校教职员学生都很振奋。在职工中，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急于业余学习文化。适应这种需要，清华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每一个系都派出一、二位青年教师，负责业余学校的行政和事务工作。我被历史系派去担负部分教学、行政工作。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三院的所有教室都坐满了听讲者，教师认真讲授。职工业余学校的工作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好评。

9月，授课之余，还与北大史学系教师组成定期讨论会，讨论重要课程的教学提纲及讲授内容，并讨论专题研究报告“唐代庄园问题”。

10月，在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感召下，写成《朝鲜的爱国主义者李舜臣》一文。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起来，我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在中国古代的史料里搜集有关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打击敌人的事迹，写成“朝鲜的爱国主义者李舜臣”一文（刊载在天津进步日报上）。

是年，母亲去世。母一生淳厚正直，勤苦善良。土改时，宝勤堂被毁，家园被占，田地被分。大伯父被斗几死，流落街头，行乞而终。母无立锥之地，往依次子中五。中五亦被划作地主，连遭批斗，饱受摧残，母抑郁而终。因迫于形势，在母生前无力迎养，去世时又不能归葬，椎心泣血，抱恨终天。至晚年，每念及此，仍老泪纵横。

编年文：《论朔方军》，《朝鲜的爱国主义者李舜臣》。

1951年

2月1日，《人民清华》第7期载《历史系总结和计划》：有6位教师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研究和编译计划，其中孙毓棠拟编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王永兴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①

3月，受清华大学委派，离开历史系教学岗位，负责清华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筹备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令

（1951年3月26日）

^① 《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9-390页。

令该校筹设工农速成中学一所，并将计划预算报核由。

清华大学：

兹决定你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一所。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设立四个班，招收学生一六十名。

附发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一份，希即着手筹备，并将筹备情况、具体计划及经费预算一并报核。

附：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一份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部长马叙伦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4月12日，清华大学呈教育部函，提请教务长周培源先生兼任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历史系教员王永兴先生兼任副校长。

27日，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副校长。开始制定办校章程和方针、工作、会议制度等，很快让学校走上正轨。

教育部批复：

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清复（51）发字第七九一九号呈悉。周培源兼任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王永兴兼任副校长，准予备案。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钱俊瑞 代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51年春，教育部指定清华大学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党和学校行政派我负责筹备工作。这年秋天工农中学开始招生，我担任副校长的职务，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历史和工作。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可能由于我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中有一点成绩，在遵教育部命创办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时，清华校领导要我把在历史系的教学工作全都放下，协助周培源先生筹建工农速成中学。

5月，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捐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筹建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中建立了校舍。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筹建之始，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筑校舍，二是聘请教师。教育部拨给建筑费，很快就建成了一座两层小楼和一排平房及一个礼堂兼饭厅。教育部允许从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者到工农速成中学任教。聘请教师的工作也很顺利。教师中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少数年纪稍大的教师是从北京以及外地聘请来的。教师队伍的水平是较高的，大家都因为能在这个新型中学任教而感到光荣。

7月，聘请教师，从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中挑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如物理系张三慧、化学系何其盛、中文系章熊、韩家鳌等，同时聘请一批有经验的中学教师，如王鸿逵、黄淑环、许冀闽、李淑荣（丁则良之妻）等，成为工农中学教师骨干。

何其盛《美好的回忆 宝贵的经验》：1951年上半年，当时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四年级

学生，即将毕业，组织上决定在我毕业之后安排我到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工作，特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这样有过直接为工农服务的机会是十分宝贵的，当即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不久，负责建校筹备工作的王永兴副校长约我和物理系自愿到工农速成中学任教的张三慧同学到大图书馆一楼历史系办公室谈话，向我们两传达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指导思想，并介绍了学校筹建情况，还告诉我们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务长周培源教授亲自兼任校长，这更使我们去办好工农速成中学充满信心。^①

8月，工农速成中学招生160人，为第一批新生。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是由各单位保送，再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第一届学生入学考试时，周培源校长亲自到各个考场视察，他极关心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考试完录取后，我向他汇报录取学生的情况，他很满意。

10月10日，举行工农速成中学成立典礼。

冬，去江西参加土改。

《1956年6月23日交代》：1951年冬，党批准了我参加中南土改团廿一团的土改工作。工作的重点是江西进贤县八区麻山乡，我担任这个团里一个队队长的职务，在麻山乡的工作区域里，我担任了一个工作组组长的职务。

是年，次女珠林生。

1952年

2月，回工农速成中学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8月，工农速成中学校舍扩大。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一座二层小楼是教职员、学生主要教学和其它活动的场所。但当第二届招生时，这所小楼就不够用了。大学决定把生物馆的大部分房间拨给工农速成中学使用。

9月，第二批新生入学。

1953年

仍担任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

万邦儒《回顾与思考》：工农中学有过三任校长，周培源、何礼和高沂同志。他们都是兼任，常务副校长是王永兴同志。^②

郭德魁《工农知识化的摇篮》：王永兴同志是一位热爱工农教育事业，关心工农学员和青年教工学识渊博兢兢业业工作的长者。^③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我在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了两年，我很

^① 《特殊篇章：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创校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1年，第40-43页。

^② 《特殊篇章：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创校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1年，第30-36页。

^③ 《特殊篇章：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创校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1年，第17-26页。

愉快……教师们的工作很重，很负责，很努力。有些教师备课到深夜，不只是钻研学习教材内容，还要研究教学方法。教学的对象不是一般的青少年，而是成年人，有不少同学年纪较大，三十多岁以至接近四十岁。绝大多数同学都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重要的一点是要速成。这就要求教师们从教课内容到教学方法上都要有所创新。学生的学习是极努力的，艰苦用功，多数学生星期日不休息。教师们和负责教学行政的同志们不只是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同时还要劝告学生们不能经常读书到深夜，要注意休息，要开展体育活动。学生中有不少努力读书学习的感人事迹。几十年后，我仍不能忘怀。

（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办的一所为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学校，办校期间仅七、八个年头，但她培育了千余名工农干部，其中大部份升入高等学校深造成为具有专业训练的国家建设骨干，一部份在提高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后重回工作岗位。数十年来，他们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是年，三子珠群生。

1954年

年初，被教育部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历史教科书。

《1956年6月23日交代》：解放初期，教育部要编辑一套小学初中高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参考书，为此，从各大学调借人力。我从北京大学借到教育部，后又改为调。我在教育部直辖人民教育出版社为编辑。

叶立群《继承、开拓、前进》：1953年5月，毛泽东同志听取教育部汇报工作时，十分重视教材建设，认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三十个编辑太少了，指示补充一百五十名干部来编写教材，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选调。在中央直接关怀下，很快从全国各地陆续调来一批干部，充实和调整了我社的领导力量和编辑力量。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同志仍任社长兼总编辑，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同志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巩绍英、朱文叔、刘薰宇任副总编辑。

为加强对语文教学和历史教学的领导，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和“历史教学问题委员会”，分别研究确定语文教学、历史教学和语文、历史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及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如语言、文学分开教学问题，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等）。由于中央加强领导，并为我社充实了编辑干部，1954年我社即开始自编中小学全套教材。在编写前拟定了全套教材的编辑方针，研究了各科教材的编写原则和体系安排，并提出了对编辑干部的要求，建立了编审制度。^①

8月，正式调入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部分。

是年，开始利用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余，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阅读敦煌文书，重新拾

^① 《继承、开拓、前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32页。

起放下五六年的历史研究。

《我的治学经历》：1954年，我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离北京图书馆很近，编写之暇，我利用北图所藏敦煌文书显微胶卷，写成《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这是我研究敦煌学的开始。

1955年

仍在边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边阅读敦煌文书。利用去天津出差之机，看望雷海宗和郑天挺先生。

《怀念雷海宗先生》：1955年，我去天津办事，特地到南开去看望雷先生和郑毅生先生。雷先生住的一所小房子很简朴，像是很旧。先生面容清癯，师母说，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好，看来，心情有些抑郁；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待我，问到我的读书生活情况，还嘱咐我应该多读几本讲世界史的名著。他过于谦虚地说，他是研究欧洲中古史的，应该较多较深地理解我们祖国传统的优良文化和学术思想，但他对中国古代史书读得太少了。师母招待我，喝茶，吃点心。先生指着点心说：“这是起士林做的，天津有名的点心店。”还问我：“比清华古月堂的点心怎样？”在大学读书时，我曾在两位先生家里吃过古月堂的点心，很好吃的。我笑着说：“不如古月堂的。”师母说：“这恐怕是你们清华人的偏见吧？”三个人都笑了。我能看出来，先生为了我去看望他而十分高兴，谈起清华往事，谈到陈寅恪先生，刚见面时那种抑郁表情没有了。但谁能想到，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

《怀念郑毅生先生》：50年代初院系调整，毅生先生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一次，我去天津看望雷海宗师和先生。先生居住两间残破旧屋，我进门时，先生站在煤饼炉旁煮挂面，但精神很好，笑着问长问短。我恭敬地回答着，他心中十分凄苦。残破一室中挤满了一床、一书桌和几架书，另一室中堆放着书箱书包、一桌、数椅和煤饼炉。在这样的环境中，要用的书无处摆放，一日三餐，先生自己围着火炉转，他怎样读书？怎样生活？先生看出我的心情，安慰我说：“这已经很好了，可以安居读书，你不要为我愁苦。但今天只有一点挂面，我不能请你吃饭了。”我也笑了。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居于陋室之中，劳作于煤饼炉之侧，毅生先生不改其乐，诚为贤者；但一位明清史的权威学者，其居处生活如此，实民族国家之灾难也。

1956年

4月，参加编辑《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王永兴、王剑英编，印20,000册。

6月，参加编辑《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第一分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王芝九、王永兴、王剑英编，印5,000册。

7月，参加编辑《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第二分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王剑英、王芝九、王永兴编，印5,000册。

9月，参加编辑《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王永兴、王剑英、王芝九编，印20,000册。

11月，参加编辑《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一分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王芝九、王永兴、邱汉生、王剑英编，印26,500册。

12月，参加编辑《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二分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王永兴、王芝九、邱汉生、王剑英编，印26,500册。

是月，参加编辑《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陈乐素、王永兴、李光壁、邱汉生、王芝九编，叶圣陶、巩绍英、朱文叔校订，王剑英助编，印41,000册。《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共四册，这是全国通用的第二套中学历史教材，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前。在是书中，负责第五篇“隋唐五代”部分。

《目录》第五篇：第十九章 隋朝：第一节 隋朝的经济和政治，第二节 隋末农民战争。第二十章 唐的强盛时期：第一节 唐朝的建立 唐初的经济政治措施，第二节 唐帝国的扩张，第三节 唐朝前期经济的发展，第四节 唐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第二十一章 唐帝国的衰落 唐末农民战争：第一节 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第二节 唐后期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第三节 唐跟吐蕃、回纥、南诏的关系，第四节 唐末农民战争。第二十二章 五代十国。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文化。

叶立群《继承、开拓、前进》：这套教材1956年开始使用，是全国通用的第二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在思想性、科学性，以及文字等方面比第一套教材都有显著的提高，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也有缺点……由于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教育事业大发展，不能及时补充合格的教师，有些学校反映，新教材“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

纪奚《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自1956年起的中学历史教材，都是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的，称为‘统编教材’。这是一个完整、严密、浩大的权威工程。人教社组织了历史专家、历史教材编写工作者进行编写。分工执笔撰写的，多是精通历史又懂教育的同志。汪篪、邱汉生、劭循正、李绳武、杨生茂、王芝九、王永兴等多位资深学者，多年承担这一工作；形成我国历史教科书编著史上一个人才整备、阵容稳定、章法严谨、成绩巨大的繁荣时期。通过全国广大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及重版修订而日益完善。于是产生出了门类齐全、内容衔接、繁简有度、图文并茂的，科学性思想性都较高的高初中古今中外全套历史课本，形成一个空前完整的历史教材序列，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前。它不但教给了不少于三代的青少年以科学的历史知识，初步培养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且通过钻研课本（连同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备课、讲授，早就了一大批合格的或优秀的历史教师队伍。^①

^① 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是年，完成《关于唐朝法律的几个问题》一文。是文论述了《唐律》与国家土地制度、《唐律》的等级性、《唐律》中反映的父权家长制、管理水利、干涉私人手工业等特点，是开始系统研究唐代法律的第一篇文章。

四子珠田生。

编年文：《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上的表现》，《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试教工作里的一些经验》，《介绍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从西晋到唐劳动人民徭役负担的减轻》。

1957年

1月，《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2印，署名王永兴、王剑英编；《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2印，署名王永兴、王剑英、王芝九编。印20,001-39,5000册。

6月，由于刘淑珍在“大鸣大放”期间积极向党员干部提出意见，遭到批斗。王永兴在批斗期间，一言不发。

《我的治学经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前几天为大鸣大放，继之为批斗。大鸣大放期，我无意见可说，未说一句。批斗期间，我虽不能不到会，但从未发言。

7月，丁则良因被划为右派，不愿忍受耻辱，投未名湖自尽，结束了年仅41岁的生命。王永兴悲伤、愤怒，却不获准去送别志同道合又亲如兄弟的故友。

《怀念则良》：三十年前一个夏日的清晨，庆华（陈庆华）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北大来，则良故去了，上午送他到香山公墓。站在电话机旁，我惊呆了，我问庆华，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你就来吧，来了，一切都明白了。庆华的声音急促凄怆。我去请假的路上，走着想着，在那样凶猛残酷漫天斗争大火里，一个人的生命火花被吞没，不是难以理解的事。请假被拒绝了，同时遭到申斥。斗争已开展一个多月，我虽然还不是斗争对象，但由于在斗争会上默不发言，已受到几次警告。不能请假，这是铁的纪律。

12月，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关于敦煌学的文章——《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该文考出 P.3559、P.2657、P.3018、P.2083 四号历来被视为“丁籍簿”、“名籍”的文书实为唐天宝十载敦煌县诸乡征发徭役而编制的“差科簿”，这是唐代徭役制施行的一份宝贵遗存。此文一经刊出，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但为中国赢得了荣誉，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影响了几代学人，也推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陈门问学丛稿·后记》：1957年写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是我学习敦煌学的第一篇文章。寅恪先生是我国敦煌学创始人之一。《敦煌劫余录序》为我国敦煌学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石，《秦妇吟校笺》和多篇有关敦煌学的文章是我们以敦煌资料来研究问题的典范。从1954年到1957年夏季，我的全部工作之余的时间用于阅读敦煌文书显微胶卷，在老式的阅读机下，我孜孜不倦地移录，以期有所成而不负师教。

是月，《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一学期适用）、《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适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2版，印30,520册；《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一学期适用）、《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二学期适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2版，印12,000册。

年末，刘淑珍被划为“极右”，武装押解出京。

是年，《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重印。

编年文：《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基本线索和重点》，《关于唐朝法律的几个问题》，《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

1958年

4月，因连续几个月在批斗刘淑珍会上不置一词，又拒绝执行组织上要其离婚的命令，被定性为划不清界限，驱逐出人民教育出版社，遣送到山西劳改。

《我的治学经历》：反右斗争结束时，对我的结论是：分不清敌我，应送往山西太原，控制使用，改造思想。我只能服从。

《历史教材编辑琐记》：历史教材几经变化，从事编写历史教材的人也几经补充和更新……他们的贡献将长期体现在历史教材里。有的书或具体章节已经不是他们的手笔，但是他们开拓的途径和某些范例仍然依稀可辨。说怀念，首先是怀念或先或后组成历史教材编写队伍的那些同志的劳绩。

1954年以来，这支队伍里包含不少著名的历史专家，例如中国史方面的陈乐素、汪篔、王永兴……他们的学识丰富了教材的内容。他们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历史室立下了一个好传统。^①

5月，将刚上初中一年级的12岁的长女寄宿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岁的幼子寄养于亲戚家，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北京，到达山西。

6月，因“控制使用”的身份，被安排在位于太原南郊黄陵村的山西教育学院，是院为培训中学在职教师、轮训中学行政领导及教务干部而设。

《我的治学经历》：“控制使用”者不能自由选择工作，我被分配山西教育学院。

7月，《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教师适用）、《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教师适用）3版，印32,442册。

8月，《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教师适用）、《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教师适用）3版，印12,284册。

^① 《继承、开拓、前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5-57页。

是年，《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教师适用）、《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教师适用）、《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教师适用）、《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教师适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1959年

与山西师范学院阎宗临、山西大学历史系师道刚时相过从，切磋学术，为黄陵风沙中的唯一慰藉。

秋，编写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的讲义。

《致郑天挺先生信》（1959年11月1日）：几个月来，我的主要工作为编写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的讲义。目前虽已编写出一部分，但是否符合教学改革的精神和党的方针的要求，还是疑问，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再次写这封信向吾师请教。我很愿意了解南大历史系各门课程改革的情况和指导思想、所据原则以及具体措施，特别是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内容和过去有哪些重大不同，这样改革的原则是什么？尤盼详示。因为本学年我还是教这门课，唯恐对教改精神领会不全，不能完成任务。恳请吾师抽暇复教，如同时赐下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则更为感激。专此请教，渴盼回信。

1960年

仍在山西教育学院，经常下乡“支农”。时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幼子亦从北京被送至山西。独携五子僻处村郊，倍感艰难。

1961年

饥寒苦厄之中，仍坚持读书，继续唐代法律研究，并细读《资治通鉴》。

冬，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详考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

11月，师道刚帮助从山西大学借来《福建通志》。昼夜苦读。

月中，《福建通志》还期将近，读至夜半，头痛如裂。忍痛续读，后昏迷不醒。三子珠群叫醒邻居，急送医院，确诊为流行性脑膜炎，所幸抢救及时，死而复生。

1962年

12月，《论魏徵》一文刊登于《学术通讯》1962年第3期。是文论述了魏徵的政治思想，直言善谏的风格和魏徵在学术上的贡献，指出：“千余年来，魏徵以其政治家之声誉为人所注意。我们今天论述魏徵，固应重视他在唐初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也应注意到他在唐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这在当时“政治挂帅”的大环境下，是极为难得的。而是文关于魏徵的政

治思想部分，也主要是从唐代法律史的角度论述，是其唐代法律研究的继续。

编年文：《〈唐律〉所载“同居有罪相为隐”一语如何理解？》，《试谈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论魏徵》。

1963年

秋，再次得流行性脑膜炎，救治较晚，几死。

冬，借调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工作，居住在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日子，翠微院落成为埋首古籍、潜心学问、躲避劫难的港湾。

王同策《翠微校史的日子里》：1963年秋冬，奉中宣部之命，先后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工作的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的刘节，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和山西教育学院的王永兴诸先生……来的大都是国内史学界的权威。如：郑天挺当时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唐长孺、王仲荦、刘节也都是知名的教授，北京的如北师大校长陈垣等著名学者就更多了。也就只有他（罗继祖）与王永兴、陈仲安是讲师。但书局却不分职位高下，工作分工，食宿安排都一律看待。

工作之余与星期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或结伴三五，到玉渊潭公园喝茶谈天，尽兴始去。还可以去逛琉璃厂古旧书店，访书购画，相互欣赏……有时或去访亲会友。^①

编年文：《关于柳宗元的政治思想》。

1964年

在中华书局校点《魏书》。

《我的治学经历》：1963—1964年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工作。我读《魏书》、《北史》、《资治通鉴》，写史料卡片，为校点《魏书》作准备。读书中，我注意联系寅恪先生在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中论述的重大问题，如北魏的汉化问题，特别是魏孝文帝统治期间的汉化，其中包括制定典章制度，迁都洛阳等；又如北魏取凉州河西诸儒内迁，他们家族所保存的汉魏典章制度之学随之移人中原问题；又如崔浩与寇谦之问题，六镇之乱问题，等等。前此读书不多，理解不深，今兹为校点工作，从容读书，书写史料卡片，从容思考，对昔日寅恪先生讲课中所论述诸问题，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7月8日）：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出勤人数比较齐全，除个别同志曾外出参加会和听报告，一般都在家工作。

各史的校点工作情况：

《魏书》——王永兴先生《册府元龟》对校工作本周内可以结束，关于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问题，王先生曾和唐长孺先生商量过，大致打算这样进行：石刻方面的校《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等三种。《太平御览》、《北史》、《通鉴》，唐

^①王同策《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先生意见，《通鉴》不作通校，有问题时查一查。其余就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等吸取前人成果的工作。王永兴要求和守俨同志谈一谈具体作法（赵守俨眉批：已谈好，先校《御览》）。^①

7月20日，全家八人在北京翠微路团聚。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7月8日）：各大专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快到了，校点二十四史的各位先生在暑假中有这样打算……王永兴的爱人和二个女孩、四个男孩于本月二十日左右到京。恐怕最少还需要给他准备两间房子（赵守俨眉批：已谈好，只能供给一间）。

冬，忍泪离开中华书局，返回山西。

《我与中华书局》：1963年，我从山西太原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工作，这是我与中华书局缔交长期友好关系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太原有令来，命我立即回山西。在反右运动中，因株连，我被遣送到山西太原，控制使用，改造思想，我没有留在中华书局的自由。在中华书局短短的十个月中，实际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的是赵守俨先生，他待人真诚友好，在校点工作中帮助我。他知道我被遣送后的处境与生活，安慰我，因而我与他结下了一生相知相勉的友谊。

1965年

年初，郑天挺先生的帮助联系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3月，山西教育学院人事部门将材料寄至南开大学。

5月11日，给郑天挺先生写信，怀念翠微校史的时光，盼望早日调入南开，开始工作。

《致郑天挺先生信》（1965年5月11日）：天气渐热，想吾师身体必康宁安泰。早晚散步时，想起去年此时，陪侍吾师在翠微路上散步的情景，对生来说，这是愉快的回忆。甚盼在短期内能侍吾师左右，聆受教诲。

7月29日，在省委党校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学习。

8月中旬，去晋东南潞城县参加四清。

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6月，被打成大封资修分子。经多次抄家，衣物荡然。造反派还用鞭子驱赶他将四壁图书装入推车，一车车拉到火炉前焚毁。眼见视若至宝的线装珍籍、听陈寅恪先生课笔记、多年读书所积累的数千张资料卡片，灰飞烟灭。还有一些没烧完的，分给造反派作为冬天取暖的燃料和当作吸烟引火纸一页一页撕掉烧毁。只有一部同文版二十四史因被师道刚借去，才免遭劫灰。此间，批斗、游街、毒打和严刑逼供等，更是家常便饭。

是年，与刘淑珍分居。

^①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9》，《书品》2007年第3期，第90-92页。

《北京大学教工登记表》(1984年4月):“文革”期间,我的遭遇是很痛苦的,靠边站,接着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停发工资,罚劳改,批斗,抄家,游街,挨打,几至于死,这些就是我从1966—1969年来的遭遇。

1967年

被关入土监狱,经常遭批斗、毒打,死去活来。因宁死不屈,不肯骂陈寅恪、雷海宗等恩师,遭际更为惨酷。是时土监狱的阶下囚一听到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的歌曲,皆面如土色。因为播此歌是他们最怕的批斗会的前奏,批斗一次,小死一回。

《回忆录》:一次逼迫我更为狠毒。在土监狱中,夜中不许关灯。某夜半,我在睡中,造反派某以木棍击头,命我去造反派办公室。我站在造反派头的面前,桌上摆着日本学者赠我的两本学术书和两个歹徒写的对我的揭发,他高声吼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棍子鞭子把我打倒,我仍不说话。两个造反派拉着我的两臂两手,棍子鞭子集中打我的头,还高声吼叫:“打死你就是打死一条狗!”我死了,我失去知觉。可能已是后半夜,我感到我漂浮在水上,下着大雨。办公室的屋子之前有一个大垃圾坑,他们把我打死,丢在这个坑里。我摸我的身上,全是血。我全力往坑外爬,终于爬出;我无力站起走,只能爬到我家里的那间破屋子。据造反派令,夜间,我的屋子日夜门窗电灯都要开着,箱、柜也要开着;造反派检查,红卫兵检查。我爬进屋子,我的可怜小儿子珠田睡在光板木床上,盖着几件破衣。我在他耳边低声说,要他最低声说话行动;要他拿着脸盆扶我走到院中压水机旁,一盆一盆冷水从头冲洗我,回到屋中用破衣擦干。我也睡在光板床上,盖着几件破衣。我藏在家中两天,第三天被造反派发现,我又被驱逐回土监狱。

1968年

7月,长女珠眉去北大荒前,到土监狱看望奄奄一息的父亲。

《回忆录》:这一期间,我被关入该校土监狱中,心情愤怒而悲伤。正在此时,我的长女珠眉从北京来看望我,她与北京很多学生要到北大荒支边,临行前,到太原看望她的在灾难中的父亲。造反派持枪押解着我,只允许我们谈话五分钟。孩子几乎用尽全力向我呼喊:“在任何难以忍受的情况下,都千万不要自杀!”我平静地和孩子说:“你放心!”珠眉的话不是无因而发。在华夏民族那样多灾多难时期,被带上封资修帽子的高极知识分子,自杀者不是少数。珠眉这次来,使我得到安慰鼓励,我要坚强活下去。

是年,因被长时间反复捆吊,再重重摔下,双手几乎残废。

1969年

仍在忍受无尽的批斗、游街、酷刑和各种非人的折磨,倍加思念师友、亲人。

《怀念应缪》:在十年浩劫中,我们被迫中断了通信,但我偶尔也听到应缪的一些情况,

使我悲愤。在我被木棍痛打因而半昏迷的状态中，或被拳打脚踢跪在地上挨批斗时，或在土监狱中在被监视下交代“罪行”时，我的师友们和孩子们的形象突然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怀念雷海宗先生》：十年浩劫中，我被剥夺了读书治学的权利，但不知怎的，还时时想起先生和其他老师关于我读书治学的教导，而且有时还有个计划，我未来要如何读书；我想起在昆明时，雷先生把一本很大很厚的英文的欧洲中世纪史的书交给我，指导我怎样读。这样的大书，我将来还是要读的。社会国家需要我去读。当时，我向同是阶下囚的人们说这些话时，他们都嘲笑我，说我说梦话。当时我想，我不是说梦话，先生虽然不在了，我读先生交给我的那样大书的时刻一定会到来，为了祖国我努力读书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1970年

被押送到交城县北十里岭底大队监督劳改。

《回忆录》：封资修这顶帽子未压倒我，造反派在我身上毫无所得。他们改变要毁灭我的方法，把我押送到交城县岭底村监督劳改。县革委押送我到县北十里岭底，在大队办公室，队领导石银成对我的态度很好，室中数人对我都很客气，他们一致地说：“我们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在两个大学当老师，又做编辑；在我们岭底，你不是劳改分子，你放心。”这真是我意料之外之事，但看着他们诚恳坦率的态度，我肯定，这是真的，我的长时间灾难日子过去了。我大笑并说：“感谢你们。”全屋中人都大笑起来。我在岭底村住两年，生活还好，但苦于无书可读。

1971年

仍在岭底大队劳动改造。

冬，独自一人进山，四顾茫茫，伤心绝望，情绪崩溃，一步步走向狼窝。遥望北方，猛然想到珠眉临别时“千万不要自杀”的呼喊，血泪交流，幡然醒悟。又一步步挪了回来。

年末，县革委会命令迅速去县里交代，程限严苛，为赶时间，从覆盖积雪的高山上跑下，摔倒，腰椎粉碎性骨折。因劳改犯的身份，医院不给救治，忍受剧痛，与子侄等三人挤卧在一张硬板床上，等待骨折处自行愈合。

1972年

卧床不能起半年。夏，身体逐渐恢复，但腰椎少了一节，除不能提重物外，腰背不能完全挺直，脚软，易摔，此后一直如脚踩棉花，行走不稳。

秋，被派到交城中学，教历史、语文、数学等课。课余开始研读《敦煌资料》，考释斯〇六一三背文书。

《陈门问学丛稿·后记》：从1958年春到1978年冬的20余年中，在控制使用等等的名义下，我被迫从事于对国对民对自己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在2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的

生命被践踏毁坏浪费，只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即整理了斯〇六一三背文书。十年浩劫中，我的书被抄家没收，被人们撕成碎片作卷烟丝纸，被当作烧煤炉的燃料，最后归还给我的是一堆乱纸。从中我拣出几本较完整者，历史所编辑的《敦煌资料》是其中之一。我用了数不尽的日日夜夜整理了这本书所刊载的斯〇六一三背文书（《敦煌资料》标题为“邓延天富等户残卷”），即现在标题为“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

《王永兴学述》：在该书（《敦煌资料》第一辑）户籍部分，载有《邓延天富等户残卷（斯〇六一三）》。此卷之前标明为唐户籍。此一残卷颇长，据编者标明“后缺”、“前缺”的断片来计算，残存者包括十六个断片二百数十行。很显然，这残卷原本是一件篇幅很长的文书，被割裂为几十个断片，现存的十六个断片只为其残存而已，这十六个断片并非按照原卷顺序被人粘连为一件，阅读之艰难可知也。

我几次翻阅这本《敦煌资料》，真如在灾难深重之中与老友重逢。回忆往事，百感交集。我犹如在梦中，我还能有读书研究的权利吗？我还能有研究唐史和敦煌学的前途吗？我想念恩师陈寅恪先生、郑毅生先生，想到他们对我的教诲，我感到无限愧疚，同时，我想到我对华夏民族的责任，我拭去满脸热泪，再读这一支离破碎的敦煌残卷。

对于这一残文书的研究，要从恢复文书的原貌开始，最少也要恢复十六个断片的原本顺序。从残文书的内容考察，其中有均田制和租调制，可推知此文书的时间性为自魏孝文帝至唐代前期，即实行均田制与租调制时期。文书内容复杂，仅据此点，不可能恢复文书原貌，更不可能研究文书的性质特点以及确切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对于北朝史和唐史，我比较熟悉。但从被遣送被管制后，十数年无权读业务书，仅据记忆，不可能进行研究。感谢老友师道刚，借给我《魏书》、《北史》、《北齐书》、《周书》、《隋书》、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一大堆书，我用了一年时间夜以继日读书写笔记，又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读懂文书，恢复十六个断片的原本顺序，以文书与史籍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问题。

1973年

被派到山西省教课书编辑组协助工作。

1974

年初，回到山西教育学院（已易名为省教干校）。请假去北京查阅日文资料。

《王永兴学述》：我用两年多时间整理研究这件残文书，基本上恢复原貌，初步解决了文书内容中的问题，撰写成文。朋友告知，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数年前曾整理研究这件残文书，有文章在日本《东洋学报》发表。为了阅读这篇文章，我请假五天去北京。以我的被管制的身份，不可能进入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任何图书馆的大门。我托人企图从历史研究所借出这份日文杂志或请他代我看看山本达郎氏的论文，它的内容如何？与我的论文是否相同？结果是碰钉子并感到受了侮辱。我废然而返，因请假期已过。

《我与中华书局》：七十年代初，我私自撰写一篇关于敦煌文书的论文（当时我没有读书研究写作的自由）……我要查阅几种史籍和两种日文史学杂志，借故请假五天到北京来。下火车后，我认为可以不被拒之门外的去处，只有中华书局，于是到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见到我来，为之欣喜和惊讶。我说明请假来北京谋求阅读几种书的意图，守俨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后来守俨先生告诉我这位先生是驻中华书局的军代表）商量后，慨然允许我到中华书局图书室阅读，接着他问我，在北京暂居何处。此事，我在火车上已有考虑，我在北京大学还有几位朋友，似乎可以去住，但我不能以我被遣送被改造思想者的身份，使他们受牵连，遭遇灾祸，于是决定不去，在北京的五天，我要到火车站旅客候车室过夜。守俨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听到我的这一决定，认为不妥。他们商量片刻后，守俨先生说：“到我们的招待所住几夜吧。”他说，中华书局的招待所在前门外珠市口，极其简陋，有房屋数间，有两位从中华书局退休后的老人看守，招待客人，客人的生活均得自理，房费很少。我被遣送到太原，带着儿女四人，每月工资只三十元。守俨先生知道我的贫苦，他们二人商量后，决定对我不收房费，我喜出望外，感谢不尽。

从中华书局出来，我紧接着就去招待所，两位老人说，守俨先生已有电话通知。他们领我到给我住的房间，确实简单：一木床、一被、一褥、一小桌、一小凳、一洗脸盆、一暖水瓶而已，不供饭，开水自己到水房去打。我感激之余，热泪盈眶，我知道雪中送炭在人的感情上的深刻含义了。北京茫茫之大，我的熟人也不少，使我在这五日五夜有安身之处、容足之居者，只有中华书局和赵守俨先生了。

次日，我去北京大学，不必说走进图书馆，进校门就向我要证明，我没有身份证明，难道我能说出我是被遣送去改造控制使用的身份吗！我又去北京图书馆，同样被拒之门外。这一天白白浪费了。

第三天，我又去中华书局，向守俨先生说明情况，他为之叹息。此后两天，我就在中华书局图书室阅读，图书室的朋友们为我找书、送书，态度极为友好。我感到人世间还有温暖。

第五天，我的假期已满，我不愿但又不敢不回太原去。我以伤痛的心情，告别招待所的两位老人，他们还说，对我招待不周。我满心感激，却说不出话来，洒下热泪。接着，又到中华书局辞行，守俨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都安慰我，盼我在山西平安并早日能回到北京，我也同样感激，衷心道谢而别。我要回到在太原的四个孩子身边，回到那一间土屋、一铺土炕，和我的儿女们共度苦难的生活。我知道我和儿女们更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但中华书局和守俨先生给我的温暖，鼓舞我终于完成那篇私自撰写关于敦煌学的论文。

3月，搬入山西教育学院，利用有限的资料，恢复了读书研究生活。

《王永兴书信残稿》（1974年）：我在这里没有教学任务，时间很多，可以自己读书了。

《回忆录》：我回到太原，教育学院已停办，只有几个看房子的人。我的书（包扩《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等），造反派给我戴上封、资、修帽子之时，被他们全部焚毁。我无书可读可用，感谢老友师道刚先生，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为我借出我需要的书。我

读书撰文，写出几篇论文和一本资料书。

5月，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马恩书信集》、《自然辩证法》等，并做笔记。

秋，连续撰写《释充夫式》、《中晚唐的赋税》等考证文章。虽条件依然艰苦，身上伤痕累累，但重获自由，能读书，心情振奋。

《王永兴书信残稿》（1974年9月11日）：下午2点10分，我在交城汽车站坐上学校的车子。汽车开的发疯似的快。我站在车上，迎着天际吹来的疾风。我想，我的一生不应该在这样的疾风中飞也似的前进吗？疾风使我发热的身体感到凉爽，但浑身的骨头却像针刺般的疼，特别是腰和腿。我忽然想到今天早晨我跌倒在门前台阶下的事。起的太早（四点）……

冬，完成了《八世纪前期（712-756年）唐代的经济和政治》、《试比较唐太宗高宗时期与唐德宗宪宗时期的生产关系》二文。

1975年

年初，搜集资料，开始编写《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夏，购置日语读本，开始自学日语。

9月，在教育学院图书馆发现一部未开封的《册府元龟》，如获至珍，立刻借去研读，开始校注《册府元龟·邦计部》，写《册府元龟邦计部校注札记》。

月中，读《文物》等，注重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等资料。

初秋写《敦煌资料考辨校注》。先写斯〇六一三，探讨文书时间性、文书内容与结构、难解释的名词之后，分析受田地段与水利的关系，户等标准，徭役制度、唐代租税制和徭役制的渊源、均田制的实质等问题。对《敦煌资料》记载的户籍残卷也逐一进行了分析。之后，重点研究斯〇五四二“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以探讨寺院经济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历史。

10月2日，写《关于徭役的一些问题》一文，探讨开始服役的年龄、终止服役年龄、服役年数、一年服役的天数、从魏晋到唐玄宗开元期间徭役的种类及其性质、徭役的演变等问题。

7日，读《资本论》，同时读《全唐文》。

10日，整理研究斯〇五四二文书要借而在山西无从借阅的书目。

《待借书目》（1974年10月10日）：贞松堂集古遗文、贞松老人遗稿、徐松：西域水道记、那波利贞：支那佛教史学、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31, 1961）、F. W. Thomas & Giles, A Tibeto-Chinese Word and Phrase Book、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东亚经济论丛、罗振玉：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

冬，完成《敦煌资料考释一例——简试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将之寄给王

仲荦，请其帮助据显微胶片和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文章核对文书录文。

12月，由《文物》杂志编辑姚涌彬的帮助，终于读到山本达郎文章，据之再做修改。

是月，完成《论唐代敦煌差科簿中的户等问题》一文。

是年，完成了近10万字的《册府元龟邦计部校注举例》，校注内容包括先条列相关史料，之后从史实、文字、意义三个方面研究《册府》每条史料和与它直接有关的史料，实际上是对《册府》经济资料的系统整理。

1976年

年初，完成了《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2月，将《敦煌资料考释一例——简试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寄至《文物》杂志。

《附记》：本文承文物编辑部和王仲荦同志、唐耕耦同志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初稿完成后，友人告知，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西村元佑曾有文考释同一敦煌文书。后经文物编辑部帮助，我看到了两位日本学者的文章，愿说明三点：（一）本文有些意见与两位日本学者意见重复，他们在我之前。但为了便于国内研究者使用这一文书，重复之处，都保留不删。（二）凡采用日本学者的意见，都在文中或注中说明，在此表示感谢。（三）文中也有一些与日本学者不同的意见。

是月，开始校注《册府元龟·帝王部》，写校注笔记7本。

3月10日，王仲荦来信谈《论唐代敦煌差科簿中的户等问题》一文的意见。

《王仲荦来信》：关于定户，可能是以授田的多寡和资产的多少来决定的。在战乱的年代，上柱国告身不博一醉，看到唐代的差科簿，以及户籍，也有同感。尊文这样说，不致有太大问题。

4月，根据中华书局编辑意见，对《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进行修订。

《王永兴书信残稿》（1976年5月）：编辑同志：寄上《隋末农民起义资料汇编》修订稿，请指正。修订稿体例与原稿有所不同，不知得当否？每一部分的增补增条的内容，相见各注部分资料的首页。此间校内图书资料缺少，校外图书，借阅困难，拖延了一个多月，请原谅……《类说》、《文馆词林》、《金石补正》诸书，我曾多方求借，未能借到，职能请编辑部同志代为察阅，如有可用资料，请代为增补，先此致谢。

7月，为给隋唐五代史和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提供便于使用的资料，着手编撰《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全书拟包括七个部分：阶级和阶级关系、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财政。

《王永兴书信残稿》（1976年5月）前几天，把给中华书局的书稿《隋末农民起义资料汇编》修订完毕。1976年前半，我写了一篇学术性的长文，编写了将近二十万字资料性书稿。做了这两件事，总算没有虚度年华。1976年的后半，计划再写一篇研究敦煌文书的

长文，现在已开始，困难重重，但我要坚持写下去。我还已开始了我蓄志已久的《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这是一份量很大的书稿，计划用三年做完，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我的治学经历》：由于寅恪先生的教诲，我知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拟全面搜集并校注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同时作出计划，其间得到老友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的支持与鼓励，允诺书稿可在中华书局出版。我的藏书已为劫火烧尽，只能在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借阅，两处藏书均不丰，不得已几次来北京。请假时间有限，能借阅之处不多，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于强加给我的身份，只能望门兴叹。只有中华书局图书室和中国书店两处的藏书，我可尽量使用，这要感谢赵守俨、郭纪森两位老友。由于上述种种，四年时间所搜集的材料很不够，敦煌吐鲁番文书更少，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月底，收到《文物》编辑来信，认为《敦煌资料考释一例》一文缺乏政治理论，要从文书的阶级性质作一些分析。

《王永兴学述》：最后，我寄往《文物》杂志，希望发表。几个月后，文稿退回，说我的论文缺乏政治理论，不能发表。

是年，为阅读敦煌吐鲁番文书，编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俗体字》。

1977年

年初，根据《文物》编辑部意见，重做修改，易题为《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看均田制》，再次投寄。

11月，任继愈帮助联系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是年，主要精力用于编辑《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汇编》，同时整理编辑《敦煌吐鲁番文书杂抄》。在整理经济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隋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一文。

《我与中华书局》：关于唐史研究，我编纂的第一本书《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是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有力的支持。

在十年浩劫的末期，对我管制放松了，我从劳动改造的小山村回到太原，开始搜集有关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史料，为编纂这本书做准备。这也是实现七十年代初挚友赵守俨先生向我提出的建议和对我在史学研究上做出成就的期待。回忆该时中华书局和守俨先生对我的忠告，他们的高尚情谊支持我在艰难的读书研究环境中努力拼搏。我自己的藏书已一无所有，托友人，特别是任教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师道刚先生，从山西大学图书馆和山西省图书馆为我借出有关的书和学术杂志。我不分昼夜读书，抄写汇集史料。回忆我从恩师陈寅恪先生听受讲课时，先生提出的唐代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和唐代财政制度西北地方化两个重大问题，我曾搜集史料；此外，我在过去读书中曾注意唐代土地制度，并写出有关的史料笔记。这些笔记本虽已被焚毁，但对大量史料的分类以及其中的重要问题，我还能约略记忆。这使我能在大量史料中，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分门别类。史料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分析解决，才能便于读者使用，因此我要进行认真的校勘考证，即使是原始性很强的史料，也必须如此。例如，《册

府元龟·邦计部》的有关部分，是研究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但讹误、脱漏很多，不加以校勘考证，就难于使用。感谢恩师陈寅恪先生，由于他的教导，和他使用史料时的精确考证，楷模在前，我必须用极大的精力对已搜集的史料校勘考证。

1978年

1月4日，读《敦煌资料》，考证斯四六八二文书，确认其为吐鲁番户籍。

是月，邓广铭帮助联系调往北京大学历史系。程应镠邀请加盟上海师院历史系。

《怀念应镠》：一九七八年，我恢复了通信自由，我想应镠也是如此。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还活着，依然健康，还想读书，只是我的藏书在浩劫中被没收，全以“封资修”的罪名被焚毁了。应镠回信，问我是否愿意离开太原到上海去，上海师院历史系需要教师。当时，我正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商量调动事，应镠也认为我还是应该去北大。

2月27日，再次被《文物》退稿。

《文物编辑部来信》：关于户籍帐一稿，已经拖了很久了……我们曾建议您从文书的阶级性质作一些分析，但改过以后，又似乎有不协调的感觉。最近我们请中山大学姜伯勤（现在在我社文书小组）看了一遍。姜同志也是搞南北朝隋唐一段的，平时和我谈起，对您深致钦佩，而且他懂得日文，对山本的文章也做过研究。他建议您还是把这篇文章改成纯考释性的文章，有些见解还可以展开深入，这样就可以和山本并峙争长，显出我国学术界的水平。对他的意见，我们是同意的。

《王永兴学述》：我遵守恩师陈寅恪先生的教诲，读书为己，整理此件残文书使我获得研究敦煌文书的一些方法和经验，我的学识有所提高。文章发表与否，甚无谓也。

5月，写《读唐律札记》。

夏，同时接到北大和宗教所调令。

10月，由于山西不批准回京，调动困难，往来京晋，颇费周折。郑天挺先生积极帮助协调。

《阎文儒、殷法鲁致郑天挺信》（1978年10月22日）：毅生先生：手书两函，先后奉悉。先生对永兴同志调工作事，关怀备至。俟王公回京致函山西有关负责同志，看是否能批准回京。届时如有需要，再函请先生协助。

是月，完成了《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初稿。

《我与中华书局》：在三年时间里，我初步完成了草稿。

11月11日，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在北大29楼205号。

《八十述怀》：1978年冬，我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借用这句话赋予它我的意义。几十年离开我的正业，确是浪子，虽然是不得已的。我没有什么高贵，不是耀眼的黄金，我是寻常百姓；但实现几十年前在长沙圣经学院小教堂中的决定，这一际遇却是金不换的。

12日，周一良来访，赠《秦妇吟校笺》。

《悼念周一良先生》：1978年，北京大学调劫后余生的我到历史系任教，我住在当时的29楼。报道后的次日，早饭后，一良先生到29楼来看我，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之事。一良先生坐下来，流下了眼泪，接着就失声长恸，我也潸然泪下……久之，一良先生平静下来，问我到北大后生活工作的种种安排，并问起我的藏书，得知全被焚毁后，他把自己珍藏的寅恪先生赠送的《秦妇吟校笺》送给了我。几乎将近中午，一良先生才离开，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①

14日，去中华书局看望赵守俨，买回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一部。

《我与“中华”情谊永存》：1978年冬季，我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有关唐史和敦煌学两方面的课程。我一喜一惧。喜者，从1958年后二十年中，我被迫放下读书研究，但我终于又回到教学岗位，我可以讲授恩师陈寅恪先生关于唐史的各方面的卓识和论点，也可以讲授寅恪先生关于敦煌学对于唐史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总之，我在讲课中，可以尽我所能，弘扬义宁之学。惧者，过去二十年中，我基本上未读业务书；从寅恪先生受业听课的笔记，或被焚毁，或由于其它原因丢失。我如何备课和讲课呢？但我又想到，多年前，我侍读寅恪先生身边之时，先生备课的精神和具体方法我是了解的。先生备课要阅读多种书，但首先要阅读《资治通鉴》，无论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或唐史都是如此。因此，我现在备课首先要阅读《资治通鉴》，我要把《通鉴》真正阅读明白。也许有人说，读懂《通鉴》并非难事，其实不然。回忆寅恪先生备课时，要我诵读先生指定的卷、篇，每次都嘱咐我要读得慢，要读得清楚，不可脱略。我读两遍后，先生总是闭目思考片刻，完全正确理解《通鉴》的内容，然后再要我诵读其它史籍。所以先生备课要用很长时间。现在我要在两个月后讲课，必须遵守先生的精神和方法，时间过于紧迫了。我只能加倍读书，增加准备的时间。第一件事是，我手边必须有一部《通鉴》，可是我自己的《通鉴》已被烧毁了。因此我到北大的第三天就去中华书局，为了购买《通鉴》，也是为了看望守俨先生和几位朋友。到中华书局后，他们为我又回到北京，在北大任教，感到格外欣喜。我带着老朋友的关心与鼓励，也带着从中华书局购买的暂新的校点本《资治通鉴》二十册，兴奋地乘公共汽车回到北大，开始了我在北大的教书生涯。^②

之后，重返阔别数十年清华园，已物是人非。拜访在病中的齐思和先生。时与清华、北大师友邓广铭、陈庆华、阎文儒、阴法鲁、任继愈、季镇淮、李希泌、李赋宁等畅谈学术。

《回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三事》：一九七八年末，在我离开北京二十年后，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到北大，我就急于要去看看离开二十几年的清华园。从一九三四年以后断断续续的十多年中，清华是我眠食之地。有许多人和物我要看看。

《王永兴、阎文儒致郑天挺信》（1979年2月6日）：永兴儿辈仍在山西工作，只身来京，幸熟友颇多，在邓公领导下，亦颇顺适如意。而阴（法鲁）、阎（文儒）又多一老友，亦晚

^① 《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② 《书品》2000年第1期，第10-11页。

年之乐事也。

《怀念季公》：1978年，我调来北大历史系，几次到中关村去看他。当时，他很忙，讲课，读书研究，还有社会活动；他身体精神都好。他建议，我们去看望李希泌先生（西南联大同学），3人组成读书会，读《史记》、《通鉴》，每两周集会一次，互谈心得体会。第一次由季公讲《史记》，我深受教益。可惜，这样的集会只有两次。

月中，从图书馆借来《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唐六典》等唐代史籍，并到图书馆阅览室检读大部头的《册府元龟》、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继续从事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汇编校注的编写。时第一编已完稿，利用自由出入图书馆之机，进行了较大修改，补充了新看到的有关隋唐五代经济史的专书和论文，并在每章每节之前增加了简要说明。

《我与中华书局》：1978年冬我调到北大，我可以进图书馆了，可以看到更多有关隋唐五代经济史的专书和论文，尽量补充改写我这本书的草稿。但我在历史系开两门课的备课与讲授以及对学生的课外辅导，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虽然加以补充和改写，还是不能如我的计划完成；特别是敦煌文书，我没有时间阅读和使用，使我感到莫大的遗憾，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缺点。

与师友晤谈，得知陈寅恪先生“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悲惨遭遇，心情悲愤。决定编辑陈寅恪先生文集，并写陈寅恪先生传，以纪念恩师。月底，开始搜集寅恪先生资料，并给先生师友、亲属写信。

12月5日，户口迁至北京。

年底，去天津看望郑天挺先生。

是年，仍坚持学日语，为研究土地制度，翻译了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的实施状态——以给田文书、退田文书为中心》、周藤吉之《吐鲁番出土佃人文书研究》、西村元佑《唐代吐鲁番地区均田制的真相——主要通过欠田文书来考虑》等文。

编年文《关于黄巢之乱的一些史料考辨》，编年文《八世纪前期（712-756年）唐代的经济和政治》。

1979年

2月初，得陈美延来信，知寅恪先生已将书稿委托蒋天枢整理出版，略感欣慰。为撰写陈寅恪先生传，更广泛搜集资料，查阅中外学者的回忆、悼念文章，多方复印或抄录寅恪先生的论文、手迹，去清华档案馆查寅恪先生开课资料，给寅恪先生的亲友、学生写信，着手编辑寅恪先生年谱及论著编年。

3月，访问在京的寅恪先生亲友及弟子。11日，访问陈庆华。12日，拜访孙毓棠；收到陈小彭、陈美延的来信。17日，开始撰写寅恪先生传略。18日，收到胡守为的来信。月中完成寅恪先生传略初稿，抄请周一良、阎文儒、张寄谦、刘桂生、钱逊等提意见。之后，继续补充修改。28日，拜访俞大绂；收到金应熙的来信。

4月，11日，拜访冯友兰。14日，拜访陈岱孙；收到陈小从的来信。15日，拜访王力。月中，完成修改稿，再请周一良指正。

5月，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出版，图书馆借阅不便。宿白得池田赠书，立刻送来供研读。直到年后收到池田赠书，始还之。以后教学研究中得到宿白帮助，率多类此。

9月，给76、77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隋唐史专题课，每周2学时，学生人数：60人。

《回忆录》：我是陈寅恪先生的受业弟子，唐史是寅恪先生在历史系多年讲授两门课之一，我亦多年听受。敦煌学，这一科学专门名称是寅恪先生创建的，我曾多年多次向先生请教，写过几篇有关敦煌文书论文；但在十年浩劫中，我的藏书全被焚毁。对历史系为我安排的两门课，我必须认真准备，遵照寅恪先生讲课备课的精神，全力备课。我遵照寅恪先生教导我的读书、分析史料、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精神，认真备课。人以十之，我以百之，我要用一般教师备课所用十倍的精力，夜以继日备课。寅恪先生多次讲授唐史，我的听课笔记在十年浩劫中已被焚毁；我尽量回忆先生讲课的内容，同时阅读《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通典》诸书，写出讲课初稿。我再次阅读上述诸书，并去图书馆检阅《册府元龟》有关部分，改写讲课稿。讲课一段时间，我发现听讲学生在读书学习中一些问题，如读《资治通鉴》，只读正文，考异、胡注等均不读；有些学生读正文亦不理解，即有议论。我忆及我侍读寅恪先生之侧之时，先生教诲我应知“宋贤史学，千古罕匹”，而司马温公乃其第一人也；司马温公所强调的“求真实，供鉴诫”之史学理论与精神，我们必须遵从而见于实际言行。不少学生在读书学习中的上述问题如何解决，我要求学生读《资治通鉴》并写笔记。我把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读《通鉴》同一卷或同一段，自写自己的理解和意见，定期完成并交我审查评定。每星期六晚七时至十时，我到学生宿舍去检视每一小组读书情况并指导。这一方法成效很好。

招收研究生：邓文宽、刘俊文、赵和平。

10月，始在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

顾土《口舌之辩》：王永兴先生，北京大学的教授，曾与陈庆华、汪篔同为陈寅恪的助手，也是陈门弟子。我听他讲过一年左右的隋唐赋税。说是赋税，实际王先生在教我们吾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考据之学。这门学问被乾嘉朴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现代用得至臻至妙者当推陈寅恪先生。王先生承传乃师之风，先在黑板上录下史料，继则逐字逐句考证讲解，左右开弓，旁征博引，务求其详其实。王先生开课之始，很多人闻名而来，听课者近40人，未及半载，人走过半，至末尾仅余7人。

见到王永兴先生讲课时的举手投足，我联想起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也曾经在羊城康乐园住宅的宽敞走道间向中山大学的学子授“元白诗证史”，初始呼啦啦倒也来了30余口子，一年下来，也走了大半。然而，无论陈先生抑或王先生，对学生人数从未在意，他们只求质

量，惟图有人能真正领略学问的价值，哪怕剩一人得薪传也行。^①

是年将《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定稿交给中华书局。

1980年

2月，继续在北大开设隋唐史专题课，同时仍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

5月，在完成《唐田令研究》之后，继续撰写《唐户令研究》，包括《户令》校补、释“比”、户等与土地的关系、户税研究四部分。

17日，接刘适（石泉）来信，对《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提出三点补充意见。建立“有关寅恪先生的资料”的档案袋，悉心搜集，不断补充，为写更详细的《陈寅恪先生传》做准备。

7月，与刘淑珍办理离婚手续。

《致郑天挺先生信》（1980年10月19日）：生的家庭问题已经解决。三个月前办完离婚手续，解除了拖延二十多年的痛苦。生的子女六人，都已独立生活。长女在大庆石油学院，其他五人仍在山西。

8月，《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9月，给78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文书研究课，每周2学时；隋唐五代史专题，每周2学时。

《回忆录》：关于敦煌文书研究这门课，对于大学三年四年级学生可能难一些，我思虑再三，如指导辅助适当得法，学生亦能努力用功学好这门课。我首先指导学生阅读陈寅恪先生著《陈垣敦煌劫馀录序》，其首段“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文之末段“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我在教室和学生同读，读后，我稍加解释并勉励学生“作敦煌学之预流。”我使用的另一方法为：我选用短篇敦煌文书多件，发给每一学生一篇，要求学生在图书馆阅览室在阅读机下录出该篇敦煌文书，并交给我。我检阅每一篇，改正错误。这是我在星期日的工作之一。在下次讲课时，我一一指出学生录文中的错误和致误的原因；最后，我指定一个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讲解这篇敦煌文书内容，我又作了这篇文书的时间性的补充。实际情况说明，这一方法对学生学好这门课是必要的。

《悼念周一良先生》：我讲敦煌吐鲁番文书课的方法比较特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步是学生到图书馆在阅读机下自己做录文，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和图书管理员要在旁进行辅导。选这门课的学生约有30人。学生录文完毕后，我要检查是否有遗漏、是否有错误。然后，要求学生在这件文书进行分析，同时参考有关的唐史文献等等，写出意见，当时称之

^① 《文汇报》1996年10月2日。

为读书报告。我必须一一检查这 30 份报告，而检查的过程中，我要用有关唐代别体字、俗体字的书籍和有关唐史典章制度的书籍，根据检查结果及发现的问题，进行一、二周的讲课。最后，要求学生再写读书报告，这就是他们这一个学期的成绩。由于上述课程的讲课方法，就需要大量的参考书、参考资料，因此就需要有一间专门的为我讲课辅导学生的房间。^①

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为人大复校后首届本科生开唐史专题课，主要讲唐赋役研究和唐土贡研究，每星期三下午 3 节，自 9 月 3 日开始上课。

《1980 年度第一学期工作计划》：一、备课，写出五个经济史专题讲稿：1.《唐令拾遗·赋役令》的补遗和商榷；2.唐代租庸调的品种和折造问题；3.唐代土贡资料考释；4.唐代的估法；5.唐代财政勾检制度。二、写成寅师传（九月份）。三、写成差科簿研究（十二月以前）。四、写成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研究（一月以前）。五、研究唐代寺院经济，辅导邓小南写出车牛役簿研究。六、研究水部式，辅导蔡治淮写出水部式研究。七、研究驿传制，辅导卢向前写出驿传制研究。八、辅导 78 级敦煌文书研究。九、校勘《通典》三十卷，覆校研究生校勘《通典》三十六卷（二月中以前完成）。

10 月 19 日，给郑天挺先生写信汇报开课与指导研究生情况，称：“生由于多年学业荒废，讲课中困难颇多，只能勤勉读书，努力工作。”

是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二编“土地制度”初稿完成，分均田制、官田、官僚地主土地及寺院土地、唐政府维护均田制的措施、土地上的租佃制等五章。

从 29 楼迁至未名湖畔的健斋 211 室，所居为狭窄、拥挤的筒子楼，房间离公用自来水水房甚远，手抖取水不便，屡得东语系赵玉兰帮助。

开始筹建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并承担点校《通典·食货典》卷一至十二，《通典·职官典》卷十至二十二的工作。

编年文《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怀念陈寅恪先生》。

1981 年

2 月，给 78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隋唐史，每周 2 学时；敦煌文书研究，每周 2 学时。

《历史系 78 级 1980-1981 学年第 2 学期选修课名单》：隋唐史课：蔡治淮、邓小南、马小红、王昭明、王燕萍、任君才、冷鹏飞、金锋、荣新江、赵元如、牛大勇、王小甫、张建国、薛有红、刘恒、李宝柱、赵国华、卢向前、王亚勇、彭永城、陈苏镇、李明德、黄伟虎、朱荫贵、李孝聪、薄小莹、阎步克、陆威仪（留学生）。敦煌文书研究课：蔡治淮、邓小南、马小红、王昭明、冷鹏飞、金锋、荣新江、牛大勇、张建国、薛有红、李宝柱、赵国华、卢向前、王亚勇、朱荫贵、李明德、黄伟虎、薄小莹。

《课外辅导时间安排》：星期三上午：黄伟虎，卢向前，王亚勇，薛有红；星期三下午：

^① 《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第 11 页。

李明德，荣新江，蔡治淮，薄小莹；星期五下午：马小红，邓小南；星期一下午：朱荫贵，阎步克，陈苏镇，冷鹏飞。

继续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78 级本科生开唐史专题课，仍每星期三下午讲授，自 2 月 18 日始。

在周一良的帮助下，在图书馆申请到一间专门的为讲课辅导学生的房间——219，后迁至 213，作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

《悼念周一良先生》：我几次向图书馆申请，但都得不到允许。据馆领导告诉我，中国教授一个人不能要房，必须两个人才有可能。于是我找到周一良先生，向他说明我要请他和我两个人要一间研究室，一良先生慨然应允，而且向我说明，这一间房完全由我使用支配，因为一良先生也明了我这样讲课需要大量图书资料，需要在现场辅导学生，没这间房是不行的。我在 213 工作了七、八年，我辅导学生，给学生改作业，都在 213 中，如果没有这间屋子，我的工作就无法进行，我非常感谢周一良先生对我的慨然帮助。我能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教学中顺利进行并完成任务，学生们能够最终写出高质量的读书报告并以论文形式发表，都是和一良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的。

初夏，与阔别 38 年的程应镠在历尽劫难之后相聚。

《怀念应镠》：一九八一年，我们离别三十八年后又在北京相聚。记得一个初夏的晚上，在工人体育馆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上，我在车上远远看见应镠，我走下汽车，我们含着热泪相抱。周围的人都惊讶了，我们也都笑了。这次我们谈的很多，但回忆往事不多，更多的是未来。应镠依然豪迈潇洒，他正在主持上海师院历史系。他畅谈他治理历史系的计划，发展远景；也谈了自己的读书研究和写作。

开始唐代官制系列研究，搜集资料，撰写《论勾官——唐官制研究之一》，《关于唐代阙官制的一些意见——唐官制研究之二》，《论散官——唐官制研究之三》。

6 月，应杨志玖邀请，去南开大学主持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答辩。

是年，多次去中南海找“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及教育部长蒋南翔，为申请设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而奔走。姚依林副总理认真听了他的设想后，来到北大健斋，为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启动批了编制和经费。

姚依林的信：

南翔同志：

王永兴同志来看我，带来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组织方案及工作计划，这是邓广铭、宿白、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等同志共同商定的。他们来找我的目的，除了寻求支持以外，主要是要求兴建办公和研究的房子一千五百平方米，此外希望有五万元开办费和有日常的经费。此外尚需外汇两万五千美元，购置复印机和外文图书杂志。

但是要请北京大学办一下正式手续，通过教育部向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正式写一封信才行。因此，我请王永兴同志去看你一下，向你请示。

姚 依 林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

7月24日至8月15日，与宿白一起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讲学，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在兰州召开国内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的方案。

《学术简讯》：1981年7月，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王永兴、宿白两位教授来所讲学，从7月24日开始，到8月15日结束，历时二十三天。

王先生作了《敦煌文书研究》的专题报告，共讲了五次。王先生以“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这件文书为例，对如何整理和研究敦煌文书作了详细具体的阐述，王先生指出研究文书首先从识字、读懂文书开始，在此基础上确定文书的时间性、地域性，然后对文书进行逐条分析、研究、归纳，最后得出结论，并以此去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王先生强调说，研究敦煌文书，没有一定的公式可循，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通过王、宿两位敦煌学专家来所讲学，对我所的研究工作和青年一代的培养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①

8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编辑完毕。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抄稿记录”(一)：

蔡小海	抄	张广达、荣新江
刘勋宁	抄	邓小南
降某	抄	卢向前
马七哥	抄	云气
老先生	抄	薄小莹
张万苍	抄	王永兴
马世长		郑必俊?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抄稿记录”(二)：

马七哥——马世长

老先生——薄小莹、郑必俊、蔡治淮。和平、文宽(未拿)

曹全林——刘俊文(3万)、王重民(交)、周先生(交)、左先生(交)、序言(交)、目录、卢向前(交)、李明德(未拿)。权奎山(交)。

9月，给77、78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社会经济资料研究，每周4学时；隋唐史，每周2学时。

4日，蒋南翔批示，同意建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路宾同志、龙翔同志：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组织方案及工作规划(新拟草案)，应该支持。所需少量

^① 《敦煌研究》1981年1期，第97页。

基建经费及外汇等，计委也允予考虑。请北大正式向教育部办一申报手续，以便转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审核。

蒋南翔

1981.9.4

10月，邀请在法国整理敦煌文书数十年的左景权来北大讲授他多年研究整理敦煌文书的心得和方法。

校录、考释伯三五六〇背“唐沙州敦煌县灌溉用水章程”文书，撰写《敦煌水利灌溉系统初步推测》。

11月5日至12月9日，多次去沙滩红楼抄录了新出土吐鲁番文书。

是年，又开始筹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下属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在图书馆里借用219和213两个房间，用于购置图书、筹集资料，复印许多日本学者的著作，传统字书及英文专著也在收罗之列，还到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复制敦煌文书的胶卷，翻拍照片。

编年文《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的几个问题》，《试论唐前期布的货币职能》，《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记帐户籍残卷》，《陈寅恪》。

1982年

1月1日，为刘俊文点校本《唐律疏议》作序。

是月，研读新抄录吐鲁番文书，以为讲课及学生实习之用。

2月，给78至80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每周4学时；隋唐史，每周2学时。“敦煌吐鲁番文书”课讲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以“唐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唐景龙三年一一四年西州高昌县退田、授田、欠田牒判”示例。

招收研究生：吴丽娱，王宏治。

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为本科生高年级合开“隋唐史”课程。

2-3月，多次在健斋211室居所，辅导本年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的校内外学生，包括邓小南、荣新江、薄小莹、卢向前等北京大学历史系78级的数十个学生及北京师范学院的李志英等外校学生。

5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我与“中华”情谊永存》：关于敦煌学研究，我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是对我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大力支持。这本论集，原定二人主持编辑工作，但由于意料不到之事，实际上只能由我一人主持。

这本论集编辑完成后，出版很困难，主要困难还不是出版费的筹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多有唐时的俗体字、异体字，印刷时不能排版，必须另做木刻字或铅刻字；不同类的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书写格式不同，而书写格式不同表明文书的不同性质，这也是印刷排版时

的困难。其次，论文集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原文书的影印，这也增加了印刷装订的困难。因此，为了这本文集的出版，我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出版社，都被拒绝。中华书局最初也提出出版的困难，主要是印刷厂不愿意接受。我坐在中华书局李侃先生、守俨先生的办公室里请求支援。他们看到我为了这本文集的出版已经筋疲力尽，不约而同地说：“你不要再跑了，出版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我为这本论集的出版而多处奔走，最终中华书局同意出版，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的支持。说到这里，我认为，不仅我个人要感谢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也应该感谢中华书局。

9月，给79、80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每周4学时；隋唐史，每周2学时。“敦煌吐鲁番文书”课以整理新出吐鲁番文书作为实习。

《1982年秋至1983年春隋唐史讲课稿》：本学期拟讲七个问题：一、唐太宗和魏征；二、唐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包括五个部分：1.唐代前期社会经济资料，2.《户令》、《田令》、《赋役令》校勘，3.关于“户”的一些问题，4.唐代前期的土地制度，5.唐代前期的服役制度）；三、唐代前期的科学文化（1.重要学术著作，2.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音乐、绘画、舞蹈等，3.长安、洛阳各国留学生）；四、安史之乱；五、唐代后期官制；六、唐代后期的政治形势和斗争；七、唐代后期的经济和财政。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实习课讲稿》：整理文书安排：王宏治：唐驿丁残文书、馆驿文书（基本史料：《唐六典》五兵部、驾部，《唐律疏议》一〇职制律、二五诈伪律、二六杂律，《唐会要》六一御史台中，《唐令拾遗·厩牧令》，《白氏六帖事类集》，《旧唐书·职官志·兵部》，《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吴丽娱、张小舟：车坊文书（基本史料：《唐六典》一七太仆寺，《唐律疏议》一五厩库律，《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223、217，《唐令拾遗·厩牧令》，《白氏六帖事类集》，《新唐书》五〇兵志，《新唐书》四八大仆寺）；傅玫：伊吾军营田文书（基本史料：《唐六典》七屯田，《唐律疏议》八卫禁律，《唐会要》七八节度使，《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141、142、170，《唐令拾遗·田令》，《旧唐书·职官志·工部》，《新唐书·百官志·工部》）；吴宗国：贞观考课文书（基本史料：《唐六典》二吏部，《唐会要》八一、八二）；郑必俊：豆卢军牒为吐谷浑归朝文书（基本史料：《唐会要》七八节度使、九四吐谷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133，《资治通鉴》武则天部分，《册府元龟·外臣部有关吐谷浑诸条》，《通典·边防典》，《新唐书》武则天纪、吐谷浑传，《旧唐书》武则天纪、吐谷浑传）。

与张广达合招收研究生：荣新江、卢向前、金锋。后荣新江由张广达指导，卢向前、金锋由王永兴指导。

继续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开“隋唐史”课程。

10月，教育部93号文件正式批准，“同意建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相等于系一级的研究所。”提出：“该中心应团结校内外有关专家，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努力创造历史科学研究方式现代化的经验，使之逐步成为高等学校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基地。”并具

体指出：该中心专用房 1500 平方米，人员编制 50 人，并有专门的研究经费。

是年，继续考释差科簿文书中的“平水”，撰写《关于唐五代时期“平水”一词的一些意见》。还完成了《敦煌文书考释二则》的初稿，该文包括“枝头”、“白刺头”文书考释、释“地水”两部分。

编年文《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七十年来我国敦煌研究文献目录》。

1983 年

2 月，给 80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每周 4 学时；隋唐史，每周 2 学时。

是月，定职为教授。

7 月，主编《归义军本末长编》。

《归义军本末长编》编写计划：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拟编写一部《归义军本末长编》（或《归义军历史资料》），副标题为：敦煌文献研究专题论文集之一。

编写计划初定如下：

主编：王永兴教授（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负责人）

编辑：王宏治、吴丽娱（历史系八一级研究生），荣新江、卢向前、金锋（历史系八二级研究生），李鸿宾、宁欣（历史系八三级研究生），李志生、孙顺华、梁民、刘静（历史系四年级本科生）

归义军是从唐大中五年（公元 815 年）到北宋皇佑年间（公元 1049-1052 年）约二百年间占据敦煌地区的地方政权，唐、五代的文献记载较少。敦煌文书出土后，发现了大量有关归义军时期的社会经济、归朝、军事等各方面的文献材料。此后，中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关于归义军的文献材料处于零散状态，妨碍了对归义军时期的历史状况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将所有有关归义军的资料进行整理、汇编，迅速、详细、全面地编写一部归义军历史资料集，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我室研究决定编写此书。

本书编写的原则和内容：

本书共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将敦煌文书中所有有关归义军的材料分类，可分为若干类。对每份卷子进行录文、校勘、注释方面的工作。第二部分：汇集中外学者研究归义军的专著、论文，并作出目录索引，以利学者使用。

本书编写方式及过程：

本书编写以王永兴先生所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为基础，采取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指导，研究生、学生共同参加，课内外相结合，充分利用研究室和图书馆的资料，尽最大的努力编写出一部详尽、完备的归义军始末长编。

自 1909 年以来至今，敦煌文书中所发现的归义军时期的卷子约 500 号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共三十余篇，对此，我们将进行全面的整理，拟定于 1984 年 7 月写成初稿，1984 年年底最后定稿。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

为筹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上下奔走，通过姚依林等国家领导的帮助，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措了数百万活动经费。

8 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被选为常务理事。提交会议论文《我国敦煌文献（汉文）研究概况》。

暑期，抄写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资料。

《1983 年暑期抄写资料计划》：1. 解放后有关隋唐五代史学术论文（包括文物、碑志等）。2. 解放后有关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学术论文（包括资料、图版等）。卡片内容（隋唐史）：论文标题、著者姓名、发表刊物、年月日、论文字数、论文性质（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科技、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等）。卡片内容（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标题、著者姓名、发表刊物、年月日、论文字数、论文性质（唐代前期、唐代后期、吐蕃统治时期、归义军时期）、论文使用敦煌吐鲁番资料标题及编号。

9 月，给 80、81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 4 学时；唐代政治制度史，每周 2 学时。因编辑《归义军本末长编》，这学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要求学生整理敦煌归义军文书作为实习。

招收研究生：李鸿宾、宁欣。

《1983 年秋至 1984 年春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讲稿》：学生整理文书安排：伯四六四〇“唐昭宗光化二年至天复元年（己未年—辛酉年）归义军衙内颇用布纸历”：卢向前；伯二八三八“唐中和四年（884 年）正月沙州上座比丘尼躰圆等斛斗破除见在牒（附悟真判）”：许福谦；伯三六三三“后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911 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牒”：李德龙；伯三二五七“后晋开运二年（945 年）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勘寻寡妇阿龙还田陈状牒”：牛来颖；伯三五〇一背：王永平；伯三四三八：李志生；伯三三七〇“公廩麦帐”：孙顺华；伯三一五五（后半）：薄小莹；伯二九九二（后半）：苏哲；斯五九七三“开宝七年正月曹元忠疏”：刘静；斯五九七三（2）“开宝七年二月曹元忠疏”、斯五九七三（3）“开宝八年正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疏”、斯五九七三（4）“开宝八年二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疏”：梁民；斯六三四二“张议潮进表”：宁欣；斯六九七三“张议潮别传”：李鸿宾。

10 月，去四川大学成都参加唐史研究会，作了题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现状》的报告。

11 月，迁入朗润园 11 公寓 103 号，开始写《水部式》考释。

12 月，主编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年文《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校释》。

1984年：

2月，给80、81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代政治制度史，每周2学时。

3月，准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时，重新整理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文书，开始撰写《敦煌吐鲁番户籍、计帐、手实、差科簿校释》，先编辑户籍、计帐、手实目录，之后，在广搜资料，逐一校释的基础上，对文书中反映的唐代家庭、家族、婚姻问题，唐代户口管理制度、乡里邻保及伍保制度、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唐后期户口问题，唐后期户籍、计帐、手实、差科簿的变化问题等进行专题研究。

5月，撰写《关于唐代铨选制的一些意见》，逐一考释唐代铨选的九个施行步骤，是为唐官制研究之四——贡举制和铨选制的一部分。

是月，老友师道刚自太原来京，同寓朗润园十日，连床夜话，百感交集。

师道刚《甲子初夏抵京，寓永兴夫子斋十日，语及旧事，感赋》：人海沧桑又几秋，燕园相握解离愁。圆通寺里樱花艳，昆明湖边翠柳柔。黄陵风雨情怀恶，岭底桑麻梦境幽。昨夜青丝今晨雪，与翁同忆少年游。

6月21日至22日，作为常务理事出席了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敦煌吐鲁番学术委员会”中，与唐长孺、周一良一起担任历史组的学术委员。

7月，撰写《隋唐五代时期的宰相》，作为官制系列研究之五。完成《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研究》一书的初稿。

23日至8月初，在徐州师范学院为第一期唐史讲习班学院讲授“敦煌吐鲁番文书”。

《唐史讲习班简报》：王永兴教授讲授《敦煌吐鲁番文书》。他讲述了敦煌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and 我国的研究现状，并重点介绍了整理和研究文书的方法。全部课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介绍文书整理方法。他指出，整理文书的第一步是整理出准确的、符合原意的录文；第二步是对每件录文定年代、定性质、填阙字、校异体字和俗体字；第三步是校释难解字。他以自己整理西魏大统十三年卷子的过程为例，对学员作具体指导，详细说明应如何定年代、定地域，如何校勘、解释文字，等等。后一部分是讲述研究卷子的方法。他通过讲解卷子中记载的“台资”、“上、中、下”等字词和卷子所反映的丁中制、租调徭役制的内容，为学员作了研究卷子的示范。另外，他还指出了整理、研究文书必备的两个基本功，并介绍了十几种可供整理、研究卷子之用的著述。^①

8月4日，整理大谷文书碎片。

^① 《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二期，第12-13页。

月中，研究伯二七六三背、二六五四背、三四四六背“吐蕃巳年、午年沙州仓曹会计牒”文书，将6件文书拼合为5件。

9月，给81、82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代政治史专题，每周2学时。

招收研究生：李志生 孙顺华。

冬，应程应镠之邀，到上海师院讲学十天，为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所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及华东师大等校来旁听生开课，讲“唐代前期行政效率与法制关系”、“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小自耕农经济与唐代前期的富强”、“唐代勾检制”、“怎样进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五个专题。还与程应镠商议准备在上海师院建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室，作为在上海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基地。住在程应镠家，与联大老友王勉及应镠夫人李宗蕻劫后重逢，别时少年，相见白头。

《怀念应镠》：应镠有家庭之乐。我两次去上海师院讲学，是他家里的座上客。饭后谈文论史，说古道今，他们的小楼里充满欢乐的气氛。

编年文《编写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的回忆和感想》。

1985年：

1月23日，汇集门荫与出身、荫与铨选、荫与赠官、荫与徭役及赐田、唐以前门荫制、荫与议、荫与请的资料，准备撰写《唐门荫制研究》。

2月，撰写《开天时期各种制度的变化》，探讨田制、兵制、租税制、徭役制、和雇制、使职、翰林学士、俸料钱从唐前期到唐后期的改变，以说明中国中古史前后期的转折。

16日，开始撰写《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田制文书研究》。

月底，给81、82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代政治史专题，每周2学时。

4月10日，完成《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田制文书研究》（一）至（四），校勘田制文书，并探讨请射、欠地丁与户等、授田手续、退田种类及“死退”、大女等问题。

5月，在完成关于“唐勾检制”系列论文之后，开始撰写《唐勾检制研究》一书。

6月20日，编辑敦煌吐鲁番田制文书分类目录，25日，校勘考证“退田文书”，29日，作“给田文书”校注。

7月3日，校勘考证敦煌吐鲁番“欠田文书”。

8月3日至9日，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任历史组召集人，提交了《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的论文，并在闭幕式上作了大会发言。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宁欣、要瑞芬、孙顺华、李志生、刘静随从参加会议并参观。

夏，研读敦煌、吐鲁番和大谷文书，为学生习作选择可用文书。

9月，给82、83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

代经济史，每周3学时。

《唐代经济史讲课提纲》：一、阶级与阶级关系；二、土地制度：1. 唐代史籍文献记载的土地种类，2. 以土地及财产为基础的阶级关系；三、租庸调、两税法等赋役制度；四、农业生产劳动者：1. 自耕农民，2. 租佃农民，3. 庄客、佃客，4. 雇佣制。

在讲专题的过程中，先概括讲述唐代经济的一般知识，并提出问题。学生读书与教师讲课并重，在教师讲课与学生读书的基础上，在学期中进行讨论。要准确，要严格，要从唐朝实际出发，培养学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方法，要注重基本训练。

研究问题分配：牛来颖：从《唐律疏议》看唐代的阶级分类；殷玉梅：两税法中的折估问题；李培芬：唐代租庸调的渊源；孙学雷：两税法的渊源；王晓荣：唐代租庸调的特点；张连城：唐五代两税法的变化；李锦绣：唐代前期的徭役。

招收研究生：牛来颖。同时为上海师大俞钢、张剑光的指导老师，并指导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访问学者富山大学教师气贺泽保规。

10月24日，到上海师大为俞钢、张剑光及古籍所青年教师魏亦珀连续开课，主要讲授研究隋唐历史需要看的唐史史料、对陈寅恪先生治学的体会及唐朝的官制。

月底，到复旦大学拜访蒋天枢，谈陈寅恪先生批校的出版及筹备举办寅恪先生纪念大会事。

11月1日，从上海回北京。

是年，主编22卷本唐史丛书，包括唐代政治制度史七卷（分唐代官制三卷，唐代勾检制、唐代门荫制、唐代选举制、唐后期官制的变化各一卷）、唐代法制史一卷、唐代经济史七卷（分唐代土地制度——兼考释敦煌吐鲁番田制文书三卷、唐代盐政史一卷、唐代赋役制度——兼考释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三卷）、唐代财政史二卷、唐代军事史二卷、唐代文化史三卷。确定人选，编纂体例，并自己承担撰写《唐代勾检制》、《唐代门荫制》、《唐代土地制度》等。因出版社人事变动，丛书未克出版。是后《唐勾检制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为丛书之一部分。

编年文《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

1986年

1月，肺炎住院近二十日。

2月，扶病看《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校样。主编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下旬，给82、83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代经济史，每周3学时。

3月，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田制文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唐代土地制度研究》

一书。

9月，给83、84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每周3学时。

招收研究生：徐谦。同时指导日本文部省派遣的交换留学生长部悦弘。

是月，办理离休手续。

11月，完成30万字的《唐代土地制度研究——附敦煌吐鲁番田制文书校释》一书定稿，寄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因出版社经费紧张，未能出版。

《唐代土地制度研究·前言》：唐代土地，大体分为两类，即官田与私田。官田有五种：（一）公廩田，（二）驿封田，（三）职分田，（四）屯田，（五）其他。私田主要有两种：（一）一般地主和农民的田地，寺观中僧尼、道士、女官给田亦属此种，（二）贵族品官的永业田，内庄宅使管理的皇帝、皇室田地亦属此种。寺观中的常住田，其性质也是地主的土地。

本书就上列官田与私田，顺序论述，并根据唐代历史特点，按前后两期，探讨土地制度的变化……

本书第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公廩田、职分田、驿封田、屯田的论述。我着重阐述两个论点：一为在官田上，租佃制普遍化，即租佃制是官田上的主要生产关系，特别是在公廩田、职分田上。二为官田上的主要劳动者是自耕农民，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不是低贱的。这二者是唐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本书第二篇的内容是关于均田制的论述，我着重阐明以下论点：均田制不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而是国家管理私有土地的制度。管理主要表现在《田令》中的收田（退田）、授田（受田）上，也表现在限田和括田上。

唐代土地制度，特别是均田制，是过去几十年我国史学研究者极为重视、积极探索研讨的课题，日本不少史学家也是如此，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有些重大问题，主要是关于均田制问题，还没有突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本书的撰写是我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

本书第三篇移录敦煌吐鲁番田制文书。这是不少读着难于见到的原始资料。移录这批文书的用意有二：首先是便于读者检验我在本书中对这些文书的使用是否得当，得到的结论是否正确；其次，为不少研究者提供资料。对于这批文书，我作了必要的注释。

12月，应《文史知识》邀约，写《学习〈唐代政治史述略论稿〉的一些体会》一文。之后，又继续写《读《唐六典》的一些体会》。

是年，筹划编辑《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撰写并邮寄《论文集征文启事》，向陈寅恪先生弟子等约稿。

编年文《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检讨——读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唐代的小自耕农和租佃制及其他》，《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再论唐代勾检制——唐代官制研究之二》。

1987年

1月，搜集唐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资料，撰写《唐代南及西南地区的蛮、羌、獠族》，探讨蛮、羌、獠族居住地区与唐西南地区开发、蛮、羌族在唐与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后将之修改为《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一文。

2月，再次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作者联系，更改截稿日期。约稿函如下：

前寄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征文启事》一份，想蒙察及。《启事》上原定集稿日期为1988年第二季度，现经承印单位反映，以为为时太迟。爰与季羨林、蒋天枢、周一良、邓广铭诸同志商定，把集稿日期改为1987年12月底为最后日期，特再奉上此函，请予察照，并请能将大作尽速寄下为荷。此颂
撰安。

王永兴

1987、2、12

25日，北京大学198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所出中国古代史“隋唐史”试题如下：

一、民族及文化问题是唐代三百年李氏的关键所在，试就具体史实，详细论述。（40分）

二、试具体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40分）

三、解释下列名词（20分）：

1. 官和职
2. 六军
3. 白马之祸
4. 大谷给田文书
5. 制授告身式

月底，给83、84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每周3学时。“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实习课主要整理敦煌财务帐簿文书。

4月，《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由中华书局出版。

《编写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的回忆和感想》^①：在这本书中，我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搜集史料，尽量完备；二是对有些史料，作了校勘考证。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对隋唐五代经济史领域中的全部史料，都作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就会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又节省了很多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我当时是有志于这样做的，现在仍是有志于这样做的。

我很重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是过去很少为研究者所使用的新发现的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的下列想法。我认为，从实际出发是我们研究隋唐五代经

^① 《书品》1984年第4期，第21-25页。

济史的基本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隋唐五代的实际出发,从隋唐五代的实际经济情况出发。这两种实际存在于隋唐五代的经济资料中,特别是原始资料中,而在原始资料中,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价值最高。原始性很强的资料是研究的出发点……由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如此重要,在《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我企图尽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力求完备。但由于如上所述我编写这本书时所处的时间和环境,我的企图无法实现。我的一部《敦煌掇琐》被没收了,被当作吸烟引火纸一页一页撕掉烧毁了。关于敦煌资料的书,当时我手中只有一本《敦煌资料》第一辑,虽然书中有错误,但在当时,对我是何等宝贵,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宝贵亲切。近七、八年来,大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社会经济文书被整理出来,早年吐鲁番出土但近几年才大批发表的大谷文书,其中有很多极有价值的唐代社会经济文书,如田制文书租佃文书等等。但由于书稿已经付印,这一大批敦煌吐鲁番唐代社会经济资料无法补入。这是《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最大的缺点,但也无可奈何,我对读者感到无限歉疚。

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资料工作没有受到重视,特别是敦煌吐鲁番资料。这种状况,现在应当改变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研究方法,离开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原始性很强的资料,真正的研究是难于进行的。

5月,注释《隋书·百官志》,开始隋官制研究,探索唐官制渊源。

6月,主编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4日至28日在香港参加“国际敦煌吐鲁番学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唐代勾检中财务勾检系统研究》。与“一二九”运动中战友李宗瀛在香港见面。

7月12日,《唐勾检制研究》一书完稿,寄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是月,整理陈寅恪读书札记。

9月,给84、85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代经济史,每周2学时。

招收研究生:张连城、李锦绣。同时指导日本高级进修生辻正博。

是月,为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撰写序言。

10月15日参加了在云居寺举行的首次石经学术讨论会。

12月,开始进行古籍整理课题“唐大诏令集校补”,编辑《隋唐五代诏令目录》11本。

是年,协助“一二九”运动战友何凤元遗孀张滢华收集、复印凤元遗稿,为编辑《何凤元集》尽力。深切怀思感念老友,却因时势,不能为文纪念。

编年文《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勾检制资料试析》,《论唐代的均田制》,《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

1988年

2月,给84、85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4学时;唐

代经济史，每周 2 学时。

3 月，撰写《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经济文书综述之一——敦煌出唐财务文书综述》，主要分析 10 件敦煌“会计历”文书，探讨文书的定名、结构、性质，并考察了唐代官府记账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致研讨伯三三四八背“唐天宝三、四载河西豆卢军交余帐”文书，作为参加敦煌吐鲁学国际学术会提交的论文。

5 月 26 日至 28 日，去广州参加了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会议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主持了专题学术报告，并在闭幕式上作了大会发言。会议期间，与周一良一起，去广州殡仪馆吊祭陈寅恪先生骨灰，内心极为凄凉，行礼后即退。

6-7 月，为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审查会议论文。

8 月，参加北京大都饭店举行的敦煌吐鲁学国际学术会，仍任历史组召集人，继续担任学会常务理事。会后负责编辑会议论文集。

完成《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作为探讨唐后期方镇官制的第一步，也是官制研究系列之七。

9 月，给 84、85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 4 学时；唐代经济史，每周 2 学时。

11 月 15 日，迁居至北京大学蔚秀园 28 公寓 504 号。

12 月，参加点校的《通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是月，编辑“隋唐五代史料丛书”，包括隋唐五代史料整理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校释两类，前者初步选题为《唐大诏令集校补》、《隋诏敕辑校》、《〈隋书·百官志〉注》、《唐田令、户令、赋役令辑考》等，后者包括《敦煌吐鲁番土地文书校释》、《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文书校释》、《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校释》等。后因出版经费落空，丛书未克出版，但仍坚持独自完成了《敦煌吐鲁番土地文书校释》、《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文书校释》、《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校释》等。

是年，闻老友李希泌正编辑《唐大诏令集补编》，毅然放弃“唐大诏令集校补”工作，把出版机会留给老友。

编年文《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

1989 年

1 月，为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讲授“敦煌学”课，分“敦煌吐鲁番的历史地理沿革”、“敦煌吐鲁番文书综述”、“如何整理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等专题。每星期一次，为期一年。

2 月，给 84、85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每周 4 学时；唐代经济史，每周 2 学时。这是最后一次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自 1980 年以来，连续 18 个学期在北大开此课。

《王永兴学述》：1978年，我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我的敦煌学研究进入扩展与深入阶段，其特点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从1979年到我离休的十余年中，我讲授敦煌文书研究课程多次。这在全国高等学校是首创。

如何讲授这门课以及讲授内容为何，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应全面论述国际研究敦煌学的情况，讲述日、法、英、德等国汉学家研究敦煌学的成就和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成就和情况，讲授一年，每周两个课时。

我的意见是：设置这门课的目的是为我国培养训练独立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奠定基础。教学的重点应为培养训练学生独立研究敦煌文书的能力。简要介绍外国汉学家研究敦煌学的情况是必要的，但不可占用过多的教课时间。我主张，教授一年，每周八个课时……一学年每周八课时分为两部分：一为讲课，二为实习。

我讲课的另一内容为：我整理研究一份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的敦煌文书，写成文章，向学生讲述从录文、识字、分句、分段、解释名词，定文书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文书的性质，最后写成文章的全过程。简言之，从读懂文书到以文书为主参以其他史料研究并解决问题，我是如何做的，向学生示范。此即言教与身教也……

在讲课最后两个课时，我指定必读书，并对诸书作了简要说明。

此课程第二部分内容为整理研究文书实习。

(1) 学生抄录我整理文书全文，读上列指定书，检查教师讲课并指出不足之处，或有新说，写成完整的作业。我批改作业后，以其结果讲授一周。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比较正确理解开元水部式，或可发现学生的创新见解。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的实习部分要求学生动脑动手，也要求教师动脑动手，并要二者相结合；教师检查批改学生作业并向学生讲授检查批改的结果就是二者相结合。每一学年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大约十数人，他们在阅读机下照抄的十几份录文，我要在阅读机下十几次检查批改。第二次、第三次作业的检查批改用的时间、费的脑力更多，作业中引用的史籍文献，我要一一据原书检查，指出错误和致误的原因，但又不能影响或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生的作业中表现出他们的创新精神，提出新的见解，使我愉快，感到安慰。深夜，万籁俱寂，我在灯下检读有些书写潦草但大多书写整齐的作业。有时感到十分疲倦，我想到我的恩师寅恪先生关于作为一个教师的言传身教，关于“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的教诲，疲倦消逝，精神倍增，继续检查批改学生的作业。我应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名副其实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的教师，应为此禹域九州广土众民的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人材。

(2) 学生自己选定他整理研究的敦煌文书，这一文书不少于100行。为此，学生要认真检阅《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要认真地在阅读机下阅读文书的显微胶片。这一工作费时费力，很艰难。在一段时间之后，有的学生自己不能选定，则由我选定。文书选定后，学生在阅读机下录文。我检查录文后，以其结果讲授两个课时，指出录文中的错误及致误的原因。

(3) 针对每一学生选定的文书，我一一指定不同的必读书和参考书。两月后，学生整理研究文书完成初稿。我审批初稿后，以其结果讲课一周，指出错误和致误的原因，特别是学风上和读书研究方法上的原因，要求学生再次认真读书，深入思考，修改初稿。两个月后，学生写成定稿，我审批后，以其结果讲课二周，指出错误和致误的原因；我特别着重学风上、文风上的问题；同时在学生作业中选出几份佳文，说明它们的优点。我称赞鼓励学生中有创新精神者，指出要学习陈寅恪先生和其他前辈优良的治学方法，要以创新的精神学习，不可亦步亦趋。

实习全过程的主要环节为学生撰写作业和教师检阅批改作业。敦煌文书研究课为一学年的课程。选择整理百行以下或百行左右文书者，一学年要整理两件文书；选择整理 200 行左右文书者，一学年整理一件文书。大多数是前者。一学年中，学生要撰写六次作业，我要检阅批改作业六次。第一次作业是录文，我在阅读机下检视每字每句。第二次作业是学生在读书后写成的初稿，我检查学生是否认真读书，是否能以史籍文献阐释敦煌文书，阐释是否准确。第三次作业是学生在教师批改两次后，多次读书，通解全文，确定文书的性质，文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为文书定名。我检视审查上述的每一项，肯定对的，改正错的；并指出所以有对有错的原因。

是月，《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编辑完毕。

4 月，参加整理的《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 月，只身去黑龙江省甘南县看望重病的弟弟中五。

《王永兴书信残稿》(1989 年 7 月 25 日)：我 7 月 19 日离开大庆石油学院。到齐齐哈尔，守印(中五子)派车来接。两个小时，到了甘南。中五的健康很不好，久病，虽然是热天气，生活几乎完全不能自理。将近 40 年不见的兄弟，我去了他很高兴。生活环境，特别是卫生条件极差……我很凄然，但愿这不是兄弟间最后一次相见。

《王永兴书信残稿》(1989 年 7 月 31 日)：我在 24 日返校后，稍感疲倦，但休息几天后，反倒更疲倦了。这也可能是通常的情况。这次去东北的半个月，几乎把我积累的体力全消耗完了。在甘南，中五整夜咳嗽，不能睡，我也不能睡。看到弟弟病成这样，我心里很难过。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是不好的。但此行还是必要的。如果中五不幸熬不过这个冬季，这次不去看望他，对我对他，都将是终生恨事。

9 月 24 日，汇集唐流外官资料。30 日，撰写《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之一》。

10 月 4 日，撰写《关于唐代流外官两点意见——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之二》。

是月，给 86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隋唐经济史课，每周 3 学时。这是最后一次开隋唐史专题课，自 1979 年以来，连续 21 学期在北大讲授此类课程。

《王永兴学述》：1979 年秋，在我第一次走上北大唐史讲台时，我十分激动振奋，但又惭愧。唐史讲台是恩师寅恪先生的讲台，我是在讲台下听寅恪先生讲课的小学生，现在我登

上唐史讲台，台下几十双眼睛看着我，真诚地希望从我这里求得有关唐代的真实，求得能走上读书治学与做人的正确道路。我怎么办？我一定要同寅恪先生那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课，我这样决定了，十余年中我丝毫不苟地这样做了，效果是好的。

开始撰写《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完成了“关中府军”和“命吕休璟北伐制”两则。

11月，应新文丰出版公司之约，撰写《敦煌经济文书导论》，作为《敦煌学导论丛刊》之一。

12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季羨林《序》：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之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

是年，广泛搜集北京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军事文书及《吐鲁番出土文书》、《大谷文书集成》、《西域文化研究》、《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所载吐鲁番军事文书，并参考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日比野丈夫《关于新获唐代蒲昌府文书》等，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进行汇编、分类、整理、说明及注释。

编年文《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支书考释》，《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1990年

春，《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考释》完稿。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考释·前言》：不管如何困难，我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总要开展下去。中青年研究者是骨干，这门学问的发展和前途，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怎样使他们真正读懂文书，充分使用文书，这一问题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问题的回答是，我要力所能及地做点工作，减少他们读懂文书的困难。这就是我编著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

我首先把我所掌握的敦煌吐鲁番学文书中的军事文书挑选出来，时间仅限于唐代……对挑选出来的军事文书分类是我在工作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分类就是研究。我考虑到唐代军事上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编制、军费、军仓、军粮、兵甲等等，也考虑到军事上的一些重要时间和问题，如蒲昌府问题、驮马问题等等。本书对文书的分类就是根据上述考虑作出的。对其中的第一类，我应在此多说几句。

唐帝国的创立，在军事方面，李靖之功仅次于李世民。汉水淮河以南直到岭南广大地区的平定，是李靖指挥的几次大战役取得的。贞观四年灭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使北方边境稳定；贞观八年灭吐谷浑，对西方边境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两次大战役也都是李靖指挥的。

从武德初到贞观八年，李靖指挥多次战役的胜利，也是《卫公兵法》在战争中实际运用的胜利。从贞观三年起，李靖任兵部尚书，太宗赐靖诏书谓“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当在是时。可见唐代前期军事制度的建设，应多出自李靖。军事制度的建设也是《卫公兵法》的组成部分。《卫公兵法》所起的作用，不限于武德、贞观两朝，影响到整个唐代和唐以后。《通典·兵典》的撰著，杜佑主要依据《卫公兵法》。在吐鲁番军事文书中，虽只有这一件运用《卫公兵法》的文书，但由于李靖及其《兵法》在唐代军事史中的重要性，故单立为一类，列于篇首。

书名“考释”，考释什么？我考虑到我如何读文书，从识字始。因排版印刷上的困难，文书中的俗体字异体字等，能以通用字代替的，都改为通用字。不能以通用字代替的，就注出读音和字义。其次是文书中的人名、地名、专用词以及各种名称，特别是属于典章制度的，凡属罕见的或不易解释的，我都力所能及地加以注释。文书中涉及的史实和典章制度，诸书记载歧异，就加以考证。文书中的一句或一段，字已认识，名词名称等都能解释，但还是读不懂，这就涉及文书本身出现的历史环境，唐代《公式令》和唐代官府文案的结构以及判案的制度程序等等，我也力所能及地加以解释，解释不了的只能存疑，向读者指出，这是一个我尚不能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考释中，我也尽力吸取过去和现在研究者的意见。文书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典章制度的，我往往说得多一些，从流说到源，引证的史料也多一些。总之，我的着眼点是减少一般读者读懂文书的困难……

为了便于研究者使用每一类文书，在每一类文书之前加以简要说明，指出此类文书的特点、性质和使用此类文书应注意之处。

《目录》：壹、唐战争中列阵队形及战术（唐卫公李靖《兵法》的具体运用）；贰、唐行军镇戍以及战争时的军队编制文书；叁、唐军府上番文书；肆、唐军府检点征行镇戍兵士名籍；伍、唐军府财务文书；陆、唐军队甲仗兵器装备文书；柒、唐军府官马馱马文书；捌、唐军仓军粮文书；玖、唐军府营田文书；拾、唐军府一般行政文书；拾壹、唐军府色役文书；拾贰、唐武官考课授勋官历等文书；拾叁、唐烽堠文书；拾肆、蒲昌府文书；拾伍、唐逃兵及病残兵士文书。

5月，主编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月5日，汇集数十年所撰有关陈寅恪先生史学、差科簿、水部式、均田制、官制、军事史等论文15篇，收入《陈门问学丛稿》。

是月，主编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季羨林《序言》：本论文集的编选工作，王永兴教授实主其事。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了这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感谢他。

7月，完成《库车掇拓文书考释》一文。

9月，肺炎高烧住院半月。

11月，撰写《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

12月，倡议和组织清华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会后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编年文《关于唐代门荫制的一些史料校释》，《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关于唐代流外官两点意见——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

1991年

仍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隋唐史”课。

5月，《唐勾检制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自序》：近年来，我读《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注意到各级官府具有“勾检稽失，省署抄目”职能的官吏，这种官吏就是《律》、《令》中所说的勾检官，或简称之为勾官。除门下省中书省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都设置勾官。这种现象使我认识到勾官普遍存在，勾检制是普遍实行的制度。

近年来，我读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发现很多文书上有朱书字、句和各种朱色标记，数量之多，要以千计。这数以千计的朱书字、句和朱色标记，是谁写的？是谁画的？用意如何？迄今为止，学术界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使我把上述两方面的史料结合起来并回答后一方面提出来的问题是《唐六典》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的记述：“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朱书字、句和朱色标记和“行朱”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意义，这些朱书字、句和朱色标记是勾司写的画的，是属于勾检制的资料。《唐六典》、《旧唐志》、《新唐志》所记载的是勾官和勾检制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上的朱书字、句和朱色标记是勾官实行勾检制的实际记录。

上自中央，下到地方，勾检制普遍实行，并自成体系。唐史研究者熟知唐代官制中的三个系统，即机要决策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和检察系统。但大量事实表明，在这三个系统之外，还存在着勾检系统，而这一点长时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略。唐代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行政办事效率较快较高（这是管理一个封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两者都和官制中的勾检系统密切关联。论述唐官制而不及勾检制，则所论述者是不完备的。我们从唐代的实际出发，可以看到唐官制中本来就有勾检系统。长时期以来，唐官制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忽视，没有得到研究。我的这本小书企图填补唐官制研究中这片空白。我尽可能地详细而全面地论述，希望能恢复唐勾检制及其实行的原面貌。

7月，为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作序。

9月，完成《读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札记》一文。

12月，《论唐代均田制》一文，获首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荣誉奖（1980-1990年度）。

编年文《读吐鲁番文书札记二则》，《吐鲁番出土唐代天宝四载十一月十二月交河郡财务案残卷考释》。

1992年

4月，肺炎高烧住院二十余日。

5月，研读《吐鲁番出土文书》，考释“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分析抄目、兵赐、驮马、胥吏选举、兵器甲仗等问题。

8月，《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完稿。

9月，参加在北京房山举行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担任历史组召集人。学会机构改选中，继续担任了常务理事。

10月，为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作序。

11月，拟写一部《唐代军事史》，分制度篇、战役篇、蕃兵蕃将篇、军事家及军事思想四部分。尤其注意太宗军事思想，李靖兵法、张仁愿兵法等。在写制度篇时，确立了开元九节度研究的选题。

编年文《读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札记》，《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杨隋氏族问题述要》。

1993年

1月，从唐代西北四节度研究入手，探讨唐代前期军事格局。搜集资料，撰写《唐代前期西及西北边境地区军事史料汇编》、《曲江集所见唐前期西及西北边境地区军事史料校释》。

夏，清华老友翁同文自台湾来京，在蔚秀园聚谈，并一同去李赋宁寓所午餐。翁同文谈其海外漂泊经历及《红楼梦》、“天地会”、中西画史、印刷术研究创见，共忆在长沙临时大学听寅恪先生授课情景，同怀徐高阮、丁则良、汪篔诸友。

5月，完成《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初稿。

6月，为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作序。

7月，编辑《安西都护府及四镇、吐蕃、西突厥、突骑施纪事年表》。

8月，撰写《六胡州研究》。

10月，完成《唐灭高昌及西州庭州考论》一文。

11月，《陈门问学丛稿》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记》：选入本书中最早一篇是我1946年写的《论唐朔方军》，虽行文拘束，阙漏甚多，但尚能遵师训不做无史料无依据的议论。它是我陈门问学的最早记录。

1957年写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是我学习敦煌学的第一篇文章……从1958年春到1978年冬的20余年中，在控制使用等等的名义下，我被迫从事于对国对民对自己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在2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的生命被践踏毁坏浪费，只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即整理了斯〇六一三背文书……1978年冬，我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到现在将近12年，我写了若干篇文章，选出十几篇，编辑在本书里。

编年文《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

“者”字的性质和作用》。

1994年

5月，80岁寿辰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6月16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王永兴耕耘教育园地五十春秋讨论会”。

《光明日报》1994年6月19日：日前，北京大学历史系在王永兴教授八十寿辰之际，举行了“王永兴耕耘教育园地五十春秋讨论会”。

王永兴教授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直到七十五岁高龄，他仍然坚持给学生讲课，从未间断。在教学上，他极其认真，对学生言传身教，指导学生系统读书的同时，还让学生自己动手整理敦煌文书，一篇篇批改，直到作品发表，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在科研上，他不仅坚持传统的研究领域，而且不断开拓新的课题，在唐代财政史、军事史、勾检制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是月，《敦煌经济文书导论》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户籍、田制、徭役及财政文书，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该书首先综合论述这四类文书的内容、形式，与文书相关的基础知识，然后结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籍对文书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是第一次对敦煌经济文书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对敦煌与吐鲁番户籍的两种类型格式及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户籍在国家经济财政经济上的意义、西凉建初十二年籍中“吏”、“兵”、“散”的身份、户籍中反映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等级身份的变化、田制文书所反映的唐代均田制的执行情况及性质、差科簿及各种徭役文书形式内容和意义、财务文书的形式（符、关、牒、帖等文书，各种案、抄、历、帐、及簿等文书的区分和特点等）、赋税（租庸调、户税、地税、资课、附加税、杂税、吐蕃及归义军时期赋税）征收文书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创新之见，是作者几十年研究唐史及敦煌文书的总结之作。

8月，主编之《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31日至9月3日，去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柳如是的民族气节》。

5日，参加清华大学复建历史系大会。

月中，开始撰写《唐代前期河东节度研究》一文，主要探讨河东节度的建置及其前身、河东节度辖军及领州、河东节度设置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并考证河东节度使年表。

11月14日，与李锦绣结婚。周一良自美国寄来贺卡：“唐作之合。”季镇淮贺诗：“历尽沧桑逢佳偶，百年史事赖扶疏。人生得意知何在，桃李春风夜读书。”

《催妆诗》其一：坎坷半世幸逢君，八旬又复而立身。宿缘岂因年为限，真情何惧谤器淫。锦心织得春无尽，绣手写就班马文。三生石上有名字，何须问卜月下人。

其二：贞松历劫只自悲，喜沐春光绣手回。蜗居末期晨曦入，锦心照彻静室晖。相约今

生复来世，携手山间更海湄。笑他蚁穴争扰攘，我自比翼万里飞。

12月28日，《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后记》：开天十节度为唐代前期军事史的重要内容。本书论述十节度之四，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朔方，第一部分的五篇论文全面论述西北四节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很多关于上述四节度的史料，结合有关文献进行考证可以较细致地了解上述四节度：即第二部分四篇论文的内容，可补充第一部分论述之不足。

最后，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本书所使用的几十件敦煌吐鲁番文书，把《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的性质和作用》，附于书末。

编年文《读吐鲁番文书札记》，《唐灭高昌及西州庭州考论》，《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官府文书缝背表记事押署钤印问题初探》，《八十述怀》。

1995年

1月30日，除夕，以喜乐振奋之心，迎接新年。

《甲戌除夕赠内》：水仙初放桃符成，喜烛双照醉颜红。曾抛山海无限泪，始得今宵送寒冬。

7月12日至15日，去清华参加“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会议”，提交3万字长文《论唐代前期河东节度——阐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唐代前期军事的论点》。

月中，撰写《论唐代前期平卢节度》。至9月，完成“平卢节度的设置和营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平卢节度辖军考”两部分初稿。

10月2日，汇集有关幽州、平卢节度资料，开始撰写《论唐代前期幽州节度和平卢节度》一文，拟分五部分，即：幽州节度平卢节度建立前后唐东北疆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幽州节度和平卢节度建立的时间，幽州节度和平卢节度的辖军，幽州节度和平卢节度的重要作用，唐代前期幽州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年表补证。

24日，继续思考平卢节度问题，拟探讨：1.平州何时加入平卢，2.开元二十八年，营州治所，3.平卢与幽州二节度的关系，4.平卢、幽州押二蕃等问题。

12月，准备撰写《陈寅恪传》，搜集资料，拟定篇章目录，并完成了第一章《松门松菊何年梦》。

编年文《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柳如是的民族气节》，《宋本大唐六典说明》。

1996年

1月，完成《论唐代前期陇右节度》定稿，论述了陇右节度设置的时间、陇右节度领州及其地理形势、陇右节度辖军、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陇右部分）》补正等四个问题。

认为写《陈寅恪传》，首先应阐述陈寅恪先生治学之道，于是决定探寻陈寅恪先生史学。年初，先写了《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一些体会》，之后，开始撰写《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

稿》。

4月28日，清华校庆日与李锦绣一起参加十级校友聚会，与老友吴承明、黄明信、陈宝仁、李崇淮、郭建（恩）等叙谈。

5月，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至7月，写笔记6本。

6月8日，迁至北京大学燕北园。

9月，李锦绣根据《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已完成部分，写《王永兴谈陈寅恪治史之道》一文，刊于《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

11月，筹划编辑“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年学术丛刊”，设计选题，联络书稿，条列提要，以弘扬义宁之学。

《编撰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年学术丛刊缘起》：陈寅恪先生是近百年来国际人文科学方面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正直，重气节。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不仅在今天为学术文化界所敬重学习，在未来我国学术文化振兴中亦有示轨则为楷模的重大作用。

在陈寅恪先生逝世后，国际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或开会纪念，或撰文赞颂。我国学术界举行纪念寅恪先生的学术活动或撰文著书纪念，颇为国际学术文化界所注意。

我们是陈寅恪先生的授业弟子和私淑弟子，有鉴于上述，拟在1999年寅恪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编撰写书丛刊，以资纪念。丛刊内的专著分为两类，一为直接阐述寅恪先生史学者，一为试用寅恪先生之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研究某一专题者。希望有助于人们了解寅恪先生的崇高品德和博大精深的学术。

编年文《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斯文自有千秋业》，《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种花留与后来人——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龙筋凤髓判校注〉读后》。

1997年

仍在撰写《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炎夏苦热，夜以继日。

3月，为“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年丛刊”出版事联络奔走，逐步落实。但终因“补贴”经费未到位，“丛刊”不能统一出版。

《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序》：今世遵循先生治史之道而取得成就之学人颇多，其中数人原拟编辑出版纪念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丛刊，除（李）锦绣此书外，尚包括蔡鸿生《辛押陀罗事迹》；罗炤《天地会起源研究》；吴丽娱《盐与大唐帝国》、《刘晏研究》；王宏治《唐判研究》；卢向前《敦煌吐鲁番土地文书研究》；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共九种。本拟以统一格式出版，但无力支付大量出版费用，不得已分别先后出版，敢请先生在天之灵恕此愚鲁学生之无能也。

5月，写《怀念则良》。

《怀念则良》：则良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才华超群的有远大前途的学者，才走出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第一步，竟被夺去年轻的生命。我还能说什么呢？昆明文林街先生坡七人，则良第一个走了，接着高阮也与世长辞，流金也于前年远行不归。而今，宗瀛重病在加拿大治疗，消息全无，同文、王勉二兄和我都已老迈，还能培育我们的华夏民族做些什么呢？

8月31日，《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完成，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11月20日，写《怀念季公》。

《怀念季公》：我坐在书桌前，看着张在壁上他祝贺我们结婚的诗句，想着我与季公50年的友情，无限悲伤。谨撰小文，敬当心香之祭。

年底，应浙江人民出版社邀请开始撰写《王永兴学述》。

编年文《论唐代前期幽州节度》，《从陈寅恪读两唐书札记看他的史学》，《论唐代前期的陇右节度》，《怀念则良》。

1998年

1月，为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作序。

2月，《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大师，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研究陈氏史学，不论对集成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还是对将近现代史学推向深入，均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有关陈寅恪生平专著不少，但对其史学尚乏系统论述，且对其史学渊源、史学思想等多有误解之处。本书通过对陈氏所有论文专著的分析研究，指出陈寅恪集成发展了宋代史学，从而理清了我国古代至近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本书还分析了陈寅恪以“求真实、供鉴诫”，“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核心的史学思想，阐明了其“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指导意义，研究了其集成宋代“长编考异”的治史方法，探讨了陈寅恪史学的本质特征。本书还论述了陈寅恪三部史学著作“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保存文化的主旨，部分疏证了陈寅恪读两《唐书》札记。

4月7日，给师道刚写信。

《王永兴书信残稿》：年来读书，偏重我民族古圣先贤之著述，我认为他们的训诫，乃我民族以至人类自救之言。与此不同的高科技发展，虽使人赞叹，但能使我民族以及人类走上康庄大道否？目前南斯拉夫上空之飞机群，不应该使我们三思吗？！

月中，为北大历史系本科生讲“长编考异之法”。

28日，去清华颐越先寓所看望自上海来参加校庆的李宗藻，回忆清华往事，不胜感慨。

6月，应中华书局邀请撰写《我与唐史研究》，20日交稿。

7月12日，《王永兴学述》完成，交浙江人民出版社。

26日，补充《我的治学经历》，回忆往事，思绪万千，不顾手疾，奋力撰写，8月初完

稿。

9月21日，为张杰等编《追忆陈寅恪》作序。

10月8日，再次研读陈寅恪先生读两《唐书》札记，为之撰写疏证。

14日，在陈玉书（述）哲嗣陈重处，复印陈寅恪先生致陈述手迹40封。

18日，应《书品》之约，写《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自我评述》。

29日，开始整理陈寅恪先生致陈述手札，录文、编年，写《序》、《读后》、《后记》，为寅恪先生手札影印出版而奔走努力。

12月，准备撰写《唐代武功研究》一书，以详细阐述陈寅恪先生“唐代武功可为我民族空前盛业”之说。

是年，通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汎森和陈弱水帮助，得与在台湾的徐高阮女儿静华联系，而高阮墓木已拱。

编年文《简述陈寅恪先生之学》，《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怀念赵守俨先生》，《怀念雷海宗先生》。

1999年

1月，《王永兴学述》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永兴学述·自序》：林在勇先生以“王永兴学述”为题，命我撰稿，盛情可感。据我理解，学识精深、能成一家之言的学者。自述其学，可称之为“学述”。我学识浅薄，不敢当此荣誉。然自念从恩师陈寅恪先生受业多年，对先生之学有所理解，而先生之学乃吾华夏民族学术文化振兴之根柢也，其意义重大如此，我对先生之学所知虽少，亦应述之，以供有志于研究华夏民族学术文化之学人参考，故不自量力而有是书之作。

本书分六篇。第一篇为《我的治学经历》，是对我自己治学生涯的回顾。第二篇为《我对义宁之学的理解补述》，在拙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中，对寅恪先生之学有所遗漏且又甚重要者，故不能不加以补述。第三篇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制度（以用水制度为例证）初论》，行政管理，均制度也，此乃受寅恪先生重视制度之启发而作成者；第四篇为《唐开天九节度与四个军事格局中的蕃兵述论》，乃受寅恪先生重视唐代使用蕃兵建功立业之启发而作成者，撰此两篇，亦用以检验我理解并使用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程度如何。第五篇为《我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教学与研究述略》，忆40年代初读先生所著《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知我国敦煌学之研究落后于东西洋各国，并有勉作敦煌学预流之激励，在耻辱与激奋中，我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与教学，此篇乃这一过程的简要记录。第六篇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旨述要补述》，乃为申述先生撰著此书之深意。

2月，准备参加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会议论文，至6月，完成《陈寅恪先生与唐史》初稿。

7月，修改参会论文，易题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陈寅恪先生重视唐史

的原因初探》。

《前言》：对于“自强不息”，我有感性认识，这是由于我的一段痛苦经历。1931年，我在沈阳东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上课十八天，日寇占据了沈阳，我和十个小同学流亡到北平。我永远忘不了自沈阳出走从东大附中到皇姑屯火车站途中被日寇屠杀的我们的同胞横尸路侧，途中，日寇对我们十个中国青年的两次裸体检查。直到现在，有时我的胸口还似乎感觉到日寇刺刀尖的冰冷。在检查时，日寇刺刀对准我们的胸口。在清华，听到校长、师长们讲校训，我明白了自强不息的重大意义。使“九一八”那样的灾难不再出现，使我们神圣国土不再被侵占，我们亲爱的同胞不再被屠杀，只有自强不息。

8月31日，因肺炎高烧，入院治疗，9月14日出院。

9月15日，扶病再改参会论文，三易其稿。

11月27-29日，由子珠群陪护，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学习陈寅恪先生重视、保卫并发展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长达4万字。

12月，为林在勇《体认孔子》书作序。

编年文《试论唐太宗对敕勒族的政治军事政策》，《怀念季公》，《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自我评述》，《赵守俨文存读后》，《我与唐史研究》，《体认孔子读后》。

2000年

3月初，妻李锦绣自英伦归。与妻小别四月，思念成疾，憔悴不堪。妻归后延医诊治，点滴服药两月余，方恢复读书，继续撰写《唐代前期武功研究》。

4月，撰写《怀念高阮》，为能顺利发表，从1937年7月之后写起。

《怀念高阮》：八十年代，老友翁同文兄自台湾来北京，我问及高阮的情况，才知道高阮兄到台后不久结婚，生有二女。高阮已于1969年10月18日逝世。闻之黯然泪下。真难以想到，与高阮昆明一别，竟成永诀了。1969年10月，对我来说是最悲哀的时间。恩师陈寅恪先生是10月7日弃世，11天后，高阮又远行不归，我失去了恩师挚友。在我这多灾多难的道路上，他们都曾经使我迷途知返，他们都曾教诲和帮助我如何作一个真正的人，如何作一个如韩文公所指出的“三不愧”的人。在悲哀之时，我要努力上进，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待。

由于翁同文兄的帮助，我一度与高阮次女通信，承她寄赠高阮的照相和高阮的著作：《重刊洛阳伽蓝记》、《论山涛》，我置于读书写作的案头，作为我读华夏民族古圣先贤的书和读寅恪先生的书的鞭策，永不懈怠，永不休止。遥望南天，以我真情的热泪，悼念并慰藉高阮兄在天之灵。

5月底，应《文物》杂志之约，撰写《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一文。

6月，回忆入清华大学前的生活，写散文《我的最后一课》、《北平街头的小乞丐》等。

7月8日，周一良来访。

《怀念周一良先生》：前年夏天，忽然有一天，他家里打来电话，说一良先生已坐车来看望我了。不久，汽车开到门前，周启锐扶持一良先生下车，上楼到我们家里，我们长时间地握手，久久不放。一良先生更瘦弱了，但仍谈到学术研究，谈买书，谈我们的已经去世的老朋友。

是月，应《东方》杂志之约，撰写《关于敦煌文书研究的两点意见》。

8月，为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作序。

11月17日，与施建中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十余人座谈，讲陈寅恪治史方法和唐史研究中的问题。

编年文《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陈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述略稿》，《关于敦煌文书研究的两点意见》，《我的最后一课》，《怀念郑毅生先生》。

2001年

4月6日，《唐代前期武功研究》一书完稿。

是书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之说的注释说明，展示唐代前期的武功，即创建保卫大唐帝国以及为大唐帝国富强而开疆拓土之战争，论述了秦王李世民消灭北方七个割据势力之战、用李靖的战略策略平江淮两个割据势力之战、李靖李勣讨灭东突厥颉利汗国之战、苏定方平西突厥之战以及唐与吐蕃长时期争夺西域之战、天宝末唐依靠朔方军讨平羯胡乱华的长期战争等。

唐代前期将近一百五十年，是我国几千年来历史中最光辉的时期之一。撰写这样一部全面展示了唐代前期辉煌的武功盛业及形成赫赫武功的原因的专著，就是在试图为增加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做出贡献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之后，补充“军事制度”，将此书扩展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

9月，整理之《陈寅恪读书札记·韩翰林之部》列于《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11月，开始用电脑练习打字。

12月，在电脑上完整打出第一篇文章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之后，又陆续打印了寅恪先生《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丁亥春日清华园作》、《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诗及《陈述辽史补注序》等。

19日，《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交稿。

2002年

1月初，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在电脑上为之作“疏证”，完成“关中府军”、李唐世系、“柘羯”等29条。

月底，读吴丽娱著《唐礼摭遗》，准备写序。

3月14日，《唐礼摭遗》序完成。

4月初，撰写《陈寅恪读书札记·新唐书之部》“疏证”4条。

28日，清华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和校友为之祝贺米寿。

月底至5月初，在北医三院检查及治疗心脏病。

9月25日，由董宝光联系，去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寓所，共话陈寅恪先生在四川燕京大学的事迹。为编写《陈寅恪先生传》搜集资料。

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未能与会，提交了《怀念雷海宗先生》一文，由王敦书代读。

编年文《关于读资治通鉴的一些意见》，《我与“中华”情谊永存》。

2003年

2月，撰写《以长编考异之法治史范例之一》，以陈寅恪先生李德裕贬死年月辨证及李德裕归葬传说辨证为例，说明寅恪先生治史特点，论证修丛目、修长编的方法。

4月，《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自序：（寅恪）先生两次名言均涉及军事，使我认识到撰写唐代前期军事史的重要意义。武功即胜利的战争，胜利的战争与军事制度密切相关，完整的军事史应包括二者，故本书上编论唐代前期军事制度，下编论唐代前期重要战争。

上编《军事制度》论述唐代前期的军事制度，以《唐六典》、《通典》、《唐会要》、《通鉴》所载唐前期军事制度为主要依据，以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唐代前期军事制度的文书为补充，以新、旧《唐书》所载有关唐前期的史事参校、参证之。

下编《武功》简要论述自隋义宁元年（六一七年）至唐至德二载（七五七年）一百四十年亦即唐代前期有关战争之史事。其地域为亚洲东北部、中国北部、西北部至亚洲中部为主，中国南部次之。唐代后期的战争则不涉及。

唐代前期的战争乃为保卫吾华夏民族独立文明之战，乃为解除我国广土众民以及毗邻民族在隋末乱政与东亚中亚霸主暴政下之战，充分表现民族刚毅坚强厚德载物的精神。读这样的战争史，可以增强我民族之自信自强以及卫护长时期优良传统的民族素质。我撰写此书的宗旨如此。

6月，应昆仑出版社之约，撰写《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以期展示一代军事史之全貌。时年近九旬，除生病卧床外，每日在电脑前打字，读书、思考，孜孜不倦。

8月，更换新电脑，用之写出《论北周武帝宇文邕》一文。

编年文《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学习〈唐代政治史述略论稿〉的

一些体会》，《悼念周一良先生》，《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2004年

4月25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师生为之庆贺90岁寿辰。

6月16日，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为之庆贺90岁寿辰。

8月20日，为严耀中主编《论史传经》作序。

9月，《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全部完成，打印稿交给昆仑出版社。

月底，开始写《回忆录》，但时断时续。

12月，完成《回忆录》中的《靠河屯》、《去北平》、《我在十年浩劫中的简略情况》、《我在北京大学二十六年》、《忆恩师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的凌辱伤害》等篇。

年来多病，周身疼痛，殆不可忍，但仍坚持打字。

《给卢向前信》（11月6日）：由于我的身体健康甚不佳，你是最关心我的学生，应该让你知道。在十年浩劫中，我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一次，我死而复活。当时，我在太原。二十年前，我调来北大。从表面看，我的身体不坏。但我自知，受到那样打击，身体如何能不坏呢？我在北医三院检查……医生还说：随着你年龄增加，你要感到很痛苦的。稍后，中医研究院张大夫（北京名医）在北大校医院专家门诊，同意北医三院医生的结论；他还说，你会长寿，但要很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在忍无可忍时，再加一、二个“忍”字，即“忍忍无可忍”。我目前就过着这种生活。但还读书，写文。

编年文《唐人小说红线的历史背景》。

2005年

1月，《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改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7日，完成近两万字的《论后周世宗柴荣》一文。

2月，为了解北宋历史及制度，通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写笔记6本。

4月，肺炎高烧住院十余日。

10至11月，连续到北医三院检查、治疗心脏问题。

编年文《怀念雷海宗先生》、《论后周世宗柴荣》。

2006年

1月，《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了唐代后期的军事制度，包括中央兵部职权的消失、禁军制、地方军制等，重点阐述了地方藩镇兵制及史籍记载较略的其它地方军事制度。下编列举了展示唐代后期的武功，包括讨伐藩镇（如讨伐朱泚、刘稹，收复淮西）、平定叛乱，征服其他

部族（如征讨吐蕃、党项、回鹘等）等部分。

6月，接受《南方都市报》李怀宇采访，李撰《王永兴：师从陈寅恪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刊于2006年9月20日《南方都市报》。

9月，开始撰写《隋唐五代史简述略论稿》。是书拟供初学者学隋唐五代史参考，共分十五章。

《目录》：一、富强统一的隋帝国及其灭亡；二、唐王朝的建立；三、统一全国；四、政治安定及经济恢复期；五、唐富强和社会经学术文化稳定上升的几个基本条件；六、唐太宗与魏征；七、武周时期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升降；八、开元天宝时期；九、唐代前期的等级、家庭；十、安史之乱；十一、中晚唐的土地制度、经济和财政；十二、中晚唐的政治；十三、九世纪中期的亚洲形势；十四、晚唐政治和分崩离析的政治局势；十五、缓慢而痛苦的统一过程。

20日，完成《论李靖》一文，是文主要利用唐代正史、笔记小说等，探讨李靖在大唐帝国建立之前及帝国初期的作用和地位。

《附记》：李靖是大唐帝国创建人之一，也是我所钦敬的贤者。故写此文，此之以悼念我所敬佩的有如良师的益友玉哲学长兄。

11月18日晚，摔倒伤腰，卧床不能起四月余。

编年文《唐人小说虬髯客与唐史研究》。

2007年

3月，坚强站起，终能行走自如。每日至书房读《资治通鉴》，继续撰写《隋唐五代史简述略论稿》。

5月，被中华书局聘为“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学术顾问。

11月，读《丁则良文集》，百感交集，为之作序。

12月19日，摔倒，轻微骨折，卧床二月余。《隋唐五代史简述略论稿》书稿终止在第三章第四节“唐高宗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编年文《论李靖》。

2008年

1月15日，任继愈派人送来治伤药膏。

《任继愈来信》：得悉吾兄患外伤，十分惦念。今送上“云南白药膏”三盒，请试用。如效果显著，可来电话，我托人再购买送上。我们都过了九十岁的老人，要好好保重，安度晚年。有事，可随时请锦绣同志告知，当尽力去办。老朋友，不要客气。

2月，再次站起行走，并坚持做轻微家务，但不能下楼外出了。仍每日读《资治通鉴》。

3月，编辑《王永兴说隋唐》，4月初，编选完毕。

是书分“总说”、“分说”两部分，汇集了他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宋本《大唐六典》等史籍文献，关于杨隋氏族、唐太宗经营西北的策略、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朔方军、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等政治军事史，唐代均田制、差科簿、色役制度、唐代土贡、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等经济史，勾检制、流外官等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

5月，所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一书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提名奖。

7月16日，高烧，去北大校医院治疗。17日，入住校医院，确诊为肺炎。每日点滴治疗。

8月14日，炎症基本消失，出院。在家中体温平稳，坐在藤椅上观看电视中的奥运节目，为中国健儿的战果欣喜。奥运闭幕式后，又决定重新研读《资治通鉴》。

25日，高烧，再次住北大校医院治疗。

9月8日，因低烧持续不退，被怀疑为肺结核复发，转院至北京老年医院。北京老年医院原为肺结核疗养院，毗邻西山，空气清新，环境清幽。经数日治疗，体温趋于正常，体力也多有恢复。每日上午点滴，下午坐轮椅漫步于小松林，吟诵陈寅恪先生诗。

14日，中秋节。傍晚，遥望夕阳照耀下的西山，在松林小径迟迟不愿离去。晚饭后，再次出来，欣赏初上柳梢头的中秋圆月。回到病房，坐在凳子上读《陈寅恪诗集》，不肯上床躺着，说：“我还想再看一会儿，不想那么早睡觉。”

15日再次高烧，用药后烧退，侃侃而谈。18时，坐起吃晚饭，平静去世。

2009年

1月，《王永兴说隋唐》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编年文《读〈唐六典〉的一些体会》，《论北周武帝宇文邕》。

编后记

王永兴先生去世后，我的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想到他，总会泪如雨下，心如刀绞。他在我心中那样深，思念的伤痛，让我忍不住要颤抖呻吟。我只能把和他的种种，包好藏在心底，就像放在电脑中的另一个文件夹，封存在一个不常开启的抽屉。我没有足够的坚强、足够的忍耐、足够的从容，去触碰它。

今年春，师兄师姐们编辑了这本纪念文集。编写他的年谱，我义不容辞。就这样，我踏上了漫漫求索之路。从东北黑土地到水木湛清华，从翠湖细雨到黄陵风沙，我追随着他，走过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走过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那发黄的档案、尘封的历史深处，埋藏着那一代知识分子长期受难的生涯。我尽量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训练和眼光，审读这些资料，然后用“合本子注”的方式，把他一生的荣辱悲欢浓缩在这份年谱之中。

本年谱的编写，得到吴承明、苏寿桐、郑克晟、郑克扬、郭德魁、刘桂生、余太山、林

悟殊、张希清、马怡、李志生、刘蕙莉、朱俊鹏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由于资料匮乏，这份年谱（尤其是 1978 年以前）编写并不完备。这只是一个开始，搜集资料的工作还将继续下去，恳请广大读者帮助提供资料，片纸只字，弥足珍贵。不胜感激之至！

由于王玉哲、殷叙彝先生及刘蕙莉、李志生女史等的帮助，终于基本凑齐了他各个时期的照片。我再无“纵使相逢应不识”之虞了。来生不论在什么年龄段遇到他，我都会在茫茫人海中一眼把他认出来。

李锦绣

2009 年 6 月 16 日

王永兴先生主要成果目录^①

一、教材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4月（与王剑英合编）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9月（与王剑英、王芝九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第一分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6月（与王芝九、王剑英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第二分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7月（与王剑英、王芝九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一分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11月（与王芝九、邱汉生、王剑英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二分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12月（与王芝九、邱汉生、王剑英合编）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教师适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7月（与王剑英合编）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初级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教师适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7月（与王剑英、王芝九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教师适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8月（与王芝九、王剑英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教师适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8月（与王芝九、邱汉生、王剑英合编）

《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12月，（与陈乐素、李光壁、邱汉生、王芝九合编）

二、著作

《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8月。

《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

^① 此为王永兴先生已发表成果目录。

- 《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
- 《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
- 《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6月。
- 《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 《王永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 《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昆仑出版社，2003年4月。
-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 《王永兴说隋唐》，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

三、论文

- 《中晚唐的估法与钱币》，《社会科学》5卷11期，1949年。
- 《论朔方军》，《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
- 《朝鲜的爱国主义者李舜臣》，《天津进步日报》1950年
- 《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上的表现》，《光明日报》1956年2月16日
-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试教工作里的一些经验》，《历史教学》1956年6月
- 《介绍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历史教学》1956年7月4
- 《从西晋到唐劳动人民徭役负担的减轻》，《光明日报》1956年8月30日
-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基本线索和重点》，《历史教学》1957年3月
- 《关于唐朝法律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4月，收入《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论文选》第三分册，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辑，1980年
- 《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沙知、孔祥星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史学卷》，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唐律〉所载“同居有罪相为隐”一语如何理解？》，《历史教学》1962年3月
- 《论魏徵》，《学术通讯》1962年3期，37—42页
- 《试谈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光明日报》1962年6月6日《史学》。
- 《关于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学术通讯》1963年5期。
- 《关于黄巢之乱的一些史料考辨》，《文史》第5辑，1978年12月
- 《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文史》8辑，1980年
- 《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的几个问题》，《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1981年
- 《试论唐前期布的货币职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 《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记帐户籍残卷》，《历史论丛》2，1981年
- 《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
- 《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4期。
- 《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
- 《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2卷，1983年
- 《七十年来我国敦煌研究文献目录》，《丝路访古》，1982年
- 《吐鲁番出土范德达告身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
-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文史知识》1985年6期
- 《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3期
- 《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检讨——读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中国史研究》1986年1期
- 《唐代的小自耕农和租佃制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4期
- 《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 1986年
-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1期，收入《解析陈寅恪》，张杰、杨燕丽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 《再论唐代勾检制——唐代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
-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勾检制资料试析》，《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
- 1987年
- 《论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
- 《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
- 《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 《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支书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续集》，1989年
- 《关于唐代门荫制的一些史料校释》，《郑天挺纪念论文集》，1990年
- 《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1990年
- 《关于唐代流外官两点意见——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
- 《读吐鲁番文书札记二则》，《中国文化》4卷 1991年
- 《吐鲁番出土唐代天宝四载十一—十二月交河郡财务案残卷考释》，《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5期
- 《读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札记》，《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1992年
- 《〈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文史》35辑 1992年

- 《杨隋氏族问题述要》，《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1992年
- 《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国学研究》1卷，1993年
- 《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的性质和作用》，《九州学刊》5卷4期，1993年
- 《读吐鲁番文书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期
- 《唐灭高昌及西州庭州考论》，《北大史学》第2卷，1994年
- 《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国学研究》第2卷，1994年
-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官府文书缝背表记事押署铃印问题初探》，《文史》第40辑，1994年
- 《学习〈柳如是别传〉的一点体会——柳如是的民族气节》，《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宋本〈大唐六典〉说明》，《一九一一——一九八四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中华书局，1995年
- 《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斯文自有千秋业》，《学人》10辑，1996年，收入《陈寅恪印象》，钱文忠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解析陈寅恪》，张杰、杨燕丽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 《读〈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学土》第2卷，1996年
- 《论唐代前期幽州节度》，《学人》第11辑，1997年
- 《从陈寅恪读两〈唐书〉札记看他的史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4期
- 《论唐代前期的陇右节度》，《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
- 《简述陈寅恪先生之学》，《学人》第13辑，1998年
- 《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学人》第14辑，1998年
- 《试论唐太宗对敕勒族的政治军事政策》，《北大史学》第6卷，1999年
- 《略论 S.613 背敦煌文书载西魏大统十三年七户纳税制》，《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宋家钰、刘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关于敦煌文书研究的两点意见》，《东方》2000年7期《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文物》2000年8期
- 《陈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述略稿》，《学术研究》2000年12期
- 《关于读〈资治通鉴〉的一些意见》，《文史知识》2002年1期
- 《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3期
- 《学习〈唐代政治史述略论稿〉的一些体会》，《书品》2003年4期
- 《唐人小说红线的历史背景》，《文史知识》2004年2期，100—103页
- 《唐人小说虬髯客与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6期，74—76页

《论李靖》，《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66页。

《读《唐六典》的一些体会》，《文史知识》2009年2期。

《论北周武帝（宇文邕）》，待刊《文史知识》2009年。

四、主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1至5辑，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990年。

《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五、整理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

《陈寅恪读书札记·韩翰林之部》，《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三联书店，2001年。

六、点校

《通典·食货典》卷一至十二，《通典·职官典》卷十至二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

后记

去年9月22日，是为王先生送别的日子，弟子们聚在一起，商议出版一部纪念文集，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在之后的日子里，文集的征稿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支持，赐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王先生的同窗学友颉西王勉先生、吴承明和黄明信先生，还有一些前辈学者如吴小如先生等和几位日本友人，以及王先生的忘年之交及故人之子。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弟子则是主要撰稿人。于是在今年的深秋之际，我们收获了这部赞美先生的功德伟业，充满着怀旧、感恩之思，述说与先生的交往受教故实及有关他丰富生活片段的动人篇章。

文集是对王先生人生价值和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和褒扬。尽管先生一生坎坷，尽管先生处世为人的细节之处并非完美无缺，但无论是先生的故交友朋，还是受业弟子，都会为其百折不回、九死无悔的奋斗精神所鼓舞，为其严谨求实、大朴似拙的治学风范所钦服，也都会为其以诚待人、尊师重教的高尚人格所心仪，并给予众口一辞的崇高评价。“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一生都在勤奋努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先生的学问与言行教化、影响了数代学人弟子，成为留存于世人心中和昭示后学的丰碑。

我们也同时收获了历史。见到这部文集的人，都不仅会为王先生一生所做的学术奉献而感动，也会知道如王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是怎样在国难当头之时以一腔热血投身于爱国运动；又是怎样在国家民族文化遭受重创之际，当仁不让地擎起承天之柱，承担了使学术迁延不堕和衔接新旧的重任与使命。作为学术殿堂中的补天者，作为陈门弟子和义宁之学的传人，王先生不畏艰难，筚路蓝缕，将被证明是最传统而淳正的治学之道训示后学，也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真谛发扬光大。“种花留与后来人”，今天的学术繁荣及走向世界的辉煌成就便是王先生和他的同辈学人创造历史的延续和见证。

今天和未来的史界学人，都将永远不会忘记王先生。

本文集的文字与写作格式等由李锦绣、吴丽娱作了编校统一。

最后，我们向文集的所有撰稿和提供照片、实物者表示深深谢意，并感谢中华书局为文集出版提供的资助和奉献。

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编撰委员会

2009年9月